延安访问记

陈学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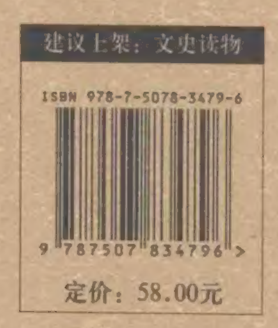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内容简介

《延安访问记》初版于1940年，是一部融入了作家思考，显现出作家性情，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长篇报告文学，被誉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作品兼具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长，侧重于从日常生活现象入手，作细致的体察，用女性作家特有的温婉而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活的生活质感的延安，不乏思想锋芒。

作者简介

陈学昭（1906—1991），原名陈淑英，笔名学昭、野渠等，浙江海宁人。中国现代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翻译家。早年留学法国，毕业于法国克莱蒙大学。1923年至1991年，辛勤创作68年，留下400多万字的作品及译著，体裁较为广泛，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著有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春茶》，散文《倦旅》、《忆巴黎》，回忆录《天涯归客》、《浮沉杂忆》、《如水年华》，报告文学《延安访问记》，翻译作品《列宁与文学及其他》、《〈噼啪〉及其他故事》等。



ISBN 978-7-5078-3479-6

9 787507 834796 >

定价：58.00元

延安访问记

陈学昭 著



延安纪实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访问记 / 陈学昭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书海钩沉·延安纪实）
ISBN 978-7-5078-3479-6

Ⅰ.①延… Ⅱ.①陈… Ⅲ.①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2949号

延安访问记

著　者	陈学昭
责任编辑	张娟平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79-6/I·323
定　价	58.00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陈学昭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与毛泽东等合影（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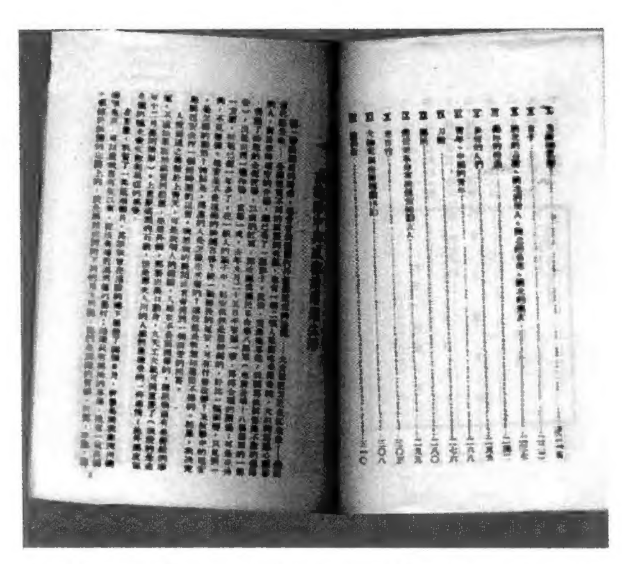
第三排左起第四位是陈学昭



1953 年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苏联（右四为陈学昭）



《延安访问记》（1940 年香港北极书店出版）书影



《延安访问记》（1940 年香港北极书店出版）目录与正文

生命在于运动

陈学昭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杭州

陈学昭的手迹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即抗战初期），中国出现了一股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潮流，有人称之为“圣地洪流”。著名诗人何其芳如此描绘当时的情形：“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吸引了他们从海外、从全国各地纷纷奔赴延安？他们抵达延安，看到了怎样的“延安风景”，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延安精神”？

“书海钩沉·延安纪实”系列，从诸多描写延安的纪实作品中遴选出三部作品：著名作家萧军先生的《侧面——从临汾到延安》，著名作家陈学昭女士的《延安访问记》，著名记者、杂文家赵超构先生的《延安一月》。这些作品将有助于解答上述疑问。《侧面——从临汾到延安》纪录了以作家萧军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奔赴延安途中所感受到的“圣地延安”所处的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延安访问记》纪录了一位女性作家敏锐而细腻的感受中的延安知识分子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形；《延安一月》纪录

了有着“国统区新闻记者”身份的赵超构站在“国民的公正观点”立场上，对延安进行的一些“轮廓的报道”、“忠实的介绍”和“自由的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侧面——从临汾到延安》亦从“侧面”见证了萧军、萧红从此分离的情形，有重要的文学研究资料价值；《延安访问记》则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延安一月》更是被毛泽东称赞为：“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这篇报道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要而言之，这些作品尽管立场不同，着眼点各异，但都不失“纪实精神”。

牢记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获得正能量。借助文字的力量，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延安精神”的魅力，从而更清晰地观照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是为此次出版之大义所在。

目 录

一　成渝路中与成都的两周生活

统一战线刚成立的时候，延安曾有国内外新闻记者去访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各种性质不同的团体的参观，也有一个两个人单独地来探奇的。大约稍稍关心国事的人，对于彼时延安的介绍，总已有了一点影子。此后，芦沟桥事起，我国为抵制强敌不断的侵略，发动了神圣的全面抗战，以前的红军，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第十八集团军的一部分），出赴山西一带作战，当第一次，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平型关一役，博得全国的赞扬；可是在另一方面，抗战已经一年多了，在一般人的脑子中，延安依然是很神秘的，好比一幅图画，只见到一角，不见整个。延安是不是这样的神秘古怪？

统一战线后的延安，可有什么改变？及抗战中的延安，是怎样的动态？特别是，那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着的？这些都是我想知道而不得的。结果，我决定跑到延安去作一个短时间的逗留，我想我的疑问或者会得到一个清楚的回答。

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是我个人的经验，入蜀并不是顶困难的，虽然我没有坐差船的幸运，不过如果能想法买到船票，坐着外轮，那么由汉口动身，九天工夫就可到重庆了（我说的是去年十二月里的情形）。上重庆码头的石级，怕是那些入川的人感到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此外那皮包骨头的轿夫会使你起异样的感觉。

在重庆，我留了一共近两个月，另外，我曾在涪陵的乡下居住了四个多月，我很高兴我在四川的乡间生活，可以说我自有生以来，从没有接近过那样的农村：四周只有稀稀的草屋，没有一家店铺，来往于狭隘的山路上的，就是那些赤脚的下田的男女同胞，他们是那样的质朴，天真，辛勤，他们又那样的贫苦，绝对不能以江浙的农人来比的。真的不到四川，不知四川农村的苦，江浙的农人，有时会穿起绸衣，皮褂，下雨的时候，穿上一双套鞋；可是四川的农人的生活，决不是江浙农人所能想象的，吃的是杂粮，蚕豆，山芋，吃玉蜀黍已算是好的；穿的是补成千块的破衣。离涪陵二百里的重庆，那一切就完全不同了。逃难的人源源地来，旅馆里塞满了人，街路上，店铺里，饭店里……没有一个地方不塞满了人。一间没有上海的亭子间

那样大且十分暗黑的房间，要十五元一月的房租，而且要先付的。许多穿着华美衣服的男女老幼，在街头，在戏院门口，一群群地走着、立着，总要以为有盛大的什么会似的。饭馆门口停着许多辆挂着“防空”标志的汽车，在青年会旁边的京菜馆燕市酒家，星期六的晚上，除非在五点钟之前去，否则，找不到一个座位。大家用畅了钱，大家也赚够了钱。但是你如果有感情，一定会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到重庆的生活是寒热的生活，而不是健康正常的生活，一切都在发着寒热。真实地说，我不爱重庆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不是战时所该有的，尤其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的一个自卫战争的时候，这个现象将是很羞耻的。我急于想离开重庆，但在另一方面，我是依恋着重庆的，那些朋友，他们对我太好了。为了来接我，渡船触礁，几乎淹死的济安先生与赵学广先生同他的夫人，使我感愧，不安到极点。别离了十多年的鸿明姐，居然在重庆会面，她的真挚，她的友情，一如往昔，那一天的晚宴，更使我感动的，是桌子上有杭州莼菜汤与昆明的火腿（她说以代替金华火腿的）。我们谈了些巴黎的前后旧友，有的已死了，谈着当年在北平时的一切，那时我们的游踪，北海，三贝子花园，陶然亭……我真的感激她那样热情热意留我住在重庆，可是我还是走了，鸿明姐，我想你一定会原恕我的吧。

从重庆到成都去的公路，汽车每天顶多只开三辆，旅客已登记到八月初。虽然一切都还是人情问题，但我不耐

烦等下去，也不想去走路脚弄票子（因为路脚之上还有路脚，除非是顶大的路脚）。靠了一位懂事务的朋友的帮助，想出了一个妙计：由重庆坐船到嘉定[1]，由嘉定再坐公共汽车到成都，这是绕了圈子。照我们以理推想，绕圈子的人一定不会多的。六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我上了××公司的××轮，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统舱里早已挤满了人，没有一个空隙，人家还是午后一时就来占住铺位的。没奈何，只好在烟筒旁边铺下了我的睡位，胡乱地睡一夜。次日早上五点，船开了，马达的声音同烟筒所发出的热气把我惊醒过来，虽然有风，可是那热气简直把我烘得头晕。最令我失望的是旅客大部分都是走长路的，并且竟有好几个南渝中学的学生是要由嘉定再转成都的。

在这只船上，有好几个自江浙流亡出来的家庭，有一个无锡人，夫妇俩带了三个孩子，大的只有五岁。无锡我曾住过一年半，对这个城市留得极好的印象，工商业发达，知识开通，文化水准相当的高。我同他们就谈起无锡来了。

“现在无锡出来的人回去的很多，听说公花园一带被日本人烧掉的房子现在又建造起来了，又好做生意了。”他说。

我同他谈到无锡的伪维持会，他说起他同族的一个工业家。我说：“怎么他会做这个事？爱钱，他不好早点把他

---

① 今四川乐山市。

的工厂搬到后方么？他不是还可以赚钱，而且更加赚得多呢！现在的布比从前贵了几倍。他那些工厂呢？”

“工厂都给日本人收去了。无锡没有失掉以前，维持会的人早已安排定当。他做会长总比江北人来做好些，现在各处失地都有维持会，恐怕办得要算无锡的最好了。”他说。

我听了他的话不知该笑还是该哭，这位先生自然不能代表所有的无锡人，不过可以代表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代表一小部分人只知道赚钱，做买卖，没有丝毫国家民族观念，把做汉奸也当做是一件生意经的！

一号的晚上，到了泸县，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乡，因此对于这地方我更有兴趣。上岸在公园里走了一个圈子，就去吃晚饭，泸县的马路很宽阔，市面热闹，人也极挤，都是我所意想不到的。我爱到一地去问一地的物价，就走进一家杂货铺里，那些重庆很贵的香肥皂，在泸县还没有涨价，特别是热水壶，价值比汉口也还便宜。这些当然都是陈货，但是为什么还没有涨价？也许是销路不畅，也许是他们不灵市面。结果我买了几块香肥皂，就回到船上。那晚船停歇在泸县。泸县虽是山城，但没有石级要爬，所以给了我极好的印象。

所乘的轮船挂牌直放嘉定，问了公司也得到同样的回答。可是船到叙府，船上的人把旅客全部赶下船来，托言水小，船不能行，当夜叫旅客换票，又说嘉定已有小火轮

下来，上水的旅客都可接着登轮。原轮呢，明天一早开回重庆去。

旅客们大家下了船，把行李搬到趸船上，等待小火轮到来。过了一夜，次日早上，小火轮总是不来，大家开始懊悔，而忿慨起来，可是原轮早已开掉，去同哪一个算账呢？趸船上的人是不能负责的。

那天夜里，大家七颠八倒地躺在趸船的地板上，臭虫从地板上，壁板缝里，四面八方地聚拢来，一捉就是十几个，那数量实在惊人。那夜我就没有阖上一眼，不停地捉臭虫，别的人也不能安睡，大家叹气，抓痒，诅咒那船上的办事人。

天下起雨来了，沉沉不断的四川的雨，对于这一群旅客，更加上了一层失意的打击，一个华西大学的学生同两个南渝中学的学生提议说："轮船把我们抛在这里，今天我们花钱吃饭，这哪是我们预算了的？实在我们可以要求趸船上给我们开饭。"他们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全体旅客的赞同："要得！要得！"马上推了七八个代表去见趸船主任，趸船主任回答说他不能作主。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去轮船公司，好得公司就在码头上。

"经理先生还没有来。"公司里一个人出来回答。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办公时间早上八时起，现在九点多了。""在什么地方？""差人去叫他来。"代表们说。

公司里面走出了一个高个子穿短衣裤的人来："什么？

有话对我说，我去转达经理。”

“你说经理不在呀，到底在不在？你不要敷衍我们！”

这个穿短衣的人没有法子了，只好听代表们气忿焦急的叙述。

穿短衣的人回进去了一歇走出来说：“公司里不能为你们开饭，贴发你们饭钱，好不好？”

“也好，”大家马上说。但是贴发多少呢？经过一阵商量之后，以票核算，统舱每天每人伙食费五角，照船上的规矩，坐统舱吃房舱饭的，每天加四角，那么坐房舱的人不是该有九角伙食发还么？结果因为房舱客少，要求与争论终归徒然。

午饭时，大家上菜馆去吃饭，虽然给臭虫搅了一夜，这一顿午饭，却使我对叙府的印象变好了许多，花了三角钱吃了一大饱：一角六分一只炒腰花，一角钱一只肚汤，四分钱饭。腰花一大盘，肚汤一大碗，至少可吃四个人。四川内地的生活与江浙一带的生活程度比较，真是相差了好几倍。

小火轮到晚上七时才到，这就是我们该换的上水轮船。那是一只很小很小的轮船，没有房舱，大家像鲞鱼一样地叠在狭小的统舱里。刚刚搬上行李，铺舱位，喘息未定的时候，船上的茶房来查票，同我们转船的旅客吵起来了。原来我们转船过来的有二十多人，叙府民生公司方面曾声明我们二十多人有占舱位的优先权，要等我们铺好舱位之

后，见有空的才得售票，可是公司方面对于这话食言了。他们尽量售票，而这批新客人待小火轮一到，就争先上去，使我们转船的人挤得毫无办法，连脚都伸不直。但是我们只不过感慨一下，而没有正式提出抗议。哪晓得公司方面，大约不甘心五角钱伙食的发还，叫茶房出来与我们寻事，我们中的一个旅客（从前是某大学的教授），他捷足先登，占了一个好位置。所谓好位置，就在统舱地上的一条长而高的柜上，正在满意地铺被头，茶房来查票，查到他，叫他搬下来，声言这是船上职员睡的地方，这一下，争执可起来了，我们转船过来的全体旅客，都帮助这个大学教授。本来，由叙府上来有两个老太婆，她们带着装满了香的大网篮，上峨眉山去烧香，她们把她们的网篮以及小包大包，在她们的四周像布起了铁丝网，而在她们的里面有坐有躺的。两个人，占住了至少有五个人的地位。大家心里虽然有些不乐意，可是为了她们的年龄而宽恕她们，一个学生请她们把网篮移紧一点，她们大声地吼骂起来，反把网篮往学生这边推，这个学生也只好笑笑不出声了。这一对老太婆使我忽然回忆到十几年前我在京奉车上遇到的老太婆，为了请她让一点位置，她索性把身体倒在我身上睡觉。我们对茶房说请他转达我们的要求，为了优待这两位年老的烧香太太，请把她们安置到经理室去，我们并不一定要占住这个柜子，只要地下有空，大学教授马上会下来。

“我们没有办法！”茶房说。

"我问你，你们要钱就有办法！"一个旅客说。

一阵哄笑，茶房只好走了。

一歇后，两个航警，他们背着枪，向大学教授说："这是我们的铺位，下来，下来！"

"你们是不是船上的？"

"不管，我叫你下来！"

他们声势汹汹，而且还带点流氓气。

大学教授一个人应付不过，他们竟想把他硬拖下来了，我们群起对付，毕竟多数人的力量是不可侮的，这两个流氓也只好悻悻然走了。

我们还等待着第三次麻烦来，倒没有。

以前我是很爱好旅行的，但是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固定的生活久了，会使你减少这种旅行的爱好，而眷恋着安定生活。但我终究确信，你读过对这个地方的十部书，终不及你自己到这个地方去旅行一下。

船上的事，大家除了吃了睡，睡了吃外，余下的就是同这些差不多的顶物质的事情。有的人找些书同杂志看——船上有一个图书库，有的人呆看着山水，有的人简直尽睡觉。在我旁边的一家镇江人，老夫妇带着二子一侄，稍微遇到一点刺激，就叹息起他们的流亡生活来。他们是从敌机的机关枪扫射下逃出来的，在南京开的店铺给敌人占去了，两个老人，好几次为了没有把账簿带走，相互埋怨，而争执起来了。

"好了，你们逃出了性命已很运气了!"旁边的人劝说。

最使我发生兴趣的，是那两个去烧香的老太婆，每当开饭以前，小桌子刚刚搁起，她们两个就没命的往网篮底下找些酱烧鸡，罐头牛肉。她们的香底下，装满了这些美味。吃饭时，她们尽量咀嚼着吃。睁着两只皱眯的眼睛，真的，那神气，似进入了无忧世界，极乐天国去了。

半路上来了一群到嘉定去会考的初中女生，由几个教员带领着，船上是那么地挤，她们只好往一点点空隙中去钻，有三个就钻在老太婆的香网篮旁边，船颠簸得很厉害，一下子站不稳，她们三个人坐到网篮上来了，她们伸伸舌头，赶快站起来，这一下，可把所有的旅客都引得大笑了，两个老太婆嘴里叽叽咕咕不知在说些什么。

由叙府上嘉定，岷江的水流越来越急剧，一个一个的大旋涡，使你望见了要头昏，有的人竟会因颠动而呕吐起来。更可怕的，船的行驶，像个醉鬼似的东倾西斜，好几次船尾差一点要碰到边岸的石块了，岸上的树枝从我们脸上擦过去，旅客大家透了一口气。虽然你清楚地望得见清秀笔立的四川特有的山，山坡上的玉蜀黍，芦蔗，麦子同高粱，但那死的恐怖时时刻刻会逼上你的心头，像在大风浪的印度洋里一样。

沿江的山上，有时坐着一个农人，他悠闲的神情，令人想到王维诗中所描写的。其实呢，与其说这个农人的悠闲神情，还不如说是我的悠闲心情。这一带江上，有木船

行驶，他们很多人，二人一排地摇着，因为水急，上水是很困难的，他们拼命地摇，口里齐声喊着，有的人一丝不挂。我在法国时，曾见到电影中，外人摄去演映的“扬子江上的船夫”，而比拟从前的“伏尔加船夫”。当我们小轮过去时，木船就颠动得很厉害，快要翻了那样，听说有时候，的确也有翻了的。

终于在七月七日的午后五时左右，到了嘉定，一尊极大的佛像，高高地刻在山上，隔着江遥对嘉定城，这是嘉定的标记。船停在江心，旅客由小船过渡靠岸。在船上望嘉定，是一个可爱的小小山城。我说小小，在四川，这却是内地的一个大山城了。经过了一番纷扰，我也带了行李过渡，上了岸。上岸后，经过一番严密的盘问与检查，为了防止汉奸活动，这也是该当的。但不知为什么对于一些非四川口音的旅客，盘问特严。他们盘问着，好似还不知道我国的抗战，也不知道这次因了反抗侵略战争，同胞们有极大的移动。盘查完毕，才把行李装上黄包车往旅馆去。

车停在一个新开的名叫东园宾馆里，里面有一个园子，满栽花木，茶阁临着嘉陵江，风景是够美丽的。但是房间却一间也没有了。靠了那两个年轻的朋友（南渝中学学生），他们用本地话去同老板交涉，结果，老板答应让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给我。没有床铺，给我放一只帆布床，那两个学生呢，只好睡在茶阁空楼的地板上。

在旅馆的花园里吃晚饭，吃到比重庆便宜的鱼。晚饭

后，马上出去探听上成都的公共汽车。嘉定有一条水门汀马路，两旁的店铺都还整齐。公共汽车站在城外，到那里问讯了一下以后，把我上成都的整个希望抛到了深沉的海底。他们的回答是这样："车子也不一定有的，顶多是开三辆，或者两辆，或者一辆。我们不用登记手续，登记手续以前用过的，但是结果是，登记的人不来买票，不登记的人来抢票，所以不登记了，登记也是无用的。"

"那么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发牌子，早上五点发牌子，六点卖票。可是人家在半夜十一点，十二点，就来我们售票的门口等待了，有的搬了木板索性睡在售票门外；有的唱歌，有的说笑，你看怎么样？弄得我们睡也不能睡。"站上的职员一边笑，一边说，一边做着鬼脸，"你知道，现在嘉定旅馆里还留有三百多人，在等待坐上成都去的汽车。"接着他说："看你们的幸运吧，早点来抢牌子就是了。"

回到旅馆里，商量办法，看来明天是走不成的分儿多。我们商量，决定我的年轻伙伴，两个学生早点起来去抢牌子，我留在旅馆中照顾行李。如果抢到一张，给我先走，因我钱带得很少，如果留待车子，必得拍电报要成都寄钱了。如果两张，他们中间留下一个，如果三张那当然顶好；如果一张也抢不到，就只好坐黄包车到成都。旅馆老板极力劝我们坐黄包车到成都，说近来坐不到汽车的人这样走的很多，不过这条路上从前有土匪出没，抢劫的事近来少

些，但终究有一些麻烦。不过我觉得这也是靠幸运的，坐汽车还是可以遭受抢劫，只要拦住了汽车，车里人一样是手无寸铁的旅客，所以我也主张抢不到牌子，就坐黄包车（四川人叫做“包”车）。

早上二时，我起来了，其实我根本没有睡上一眼，我不欢喜那帆布床，它像一只袋，你装在里面翻不得身，跳蚤与臭虫成群结队地来袭击。十二点钟，旅馆中人声喧哗，早已有人出去抢牌子了，那两个青年同伴，他们遂急急去汽车站。我在园里踱了一会，到茶阁上，坐着，望着。岷江的水流，发出丝丝的光，晓风，残月，疏星，一如柳永所写的。一瞬间，我起了无限的思绪，我想起钱塘江，滨江，以至辽远的莱茵河，一下把我的心引起了一种思乡愁情，一下又把我引到了歌德与屠格涅夫的自然的怀感里。我安慰着自己：“我终究在自己的国土上，我踏着自己的泥土，是的，我们自己的泥土！”我的眼睛润湿了，流下了感激的眼泪。我只要踏着自己的泥土。

到五点多，天已大亮了。旅馆里的一个抢牌的人回来了，“人挤得很，你们的两个人还算站在前面，或者有希望。”又说，“看来今天不发牌了，我不愿再等……”

六时左右，两个青年同伴回来了，他们跑得气喘喘，满头是汗，把制服的钮扣也解开了。“牌子抢到么？”我劈头问。

“哪来的牌子？车子给伍处长包去了！”他们忿怒地说，

"可是售票处的门窗也给打掉了。今天如果发牌子，我们倒一定抢得到的。前面人并不多。可恶那车子给人包去了，许多人一下子发怒起来，把售票处的门窗都打了，我们也参加了一下。有许多人上了那辆车子占住在那里，也有人立在站上等待发牌子，我们看看没有希望，还是回来，坐包车走吧。"

我们决定坐包车走，正在商量叫车的时候，又有三个旅客，抢不到牌子而回来了，他们就加入我们谈起来："今天车子并不是伍处长自己包的，是岷江旅馆的一群旅客，等了好几天抢不到牌子，其中有认识伍处长的，去走路脚，由伍处长出面来包一辆车子。"

"公共汽车可以包用，何必办公路、设公路局呢？"

他们三人也主张坐包车走，与其坐等在旅馆里，而且明天有没有车子是不一定的，抢得到牌子与否又是不一定的，什么都是不一定的。结果，我同两个学生决定与那三个旅客一同走。

我们叫了六辆黄包车，计划是先到眉山，在眉山再换黄包车到成都。到眉山的车价是四元（公共汽车由嘉定到成都是七元六角），路程共约四百里，到眉山恰合一半路程。

动身的时候已快八点钟了，车夫说如果赶一下，今天可以到得眉山。

我们的车子经过公共汽车站，站门前挤满了人，一辆

汽车停着，坐的，立的，只见满车是人头。车站前的空场上，堆放了好些铺盖同箱子，同轮船的大学教授，他百无聊赖的神气坐在那里，见我的车子拉过，他大声地喊我，向我招手："陈先生！陈先生！你到成都吗?"

"是的，我不愿呆等了，你不想坐黄包车么?"

"我等一下再看。"

大约不到十分钟，他的"包"车来了，而且拉得很快，赶上了我们的车子，当他从我们面前过去时，他微笑着对我轻轻摇手。

我们在夹江县午饭。夹江是一个县城，但小得及不到江浙的一个村镇，冷落得像一个死城。找不到一个起码的饭店，我们在一家摆着一只方桌的饭店内坐下来，两个青年学生对我好似抱歉地说："四川内地就是这样贫苦的，但也有比夹江好得多的县份。"为了填塞肚子，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的脾气一向是很坏的，在家里，没有我爱好的菜，我宁可少吃一点饭，但是在这个时候，虽然饭带着酸味（天气太热了，一定是上一天卖剩的饭），我也只好用开水泡了一下，把它吃下去。我第一次懂得，在饥饿面前，什么都顾不到的。

现在回想起走过的地方，要算夹江这个县城给我的印象顶坏了，街道那么脏，街市是那么样的冷落，没有看见一个活泼的小孩，没有一条肥胖的狗，没有一张抗战的标语，个个人带着一种病色，没精打采地，好似生活得厌倦

极了，恨不得倒下来似的。谈到抗战，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哪一边同哪一边打？你们是哪一边的？”他们这样问。

离开夹江时，一辆公共汽车从我们后面赶了上来，车里有好几只我们熟识的面孔，原来他们占住了车辆不下来的，终究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很悔没有照他们那样做，但又想他们都是没有行李的，或者极少。

我们三辆车，有一辆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拉的，常常掉在后面。

为要三人在一起，前面的只好慢慢拉，等待他，因之，还有那同行的三个同伴，他们早走在前面去了，剩下了我们同车夫六个人。车走在山中，四围都是高山，松林与柏林，没有一个人影，静寂得连鸟声也没有，只有车夫的脚步声与他们的喘息声，及橡皮轮在路上的转动声，经过了这样一节弯曲狭隘深岙的山路，我们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好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以前是常常在这里出事的。”两个中学生说。车夫们说近来这一路还平静，坐包车的人很多。在经过这些山岙时，我们大家不期而同地静默了，连咳嗽声也忍住了，好似等待着一粒子弹突然飞来，而预备跳下车的。可是，一点事情也没有，我们已经过了彭祖的故乡，彭山县。

成渝公路的桥梁实在太坏了，常常只用几条木头随便搁着，下面用竹篓子装了些石子做桥基，差不多在每一个

桥前都竖了这样一块牌子："危险……"底下是叫坐公共汽车的乘客下车来走过桥去。我觉得四川境内固然因山多，造路不易，但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随处都有小石子，只要把路身推平，铺上石子，公路就成了，可是四川公路是这样的坏，昨夜为早起抢牌子，没有睡好，今天七高八低的路把我们颠颠倒倒震得腰酸，头昏，太阳又那么烫热地照着我们，呆板而单调的姿势，前面与后面都放了行李，好像把你夹在两块板里，你只想睡觉，可是刚有点蒙眬，不是头因后仰碰疼了，就是前倒碰疼了。在下午二时光景，天下起阵雨来，我们只好停下，在一个小极小极的村上，一家茶馆而兼旅馆的——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门前躲雨，茶馆主人非常可爱地替我们泡了茶，又问我们要不要上楼看房间。我们因了这个村庄太小，而旅馆的神气又太坏，决定不留下，还有最大的原因，是我们今天要愈多走一点路愈好。据车夫说今天是无论如何到不了眉山的。我们希望雨早早停止，可是旅馆中的人看见雨越下越大，竟拍手哈哈大笑，劝我们留宿："今天一定走不成了！"看了他们这样诚意的做生意，不由得令我好笑，真的，我们同他们的利益是不相同的，他们怎能理解我们呢？雨小起来了，车夫们也急于要走，赶到前面较大的村庄去停宿。

终究，我们没有赶得上停眉山。雨是止了，又失望，又快慰的，在晚霞远贴晴空的凉快的黄昏，约七时半，停落在离眉山约三十里的一个村庄上。下车时，我的腰背都

痛得有点伸动不得了，坐车的人已经这样，拉车的人的疲倦更可设想了，特别是那个小孩子，几乎喘得气都透不过来。

我们先去那“未晚先投宿”的地方，进一家，挂着好似泰什么栈的招牌，账房里居然有个青年——一面孔的鸦片烟 在那里踏风琴，我们一进去，他就停住了，原来他就是老板。他领我们去看房间，那些房间都没有窗子，黑暗得像地下室，必得用一盏小小油盏照一照，才能看得出一点东西的影子，那些房间里放着一只桌子，三四只秃头铺 没有帐子的 就是几块板，板上铺一条席子。

每一只秃头铺是一角钱，我的两个伙伴，他们就找了一间住下。剩下的房间都是铺位太多，我就往隔壁一家去看，恰恰有一间小小的房间，那只铺还有帐子，我的直觉告我这个旅馆比那一个好 后来知道这两家旅馆是一对亲兄弟开的， 决定住下来。放下行李，我们就赶忙去吃饭，这种小村子，太晚就找不到吃的地方了。那晚我吃到了四川有名的豆浆粥。吃罢回到旅馆，先付住费，就倒头睡觉，我的直觉一点也没有错误，被头是干净的，臭虫与跳蚤一个也没有，拍死了三只蚊子，就清静无事，所以我竟像死了一样地沉沉睡去了。直到早上五时那两个同伴来喊时我才醒来，并且知道他们一夜捉了几十个臭虫，没有睡上一小时。

天没有亮足，我们就动身了，车夫们因为看不清道路，

慢慢地走着，太阳渐渐升起，高照，也渐渐热起来，一下子又呈现了炎夏的景象。九时半，到达眉山。

在一家茶馆里，我们停下歇息，并接洽去成都的车子，原来的三个车夫，只有一个愿拉往成都。

眉山有条水门汀马路非常清洁，市容也很好，店铺与住家的门口都干干净净的，有的迟起的人家正在自己家门口打扫，看去大约是各个人家须扫干净自己的门口。城门上极大的标语：“驱逐日寇，抗战到底”，街头，店铺门口都有抗战的标语，防空、防毒的通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眉山，比起别的我已经过的县份来，它的面目是相当新鲜与活跃。眉山是苏东坡先生的故乡，我自然地想起他的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这些感想使我心内有些惭愧，一路自重庆过来，看看那些县城同市街，人群，我总要想：“这样偏僻的地方，位于四山之中，也有这许多人生活着，而且与别人一样的生活着！”

我们在茶馆里停了一小时多，一次次把黄包车叫成功了，讲定了价钱后，给一个流氓似的鸦片烟鬼捣乱，一扇动又不肯了。这一带地方，哥老会有极大的势力，哥老会始创时，原是一个极革命的民众结社，是以复汉为职责的。但是在这一次的抗战中，我们各个民族实现了大团结，上与下，党与派，统统都在为抗战建国的唯一目标努力，可

惜哥老会还没有把他们那么大的力量动员起来帮助政府，直接参加抗战。在重庆时，曾经见报载四川的哥老会员准备出川杀敌了，我希望能够这样。

我们看看车子叫不成功，预备等待出租汽车，及至他们看我们无意坐黄包车，却又肯了，可是一定要四块钱的车钱。

由眉山而上，公路两旁有望不断的大平原，稻长得肥肥的青青的，已结了穗子，重重地垂下。四川今年雨水调顺，可望丰收，真可说是天助我们抗战。稻田旁边间或有稀密不等的桑林，四川也是出产丝的。这一幅江南农村景象，怎能不令我想起家乡呢？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渡那个“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的新津渡。水流湍急，江面广阔，足足渡了一小时多。天晚下来了，大家争着渡。我记起大约是孟郊的诗吧，“渡头争渡喧”，真对。不过现代与从前不同，当然有枪的人总比较神通广大一点：“你给我渡不渡？你……”这样一来，就给他先渡了。我们无聊地坐在一个竹篷下的长凳上，等待着，我同一个看去约十五六岁的男孩搭着话：“……你恨不恨日本鬼？”“不！”他回答。“你不恨？”我吃惊了：“他来了，把我们房子都烧了，把我们大大小小都杀了，你还不恨？”他低下头去，轻声的，像自对自，又像羞怯又像惭愧地说：“日本鬼子不来，我们的日子也难过呀！”

我们等得急了，然而哪一个人来注意我们，两个中学

生与一个女子？渡船拼命敲竹杠　我们也只好听他
两人一车要一块钱，后来总算让到八角。

新换的车夫，比上一天的差得多，他们不但时时要休息，而且有时无缘无故地在半山荒地里停下来，使我们不得不起戒心。每次我们都是很客气的，几乎是恳求他们，早早达到目的地，但他们不是突然地使一下性子，放下车来不肯走了，就是叽叽咕咕地骂，每次都要说上许多好话。有一次，大一点的那个中学生，他简直恨得伸起手来要打了。这一天的旅程，真使我感到疲乏，特别是心境上的懊丧，　虽然昨夜是好好的睡了一觉　一天到晚和车夫们费口舌，弄得喉咙都哑了。他们说我们舍不得钱，不肯给他们“飞票”　上坡下坡的时候，叫一个人来帮助拉，叫做飞票，大约每次飞一个票，顶多是一角钱，车夫们顶欢喜旅客能慷慨地给飞票钱。这种来飞票的人，沿途时多时少，大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　却不知道我们身边所有的钱，大家都是很扣的。我耐不住，对他们老实说了出来，他们对我们的诅咒是停住了，却变成一种不快意的鄙视。

这天晚上，我们停在离成都五十里的一个镇上。很奇怪，白天我们恳求车夫们赶路，他们不情愿地拉着，到了天快暗下来，他们反不肯停了。甚至我们要停下来，吃晚饭，住宿，他们都不同意：“你们要早点到，那我们就拉夜路。”月亮固然很清明，但我们何必一定要半夜赶到成都呢？况且城门口一定有检查，不会半夜三更放我们进去的。

"我们不愿走夜路，倘半途出了事情，大家不快活。"因了我们的坚持，停下来了。

那晚我们在一家小馆子胡乱地吃了一点东西，又贵又不好。找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旅馆，只有一间房间，里面冲出一阵说不出是什么的怪臭味，跳蚤非常多，我们没有立上三分钟，手臂上，脚上已经给咬了好几口，痒得难受。我们不愿住这间房间，而且也住不下，就同老板商量，在堂中放长凳，搁起门板来睡觉，愿出房间一样代价。那两个学生弄到了一块门板，搁起来睡觉了。旅馆里唯一的茶房同了一个小孩子睡在堂中地上。我呢，找不到门板，把一只五寸阔的长凳当做了床，只能笔直地躺着，两只手拱放在胸口，或索性挂下，如果要侧身睡，必得起来，重新换姿势。大而黑的蚊子，一歇也不肯放松我们，它们不待你有点蒙眬，就东一口西一口尽量来咬，我们的头边，身旁，脚跟都点了蚊香——蚊香倒还便宜，一个大铜子买三根——满屋都是烟。那两个青年学生与那两个旅店伙伴都呼呼入睡了，可是我，从来不欢喜点蚊香，眼睛受不住那么厉害的砒霜气味，眼泪竟大滴地掉下来，弄得比蚊子咬更难过。在这条长凳上，本来我就不预备睡觉了，这样，把我身旁的蚊香熄了，开了店门，在门口不时地透一下空气。月亮清清地照着那条唯一的大路——公共汽车路，静寂极。村外时时传来一些秋虫的声音，"叫哥哥"的声音，陡然，温柔而残酷地打击着我的心，这些声音对我太熟悉

又太生疏，就是这样使我难堪，四川的季候，什么都提早了，在江南还是盛夏，而这里已遍地秋声。

“啪”一下的声音，使我想回进屋子去看看，他们两人之中大约有一个醒了，在拍蚊子，回进去，使我忍不住地笑了出来——这是很本能的——那个年纪小的学生，掉在地下，他茫然的神气，眼睛半开，正在爬起来，把他的同伴也吵醒了。我们笑了。

看看表，已三时半，三个人就谈起天来，他们谈成都的生活，春城的风景，奇怪我不在峨眉停留。四川的山，的确是秀丽的，我觉得只有沿浙江徽河的山，严子陵起直到黄山始可比拟，但现在我没有游山的福气，也没有这样的闲情。到四时半，我们去喊醒车夫们，他们睡在猪栏旁，一间篷屋的地上，简直那样地酣眠着，用手去拉才拉醒过来。这是习惯，还是劳动的代价？

我们向成都行。成都，这个满布着史迹的古城，在今天，变成了我们抵抗日寇侵略，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四川的一个重要城市。四川不但物产丰富，应有尽有，而且在地势上，能攻能守。诸葛武侯费尽了心血，把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放在这样一个好地方，然而那个不争气的皇帝，不知道好好自为，结果仍把它送在别人手里。在清晨的美丽的阳光下，一片新鲜的大平原展现在我的眼前，穗上，草上，树叶上，晨露如珠，一滴一滴地落下，辛勤的蜘蛛，只为了过一夜，它也在草上结了网，一点也不随便，一丝

一丝结得很美好，讲究，我的脑子里充满了一部《三国演义》，一些对成都的想象。

离成都只五六里了，公路上的人愈来愈多，农人们肩着菜担，各式的小贩，有卖麦柴扇的——那些扇子编得非常美丽，都是农家的手工副业，有卖零星食物的，大都是向着成都行。到成都了，经过一座大院子，门口挂着西北联合临大，他们，两个青年同伴指给我看："这就是武侯祠，"但我没有仔细注意，我正在深深地思索。许多小河道弯弯曲曲地流着，我问有什么名字不，他们说没有名字的。那些小桥很精致地架在小河上，玉蜀黍已熟了，农家架了一个高高的棚，在看守着。四川同胞对于建筑有特殊的本领，这种看守农作物的棚，他们只用四根木头高高竖起，再用几块板，一个竹篷，几根绳子，几根短木头做一个梯就成功了。妇女们在棚里面坐着做针线，小孩子爬上爬下，看去那样坚固，没有一点危险。

终于，我们到成渝路的成都汽车站了，长途黄包车是不能进城的，在一家近汽车站的茶馆前，我们停下来，把行李搬下，付了车钱，好似很偶然地结束了这个旅行。休息了一歇后，我就同那两个学生告别，雇车进城去找朋友。那是七月九日的上午十时左右，由渝至蓉总共在路上走了九天半。

进成都城，经过一座大而古旧的石桥，下面江水浑浊而湍急地流着。进城时，城门口的卫兵把我的行李严密地

检查了一下后，才得放行。我找到祠堂街的一个朋友那里，第一就问惠姐来了没有？朋友回答我说没有人来找过我。接着，放下了行李，就去寻旅馆。成都的旅馆，没有重庆的挤，价目也没有重庆的贵，但是我一个一个的看了好几个，都没有中意的，看见被头褥单上，墙壁上，都是臭虫的血迹，就只好退出去；几个价钱公道而比较清洁一点的旅馆，却住满了人。最后看定了凌云旅馆，这是一位朋友在重庆就给我介绍了的。价钱是三块钱一天，可是因有一个熟人的朋友曾是这个旅馆的老主顾，经这个间接朋友一说，就打了个四折。

一进旅馆的房间，我简直就想倒下来，但是有许多事情必得就做，最重要的，第一件，就是填饱肚子。在旅馆里随便的叫了一点东西，吃了就睡。我全身，因了两天半的黄包车颠动，痛得睡都睡不下，在路上，还能支持，此刻却感到身心都被疲倦克服了。待做的事情又像乱麻似的，做完一件又来一件。身体需要安睡，脑子可一歇也不肯休息。“惠姐[1]究竟来了没有？她会不会在什么旅馆里等我？我们竟会在成都相见！”于是在蒙眬中忽然异想起来，像是一下子遇见了惠姐……

离开重庆的几小时前，在大梁子街上，遇到了峥嵘先生，知道老伯父母都住在成都，他们要我住到他们的寓居

---

① 即陈竹影，作者在上海爱国女学时的同学。

去。他们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我为了要重新整理行装，把路上已用脏了的衣、被理出来交人去洗，……等等的事情，不愿再搅扰他们。其次便是有许多朋友待见面，以及去探听川陕公路的车子，在凌云旅馆，进出方便一点。但无论如何，我知道峥嵘夫人——永檠姐，一定在那里等我了。

午后，祠堂街的朋友把惠姐的信转来了，她还没有来成都，在崇宁生病刚痊愈，她说这几天天气太热，待秋凉一点来看我。这个信一下子又使我失望，又使我焦急。我想我跑到她那里去，但事实上又不可能，车辆呢，那里是有一条公路的，但不直接通，须去找商人的货车来搭，可是我人地生疏，哪里去找这样的机会呢？如果再坐黄包车，来回一百八十里路，我确实有点怕，而且一来一往总得三四天，我呢，只想愈早愈好搭川陕公路的车子。结果，写了一封信给她，请她可能时在十五号之前赶到成都相见顶好；同时发了一信给广汉书台姐，告她如果她还没有回重庆，过成都时，希望她来看我。

终究，我还算睡了一些时候，虽然几次为了收信、写信而打断。我把被头都叠在床上当褥子，睡着也还算暖和。起来后，就出去打听车子，一问再问，才问到了川陕公路的汽车站。办公的时间已经过了。在院子里看见几个职员，正闲散地踱着步，我走向其中一个问："明天有车子么？"他不则声，只是有意没意地望了我一下。"对不起，请问，

明天可有车子?”我再问。“不知道，”他掉头对我说。我往里走，遇到一个职员样子的人，我想我应当变换问话，指着停在院子里的五六辆公共汽车问：“先生，对不起，这些车子明天开么?”他对我投了一个冷眼，慢吞吞地说：“不一定，开就开，不开就不开。”我觉得再找人问也不会有结果的，带着忿恼，走出了汽车站。

我茫然地走着，脑子里尽量工作，但总是想不出什么办法。“在这个时候，一个普通人要行路是这样困难，不要说没有钱的，出钱的也不让你走，最需要的是势力!”我恨恨地想。忽然，在一条街的中心，一辆包车疾驶而来，车上一个人对我招手，一面车子停下来。我一些也没有预备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遇见熟人，所以我只是呆着，直到这个人走近我来，一看，是峥嵘先生，真太巧了!约好我回旅馆去，他同永檠姐来看我。

回到旅馆不久，他俩来了，永檠姐手里抱了一个小孩子，快半岁了，又胖又白，完全像他的母亲。我们彼此惊奇地喊：“无锡一别，再也想不到会在成都晤面!”谈起无锡，我们有无限的惆怅!峥嵘先生劝我们别去提了，预备吃晚饭。

他们非常客气，邀我到沙利文去晚餐。这是一个新开的馆子，开了将近半年，主人与厨师都是从上海一带流亡出来的，菜价还算公道，吃客都是带些苏沪口音的。天下起了微雨来，马上凉快了，这就是成都的天气，一下雨马

上就凉。他们怕小孩子冷，急急地要归去，在沙利文餐馆前我们分别了，我约明天去访伯父母。车子问题，完全托了峥嵘先生，本来，服务公司专修理公路上的车辆，当然，有车没车，消息是最灵通的。但最近为了人事上的某些关系，服务公司已奉令结束，现在正办理结束手续。他说他尽力去替我探听一个究竟，并帮助我去弄票子；一方面呢，我自己也去想法进行，大家分头努力，免得落空。

那晚我并没有好睡，臭虫不多，但被蚊子咬得不能沉睡，我是太被这个旅馆的外表所欺了。次日早上，一起来我就决定搬旅馆，可是跑出去看了一圈回来，还是不搬。"成都是没有好旅馆的，大概都是这样！除非你愿意花上八块十块钱一天，像沙利文那样的，可是你一定又觉得太不合算了。还是凌云好！"的确，还是凌云好，我安心住下吧。但这间房间是西晒的，我又想换房间，茶房以滑稽的口吻对我说："我劝你不要换了，这间宽敞，蚊子吧，那边也一样有的，夜里只有点蚊香。"果然，我就依照了他的话，马马虎虎地敷衍过去。

早上八时半，我又打电话问汽车站有没有车子开，这回总算回答我说："十五日大约有车子开，五点半领牌子，六时买票，七时开车。"可是我有点不大相信。

到退渔别墅，四妹正在门口，要出外去，她领我进里面，老伯父刚吃过早点，就在他的房间里坐下，接着，永繁姐、三妹都来了，还有未见过面的三弟的新婚夫人，大

家都争着谈别后一年半来的一切，可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大家东一句西一句的。他们以为我从嘉定坐公共汽车来，二弟天天去汽车站接我，一连等了三天，又以为我在成都大约是长住的，在他们寓居的旁边为我看好了一座小小的西式房子。“就是这一座，”走到园里，老伯父指给我看：“我们可以做邻居，只有一墙之隔。”他们领我看看他们的寓居，这是一个大的花园，在园里有好几处三间一起，四间一起的平屋，都是西式的，园里满种着花草树木，又有小池小桥，地点很好，在城外，没有市声的烦扰。他们布置得很简单，这是旅居生活，明白地说，这是流亡生活，在没有见过他们的太湖别墅与姚宝巷住宅的人，是不知道作一个比较的。

我们在园子里坐下，老伯母也出来了，自从离开无锡，到了成都，一路上饱受惊吓，更加上旅行的疲倦，本来体弱多病的老人，兼之气候的不惯，差不多十有九天卧病在床的；当然，还有是怀念故乡，愁绪不宁。她是一位热血的女诗人，满腹牢骚，苦恨年老，无力报国；她又是一个贤母，教养出了她的爱子，王昆仑先生，为国辛劳，最近在徐州为抢救难童，突围而出。那次他同他的夫人孟君女士，曾受到敌机轰炸下的极大危险，一个炸弹正落在他们住处的旁边，房子倒下来，几乎压死。幸而一个仆人把他们救出来的。老伯母很兴奋地对我谈到她的愁国思子的情绪。我一边听，一边欣赏着园里的花木佳草，想起她在病

床上写给二妹的诗："满园花似锦，不如故家山"，不禁感到凄怆。老伯父叫人拿了一竹篮的李子苹果出来要我吃，我们一边吃，一边赞美成都人编的竹篮和各种竹具的精致，以及成都出产的大量水果，特别是李子，味美得很。吃着水果，使我想起无锡来了，前年这个时候，我不是天天吃着他们山上的水蜜桃么？有些日子，我甚至早粥也不吃，只是吃桃子。

他们留吃午饭，并且另外已做了几样菜。午饭时峥嵘先生回来了，也说探听的结果，是十五日才有车子。

那天午后，天微雨刚晴——成都是差不多天天这样下一阵雨的——我独个人雇车到武侯祠去。武侯祠的门口挂着西北联合临大的牌子，其实临大早已不在这里了。走进门，一个大院子，满院是高大的柏树，树叶发出清爽的香味，在树荫下走，使我真的感到前不见古人的怅恨。"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至今还是事实。左厢现在不开放，停着四川故主席刘湘将军的灵柩。头殿正中是昭烈帝——刘备的坐像，两边是他的子孙，两厢的左边是汉寿亭侯关羽，右边是桓侯张飞。两廊上供的，自赵云、马超，直到费祎，姜维，一部《三国志》里的蜀汉功臣，统统在内。泥像有人体样的大，颜色都还鲜洁，大约是新修过的。每个像前有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他的身世、籍贯和事迹。关张的像是独立的，像前有门，门闭着。无论谁读完了《三国志》，总要感叹"关张无命"。正殿上供的武

侯，香火似乎特盛，有好几个老百姓正在点香烛，是来求签的。我对着他的像不禁深深地致敬。童年时我爱读他的前后出师表，不爱别的，爱它的理直气壮。现在，我更爱这些文字了，因为这些文字不是简单的文字，它不止表现了武侯的一生，一个时代，直到现在，将来，都有不灭的价值，因为它能够影响一个民族的实际生活。

我国历史上多多少少伟人，但可说只有武侯是最为群众所熟知的，“诸葛亮”，无论妇孺都知道的。但是很可憾，人们只把他神化，把他的鹅毛扇，写得那么巧妙，而不把他的真实才能加以宣扬，武侯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更可崇敬的，同时他又是一个治国的能才。《三国志》里写他刚到成都，与法正的谈话，是值得三思的。能够攻城略地，克制强敌，并不就足够了，更要在乎同时能够治理。就说俄国女皇加德琳，她在朝的时代，固然经过了些胜利的战争，但最要紧的还是在战争后，她能够知道，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幸福。我们现在为了抵抗一个外来的残暴的侵略，而有了一个超乎历史的大团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这个伟大的时代，将产生伟大的人物，使它成为更伟大的时代。这是必然的。每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努力握住大时代，别要给它淹没了！

永檠姐陪我玩了一整天，我们先去望江楼，薛涛的遗迹一丝也不存留了，只有一间小屋，里面有人出卖薛涛的像，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的一块石牌上拓下来的。

临着江的楼上，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咬瓜子，也有人在此吃面，吃饭的。在我国，每一个风景地方，也就是吃喝的地方，所以无论怎样美丽的山水与建筑，结果总是弄得杯盘狼藉，果壳遍地，若说游风景是找寻诗意，那我觉得这句话不顶适合于我国人的心理。成都毕竟离前线太远了，没有一点战时景象，虽然从逃难来的人身上带来了一点战争的气息，但这些人慢慢安居下来，那气息也就淡下去了。人们喝茶，闲谈，快乐而轻松，有的，在园里缓缓地踱着步，有的，手里提了鸟笼，来这里比鸟。在童年时，我就见不得提鸟笼，他们都是些闲荡的高等流氓，这个时候我见着了这些东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憎恶的感情。真的，我觉得成都需要几个敌人的炸弹。

往望江楼，来回都经过四川大学农学院农场，有几个农人（不是农学院学生），正在收玉蜀黍。在农场的那一边，五层的水泥大厦正在建筑。川大农院的院长秋季要更换了，听说将是本来江西省农学院院长董时进先生担任。住南昌时，在友人家的茶舞会上，在欧美同学会的聚餐席上，遇到过董先生，有一次，偶尔同董先生同桌，承他邀我到莲塘去玩，他对我说农院里的池塘、树林的美妙风景："夕阳西下时，在那里划船是很有趣味的。"可惜我始终没有去过莲塘。此刻想着，我很悔在江西时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的确是辜负了许多胜境。董先生大约是去年十二月里返川的，重庆的报上曾刊着他的"返川杂感"（大约是这

样，我已忘了题），也有一篇关于改良四川农产物的文字，当时即有一位一向留川的从事农业的先生回答了一篇讨论，那位先生在开头说："董先生这次由江西坐飞机返川，可算是衣锦荣归，若不是战事，哪会有这样的农学家想回到四川这种苦地方呢……"实在，这倒也有几分实在的。我国近年来已有了些农业工程师，但他们大半不是住在洋楼上，就是坐在那些省政府的技正室里，一天一天办几小时公！以前在《国闻周报》上，我读到董先生的文字，很敬仰他是一位有见地的农学家，像他那样的人应当主持一个大型农场，做农业行政人员未免太可惜了。

那天永檠姐同我在一家广东馆子午饭，这家馆子名叫"小巧"，确是名符其实。当炉的是老板娘自己，红烧牛肉每天只烧一锅，卖完了就没有了。我欢喜的不单是价廉物美，特别是清洁，还有，菜的味道不带"馆子味"，使你只觉得是在家里吃家常便饭。

十三号的早上十时左右，我正在写信，迅快的脚步声走向我的房门："幸好，她还没有走！"于是，急促的敲门声。惠姐，她来了！同着静沉。我已经不等待她了！

我们分别了十二三年，她依旧是那样的瘦弱，举动是那样的急促，似乎她的一伸手都要使你觉得是突然而来的。

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尖锐。在期待了多少年的会面，以前我们曾为此流了多少想念的眼泪，多少的信，多少的诗，多少的词，评说这个期望，如今见面了，却又无话可

说，而那样的平淡。

晚间，他们夫妇俩领我到“不醉无归老酒家”去晚饭，这家馆子是几个文化人开的，在成都，有许多文化人做这个生意。祠堂街有一家小馆子叫“小园地”的，也是几个文化人开的，这个“不醉……”馆子，在成都是很有名的，有几只特别的菜，可是价钱太贵了。

那晚惠夫妇也在凌云开房间住下，静沉为了事务的关系，次日大早就回崇宁去了。惠的家本在成都，可是没有什么人了，有的是一些亲戚同朋友。静沉走后，她出去访朋友，并把老同学张载飞姐也拉了来。载飞，她真的变了，竟变得那样不同。以前在爱国[1]里，她是极好动而极爱打扮的，有一年冬天，她因烫头发把发烧了起来。现在，她的服装是如此随便，性格竟变得如此的恬静。她已有了四个女孩子，个个都是她自己哺乳的。“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是我的实感。她的外形，固然是一个平常的良母贤妻，但同她深谈起来，感觉到她对于国家有多少的关怀，而自己的心中又压着多少的牢骚。是的，中国的年轻的母亲，她们与别的青年男女不是十分相同的，她们有双层的苦痛，双层的烦闷，可是她们却顶被人们遗忘，而往往遭受鄙视的。人们笼统地叫她们做“家庭妇女”，这个名目一被盖上，就表示她们已没有了社会地位了。实际上，她们

---

① 指上海爱国女学。

有她们的利益，决不是她们的丈夫能够代表的。我看到许多像载飞一样的妇女，她们各有特长，在未婚之前，她们是有职业的，结婚以后，有的为了子女的牵累，有的或因丈夫的地位较高，要谋经济独立时，受到人家这样的回答：“你何必做事呢？留给了别人吧！”因为在中国，女子总被看为男子的附属品。年轻的母亲，她们或者及不上少女具有的革命热情，可是她们富于实际生活的经验，往往不单是为了她们自己，特别是为了她们的子女，她们是更会坚决地站在抗战上去的。一个母亲，不像是一个少女，她们的眼泪，人道的多于恋情的。惟有她们，更能鼓励多少男子上战线去！在抗战期中，后方的工作，积极方面，生产，消极方面，节省，其它如保育，如慰劳等等，如果不发动家庭妇女来参加，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与损失。我们在这次民族解放战争里，不幸有了许多给我们丢脸的汉奸，但另一方面却到处可以听着男女志士的报国无门的热情的感慨，这是我们的光荣，却何尝不是我们的羞耻。特别是外人，一定觉得十分奇怪的。

近晚，与惠、载飞在少城公园散步，回国以后，我已失掉了“游花园”的习惯。少城公园多树木，少亭榭，这是异于中国一般公园的地方，在那高大成行的树下，使我怅然地想起里昂公园来。一下子，使我记起了已经忘记的新近的印象：那天船向嘉定行的大早，在睡梦中被旅客们惊叹的声音吵醒了，我也起来看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盐井，

高高的棚屋顶，远远望去好像希腊的教堂，有几个顶上架着几条木头，又像法国南部的磨坊。

出少城公园时，在门口的小桥上，遇见了十多年前教我书的冯克书先生夫妇，重见到童年时代所崇拜的人，这位很早翻译了卢骚《爱弥儿》的教育工作者，我的心境上起了不少的波动。冯先生苍老多了，额角有了皱纹，找不到当年南通女师时的中年人气概了，他的太太倒还依然胖胖的没有见老。他们显然不认识我了，但也对我凝视了一下。我想去招呼他们，可是终又把脚步移转了方向，“何必呢？彼此诉说一下我们老家陷落的惨痛，我们对敌人的忿恨？都是废话，我们都知道的。”这样，大家过去了。

十四日的夜里下了大雨，刮了大风，黄昏时，我已经把行李检好了，准备十五日动身。一夜风雨，真令我焦心极，早上四时起来，坐待天明，天依然下着沉沉的雨，茶房劝我不必上汽车站去，惠也这样说。川陕公路只要一下雨就不能开车，这个我也知道的，我就像热石头上的蚂蚁一样，在房间里打旋。到八时去电话问汽车站，回答是这样：“今天不开车，明天不一定。”接着，峥嵘先生打电话来：“今天没有车，多半是因下雨路坏了，只好再等吧！”

糟了，什么时候才能走呢？真的使我坐又不安，立又不是，幸而后来的几天，永棨姐、惠姐，同载飞姐，她们三人每天好似轮流着地陪我玩，吃饭，消遣那等待中的时日。吃饭，是的，特别是吃饭，简直每天最重要的事，就

是到各个馆子去吃饭。她们见我一时不能走成，反而很高兴，留我吃，留我玩。

十六日早上，各个报纸登载着大风雨后的各地损失，川陕公路的川段桥梁，许多均被折断了，这样，等上十天、八天，半个月都是可能的。旅馆我已住厌了（而且那样地费钱），整夜吵闹不停的声音，脚步声、话声，使你的心一刻也不能安定。在这个时候，我又悔住旅馆了，根本早就该接受友人们的好意，住到朋友家里去。我决定搬到祠堂街附近的友人家去住，在那里，进出也还是方便的。早点后，我就出去通知友人，然后回旅馆来搬行李。

在友人那里，谈了些话，告别出来，又去吃饭，回旅馆，已近下午三时了，账房里交了我一张名片，我惊奇地接过，一看，是书台的。书台已经到了成都，暂在四川旅行社她的夫弟那里，还没有找定房间，望我在凌云留意。我问了一下，刚刚有一间空房间，马上就跑到四川旅行社关照她。在四川，为了语言的不通，或者也因为他们性格上与江浙人的不同，问路是到处要碰壁的。不单是问路，无论买东西，上馆子吃饭，时时都有可以吵架的机会。在南昌时，一位差不多走遍了全国的朋友曾讲到各地的风俗人情，他说在重庆进一家铺子买物，店铺对你表示十分讨厌，理也不理的。在昆明，商店对于主顾像是仇敌："没有!"他们总是这样一句回答。根本就不肯去找寻你所要买的东西。他的话实在对极了。在四川旅行社的门口，我几

乎要同那里的茶房吵起架来。“没有!”他一来就这样回答我。当我问房间号头时,“不知道!”他又那样回答,账房也找不到,结果我也不管什么了,自己去找名牌,找着了名牌,再去寻房间,里面房子非常曲折,在院子里,我还是只好见人就问。

“学昭!”书台在楼梯头喊我了,她居然还能辨出我的声音。见着旧友,使我想起往事,她那大的男孩已入初中,小的已小学三年级,“读第五册,一直带在身边。”她高兴地对我说。川陕路的桥梁确实被风雨冲坏了,汽车不能通,她是由广汉坐了黄包车来的。我说我也预备坐黄包车走川陕路,一节一节地坐过去。“这怎么成?麻烦哪!”她说,“桥梁都坏了,水浅的地方只好搁了木板,人下车来步行,把车子扛了过桥。短路还可以这样,你走长路怎么成呢?”

为了书台,我又在凌云多留了一夜。那夜在她的房间里,我们谈了些时,环境的变迁,心境的不同,使我们本来可以更为接近的会面,却增加了不少惆怅,当然我们彼此都已找不到当年“倦旅”隆阜时十八九岁的热情与天真了。

“你别去,那边比这里更苦,你去走一圈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看你入川以来,心境就不安定,你这样跑来跑去,太疲劳了。就是广汉小一点,并且也不安全,否则我留你在广汉居住。”

许多好意我都接受了,“这样吧,我回川时,总希望能

与你住得近些。”我说。

她微笑起来。

次日，她请吃午饭，是一桌丰满的酒席，又为我介绍了几个朋友，可是我心里很难受，对着佳馔，虽然本能地吃下去，可是不能不想起战争，以及其它。如果在国家自由、独立、快乐的时候，看见许多旧友，境遇也都很好，我心里一定愉快得不可言状的。

午饭后，我搬到祠堂街友人家，近晚，书台来看我，留字说明天早上动身回重庆，我正出去了，回来已夜里十一时过，来不及去看她了。于是，我们这样轻易地见面，又这样轻易地分别了！

成都差不多每天午后与夜里总要下一阵雨，正午又很闷热，使人昏昏然，好像没有睡足的样子。天气简直有些像西贡那样的潮湿与难过。有人说住家的舒适，北平以外，要算成都。北平，我同意的，若说成都，我可绝对不同意，我不惯于闷热同潮湿的气候，就是家乡的气候，我也不欢喜，我觉得住家最好是哈尔滨，其次才是北平。哈尔滨气候干燥，有水，有雪，有炎夏，只是冬天吃的菜贵一点。那天午后——这一天例外的没有下雨——我独个人雇车到华西协合大学去，这是成都人叫做“租界”的。那学校的建筑与北平燕京，南京金陵的校舍差不多，都是宫殿式的，不过年代较久，墙瓦都已变成深黯色了。只有美国人有这许多钱来造华丽壮大的校舍、学生寄宿舍。美国人常常笑

旧大陆上的国家，那些有名的大学，不过是几间课堂、图书馆与实验室……但是旧大陆的国家有时也笑答新大陆："虽然这样，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学者，往往是成为世界的学者，我们依然可以做研究工作，我们新的人才依然源源不断地从各种大学、专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确，这倒是一个事实，在我，觉得一个国家，当钱太多的时候，那也不妨造些美丽的大学校舍，至于像我们，这样的校舍似乎是无需的。实际上，抗战一年多来，早已证明不但这些校舍是不需要的，而恰恰给敌人作为轰炸的目的物。我不能不深叹我们一向的教育只是形式教育，商品教育，更可痛心的是那些各地的大汉奸中，竟有留学生、大学生，不能不说是一向教育的破产，也不能不叫人反省深思该不该再继续这样的教育！

南京中央大学的牙科现在并在华西大学的牙科里，南京金陵大学的一部分，文法科学生也在华西寄读。这时是在暑假期中，没有一个学生的影子，游人很多。有一家男女老小，坐在草地上嗑瓜子，吃糖果，悠然自得，谈笑欣欣，使我想起巴黎波洛业森林里的情景来了。有些小姐与少妇，她们的"马桶式"的鬈发在风里飘动，耀眼的各种花色的绸衫，高跟皮鞋，可憾地发出不自然的不均匀的"托托"声，向着我迎面而来。她们快乐地谈话，多半是带着江浙口音。竟有的为得要省却极微小的力气，索性坐在黄包车上，向天望望，向地望望的那样欣赏着美景。宿雨

积在球场上，还像池沼一样，我想要等待它干燥是不很容易的吧。树叶的颜色青得发亮，草也一样的苍翠，浓郁，绿沉沉地铺在地上。树木，花草，这样的发育，无怪使人感觉到有些难受，这是一个最好的适合于植物的气候，而不是最适合于动物，特别是人类的气候。水蒸气与霉气好像从天上压下来，使你鼻孔都感到闷塞了。是的，尽管有人说住家成都最好，但我还是不爱它。我要重复说的，成都毕竟太远离前方了，看到那些悠闲的游人，他们与她们，嘴里只是琐琐碎碎谈他们的私人间的情感，我心里深深地嚼着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话，大意是："前方激烈地进行着战争，后方的一切依旧照日常一样的在那里经过，憎，爱与别的……"你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是这样。

二十日午前得到的消息，明天有车子，一切都托了峥嵘先生。午后，去向王老伯父母辞别，他们知道我爱吃甜食，拿出蜜枣等等的东西来，永檠姐又烧了糖芋，吃着这个应时东西，使我想念起家乡。伯母一定要送我一个红豆戒指，我恐没有戴的机会而谢却了她，结果，她送了我六粒红豆。红豆，就是王维诗中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这种红豆。很奇怪的，如果把它放在身边，它会愈久愈红，愈鲜艳。它的形状圆圆的像毛豆一样的大，可是镶在戒上很像一粒宝石。成都有一家专镶银器的店铺，永檠姐曾领我去看过。这家店铺镶工的精致是连在沪杭一带也难找到的，峥嵘先生也说可

以比得上巴黎有名首饰店的镶工，的确，我在法国温泉疗养地如维希（VICHY）等地见的首饰店镶工也不过如此。这家店铺现在很有名，可是我恰恰忘记了它的店名。只认得是在离凌云旅馆不远的一条路上。居留在成都或来成都游玩的外人，常欢喜在这家店里定打些银叉、银杯、银匙及各种好玩的小东西。那天我看到一个表饰，上面刻着一个老农肩了一副担子，那老农的背微微有点弯，表情十分生动，很使我爱好。

回来的时候，惠姐已在友人家院子里等我了，上楼去，我急急地整理行李，她静默地坐在凳上，显然心情是被惜别的惆怅激动着，她立起来，她踱着步，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得再见面！”

“只要不死，总还易见面的！”我笑了说，我并不是那样残酷，也并不是不知道珍惜友情，特别是不能遗忘的童年的友情，但是旅行的兴趣已超过了这个别离情绪。

二十一日大早五时，就起来雇车，太早了，雇不到车子，只雇到两辆一老一小拉的黄包车，为了不愿吵醒事情极忙的友人，就把行李搬到车上，这样上了车，不别而行了。

昨夜又下过雨，今早已停止了，但地上还是很泥泞，街上十分寥落。车夫老者拉我的行李，小的拉我这个人，一样地蹒跚的脚步，从祠堂街到汽车站，他们竟拉了近一小时工夫。我心里异常着急，可是那老的车夫，他还不认

识路的，时常往错的方向拉，小孩子在后面喊住他，指示他，一只箱子太大，搁不稳，时时因震动而抛下来，这样耽耽搁搁，可是他却说："早得很呢，车子要八点钟才开。"这样欺骗我。小孩子呢，倒老在后面催促着："时间不早了，恐怕赶不上了！"小孩子对于责任心总比成人强。

到汽车站时，峥嵘先生家的男仆已在那里等我，说牌子已领到了，他帮忙照顾我的行李，不一歇峥嵘先生来了，为了打长途电话介绍绵阳广元汽车站上的熟人。惠姐赶来，在候车室里谈了几句话，我就上车了。上车时，才知道这辆车是直开梓潼的，但当我买票时却只许买到绵阳，开车时，站上的人说可以在车上补票的。

车开了，窗外还望得见友人们挥着手，渐渐地他们的影儿也看不见了，车出了成都城，开在田野中。

成都，这个被多少诗人们歌诵过的蓉城（成都，春来满城都是芙蓉，故名），我就这样匆促的同她分别了！

二　由成都至宝鸡，宝鸡至西安

成都到广汉，广汉到绵阳的途中，两旁都是大平原，碧绿的稻田，铺展在眼前，可是乡人同川东的一样，衣衫褴褛，面色枯憔。

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到了绵阳。这时候，三辆车，因渡河的关系，前后相距得很远了。我们的车停下好久还不见第二辆来。我们这辆车，在成都开出时，原说是直开梓潼的，可是刚刚车一停，司机还没有跳下，站上的一个职员对司机喊："车子坏了么?"果然这辆车子，一直很好的开到绵阳，又很好的停下来，忽然坏了！"车子坏了！不能再开了！今天在绵阳过夜！"司机喊。车中有几个旅客，连那位别动队队长太太在内，不肯下车，要他们继续开梓潼。

照卫兵说，他已走过一次——此去到梓潼只须渡一条河，倒要花个把钟头，真正的路程只有一个多钟头，算起来，六点钟一定可到的，我可以找到峥嵘先生所介绍的人——站上的职员。我也不指望他帮我什么特别的忙，只盼他能帮助我办补票的手续。可是他说今天车子一定不开了，劝我早点去找旅馆，等一下也许给人家住满了，并介绍了我一个城里的旅馆。这个旅馆，起孟先生在重庆就为我介绍了的，说是比较清洁一点的旅馆。我感谢了他。正准备同黎君一起叫黄包车进城去，而停在车上不肯下车的旅客，在车窗里对我呼喊招手，我走近车去，隔着玻璃窗，他们对我说："你不要走，时间还早得很，我们可以要求成功，直开梓潼。"我觉得话非常有理，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被那个职员的这几句话："今天车子一定不开了……等一下也许给人住满了……"深深地刺激着。在车旁徘徊了一歇，站上的人见我们聚拢来商议，就大声地叫："车子今天一定不开了，大家走吧，车子要开进车房去了！"……可是没有一个旅客理他，于是接着吱吱喳喳地："今天就是为了不能渡河，不相信，可以问别人，昨天我们的人被新绥公司打伤了，还照了相，要呈报上去打官司的……"那个卫兵跑回来对我们大家说："司机不肯开，因为昨天公路局的车子在渡河时，新绥公司的车辆争先渡河，把公路局车上的司机与乘客都打伤了，怕今天又起冲突。当然，要打起来，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另一个旅客加上补白：

“昨天是这样子的：有一辆新绥公司的车停在前面，公路局的一辆车开在他们后面，可是在这一辆公路车的后面又来了几辆新绥的车，渡河时间很久，只有一只渡船，只好一辆一辆地渡。当轮到公路客车渡时，后面新绥车上来不许他渡，这样就争闹起来至于打架……”听他们说得这样生动，但我倒反有点不相信起来。打架这件事该是真的，决不是不肯直开梓潼的理由，何以现在不再说是车子坏了不能开？总之，这里面有欺骗。可是在这个时候，那位大队长太太也已经走下车来了，“如果出了事，那不上算！”他们都在这样说。准备在绵阳过夜了。这样，还是决定再叫黄包车进城吧。我托那个职员明天帮忙我办理买票的手续，又问他要否今天先行登记，俾明天就可领牌。他回答说：“不用，不用，明天你只要近开车的时候来好了，我替你留出座位。”我问他这辆车会不会等一下开梓潼呢？他说如果开，会打电话给我。

进绵阳城，沿城墙下走，奇怪这些倒颓下来的城墙，非常像海宁小东门一带的城墙，黄包车沿着石板路颠颠倒倒地走，顷刻使我觉得“快到家了……”可是，这是绵阳。

幸好，在那个旅馆——大约叫嘉利宾馆吧——里找到了两间房间，我的一间靠院子，黎君的一间近厨房，在一条小弄后面。放下行李，去找饭店，吃过饭，就去逛街。这差不多是我在旅行中所一直爱做的。绵阳也有一条直贯城中的水门汀马路，可是很短，街市也不及广汉的热闹，

在民众教育馆前我看了一下壁报，又在一家店铺里买了一份当天的成都报纸。绵阳人的说话口音与成都不很同，就是面貌与举动与川东人比较起来，也显得质朴、迟缓，总之，慢慢的有起了川西北的风味。玉蜀黍与麦粉混合起来做的饼子堆得满街都是，但吃惯南方糯米食品的我，总引不起爱吃的胃口。

回进旅馆，在院子里的一只茶桌旁坐下，泡了壶茶，一边读报纸。太阳已经快要下去了，可是地下的水蒸气依然热烘烘地从脚底下升上来，满院绿苔，厚如绒毯，使我烦腻得好似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搁脚。墙角的天竹，翠绿的叶，鲜红的果，在潮湿的天气里，显得分外的美艳。洗了面，把身上的灰尘出清了些后，再往街上去踱步，月亮已出来，深淡的照着马路，天忽然闷热了，人们都从屋子里出来，在街上闲散着，小小的豆油灯在排门板里抖动着，一闪一闪的。

次日大早起来，就雇车子动身。

街道旁倒着一棵一棵的大树，有的连根折断，有的吹断了桠枝，也有一处街角，屋子吹倒了。太阳已新鲜地透出了热光，今天依然是炎热天。到汽车站，已有几个昨天同车的旅客在那里等待了。车站上的职员还没有起身，我们大家无聊地坐在站旁一带的小茶馆里，有的喝茶，有的吃酒酿蛋。茶馆旁边有好些小担子，卖甜酒酿蛋，在什么东西也买不到的清晨，他们的小生意倒还可观。等着，等

着，这个跑进去问，那个跑进去探，太阳热烈地逼照着我们。一队整齐的军队从我们面前过去，该是出操，他们的年龄约在二十四五岁，他们的胸膛个个挺起。“为什么他们留在这个地方？不出去打鬼子？”我苦闷地想，他们唱起歌曲来了：“太阳清早……依呀嗨……”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歌曲，或者是我听久了一个我所讨厌的人的歌唱。他们为什么不唱《义勇军进行曲》，我爱好这个歌。

七点钟了，应当是开车的时刻，然而车子还没有离开车房。听说可以领牌子、买票了，许多人都拥到售票的小门口，我倒有些茫然了。一到车站，我原就找那个许留车位的职员——不过我根本就不信任他——他还没有起来。及至等得他起来，他说已为我留得一个位子，我就耐心地等待上车。可是人家已经买好了票，坐上车子，我呢，还在等待着，当追问时，他人也不见了，我就自己去买票，他们说：“买票要登记，今天登记，明天买票，今天没有位子了……”怎么？今天没有位子了！我恼了，那个职员出来：“替你留好了位子。”我问他许我的位子在哪里呢？他说：“等大家坐齐了替你找。”“那不成，我要知道我确实坐哪一辆车走。”车站前这时候停了三辆车，我逐一问过去，这辆也不是，那辆也不是，而且都没有空位了，那么我该坐的一辆车呢？他被我逼得不能再敷衍了，却说了出来：“今天客人实在拥挤，我只替你在一辆行李车里弄到了一个位子。”这辆行李车还没有到绵阳，十点钟可到。奇怪，今

天客人实在拥挤，那昨天为什么不让我登记呢？我也不是一定要靠他才买得到票子的。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再问时，他说那辆行李车坐四个旅客，我同黎君及另外两个旅客——看去也好似同我一样因有人介绍而反上当的。我同黎君经过了一番商议之后——我心里早已猜着这个职员不是为要揩我车票的油，就是与旅馆主人有关系，多留客人住几天旅馆，他有回扣钱的——我说：“那不成，为什么要坐行李车呢？我决不坐。”就同他讲理，责问他昨天欺骗我的话，黎君也帮了我说。“什么？你在这里无理吵闹！”站长走出来打官话，想把我吓住。这一下子，更使我忿怒了：“你说官话没有用的……”忽然，哄哄然的，第一辆车上的旅客在那里吵闹了，许多人的话声响成一片，分不清楚是哪一个说的。“那不行，公家的车辆你要放私人行李，反而把我们的行李连一个很小很小的包裹也要磅过……”那些旅客都纷纷下车。一问，原来那个站长把行李都装在旅客车里；旅客的面前，背后，都放了行李，挤压得连腰连脚都伸不直。许多的质问，许多的威吓，许多的解释，终究，才弄清楚了：行李是旅客们打过票的行李，并不是站上任何私人的行李，那是因为要替公家省一点汽油，把一辆行李车省下不开了，所以把行李装在客车里。既然这样，旅客也愿意挤一点，在抗战时期，一切都该节省，特别是汽油，那是对的。于是旅客们在车旁等他们把行李先好好地重新装过，然后一个一个爬进去，因为落脚的空隙

也都给行李塞住了。忽然，我的位子也有了，第一辆车里竟余了六个位子，而且都在前面。我同那个大队长太太仍旧坐在第一排。一场吵闹总算结束了，可是开车，已近十时了。

其实只开了半小时光景就到河边了。河边已有许多辆漆着“新绥公司”的汽车停在那里。在成都，我为了坐公路车麻烦，要等待，及开车时刻不定等等原因，曾想坐新绥公司的车子，去探问时，他们回答只运货物，不载旅客，可是这个时候，却看见有穿着旗袍的女子，有小孩，还有好些年轻的男子，从车上下来，在河边散步，这些人，未见得都是新绥公司的职员吧。我想既不公开售票，那些人总有别的方法才坐上的：他们都是高大而强壮的，说话带着东北口音。我们等着，等着，尽徘徊在河边，直等待八九辆新绥汽车都完了，才轮到我们。渡船只有一只，渡夫只有一班，这些渡夫，他们十几个人，看去个个都抽鸦片的，面黄肌瘦，眼睛半闭，他们黄黑的皮肤底下该有的脂肪都给鸦片烟毒吸干了。他们像在梦中一样地摸摸索索拉着那个绳子，好容易把汽车渡过去，又把空船渡回来。

水流很急，上水费力，下水倒极容易的，用不到撑篙，渡船来回像箭流似地斜行着。这条河边，据说张飞同黄忠曾隔河对打过，我可记不得《三国志》里是不是这样写的。在河边走，那个大队长太太的卫兵对我偶然发牢骚：“真讨厌，一个不够，还要两个。”他伸出两个指头，“已经接去

了一个，放在宝鸡，现在这个去住南郑。”那么他走这条路不是第二次，现在应该是第四次了。

渡河这样的麻烦，在我过去旅行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一渡渡了近二小时。

绵阳以上，渐入山地，只开了近四十分钟，就到梓潼了。“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童年时，读着王维这两句诗，已死的畏兄兼畏师随便怎样同我讲，我总不懂，“梓潼”，原来有这样奇怪的地名。

车到梓潼，停在站前的大街上，司机一下车，又无影踪，又不预备开了，时间只一时过，昨天同今天绵阳站上的事，已够教训了我们，这短短的路程中足够给我们充分理解与团结的时间，我们就坚持统一战线。对车站上的人我们的言语与态度是十分强硬的；对司机，我们软硬兼用。我们无论如何不下车，只推两个男客下去往馆子中吃东西，其余的人均在车上，由这两个男客向馆子中叫了面，送上车来吃，因为站上的人骗我们下车，如一下车，就要把我们的行李搬下，这辆车子开回成都。他们见我们不下车，起初是骗，后来用威吓，最后站长出来了，他命令尽管把行李搬下来，他们来搬，我们把行李夺住，他们冷笑，可是也无奈何。“司机病了，等他休息一下看能不能再开，如果司机患病开车，途中出了事，我们不负责。”站上的人说。我们大家哈哈笑了：“当然我们的命难道你们能够替我们负责么？”“车子坏了，那是真的，今天绝对不能开了。”

他们说，最后，他们又说油没有了，骗来骗去总骗不了我们。我恨极了这批车站上的公务人员，他们不是技术人员，可是他们却借了他们的所担任的公务人员名义，卖弄外行的技术伎俩，说种种骗人的话，摆出臭架子。快三点钟了，太阳热烈地逼照着我们的车子，我们热得透不过气来，又加上烦躁，但决定不下车。一歇，他们来说："司机睡了起来，好些了，或许可以开车。"一个职员无赖地量量油，玩那些下台的把戏给我们看。后来，司机出现了，他恨恨地投了我们一眼，恨恨地开动了车子。毕竟我们的统一战线胜利了。

梓潼的街上拥挤着驴子及牛，汽车好不容易的从它们中间开过。出街时，经过一条可怕的桥，这个桥上两旁有屋宇，还有许多小食担同菜担，车开过时，一块一块的桥板都跳动起来。

汽车尽是上山下山地爬，下午四时半左右我们到剑阁，汽车站是在一个公园里，背靠着山，围墙外，就是河流。这边有一个小亭子，那边有几只小圆茶桌，几只竹椅，有的人在那里喝茶，有的在玩脚踏车，这山景与人物都使我想起游过的法国中央高原的一个小乡镇，珊雅（Ceyrat）靠山的那个露天跳舞园的小咖啡馆，游人们吃着新炸的马铃薯片。

到剑阁，司机又不肯走了，我们依然采取我们统一战线阵势，大家不下车，推两个代表去见站长，说明我们不

能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车票是直买广元的。那个站长倒很好，他不像绵阳站长及职员都一任司机的摆布，要开车必得好言好声恳求司机老爷。在我们申说之下，剑阁站长对司机说话，叫他快开，司机又说生病了，我们问他生什么病，他说眼睛痛。但是哪一个相信他，就使是真的。本来，开长途汽车是一件苦事情，但这是他的职业，并不是旅客逼迫他去做的，他不做则已，做了必得好好地做。一切工作上的条件他该向公路局去要求，可是他没有权利来为难我们旅客，不情不愿地找旅客出气。我们恨极了，在车中你一句我一句地指责他。他在车站里面转了一下，回到车上，不声不响地开动了车子。我们知道他是恨透了我们，但不管他，我们要走路。

过剑阁，车继续往上爬，不久我们就到剑门关，山口异常狭小，曲折、险峻，在转弯的口子，好似没有路了，但转过口子，大山又出现在面前了。李白《蜀道难》中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这个地方。车过去了，回头看时，只望见一条山缝。有一个时候，我们的车尽是沿高山走，一旁是临着急流的河道，隔河，又是起伏不断的高山。我们经过一条险路，那是从一个突出的好像悬挂着的山石下开过，如果那石头掉下来，我们连人带车当然都没有希望了，那山石看去那样伶仃，可是并不掉下来。

车在高山上颠动得非常厉害，还不知是路不好，那卫兵轻声说，他怕司机恨我们而故意出事，弄到翻车等等；

我觉得那是不会的，如果翻车，司机不能保他自己不受伤，虽然开车的人在最前面，比较稳一点。

离剑门关，六时多了，这时太阳已下山，汽车靠着一点晚霞的淡光，迅速地开着，经过几个小村，都没有停留。七时了，我们想停在一个小村里，司机倒不愿："没有我们车站，连睡的地方也没有。"而必须赶路，天暗黑了，只靠着一点星光，车子一会儿开过小河，一会儿又下坡，开得极慢，像一个盲子摸索着走。八时左右，才到昭化，那里有公路车站，就停下来。昭化，这是离广元约百里的一个较大的市镇。下车时，我们只将必需的小东西带了走，其余行李均留在车上，站上的人说他们会当心的。这样，我们首先就去找旅馆，找到了"只此一家"的旅馆，幸好有两间房间，我同某大队长太太各占一间，黎、韩（同行的一个不相识的旅客）与卫兵只好睡在堂中的桌子上。

我们在街上来回地走，整个昭化，不过几十步的市面。昭化，这个古怪的地名，好似含有梵意的，但是并没有什么大的佛寺，也没有特别的佛迹，什么也没有，只有古旧，衰败，贫苦，这样的一个市镇。

到早上五时，我们都已理好行李。那位大队长太太也一夜未睡，尤其是她的小孩子一歇不停地哭闹着。我们在七时就到了车站，司机还没有起身，今天我们只好稍微忍耐一点，如果闹得不好，把我们抛在昭化，那可糟了。八时半，司机老爷起来了，洗面，漱口，吃早点，歇息，喝

茶……十时四十五分了（我们几乎是一分一分地数着），才慢慢地步上车来，转动那把手，在我们说不出的焦急情绪下，总算开出了昭化。又是险峻的山路，又是焦人的渡河，每次渡河都得等待新绥的先渡，他们的车都是新的，开足了马力，往往从我们后面疾驶过去，我们的车只好可怜地让过一边，从对面来的，也是这样。下午一时过，我们到了广元。

检查的工作完结了，车站上只剩下了我们几个走长路的人。我们向站长要求给我们马上直放宁羌，他们回答说："没有车子，车子坏了，油没有了……"争论一场，毫无结果。四时过了，我们才进一家旅馆，离车站只十几步路。店堂里是茶馆，里面一共有五间小屋，两间已给人住去了，我们占下三间，黎韩二人一间，我与队长太太各一间，卫兵只好睡在堂中了。

我们曾到汽车站去看过几次，其实立在我们旅馆的茶店门口，就望得见一切，的确没有上宁羌的车，只到了几辆装汽油的车，"明天你们一定走得成的，汽油到了，"站长对我们说。

那晚我睡得尚好，居然买到一枝艾绳，点了后，蚊子少一点，可是天热极了，到半夜，下了阵雨，雷呀，电呀，大约一小时光景，雨停了，不敢重新入睡，怕睡误了时刻，就休息着等待天明。起来后，院子里的石板上已露出干燥了的花白形迹，太阳也已照在岭上，昨晚洗的衣服也都干

了，一切都好，我快乐极了。

六时，我们已把随身的行李安放在汽车站上，大家呆等在那里，有一辆载重车停在站前，八时半，我们已登上第一辆载重车，车中堆满了行李、汽油，我们旅客就坐在铺盖上，一共十五六个人，大家挤做一团，连放脚的地方也没有，各人的脚排齐了似地放着，一点都不能移动。坐这样的车子，我是第一次，也曾听坐过这类车子的朋友说不好，但是车子开出了几小时后，我却觉得这种载重车是很好的，无论是它的橡皮轮及马达都比那些客车来得吃重，只有这样的车始能在山地上行，如果是不能吃重的车，那是危险的，容易颠覆。

从广元以上，山更高了，路也更险峻了，我们已经沿着栈道行，古时的栈道还留在那里，有几处，公路就傍着它建造的。栈道非常狭小，只能行一人一骑，或许以前比现在阔些，现在路旁蔓草丛生，把路遮得只剩尺把阔，不时有挑重担的人及柴夫走在这条路上，足见它还在给人利用的。两旁的树木，有榛树、有榆树，树身都有几抱以上，是有些年代了。我想象玄宗当年行在这条路上，天下着雨，听着风声、马铃声而作词曲的情景。这个英明的皇帝，不能英明到底，不过为了个女子。

我们的车在下午三时过就到了宁羌。今天除了一路受检查的麻烦外，那司机是非常好的，他开车的技术也很高明，而且不愿多耽搁，如旅客一样，只望早早到宁羌。有

几次，我们因为受不住车的颠震，要停车走下来，他倒不肯同意。也有几次路上受拦阻时，是他不理会他们，尽把车子开过去："查什么？早查过了！"

次日早上在宁羌汽车站又会见了上天同走路的人。这个地方苦极了，连甜酒酿蛋也没有，在一家小馆子前，我看见有几个穿翻牛皮褂的人在那里吃稀饭，我也就买了一碗——恰恰这是最后一碗——把肚子填满。

今天我们坐的还是无篷车，已经是陕西的车辆，是美国与苏俄货。陕段公路比川段好得多，桥梁都很结实，司机也能尽他的职务，一点也不用费口舌，我觉得痛快极了。只是天气太热，昨天的太阳已把我手臂晒得痛了。在宁羌买不到草帽，今天还是只好两手交替着拿扇子遮住头，到后来，看见别人用衣服来包头，我也用一块手巾裹着，渡河时，把毛巾在水里绞一下，包在头上，很风凉，但是不到一、二小时就晒干了。自宁羌以上，已觉气候干燥，汽车过去，灰尘飞扬，真是喝饱了黄沙。一重山，两重山，爬了无数重的山，只有在午饭的时候因吃面点而停留了一歇。午后五时光景，我们到了汉中。

那晚在旅馆里，　　已经没有那队长太太同卫兵了，他们与我们在汽车站分别了的　　等待着受检查，等到十一时多，才来了两个武装军人，把我的一只皮箱翻了个身，一声不响地出去了。那晚居然买到蚊香，点多了，我出眼泪，点少了，又不灵，臭虫也很多，扰得一夜未睡。天未

亮，我就起来，立在窗口，由院子望到街上，不知怎的，那情景很像十三四年前的南京，由台城远望所见的。

五时，我们动身到车站去，已经有三个穿青布工作衣的女学生同一二个男子在那里，在站上盘旋着，时间还早，大家往汽车站对面的小担子上吃甜酒酿蛋。自从离成都，这个东西，几乎成为每个人早上必吃的食料了，以前我这般爱吃它，　　回想到去年十一月底同戴练江夫人在九江终夜候轮，以吃甜酒酿蛋消磨时刻，那时吃着何等有味　　可是这一天吃进口里，差一点想呕了。有一个哲学家，是笛卡儿特（Descdrtes）还不知是哪一个，曾讽嘲女子的胃一如女子的感情，这个时候想着这句话，使我好笑。

"什么时候到秦岭？"车中大多数人这样发问，我更是问了好几遍。我们还要爬过一个大山，那就是秦岭，过了秦岭，就到宝鸡了。秦岭这个山名，我在八九岁时就听到了，小时候，母亲讲那些神怪的故事，曾讲到八仙里的韩湘子，"韩愈贬到兰州，过秦岭，梦见他的侄儿湘子，……赠他八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就是这个秦岭。

我们的车，爬上一层又一层，原来已经爬在秦岭上了，如果只看对面的山峰，那你还不觉得爬得怎样高，如果你往下看，往后望，那你的心虚脱得就要像坐升降机下来时的情形了。秦岭里只见树木，荒草，没有人烟，间或有一堆工人在修路；有时，一群全武装的军人从山凹里出来，

全车的人不由地都怔了一怔。车子继续再爬，每转一个弯，大家都攀住车，好似准备车子翻身，其实如果车子翻身，任你如何用力攀住车也是没用的。或者，忽然搁住了，如果在这个地方搁住了，那真是糟得不堪设想。幸而车子没有出毛病，爬、爬，终究爬过了秦岭。到宝鸡，下午四时过了。

次日大早，我们上火车站去，火车早已停在那里，“沪杭”“京沪”“北宁”……一节一节都是这样接拢来的这些字，残酷地刺动我的心脑。这个车站的月台因为没有栅栏，使我觉得浩浩荡荡。车站的墙上，贴着好些纸头或用粉笔写的字：“××，我在××……”这类通讯的东西。我们买好票，打好行李，就上车了。说是六时到七时方开。天下起微雨来，但一会儿就停住了，在火车里望两旁田亩，泥土不再是黑色，而是黄色，干燥、结实。玉蜀黍还没有收，白菜、南瓜很多。这一带的屋宇还美观，有的是一座一座四方形的黄色泥屋。过马嵬，杨贵妃葬身的地方，当时“大军不发”，玄宗无可奈何，“赐”她自缢，后来入蜀之后，玄宗深深悼念。“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这是《长恨歌》里的名句。接着过咸阳，这是一个大站，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大市“咸阳市五牛分尸”，充满了多少悲惨与快乐的故事，阿房宫也该是在咸阳，现在却是这样的冷落，破败，从站上望去，简直没有一座像样的屋子。

在车中，又遇到那三个女大学生，她们今天都施上了

脂粉，“为什么呢?”我不禁傻想。坐在我后面一排椅子上是一个武装军人同一个“大阿福”脸的妇人，那个妇人有一只巴儿狗，在人们的脚边钻来钻去，这个军人用着一口纯粹的绍兴话问她关于狗的起居一切：“它爱吃什么?”“它吃牛肉，不爱吃羊肉……”我听得厌极了，然而不能不听，因为他们的话声是这么尖锐。这个小牲畜在这个时光居然还能吸引人的注意，我真不解。“克明！克明!”狗走往车厢那头，妇人一边追一边呼，我的汗毛都浮了起来，我承认我讨厌这个女人。

太阳火热地照着黄沙大地，在不安、好奇、期待的种种复杂情绪里，我们到了西安——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二时光景——这个古代的首都。

三　西安待车与西延途中

下车后，旅客拥挤在西安车站上，等待检查行李。检查处像一个柜台，旅客把箱子放在上面，人人都想早点受检查，所以，拥挤、混乱，但是同时，那些站上的检查员却不停地在喊："这是哪个的？快拿上来检查！……"这情景使我想起杭州的城站。

受过检查的人，都站往边上一角去，好像又有什么必需手续要办似的，我带着行李走近去，才看见是几个男女护士，在一只桌子旁替旅客打针：西安这时候正流行霍乱。旅客是那么的多，只见男女护士把针东一针，西一针在人们的手臂上打进去，我觉得太不干净了，而且我又在旅程疲倦之后，我对他们说我进西安就去找医生打，他们好似

求之不得地回答："好！好！"

这样，我就带着行李，走出车站，站门外的墙上贴着许多关于防止霍乱的宣传彩色画，可怕的虎列拉正袭击着西安市。

在站上，我们被大车、黄包车所包围了，到马坊门街，索价一元，或八角，我有点稀奇，起孟先生明明对我说过至多是二角半钱。太阳如火一样照在我的头上，黄沙扑面，西安对于我，显得是这样的陌生，总之，我是被我的浙江官话累了。黎、韩两位先后坐黄包车走了，我也终究花了五角钱的代价雇到两辆黄包车进城去。

西安，我们古代的首都，"八·一三"后，它很早就受到敌机的空袭，而且有一个时光，潼关是很紧张的，可是市面还繁盛，虽然空气是紧张的。钟楼上有"声闻于天"的金漆字，城墙也还完好。同南郑一样，街上有许多不同符号的军人走着，车拉过一条街，我仔细观看，看有没有八路军人？很运气，给我发现了一个臂挂"八路"的军人，他背着一只信包，像别的人一样，在热阳下，喘着气走路。当火车到咸阳车站时，我曾见一个八路军人，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看去不过十四五岁，不待我注意，他已经下车去了。

一个朋友住在马坊门街附近，为了便于招呼我，就陪我在马坊门街上找了一家旅馆，叫西北大旅馆吧，我只记得这家旅馆的隔壁是一家馆子，叫浙江大饭店，可是店堂

门口有洋广南货出售的。

我的房间在二层楼上（一共也只有二层楼），西向，太阳正逼照着一半房间，地板是广漆的，灰尘积得乌黑黑，除此以外，椅桌等等好似还觉得清洁。一进旅馆，我就想睡觉，朋友走了，说等一下来同我去晚餐。一睡到床上，我发现这间房间并不如我想象的好，沿床的白墙上有一条一条的血迹，枕头底下还有干枯了的臭虫尸体。

我没有睡着，实在太热了，因为天气又是干燥的，简直热得全身像火烧一样，嘴唇都破裂了。我没料到西安的夏天也是这样热的，从前，听到好些住过西安的熟人对我说西安是如何风凉，可见一个人如果不亲身到这个地方总不能知道这个地方的确实情形，连气候都这样。五点半，朋友来，一同出去，他领我去青年食堂，这是一个西餐店，我们上楼去，那里挤满了一些南方口音的吃客，电风扇正在迅速地转动着，餐价每客好像有一元二、一元五、一元七三种，还不是那些牛排猪排。内地的西餐都是这样的，不但味道是单调的，菜目也单调，所以吃一次觉得还好，吃第二次可以，吃第三、第四次就乏味了。但是，我确实感谢友人的盛意，为的在那个时候我正想吃一次西餐。

西安的街道非常阔，而且有旁路，旁路上还有些树木，行人在树木下安闲地走着。我问朋友这些路基是不是新加阔的，还是原先如此，他说一向这么阔，那么这是很古旧的路基了。小时候，我常常梦想长安的街道，“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走遍长安城。”我想那个时候从外省进京的人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当然会特别兴奋。在马坊门街附近的一条短街上，还看到旧时的明角灯，那样小的灯，不知道怎么能“金吾不夜”的?!

同友人分别后，就回进旅馆休息，太阳一西沉，天气马上风凉起来，这是与南边不同的地方，夜里我还盖了棉被。

早上八时光景，我还没有起床，被韩君来吵醒，他找到我友人那里，然后再跑向旅馆来。他同着一个朋友，有一点张皇失措：“我们有两个友人失踪了……”他轻声地说。坐了一下就走了。

十时左右，我雇车往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去，接洽去延安参观的手续，办事处伍处长出来接见，一间方形的会客室，靠门口摆着四只沙发，黄布套。他客气地请我上坐，没有什么客套话，开始问：“呵，可是坐飞机来的?”

“不，坐公共汽车来的。”我心里想怎么差一点给他猜到呢，原来我曾想坐飞机的。

“延安很苦呵！不像西安一样的，远远不像西安。”他说。

我忍不住笑了。

后来说到车子，他关照我同门口的王先生接洽，要我把寓居地址留下，一有车，王先生就会打电话来通知我。问了王先生，说二十日大约有车，明天下午会通知我。

走出办事处的院子，我心里想，今天我的服装，一定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印象，——至少是不大好的，但是有什么法子呢？我没有一件旗袍，为的我受不住那枷锁一样的领口，当然更不用说军装了；我已经穿惯了西装，在我，这是习惯问题，而不是讲究与漂亮的问题。

回进旅馆，我觉得很快乐，好似把一个数学难题解答了。没有事了，只须在旅馆等待电话。

下午四时，韩君来看我，他很高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明天就出发，进陕公分校。呀！青年！热烈的青年！

近晚去访二妹——明霄女士——把王老伯母托带的东西交给她，她是南京失陷后调到西安来的。我同她在无锡一别又快两年了，她结婚了，而且快做母亲了。她的周先生是一个可爱的东北青年，他们真是一对单纯、诚挚的夫妇。二妹来西安后，曾回成都省亲，谈到川陕公路上的一切，她说："在绵阳，他们硬要留我住旅馆待车……"原来她也上那个人的当，"他们就是这样的，越有人介绍，他们越要敲你，或同你纠缠。"这也是中国人的特别脾气，外国人常常骂中国人，爱利用信用而做坏事，这话使我深思。

二十九日那天，为了等电话，就没有敢出去。二妹夫妇接连打电话来邀去吃午饭，终于到正午，他们两人来了，拖到一家江苏馆子去。西安的菜也是这么贵，同南郑差不多，菜也没有标明价钱，而至少都在五角、六角。

那天下午二时光景，有警报，可是旅馆只把大门关了，

旅客们依旧说笑谈天，因之我想听一听敌机的声音也不可能。警报我也没有听到，只看见有些路人冲进旅馆来，茶房们说："有警报！有警报！"人们把警报看得那么平淡，似乎同南昌的空气是不同的，大约因为南昌很早（第一次轰炸在去年八月十五号上午）就遭受到敌机残酷的轰炸。我本来睡在床上，起来到走廊上望了一下，天太热，又回进房间睡觉。在南昌，一个朋友曾说他每次听到警报就爬到床上，如若在夜里，根本就不起来，那样，如果一个炸弹下来，死得可以舒服些，何必劳劳碌碌起身呢。引得我发笑。那天我确实照着他那样做了，实在，天热得我一点气力也没有了，真的，炸弹下来，我也不愿躲避了，我只是昏昏然地睡在床上，不时地喝冷开水。警报解除了，敌机回去了，没有投弹，只来了一架侦察机。

直到近晚，电话不来，我决定出去洗澡，友人曾介绍一家明星浴室。收费比上海这些地方贵一点，但很干净，设备齐全，可以比得上巴黎的浴室。洗了澡出来，回进旅馆，叫了一碗面来，吃过，出去逛公园。走过几条小弄，那些旧式的房子，式样很特别，门槛是那么的高。公园门前停着汽车，黄包车，拥挤着进进出出的游人，烫发，高跟鞋，各式的丝绸旗袍……一如成都少城公园所见的。园里有花木亭榭，还有一只大的池子，杨柳垂岸，穿过晚光下的树影子，传来划船的男女们的笑语声……谁相信西安是已经逼近了前线呢！

三十日的早上，我又跑到办事处去问王先生，他说他没有忘记我，今天仍旧没有车子，一有，就马上有，并且通知我。结果，决定明天如果仍旧没有车，我就搬进招待所去，招待所就在六号（还不知道是七号）。回到旅馆里，把行李理好，只剩随时要用的东西放在外面。三十日又过去了，还是没有车子消息。三十一日早五时就起来了，因为王先生说好也许有车，临时来通知我，叫我预备好。十时我又跑办事处去，终于回旅馆来搬行李。

办事处的门口，老是挤满了各种口音的男女青年，那位王先生，一个长个子的东北口音的青年，总是被一群学生围住着，“我们怎么能走呢？那么多的路！”我顺耳听去，这是从长沙来的一批学生，他们要求车辆将他们载到延安，我觉得他们真有些不大明事理，世界上没有一个学校这样不要学生出一个钱，而学生还要求给车子坐的，实在太不体谅办事处了。虽然目前中国情形不同，因为有许多许多学生是流亡的。那位王先生，我觉得很能干，办事干脆，有条理，我听他对人们的应答，有这种感触。

七贤庄并不是一个村庄，如我所想象的，只是像一个里，一个弄，那里的一排房子差不多是一样的，大门进去，两边各有两间房，同一个小天井，二门进去，是一个院子，有几株树，两边又是房间……招待所好似没有办事处深进。大门右边的一间门口，贴着抗大招生委员会的纸条，里面同时住人的，有几只秃头铺；左边的一间挤着许多男子，

年龄不等，一律是军服，有的有“八路”的臂章，有的没有，这一间里只有一、二只铺，大部分的人都睡在地上。“妇女同志”（他们这样称呼每一个女子）住的就在院子里面一间大的房间里（接连有一间小的，两个女管理员，还不知是该叫事务员，我忘了，住在里面，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姓杨，大家叫她杨同志），只有一扇窗，因为苍蝇很多，用纱蒙着，里面一排用长凳搁起的木板，铺着被褥，这是大家的床铺。对面的一间是诊疗室，有人负责在替患病的人换药。他们男同志住的两间是二院子里朝外的，一间大，一间小，小的靠近救亡室。院子里的墙上，贴着许多标语：“拥护蒋委员长”、“扩大巩固统一战线”……简直记也记不清楚了，只是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些标语，——字很草，而且写得也不美观——把我的心感动得颤抖了，甚至于热泪盈眶，它们是这样的诚挚，简单，句句都是涌在每个人喉间所要喊出来的。救亡室差不多是一间图书馆，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先生、朱总司令……许多像，还有标语，壁报，很有次序地贴着，有一个白木柜子里放着些书。两只白木的旧方桌上堆着报纸。借书，看报，随时都可以。

“同志”，“同志”，他们间很亲密地喊着，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把这两个字喊出来。我的服装，本来已是引人注意了，而对于一个新来住的人，大家不免都要看她一下或招呼她一下。“同志，你过去做什么工作呀？……”我窘

极了，不知如何回答，所以为了这些，我就尽躲在她们妇女同志的宿舍里，躺着或坐在木板上看些书。大批的青年往延安去都是进抗大或陕公学习的，像我这样只是单纯地去访问延安，一定很少，对于我的好奇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在我搬进招待所的两小时后，我遇到了一个同伴，她姓李，名片上刊着全国女青年会农村什么部的干事，她说她去参观延安，准备停留两星期。妇女宿舍里挤着十几个人，有长沙来的，有四川来的。从四川来的，跑路来的居多，有洛阳来的，也有从延安来西安医病，或者往前方去工作的，流动得非常厉害，只见到许多陌生的面孔，进进出出。那晚坐火车往汉口的有一个鲁迅艺术学院的女生，沈阳人，进来的是一个姓朱的女医师，还有两个川籍女同志。

那天的晚饭，我在招待所吃的，一大盆青豆同一碗淡汤，杂有几根葱，一点蛋。八九个人立着，围了一只破旧的方桌吃，是纯粹的素菜，大概是用麻油烧的。

“这里吃得比延安好。”一位同桌的臂上有“八路”符号的男同志说。“怎么呢?”有人问。“那，延安一切都贵，菜里没有这么多油，不大有大米饭，尽吃小米饭。”

“哦!”我一边应允，一边心里惭愧地沉思着，今天的菜在我吃着，已觉得苦了，就是在法国念书的时候，身边干枯，正期待钱到，也没有吃得这么苦。我惊奇他们怎么能长期吃这样苦呢?一号里的林伯渠老先生今天也同样吃这个菜。

听说起来，延安是这么苦，但是他们谈着延安，人人带了眷恋的口吻："延安什么……""我回延安……"延安这个，延安那个……几个伙夫同志，当我去拿洗脸水的时候，听他们一边洗碗，一边谈："延安的洋芋比西安大……""延安的豆子比西安好……""你没去过延安么?""没去过。"我说。"延安好呵!"他们说。

晚间，姓朱的女医师，睡在我旁边，她能说流利的上海话，我就同她长长地谈起天来了，她是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毕业出来的，在南京中央医院做实习生，去年八月，她回家乡湖南。"在家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我给姐姐姐夫写信说我愿到延安去，他们回信说那边很欢迎的，不过苦一点，我就去了……"她简单地对我说，她的姐夫是八路军留守处主任，（后来我到了延安，才知道就是萧劲光将军。）她在延安边区医院做医生，这次来西安割扁桃腺。她是一个志愿医生。

"延安的生活究竟怎样苦?"我好奇地问。

"呵！是很苦!"她似乎没有头绪，不知从何说起似的，"你是一定吃不消的!"她又补上一句。

"为什么我一定吃不消呢?既然你都吃得消，你也是久住过上海的。"

她想了一想："那你同我不同呀！我们湖南人……你们江浙人也是一向地域的关系，地方富庶，生活优越。"

我听到她的话不禁想起有些女友曾说江浙妇女不会革

命，但同时也同意她的话。

于是，接着，她同我谈到病人，“药品同纱布都非常缺乏。”

“为什么他们不向外界募捐呢？我相信一定有人关心抗战时期内的救护事情。”

“他们不会这一套，他们已经天真、直率惯了……捐是也有人捐一点，但是怎么够呢？”

那夜，因了蚊子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合眼，翻来翻去，没有睡着，却很疲倦；可是在我旁边的朱医生，她用一条毛巾毯把头同脚都裹起，在毛巾毯里面发出大大的鼾声。近天明，她翻了个身，对我咕噜着：“你还没有睡着？真讨厌，蚊子多极了！我也总睡不好！”“你还说你睡不好！你打着大大的鼾声呢！”她吃吃地笑了，可是一下子，鼾声又作了。

我心里想，到延安去，可以测量一下我能够吃怎样程度的苦。

一号的早上，我仍旧五时起来，为等待车子。把行李结好，等着，听说那位李女士她同我一车走。她穿着一条蓝布工裤，上面是白色麻纱衬衫，像男子的西装衬衣一样，她说：“这样才可以到延安。”旁边的那位由鲁迅艺术学院出来上汉口的女同志说：“对了！”“你怎么知道呢？”我问。“我早知道的。”她说。

我奇怪怎么我不知道呢？我只知道，模糊地知道那边

妇女也穿军装的。

“你这样子去恐怕是不大行的，并不是不许穿，是因为大家都穿军服，你一个人穿得不同，不好意思走出去。”鲁艺的女同志说。

怎么办呢？做军装是来不及的，于是我决定今天如走不成，一定去买工裤。

李女士会说话，善交际，也很活泼，我想她一定很快就会被延安认可的，在中国，也在全世界，这样的人是容易被人认可的。

到八时左右，听说有车子了，管理科长还不知是事务科长来叫李女士动身，对我说：“今天坐不下了，明天还有车，明天准可走。”我旁边的两个长沙来的女同志，将同我一起走，她们也已等待好几天了，大家很和气地说：“希望能够早点让我们走！”

实际上，大家已经在西安停留了好几天，盼望走的心是很急的，可是到了这样一个环境里，最烦躁而最易发脾气的人，也用了极大的忍耐把这个焦急克服了。

“开一辆车由西安到延安，最多花费到二百八十元至三百元的油费，实在贵呵……”杨同志对我们说这里面的苦衷。那是一定的，不说，我们也都能想象，而他们只收车费十三四元，拿来补贴补贴，并且有时候，有些工作人员是不收费的。实在，比起一般公路车来，这点车费是便宜的。

午前友人来看我，在救亡室里谈了一歇天。

这天是八月一日，是世界什么节（我最不会记这些节日与纪念日），昨天午后，杨同志已经来动员整个妇女宿舍的同志写文章：“同志，请写一篇东西，好不好?”“写不来。”“不要紧，随便写你所想的……”一张纸头送到一位从洛阳来的女同志手里：“我不会写。”“不要客气!”“我不是客气!”“过去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杨同志笑眯眯地问，“别客气了!”“不是，的确不是客气！我是一个女工，我不会写。”但是她承认她的歌唱得很好，她唱了一只“……不让敌人渡黄河”给我们听。

我深深地为这个女工同志的直率与不可动摇的自信力所打动，她们这种优美的性格，在我，出生在一个极封建的家庭里的，恐怕永远学不会的。

早间，编排得很美丽的新鲜的壁报（还有插图，有一位画了一张“延安的俘虏”）挂在救亡室里与室外的墙上了，杨同志征求读者的意见：“这个是不是呆板一点?”“这个颜色好似……”有的人一边搭着话，一边看。

因为是纪念日，有会餐，会餐就是有肉吃，那天吃到青豆里杂一些肉片。

午饭后，二妹夫妇来看我，拿了些果子露同饼干来。说是延安没有这些东西，知道我今天不能走，约我去观碑林，我问他们游华清池怎样去法，说是坐火车在临潼下车，再进去……一天是来不及回来的，只好作罢了。我们正要

出门，警报来了，在门外附近的一棵树下，坐着，彼此谈所见到的敌机的轰炸，无锡、南京、南昌……敌机来了，是一架侦察机，打从我们头上过去，飞得很高，在阳光逼照的天空，只看见一点白色。

警报解除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雇车，那一角地方很荒凉，遇到一二辆黄包车，索价六毛七毛。西安的黄包车价是这样的贵，车子的式样就像京沪一带的包车。实在西安的黄包车夫怕要算是有产阶级了，因为这样的车买起来至少也要一百多块钱呢，除非他们是租来的。我们慢慢走，太阳很大，风过去，吹掉一点炎热，带来一些干燥。我们谈着西安的古迹。“曲江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连秦淮河都比不上，一滴水也没有了，只有干干的一条沟的痕迹！”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样被诗人们歌诵着，带着许多艳情逸事的这一条水流，变成这样了。“春日同游曲江头……”我忆想起陆游失意的爱情与他的词：“……悔，悔，悔……”

碑林的房子是新造的，入门购票，实在是一个博物馆，里面有许许多多石碑，各种刻字、像与花草。有一块石刻“达摩西来”，非常细腻生动，我很欢喜。景教流行碑，我在巴黎东方博物馆看见过的。

从碑林出来，就雇车分道，二妹问我招待所住得惯不，邀我去她那里住；我想也好，别的没有什么不惯，可是我太怕蚊子，如果再不能睡觉，我会生病的。但我必得回去

说明一声，否则也许他们要以为我迷失在什么地方了。我回招待所说了后，吃过晚饭，就去二妹那边。在她对门的一条街上的铺子里买了一条工裤，只有男式，没有女式的，也不管它了。又买了两件衬衣。

二妹已在工作　播音，她把他们的小书房出空了给我睡，安放了一只小铜床，又放着椅子桌子，……简直像预备我长住似的，还叫人把洗浴的水都预备好，蚊香也点起了，……好吧！再来过一夜太太小姐生活！这间房间门与窗两面都临园子，夜里，对头风很大，太凉了，必得起来盖棉被。

一日的早上，我还是五时起床，去招待所候车，二妹已关照佣人烧好糖鸡蛋给我吃了走，她想得实在太周到了。

招待所里的女同志，大家在待车，听说今天可以走成了，坐红十字会的车。把行李搬在门口，等到八时左右，我同长沙来的几个女同志仍旧走不成功，只有几个男同志，有一个是广东来的，他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孩，他们走成了。

无聊极，回进宿舍来谈天，大家谈各人的家乡情形及别的，……那三个长沙来的女同志，一个姓许，一个姓邹，一个姓叶，姓叶的年纪还只十六岁，是一个生得很秀丽的女孩子，据说她的父亲是牺牲了的，她要往云阳去进青训班。

这一天没有出去，把三天来所见的面孔更混熟了些，有一位姓张的男同志，谈起，他是浙江上虞人，他老同着

一个长个子的同伴，是一个华侨，姓黎，他们来西安有事，办完事，仍要返延安。我很惊奇延安竟有这样从纽西兰跑来的青年，固然我也早从一些书报杂志上看到延安是挤满了祖国的有出息的青年，但是我不能想象他们是从哪一角去的！现在我才知道，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青年，不远万里、千里而去的。

他俩都爱好航空事业，张君曾学过航空机械，在日本住过两年，现在八路军里做俘虏方面的工作。黎君有点小孩子气，长得虽已像一个大人。因为生长在外国，英语说得很流利。

招待所里吃过午饭，大家午睡，这是最卫生的办法，恰巧也正是我的习惯，午饭后全座屋子鸦雀无声，午睡起来，一切都照原旧，有的人看报，有的人在大门里的小天井中打乒乓……那天午后，几个人立在门前，看见四号里的一个男同志把行李提出雇车走了，一定是因为招待所里的生活，已使他受不住而一下子取消了去延安的决心。对于我，实在说来，招待所里的生活，当然是觉得有点不惯，可也不是不能忍受。像学校寄宿舍的集体生活，我已经十三四年没有过着了，又是从小到大本来孤僻的脾气，总爱一个人至少占一间屋子看书做事；但也不能够就说我不爱人多的团体或公众场所……总之，对于工作，我是欢喜静静地独个人做的，不欢喜有人来吵扰我；娱乐，我却是欢喜社会性的、大众性的。

招待所里只有两件事使我很不惯，就是蚊子与厕所，但这也只能怪我的特殊脾气，因为别的人都很好地过去了，要蚊子一只也没有才能睡觉，把厕所的门锁起，还要把厕所四周的人赶掉，就是在那些贵族式的学校里也是不可能的。招待所里的厕所比西北大旅馆的好得多，有门，打得还算深，虽是不够，男女又是共同的，人又多，刚刚进去，就有人来推门。西北大旅馆的厕所同昭化差不多，总算没有猪栏，根本不是厕所，只是在一块平地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一直摆到"厕所"门口，连可踏脚的地方也没有。所以每次我觉得需要了，走到那里又吓回来了。那天二妹曾对我说越往西北走，厕所越糟糕。

偶然又谈到延安生活，一个睡在靠窗的女同志，满脸有痱子，她也是来西安看病的，说延安患肺病的人很多，因为营养不足；患胃病的也很多，因为小米饭不消化；患神经衰弱的也很多，因为工作过度；还有皮肤病，是那样的普遍，在学校里，有些人的境况是很苦的，买不起毛巾，大家就随便乱借，又不好不借，就是这样传染开来的。还有花柳病，那真是无从说起，陕北的老百姓，差不多十之八九患花柳病的……他们脏极了，从来不洗澡的。他们以前脸也不洗的，他们一生只洗三次脸，生出来，结婚，死。还是在八路军到后，他们开始洗起脸来……"总之，延安别的都好，就是生不得病，一生病，就糟糕了，又没有医生，又没有药品……"她这样下结论。延安有这许多病，

我在重庆、成都就已听到过。小米饭据说不易消化，须看如何烧法，如果烧得烂一点，那还好吃。王老伯父曾叮嘱我说：“吃小米饭要嚼烂，不要多吃。譬如你平常吃两碗大米饭，那么开始吃小米饭的时候，你只能吃一碗。”他又说，“小米饭能耐饥，从前年轻的时候，他在库伦，骑马的日子，必得吃小米饭才可持久。”

晚饭前，我们几个人在招待所旁边的革命公园里散步，这个公园里没什么特别景致，只有很多的树木——一些未长足的树，叫它们做青年树吧。但是有可散步的小路，两旁天然地长着蔓草，使人一下的忘记了身处城市的感觉。七贤庄旁边恰恰是一个革命公园，偶然，还是不偶然？

那晚我仍去二妹那边过夜，并且依照招待所中大家的办法，买了一顶阔边草帽，西安市上就有人戴这种草帽出来的。戴着这样草帽使我想起西班牙的水果小贩，很相像。

三日早间，我还是六时就回到招待所，说是今天可以走成了，我非常高兴。本来一到西安，我就打听去云阳的路，想去看看分别了十三年的琴秋姐，可是办事处说琴秋已回延安去了，这样，我就连信也不曾写，反正到了延安总可见到。这天恰恰那位洛阳的女工同志将与我一同坐车，在三原下车去云阳，我就写了一个条子，托她带去，或者琴秋还没有离开安吴。

在门口，我们眼巴巴地等车，车子到了，停在一号门口，一共三辆都是载重车，上面堆着些面粉、邮包……乱

七八糟的。办完上车的手续，大约已八时左右了，大家上车。车开了，我们立在车上，扶住行李，东西堆得太乱，没有地方可坐，据说还须到堆栈上货，这些东西需要重放的。我坐的车是第二辆，红头，每辆车子有一个押车的人，听说叫副官。我们车上的副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一口湖南音，眼睛有一点斜视。车上挂着第十八集团军军用车牌子。我们车上一共四个大人，五个小孩（三男二女）。到堆栈，大家下来，在看守栈屋的同志屋里喝开水。那屋里有三只秃头铺，两三个老头子在那里。车子停留了好久，上好货，重新分配人，他们要我们坐到第一辆车上去，说第二辆车上东西太多，换两个男子一个女子上去坐，但却又尽量往第二辆车上堆东西。在西安上车的时候，听得说那红头车比较结实，同时也听到有人叫那个男同志把他的八岁的小孩放在司机旁边，为了让小孩可以少受颠一点，但那个男同志并没有替他的小孩争这个坐位，听说是已有人坐了时，也就不出声了，后来还是那副官坐着。这个时候，第二辆车上的司机与副官叫我们到第一辆车上去，可是我们的行李搬到第一辆上时，竟被第一辆车上抛下，而不要我们上这辆车。那叫我们怎么办呢？

“同志，”我第一次这样叫，“我想你态度可以好一点，这边不要我们坐，那边又不许我们坐，那应当怎样办呢？”我说。

“他不是我们同志，他是我们请来的工人。”第三辆车

上的一个戴符号的男同志说，他把我们被抛在地下的箱子提起来："你到底叫他们怎样呢？有话可以好好说。"

我们车上的那个男同志说：给我们仍旧坐第二辆，这辆车上东西稍微平一点，给小孩子同女子坐着，少一点危险！

"小孩子也是人，妇女也是人，他们要少危险，我们就不怕危险么？"

听着这个话，我就出来说："好，我们不怕危险的，请你们去坐吧！"我问两个同车女伴，她们说好的，我们就坐第一辆车吧，可是因小孩子确实太小了，那个男同志坚持一定要把小孩放在红头车上，副官说他不听从他的分配，便争吵起来，末了，管堆栈的人出来说话，结果，我们四个大人一个小孩仍旧坐在第二辆车上。

小孩子也是人，妇女也是人，在理论上，这是通的，可是在实际上，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如果没有大人照顾他，他会成为怎样一个情形呢？在这种遍地烽火，艰苦抗战的今日，我们期待男子，中国的男子，不但勇敢的赴战场，为国家、民族与敌人肉搏，却还希望他们能够作出一点见义勇为的行动来，特别是对于妇孺。可是我不能够说这句话，轮不到我说，因为，我倒霉，做了一个女子，如果我说这样的话，人们要以为是女子的依赖性了。许多理论没有讲到这些枝节的小事情该如何做，没有讲出从理论到实践的曲折，可是理论到实践的确还要经过一些路。

堆栈里放着好些东西，进门口，有两大麻袋贴着万国红十字会封条，斯沫特莱捐来等字，我想该是药品，一个老头子问我："这几个外国字是什么?"我回答他："怕是药品，斯沫特莱女士捐来的，那个美国女同志!"

"唔！那可不得了，早就该把它运延安的……快些！快些！喂！这两包东西搬上车去!"

这两件东西大约堆在那里已好久了，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个年纪较轻比较有文化的人来负责管理这事呢?！因为很可能有些东西—— 如像药品或医疗用品，不能受潮，不能碰动，同时却是很急用的东西，因为负责的人不知道其特殊及价值而弄坏了，多么可惜呢!

我们的车子开了，出城时受到一点检查，副官给他看护照就放行了，三辆车前后之间隔着一点距离。车过时，黄沙在我们四周飞扬，太阳已开始热烈地照在我们头上了，幸而我们个个有草帽。

渡河的时候，我们三辆车上的人都下来，等待的时光，在河边走着，一边闲谈，轮到我们渡河了，那个背匣子枪的第三辆车上的武装同志，同我们一起渡，我称赞陕西渡夫的敏捷，肯用出力气来，…… 于是东一句，西一句，大家谈到各地的渡夫，谈到工人……

"刚才这个抛箱子的工人，不是我们的，他们什么也不懂，常常对外来的学生与妇女同志很不好的，我们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八路军里谁对谁都是客

客气气的，你们这个样子要把我们的名誉破坏了。’我们好几次对他们说，他们才好一点，可是常常仍旧像今天这个样子……”

这位同志是川西人，姓陈名独保，曾经过两次草地……在每次停车，吃饭或歇息的时候，我们欢喜同他讲话："过草地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也结果了不少性命呢！"他抚摸着他身上的匣子枪说："那个时候我们不愿再打了，我们不愿再自己打自己，我们要打日本鬼子！""过草地真苦，看去是一片绿色草地，但是下面它多少年积着的烂草，变成像软的毯子，你走下去，拔不出来，如果你越用力想拔出脚来，你就越陷下去……""在我们八路军里，越是上面的人越苦，他的责任越大，事情也越多；我们下面的人反舒服。我们不骂人，也不兴打人，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就劝告他，说服他，要他改过……"本来，他是个战斗员（他说我们不称兵的），第二次过草地时他受了重伤，动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做得不好，他的右手现在拿不起步枪了，所以他没有再上火线，现在卫生部做一个特务员①，这次是同了卫生部长由前方转来，再回延安去的。

我们越同他在一起走，越觉得他的可亲，他对我们完全像兄弟姐妹。他是这样的真挚、单纯、平常，可是却又这样的不平常。谈起他的老家，他带着些依恋："不知他们

---

① 比勤务员高一级的工作人员。

怎样了，已好几年没有信了！”

十一时左右，我们到了三原，洛阳女工同志下去时，同我们告别。我们的车停着，司机要休息，吃午饭。我与同车的温女士，第三辆车上的邹、许两女士，走进一个馆子，就在那里吃面。这是一家比较算好的馆子，或者是唯一可吃的馆子，是副官与司机指示我们的。一下子，车上的人大家都来了，老板笑眯眯地招呼他们：“天热啦！快喝一杯茶！”和气地招呼这些手臂上有“八路”符号的男子，老板娘的小脚也一拐一拐地走过来招呼喝茶，她不但不怕他们，的确自自然然而且亲亲热热地招呼，像招呼她一个从远方回来的爱子或胞弟，我不能不感动。

吃过面，司机他们休息去了，说是天太热，要等太阳稍微过一点才开。三原的八路军联络站，就在街上，只有两间屋子，外面的一间，像一个书报推销社，有些书籍出售，在那里翻了几本书。没有坐的地方，就在联络站对面的一家老百姓家门口的石凳上坐下，那并且是阴凉的一角。太阳晒在黄沙地上，地面变成火红，特别觉得热。好像在红海上望阿剌伯的沙漠那样干燥而炎热。三原没有什么市面，或者因是中午，行人稀少，更觉冷落。我们口渴，就在旁边的一只露天桌子上等喝茶，等待小孩子把水煮沸，泡给我们。我实在想睡觉了，天太热，又无聊，加上每天的睡瘾发了，一个不相识的同志拿着几本救亡小册子在看，就向他借来翻了一遍，有一只凤阳调，谱进抗战的词句，

我觉得很好。这些通俗的调子，最能流入民间。

到下午三时我们还坐在这只茶桌旁，打过几十个呵欠，喝过十几杯茶：“同志，快开车了吧？”“快开了！”副官来了，司机跟在他后面。终于司机懒洋洋地转动了车轮，我们离开了三原。

黄沙是那么大，如果车子前后开得相距不远，那么前辆车开过后掀起的路上黄沙，像迷雾一样地遮在后一辆的面前，我们只好屏住呼吸，把手来掩住口鼻，虽这样，因为喝饱黄沙，时时感到口渴。

六时左右，到了耀县，今夜车停在这里过夜。副官告诉我们一家旅馆，说是比较干净一点。是一座黄泥平屋。走进门去，一个狭长的空天井，两边是屋子，屋子里，一只大炕之外，一只桌子，就完了。炕上铺着一条高粱秆子织成的席，用手一抹，全是黄沙。随便什么地方我总要现出我的怪癖来，用面布将席揩刷后，一盆洗脸水变成黄泥浆了。茶房不肯换第二盆洗脸水，说：“等泥沉下去，可以用的。”原来越往西北去，水是越来得宝贵了。其实这个地方并不缺乏水，是人们懒得去取，或者是脏惯了。

把行李放下后，就去吃晚饭，大米饭已卖完了，只有馍。这种馍，是以麦粉做成的，荞麦、玉蜀黍也都可以磨成粉做的，没有馅子，实心，其实，在北平，就叫它做馒头。听说明早五时就开车，那今晚必得饱食一顿。吃完饭，就上街走了一下，耀县比三原大多了，一条不怎么阔的街

上，挤拥着驴子、马匹、大车、与人们……在一个摊头上——卖馍的摊头是很多的，我买了一角钱馍，有十二个，带回旅馆，准备明天早上吃。

回旅馆，去看看三个女伴。与我同车的温女士，她同邹、许两位同住一间，就在我隔壁。她们三个人把被褥铺起，盘膝坐在炕上，预备睡觉了。“听说明天早上五时就开车，来不及吃早饭的，今晚还是去饱吃一顿吧！”她们听我一说，三个人就起来，跑出去吃东西。

我觉得很疲倦，向老板买到两枝艾绳，点起，就睡觉了。其实这天我们的车并没有走许多路，恐怕一共只开了五六小时，如果像川陕公路陕段的那样开法，一天开十二小时，不多停留，那么一天工夫可以到洛川，或洛川以上些。

土炕比木板还硬些——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蚊子倒不多，可是跳蚤却扰个不休。脑子里萦回着日间所经受到的新鲜的印象，实际上这种印象到明天更有其它新的，以后就要变成旧了。最使我兴奋的是对于陕北的印象。

四日早上四时左右，我已起身把行李结好，等待出发，到五时多一点，我们上车，就离开耀县了。

我们的车上，经过我们几次的整顿，靠了那个男同志的力量，把行李已经尽可能地叠得平了些，可是终究还是很高，每次经过城门，我们的头尽量低下，或者索性将身子躺倒，不然，恐怕会把我们的头削去的。从耀县过去，

尽是山路，非常不平，车子颠动得厉害，那个男同志只好把小孩用一条很粗的绳子绑着，深怕小孩子睡着了，他一不留意，孩子会抛出车去。

昨天我还不十分信长江先生《陕北之行》中的话，今天却越走越相信。这条公路恐怕要算最难走的公路了。地方是愈来愈苦了，荒凉，冷落，多少里没有人烟，虽然这样，我还是爱它，深深地爱它，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祖宗曾经在这一带开辟民族大业，好不容易子子孙孙繁衍到沿海几省，可是现在，我们的一大部分肥美平原有的被敌人占着，有的被敌人糟踏着，我们要靠着这些穷苦的山地，作后方补充与建设的根据，把敌人打出去。

十一时左右，我们到皇帝陵——这地方怕叫“中部”吧——，就在那个小村上歇息，吃午饭。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庄，不过二十几家人家，我们到的这家馆子兼旅馆，恐怕也是唯一的。今天第一辆车曾在途中搁浅，后来听说是修好了的，可是这样，我们的车就开在最前了，我们的车总算没有出事，每次上山，汽车发出呜呜求援的声音。坐在上面的旅客，也都个个肃静正经，车上的一个随车工人，每次车上山，他就跳下车来，拿着那个木桩，在后面拦住车，怕车开不上去倒退下来，车子上几步又退几步，终于爬过了一个山又一个山。看惯了四川与江浙一带的山，那么陕北的山，实在太丑了，它们没有山峰，只是一堆一堆的极高的黄泥堆，好像用人工削平了的，像男子的平头，

就是所谓“台状形”，没有一棵树，只是长些乱草，太阳照着黄沙泥的山地，发出的反射，使人起异样炎热的感觉，完全像在红海上所望见的热带地的秃山。因为气候干燥，泥土都生了裂缝。可是，这个时候，还是雨季呢，尚且如此，这条公路大约是极难造的吧，当然我是外行，只好猜想，这一带很少有石头，没有法子铺细石子，整个路基是泥身，天下过雨，行过车，就成一条沟，又有一块一块裂下来，有深深的洞，车子行在上面，就是那样七跳八跳的乱跳，像法国奥凡业（Auvergne）人跳的本地舞。

我同温女士在那家馆子吃午饭，司机与副官也在这家馆子吃饭，饭后，他们在大门里的一只炕上睡着休息。我们靠在圆桌上谈闲天，那位男同志戴了草帽去访皇帝陵，托我们照料一下他的小孩。在这个时候，温女士对我讲起她来延安的经过。她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扬州人，她曾两次出走，都被父亲追回。父亲也不是一定反对她来延安，只是要她在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因为她已高中二年级了，只差得一年，但她等不及。到后来，父亲见她意志不可屈，就给了她一些钱，这次她由重庆到成都，成都坐飞机到西安……我偶然问她多少岁，她说只十三岁半足，已高中二年级了，但我想或许她不止这个岁数，在欧洲，没有一个女子的岁数是准确的，我可不知道中国时行的女子的习惯是怎样的。她父亲是××大学校董，兼现任教育主任，我问她××大学里我的几个朋友，她说都曾见过，当

她父亲宴请同事的时候。我同她谈天，觉得她很可爱，她有一些正确的判断力，但是我又不禁替她担心，她太聪明，太早熟，我只怕堕落的魔鬼随时要窥伺她，有的人说聪明的人应当学政治，我却觉得聪明的人更应当学科学。

自西安出发，一路遇见三三两两的男女青年，行在公路上，往往数十数十地鱼贯走着，他们背着一个包裹，那样的走，像朝山进香似的——正如我的家乡六月十四五日由茅家埠到灵隐所见的——他们带一点少量的衣服，为着求得抵御日寇的知识与技能，远远地到延安去。往延安的青年，几乎每一个都有一段奋斗与艰苦的经过，一段小小的动人的历史。

直到我们谈了好些闲天以后，第一第三两辆车才到来，邹、许两女士说她们的车上不来山，只好大家下来走，后来总算开上了，却又坏了，再修……

那个男同志回来了，满头是汗，他说他找不到皇帝陵，只见着皇帝庵，“这就快到了，”副官同他说，可是他不愿再去了。我同温女士出去，照着他们所说的，一出城门，就往右边的山路走。出城门时，我们问了守城门的卫兵，他向山上的柏树丛指了一下：“就在这上面”，问到一个老百姓，他说在那一边，叫我们回头走，他一定没有听懂我们的话。我们走到半山，路也没有了，山上都是小的枣树，攀住衣服，天热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一辆汽车到山脚下停住了，“志川医学院”，是第二战区的，车上下来好些青年，

他们也上山来。“皇帝陵在哪儿?”糟糕，我们还不是一样的不知道。他们在半山里盘旋了一下走了。我同温也无意上山，就走下来了。在河边，居然有几株柳树，我们就在树荫下漫步，河水澄清，有三四个男孩在河里洗澡，他们快乐地彼此泼水，我们歆羡地望着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洗一个浴。

二时过，我们离开小村，过洛川，没有停留，近晚六时，到了鄜县[1]。车子停在一家小旅馆门前，车一停，旅馆门口一个穿红衣服绿裤子的女子，满脸白粉，抹得又不高明，有几处被汗流弄掉了，显出一块油光的粗糙的皮肤；她来同副官搭话：“房间一间也没得了，我让给你，你来……”她拉住他的袖口，老是这么说。副官手里拿着那条卸下的皮带与匣子枪，这个女人就接了去，“等下要来呀!”副官下来，他往这个旅馆里去了一下，又回来：

“这家算最好的旅馆，没有房间了!”

“怎么办?”我同温与邹、许，大家没有头绪地呆在车上，他们叫我们到茶馆里去喝口茶，再替我们想法。我们走进一家茶馆又回出来，家家座满，到最后，我们走进一家，茶炉就在门口，煤气息很重，也不去管它了，就在这家占住了一只方桌，洗了面，拍了拍灰尘，我们就在这里老等。

---

[1] 现改称富县。

这个小小的城镇那样地挤满了人，街道上，来来往往，简直没有一个空隙。天已快暗下来，终于，陈独保同志替我们找到了一个过夜的地方，他去向友军（八路军称别的我国自己的队伍为友军），第二战区的一个后方医院（军政部第×后方医院）接洽，请求他们让出一间房间来，他们答允了，并要我们早点去吃夜饭，再晚一点，也许会吃不到东西了。我们邀他一同去吃饭，他无论如何不肯。走进一家馆子，运气真好，我们先来一步，因为里面已经客满，而且还在源源地进来，我们占到一只圆桌，大家饱吃一顿。回到车旁，陈独保独自在那里，他说他们今夜睡在车上了，正在把行李铺平一点，去同老百姓借几块木板，搁在车上。我们把要用的铺盖拿下，他领我们到那个后方医院去。这是一座旧式的有许多零零散散屋子的大院宇，穿过几个小院子，到里面，才是那间借给我们的房间，泥的，一连好几间，人声，笑声，胡琴声，像走进一个市场。这间屋子里有一只铺，是用几块板搁在长凳上而成的；还有一只高的铺，是几块板，搁在两只圆台脚上的，这都是陈独保同志为我们预备好的，真难为了他。邹、许二人住了板铺，男同志与他的小孩用了高铺，当他铺好了睡上去，或许是他的身体太重，圆台脚摇动得非常厉害，那小孩子却哈哈地笑，一边喊“阿唷！”我同温，在墙脚边看见有竖起的两只圆台面，各人拿了一只，放平在地上，她睡在一只桌面上；但是我的一只，医院里该是刚刚吃过酒席，上面留着

猪油、韭菜、鸡骨头……用纸揩过后，还是一塌糊涂的油腻，没有办法，我就把它反过来睡。可是圆台的背面有四根木头，因此我得小小心心地睡，而且脚也不好伸直，这样弯曲着。那位男同志同我们开玩笑：“这只圆台面比起《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的圆台面怎么样?”我们说：“不去管它，总之，它们给了我们无比的用处。”第二辆车上一对夫妇，睡在院子里的地上，其余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住什么地方去了。

我把被头包住身体，弯曲着睡。跳蚤多极了，每个人隔衣抓痒的声音，像刨生瓜。

天热，没有关门，为了贪风凉，我的圆台面就放近门口，大约已是半夜了，本来睡不着，门外面来回急促的脚步声、人声……更烦扰得我不高兴睡觉了。“送到一个俘虏!”“伤了头的?”“房间早已预备好了!”“送东西给他吃过么?”“早送过，药也换过了。”“他不要吃，他要吃大米饭。”“他不要吃馍，那么去买大米饭。”“去买过了，没有!”“这里哪来大米饭?”“那么去叫碗面吧!”……这个一句，那个一句，许多不同的声音在那里说。“一个俘虏!”刺入我耳朵：“一只穿衣服的野兽!”一半为睡不着，一半为好奇，我就起来看，这个俘虏就睡在我们的隔壁间，怪不得这些人的话，句句都这样清楚地送进我耳朵。这个黯色皮肤的日本兵躺在铺上，用灰色军毯裹着身子，头上扎着绷带，他的表情还是那么的骄傲，在那里半睬不睬地回

答人们的问话。我在门口望了一下，一个穿西装的男子在用日语问他，又把他的回答翻成中国话给旁边的人听："他说他不愿吃馍，并不是不爱吃馍，刚才买来的馍，他看见没有纸包起，给勤务的手拿过了，他嫌脏，不肯吃。他们日本人多文明，不像我们这样的，他们多清洁！多讲究！"说着的人现出惊叹赞赏的面色。这大概是一个留日学生，他这样义务地宣扬日本的文明！不知道他所见于日本的文明，是哪一方面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有飞机大炮得以在我国攻城掠地，残杀我们同胞，奸淫我们妇女，烧毁我们家舍田园？

他发了一些赞美日本的议论以后，回过头来命令人家快快去买碗面来给俘虏吃。我不愿再看下去，也觉得那样立在门外望是不大"绅士"态度的，在另一个场所，我绝对不会这样的，可是这一次我为了克制不住的好奇，要看一看杀我们的人是怎样的人而那样不绅士地去望了一下。但是我真气恼，心里深深诅咒这个奴性的同胞，这就是祖国花了许多钱送出去留学回来的！！同时对于他们这样的优待俘虏，也使我忿慨！为什么一定要替他们找大米饭？既然我们自己也没有大米饭吃。买了馍来，他不要吃，那就算了。优待俘虏，不错，对的，但他们是一个人，不是神，我们待他们如待自己一样就是了，为什么要待他们胜过自己？怕他们？敬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文明？

早上，天还没有亮，大约不过三时，我就起来了，接

着温、邹、许也起来了，大家都没有睡好。我们摸着暗路到厕所，真糟，简直无从说起。我已经把皮鞋抛在西安，只剩了脚上一双鞋子，有什么办法呢？

天一亮，我们就离开那屋子，往车上去，司机与副官正刚刚起来，“昨夜我睡在车上，”副官说，他好似特地对我们几个女同志声明似的。“我们睡得很好。”他又说。“我们睡得一点也不好。”我们说。

七时左右，我们渡过一条小溪流，对面有一家茶铺，还有馍，热腾腾的，我们停下来，大家喝一点开水。温去溪边洗脚，我把我的鞋子底往水里洗了一下。溪水碧清地流着，可惜靠水的泥滩上都是驴子粪。我注意到驴子有个怪脾气，每次渡过水的时候，它们喜欢小便，它们是特别欢喜便溺在清水里的。

说是今天我们可以到达延安了，我的心为要看到一个新地方，经受到一些新的事物而激跳着，喜悦着。十时左右，我们停落在一个小极小极的村庄上，一家小茶铺前有几株大树，我们就坐在大树下等待我们的车子，只有第三辆车老早开去了，第一第二辆车上不来山坡，在我们对面的坡下呜呜地叫。

在大树荫下，望着质朴的山景，好似十分熟悉。我想起在珊雅（Ceyrat），法国中央高原的一个小村的夏天，我好几次同了朋友在一家大树边的咖啡店里喝咖啡，游人在那里买油煎马铃薯片吃。茶铺临着一块干净的空地，后面

有一座瓦屋，关闭着。

我们的车上来了，但是司机叫我们不要坐上去，还要爬过一个高山，这样，我们就留下第一辆车上的同伴而走了。我们翻上山又下山，跑了近十里多路，就在路旁坐待车子。

据说昨天我们早已进入边区了，（从前的苏区，现在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十二时左右，我们停在一个小村庄上，就在当路的一家小铺子前坐下，有两个男子，和蔼地来问：“同志，你们是到延安去的么？”“是的。”“不知道你们的车上还能够坐一个人不？……”

我们请当炉的老板娘做了三碗面，无论如何，同她讲不明白，结果，她给我们烧好一锅开水，还是我自己动手，我最欢喜吃烂面，居然不知不觉地烧得那么烂。老板娘看我放下酱油，打下鸡蛋，不时露出会心微笑，喊一声“噢”！

我们上车走了，副官没有允许小村上的男同志上来。现在我们的车孤独地走着，前面第三辆车早走了，后面第一辆车还没来。经过一个地方，两边是深山，路只恰恰可以开一辆汽车，如果开得斜出一点，那可完了。我们的司机的技术，似乎还好，但我总觉不及川陕公路上的。而且他工作不很努力，不把工作当工作做，有一点儿戏似的，我确实有点不大放心。

刚刚开出小村，天下起雨来了，副官同司机说还是回

小村，在小村过夜吧，看天色是要作阵了，问我们意思怎样。说只要我们不怕雨，他们是没什么的。我们希望早到，就说开吧。雨越下越大了，草帽已遮不住，我们就用一条绒毯将我们三个大人一个小孩都遮了起来，但终究不成，过一小村落，只好停下来，等雨小再开。村前有好几株大树，我们的车就停在一株大树下，受不到雨点。

看见我们这辆车，村里的小孩与妇女都出来了，女孩子拖着辫子，妇人都是三寸金莲，他们男男女女个个人胸前挂着一个红布或绿布肚兜，很精致地用别的颜色布来镶出花朵或嵌边。她们围住司机与副官问话，我们也没有去听，根本也听不懂，接着她们烧出稀饭来了，我们已吃过面，司机与副官从清早起还没吃过东西。

我同温与一个老妇人搭着话，旁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这里还裹脚？把她的脚放了吧！”但是她完全文不对题的说：“苦呀！这地方苦呀！苦得吃稀饭都不成，只好喝水！”她说这个地方的土地太瘦，只出小米，就是小米，收成也不多。可是我不相信这句话，自从我进入陕北，我根本就不信这话，就在这小村的四周，我看见许多肥美的青豆，长得同江南一样。只能说这个地方不适宜种稻麦，但还可以多种别的东西，多吃些杂粮，也总比喝水好，实在，她们如果喝水过日，我想也不会那么胖。她们给我一个不好的印象，她们有一点虚矫，也太懒惰，就如我们的车子停着，她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甚至有几个本来在作农

事的壮力也跑来了，有的坐在露天的磨子边，有的立着，个个双手拱起，呆看我们，直到我们的车子开走。

我们在这个小村停留了近两小时，雨小了，就开车，开出不一歇，雨停了，天边也没有了乌云，玫瑰色的晚霞，展在晴空，我们高兴极了，但是今晚到不了延安，我们必得停在甘泉过夜。

到甘泉，太阳快下山了，车子停在一个小旅馆前的空地上，副官同司机下去找旅馆，他们问我们下去不，我们说今夜一定在车上过夜，他们笑了。我们就没有下车，这辆车子已经变成了我们暂时的家，在车上不再觉得怎样不舒服，反而有点眷恋的感情。隔街的一家馆子，问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有面，有馍……他再三问，并且跑近车来。“等我们下车来再讲吧！”“你们不用下来，我送过来给你们吃。”一歇后，他竟送了三杯茶，一只小方桌面来，我们把这桌面平放在行李上，靠着，喝起茶来，像欧洲 Vogue[1]里的人。末了，他又送过三碗面来。

我同温下车去走走，甘泉是个很小的地方——这是在我看去，其实还是一个县呢——四围是荒着的山，听说这个地方有个甜水井，所以叫甘泉。陕北确实是地广人稀，就是近人家的平地，也都荒着，不种什么，不像四川，连一寸一角的山坡都种满了东西，土地在陕北是

---

① 法文：指赶时髦。

那样不值钱，不被重视。如果国家能够把战区里逃出来的难民移到这些地方来，给他们一点开垦的费用，一方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同时又使他们得以贡献他们的力量，增加抗战期间的粮食生产，总比把他们放在难民收容所里好些。

我们在一个小学校的操场上来回散步，回到车上，那个男同志已把车上的行李重新加过一番整理了，“就是这个邮包，没有办法安置它，又硬！你们睡一下看，这是你们睡的地方！”我同温睡下，觉得还好，于是铺起被头，索性睡了。

那夜我睡得很好，从来没有比这夜的睡眠更甜蜜了。没有一个跳蚤，没有一只蚊子，只有半夜以后，露水很重，被面也湿了，觉得冷冷的。头上冷，用草帽遮着，也就继续睡去了。

天微明时，我们早已醒了，大家睡得很好。可惜早上太冷一点。我下车去，在小学操场的一角换上工裤与衬衫。大早，衬衫穿着还嫌不够，需要加上毛绒衣。

五时左右，我们车就开了，迎着朝霞，大家心里为快要到达目的地而快乐着。各人唱着自己爱唱的歌曲，好像凯旋归来似的。

甘泉以上，每逢山口，有女自卫军在山坡上放哨，她们都是小脚，挽起一个厚厚的发髻，穿着青、白短衣裤，两三个在一起，坐着做针线，车子经过，她们立起来，带

一点羞怯，检查路条，一辆车子也不肯放过。

车子开出大约二十几里路，一个背包的青年喊住我们的车，要求上车来，副官答应了他，他就上车来了。他是在云阳青训班工作的，这次回延安去。

太阳照着全身，毛绒衫已穿不住了，过劳山，副官与司机要我们下车来，因为山坡太险。我们又走了十几里路，在路上，我同云阳来的青年，又谈延安的生活。

“延安的城外山里，狼很多，大早与黑夜，一群一群地出来，不过都是小狼，见了人多，它们就跑了，如果一个人，那它会来咬的。山里的小猪小驴常给它们咬死，拖去吃掉。”

“呵！”我应着，问到日常的生活程度，他说：“羊肉一块钱六七斤，猪肉一块钱四斤……”

这样便宜，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在西安，听人们说延安的生活程度是非常高的，我有点不相信，羊肉比猪肉会差得这么远，在别的地方，羊肉比猪肉还贵。他说：“那是因为这边出产羊，一张羊皮可卖几元钱！它的肉又值什么？”

他的话似乎有理，的确，在近延安的路上与山坡上，许多成群的黑羊白羊，有人赶着或散放着吃草。

劳山的山路极险峻，车子常常在这里翻身，可以说是到延安的最后一个关。过劳山，山坡旁边有一辆载重车倒在路旁，幸亏是落翻在路的斜坡上，还可以想法弄起来，

车里并没有坐旅客，司机和押车的也都安然无恙，他们要我们的车带信给延安派人去帮助他们取起车来。

延安已在望，延安的城墙蜿蜒地从山巅拖下来，临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延水。近城门了，城门外的两边墙上的字，清楚地映入眼底，生动而有力："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高地写在那里。

进城门，只转了个小弯，开进一个停车的所在，我们就到延安了！

我们的运气太好了，路上没有遇着下雨，有些人费了八天十天，甚至于二三星期之久，才到达延安的，我们只走了三天半的工夫，——那天是八月六日，上午十时左右。

四　延安最初的一瞥

到了延安，朋友们的航空信，陆续从西安转过来："写些延安一般的真实情况，生活情况来告我们……"但是，我能够写些什么呢？伟大的话，留给伟大的人去说吧，去写吧，我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女子，只能说几句，写几句与柴米油盐差不多的琐碎的东西。

到达延安后，居处马上就成了一个问题。离西安时，黎君曾说起可去住西北旅社，在延安的停车处探听一下，说这旅社早已住满了人，没有空房间了。我身边带的几封介绍访问的信，那当然与解决居宿问题无关的。这样，我有点窘了，因着一个朋友的关系，住到北门内的北什字巷一家老百姓人家，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家机关，挤得没有一

间房子是空的。我住的是一间很小的四方形房间，西向，很矮，窗子低于行人的街道，街上的行人毫不费力地可以瞭望房间中的一切。没有门，仅有一个白布门帷，隔壁是那个机关的通讯室，但门上没有字条写明，来找这个机关的人常常闯进我房间里来。后来，这机关里的人也同我熟了，半夜，当他们在院子里谈天谈得口渴了的时候，知道我有热水瓶，他们跑进来倒热水，我醒了，翻了个身，又继续睡觉。因为日夜有人进来，我只好穿了同白天一样的衣服睡觉。

我房间里有一只大炕，上面铺一条高粱秆子织成的席，靠窗有一只旧的白木桌子，一只小方凳。跳蚤非常多，还有一种白色的小蚊子，后来知道陕北人叫做“白蛉子”，在阳光里一点也看不出它的影迹，给它咬一口，很痒，皮肤上立刻起一个泡，直到一两个月后，还时常会发痒，一抓就起泡、出水。想不到这种小小的虫，它们的毒汁是这般厉害的。

这份老百姓人家，是没有厕所的。他们的厕所，就是屋后面的空地。那个机关在屋后的空地上造有一个厕所，三面是围墙，上面是屋顶，厕坑打得不很深，用八条不很粗的木头搁着做凳脚，可是脚立到木头上，又怕滑下来，又怕木头断。大约人人都有这一种感觉，所以一堆一堆的东西并不在它们应当所在的地方，却在这个坑洞的四周，人们走路的地方。厕所的地位在平地上，对面是一个山坡，

有几个卫兵站在那里，正好居高临下，对着这个厕所。那个机关里没有一个女同志，时刻有男同志进出，因之你要在这厕所里停留两、三分钟都是不可能的。

延安这时是在盛夏，可是早晚很凉，须穿毛绒衫，半夜，我冷得盖厚丝棉被，只有中午极热，不知道其间相差有多少度，为了不愿太过文明人的生活，我已经把一只爱好的常带在身边的小寒暑表送给了朋友。

七日的早晨——这是一个星期日——我去访洛甫[①]先生，向那个机关商借了一个通信员，请他领路。据说有十五里山路，可是我急于知道琴秋姐回延安没有，也就不怕路远了。那个机关里的人对我说洛甫先生这几天在生病，今天去，恐怕见不到。实在，这样突然去访问，也是很失礼的，并且张先生事情非常忙，多半不在寓所，更是可能的。但这个时候，我只想知道老友的行止，这些都不去想到了。山路不大好走，高高低低的，天气也很热，可是还算好，只走了一小时多就到了：原来不过六七里路程，陕北的里数，像四川一样都是说大的。特别是在这位通信员同志口中。

洛甫先生在寓所，近日正患感冒。夏天，住窑洞的人很容易患感冒的，窑洞里与外边热阳下的温度是差得很远的。第一次走进一个窑洞，我觉得它比延安城内的瓦屋好

---

① 即张闻天。

得多。这是一个土窑，大约丈把深，七八尺阔，有一对门，一对小小方格的木窗，糊上些白纸。里面有一只铺　　几块木板搁在长凳上，　　一只旧得已拐脚的书桌，好像旧家庭的账台，还有一只与这只桌子成对的椅子与茶几，一只只有一个靠手的藤椅，一些书籍……就是洛甫先生窑洞里唯一的摆设了。这些破旧的东西好像是从没人访求的旧货摊上弄得来的。这些东西虽然很破旧，但整理得很清洁，有次序。我开始赞美窑洞，他笑了："你欢喜这样的窑洞？"我说："是的。"洛甫先生又微笑着说："那还容易，在延安，打个窑洞住住，总还容易的。"问起琴秋，说就要回来了，从琴秋谈到泽民[1]，"泽民已经牺牲了……"他面孔上的肌肉好像紧缩了一下，或者为了不愿给别人看到这个苦痛的表情，说过这话，他掉转了头。

回来，已是近午。在路上，天很热，遇到一个小瓜担，买了两只小瓜，一边吃一边走，想起泽民，心情十分哀伤。一到延安，听说琴秋已结婚了，很觉难过。当然，那并不是封建思想作怪，琴秋，她有权利得着一点安慰，不过在当年做了泽民与她两人的朋友的我，对于泽民的死，不能不起哀感。眼前这副小瓜担，使我忆想起上海西摩路弄堂里的馄饨担；那年冬天，我在他俩寓中过新年……泽民已经死了，他的快七十岁的老母，还是巴巴地望他来信，在

① 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

骂他懒笔头哩！

傍晚，我出去逛街，想出城门，守城门的站岗同志要问路条，我没有，只好回进城。觉得无聊，不想回寓，就爬城头。经过一个广场，许多人坐在地上，大家都在出神地听，有的手拿了纸笔在记录。主席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讲话，太阳正逼照着西向的主席台，他不时揩着额角的汗珠，头发也似乎发出汗湿的光。这位老先生，我想大约就是林伯渠先生。顺耳听，是报告赴汉口开第一次参政会的情况。在陕北，演讲等等，都称“报告”。

城头上站了一歇，我就走了，人们的眼光已开始在注视我；走在街上，有几个青年对我吹口哨，想是表示不快，一定是为了我的服装。那天，实在太热，穿不住厚衬衫，把一件有花的丝西装塞在工裤里面，就这样走了出来。我深悔自己太不谨慎了，后来，我又觉事情并不如此严重。那是大约在一个月后，我走在鲁迅艺术学院的附近山地上，看见一位女同志，穿着一件绿色丝质西装，式样也还新，正从公路上走来，并没有人向她吹口哨，也没有人注视她。我推究缘故，想该是她已经被人们看惯了，熟识了。看惯了的人，看惯了的服装，以及看惯了的一切，方式……不觉得特别，也就不觉得不好。

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穿军装的妇女，在别处是极难得见的，可是在这里，还有穿着军

装的怀孕的女同志，她们有的是边区的妇女工作人员，偶然也有抗大的女生，快要做母亲了。老百姓的服装也很朴素，颜色也不十分鲜明。服装的颜色与奢华与否，我觉得与地势同气候都有关系。热的地方的人，欢喜鲜明的颜色，冷地方的人，喜穿深沉的颜色。至于质料的奢华问题，产丝的地方，像我的家乡，最便宜的纺绸只要一角三四分一尺，有些人用做衬衫，还嫌不好，但是洋布与土布呢，也差不多至少要这个价钱；这种便宜的纺绸，运到西安，起码就变成八九角一尺了。那天我替二妹带了一件丝绸旗袍到西安，她说西安买不到一元一尺以下的丝织衣料的。越往西北走，丝的东西越少，越贵，大家穿些土布，固然是风尚的朴实，却也是势所必然的，因为这边是产棉的。

走在延安街上，自南至北，一条短短的大街，挤着无数的人，有着无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口音。延安是这样的挤满了人，简直是水泄不通。在星期日，每一个街角，每一间屋子里，都挤满了人——连在乡下的人也进城来了。冲在这样一个人潮里，我有点着急，不曾习惯，而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有点害怕被它卷了去。

十二日的午饭后，机关里的人正在午睡，四周是静寂的。院子里忽然有人声，说是来找我的，我真快乐，真感动，但也有些惊奇，在延安，我没有很多朋友。在那个机关的会客室里，我们彼此喊：“呀！你来了！”“你们来了！”“你怎么来的?”六日午后我托通信员送的信，陈昌浩先

生　琴秋姐的丈夫，“丈夫”这个名称在延安是不存在的，大约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延安盛行的是“爱人”，代替丈夫，一　到昨天　十二日才收到，我写的地址不清楚，他们竟找到二十里铺去了。后来，吴亮平先生想，问马海德先生也许会知道。一说起这位马海德先生，延安大家叫他马海德同志，是我到延安后最早见到的一位外国新闻记者，兼八路军志愿医生……还有傅连暲医生，也是最早就见到的，那晚他们有事往那个机关，听说有外客，就来看我。马海德同志，说是美国人，能够说法国话，他说最后的三年医科是在瑞士读完的。曾经到过法国我两次度暑假的高城（Haute ville），那条路上的山景，他是熟悉的，我惊奇他的法语发音还很准确，过去我接触的会说法语的美国朋友，他们的法语发音常常是很可笑的；后来，人家对我说，马海德同志原籍是叙利亚，谁都知道的是一个现在正很受压迫的弱小民族，我知道这个民族对于语言是有特长的，尤其是对于“说”。马先生能够说我国的普通话，特别是开玩笑的话，他还能够签他的中文名字“马海德”。马先生在延安已久了，　陈、吴两先生问到马先生那边，居然问着了。可是我在这五六天里，正在奇怪没有一个回信。见面之后，大家似乎有些要埋怨的意思，却说不出埋怨的话来，大家还是初次见面；可是我很高兴，因为在那间屋子里，天天盼望有个人来领我认认延安，天天闷得百无聊赖。

这天午后二时，该去拜访李富春先生。上一天由那个机关去信约好了的，听说我要问的都可向李先生提出。约访的时间已到，我就动身去。

在延安找人，是很不容易的，道路除了大街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全是黄泥沙；没有街名，也少有门牌号数，如果是近郊的窑洞，那更难找了，除非你一个一个洞窑问过去。问路也很困难，街上没有警察，间或遇到一两个站岗的卫兵同志，你问他时，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你，他也不认得，只好用手随便指一下；言语的不通，也有一些关系，如果背后跟着一个特务员，或者前面有一个通信员，那么对于问路及别的一切，就方便得多。那天若不是陈、吴两先生领路，我决不易找着李富春先生的寓所。

李先生住的是半窑洞，大门外砌着瓦屋的式样，里面却是窑洞，接连三个，是打通了的，由当中一个的大门进去，陈、吴两位领我走进右边的一个，李先生在那里办公。

四十左右，中等身材，不胖，却很结实，皮肤紧紧地裹着肌肉。面部与手的外表，似乎已把个性表示得十分显明：坚决、干脆，办事十分能干，我这个直觉并没有错，因为，在后来，为了接洽参观，想听报告，甚至于晚会的入场券，我都去信麻烦李先生，他总是有求必应，而且总由他亲自给我一个迅速的回答。

“来延安几时了?”李先生立起来，一边让坐，一边说。

他是一位留法老前辈，问起我几时回国，我说："一九二五年二月。""我是一九二五年归国的。"他说。

问到我的居处，我就说："希望能介绍一个地方给我住，现在所住的地方，厕所太不方便了……"

他笑了笑，又好似皱了皱眉头，立刻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介绍信。

在这个短促的访问与谈话里，已经二、三次有人拿进信件公文来请李先生披阅，他的路易十六式的有插信柜的破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文件，我不愿耽误他的重要的工作，把我写在纸上的几个问题，呈交了李先生，他答应约定日子通知我去各方面谈话，可以得到我所要知道的种种，我就告辞了。出来，陈、吴两位有事，也就分别了。

这天晚间，那个机关送了我一张晚会入场券，券是油印的。那晚的节目是：一，《忠烈图》（京戏），二，《东塔镇》（快板），三，《双拾金》（滑稽剧），四，《烈妇殉国》（秦腔）。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七点钟，我赶去赴晚会，在大礼堂进门的院子里，又遇到了陈、吴两先生，于是便一同进去。"大礼堂"只是一间较大的屋子，这是附属于基督教堂的，大约从前是用以说道的吧。里面没有人们想象的各色电灯、电风扇、冷气管与绒椅一类的东西……只是一块一块的白木板，一行一行地钉着，就是座位了。人是那么的挤，连窗子边上也坐满了人。我的券号是左一百十四。可是陈、吴两位把我领到最前的一排板上，这是无号的，

他们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券就坐在这里吧！"

一只小小的戏台，台前挂着一盏汽油灯，左边拦起了一只角，里面坐着打锣鼓的。写着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红布幕半开着，不久，戏就开始了。

那晚的京戏与秦腔，都能感动人，观众热烈地拍着手，有时还听到诅咒日本鬼子的骂声："妈的……"戏的内容是抗战的实事，而用的是旧形式。听说丁玲女士正热衷于戏剧的旧瓶新酒问题。实在说，我不大爱京戏，或者是因为我不懂得它。我不爱京戏，因为它表情太做作，京戏里的音乐我又不懂。可是秦腔，我却很欢喜，在西安旅馆中，我已听到有人唱秦腔。秦腔的声调高亢、凄怆，这是我国的地方音乐，也可以代表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那晚在戏中间加进的两个小同志的"活报"——不知是不是叫活报——也很可爱。

戏完了，幕已拉拢，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站在台的左角，好似带着一点惆怅与疲倦，大约该是丁玲女士，我想。今天那个机关曾给我介绍午后二时去访她，她在介绍信的信封背后批了三个字"明天来"。明天既然要去见她，今晚介绍一下也好，吴亮平先生为我介绍了。在暗淡的汽油灯光下，她似乎带着惊奇的眼光凝视我。"很好！"我说。她笑了笑，没说什么话，搀着我的手，送到门口，彼此又握了一下，分别了。在我与丁玲女士招呼的时候，陈、吴二位因遇到了别的友人，走得不见了。

回来，踏着淡淡的月光，我还在想刚才戏中的情节，与丁女士的好似惆怅的影子。

十四日的上午，我请那个机关的负责人介绍去参观妇联会。我的目的是想去看看那边有没有琴秋的女友。妇联会的负责人是蔡畅女士，可是找到那里，说蔡女士因生病，休养去了。一位女同志把我领到一个窑洞，有一位女同志在那里看文件，　　还不知是稿件　　，胖胖的，面孔上有一点雀斑，说了些客气话后，彼此都坐下来。

“琴秋同志来信问起你，我们也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她不久就要回来了……”

“是的，”我说，“我因为不熟悉这边的情形，来的时候我没有往交际科或西北旅社去住。”

这位徐明清女士，她是浙江上虞人，来延安一年多了，现在的妇联会，大约是她负责的。

在送我出窑洞时，徐女士说明天下午妇联要开一个座谈会，邀我去参加，如果我还不能记得这条路，当由一位女同志来通知我并领我去。我从没有参加过什么座谈会，可是我想：我不会说话，却可以听听她们的话，而且这边的妇女工作情形，也是我所要知道的。

“明天下午你有空吧！”徐女士问。

“有，我一定来！”

回到住处，正好吃午饭。那个机关里的用膳时间是这样的：早晨八时左右吃早饭，午前十一时左右吃午饭，午

后三时吃夜饭，早晨是干饭，中午是稀饭，晚间又是干饭。三顿饭在六七小时内吃完，只觉得一天工夫吃饭的时间占去大部分，因为餐与餐之间的距离太近，常常把工作打断。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南瓜在这时是“时季菜”，听说也比较便宜，但也要一角大洋一小个，那是不能同四川相比的。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第一两天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有一次，他们开饭时，我偶然立在门口，看见他们的饭桶——洋油箱——里面尽是小米饭。心里很不安，但他们又不能如我所请，每顿还是另做大米饭与葱炒蛋。有时，我就吃一碗大米饭，半碗小米饭。小米饭其实并不如何难吃，只是糙一点，粒子太小，如果不细加咀嚼，恐怕是不易消化的。我所觉得不惯的，是早晨吃干饭，中午吃稀饭，我想所以这样也一定有理由，偶然问到机关里的人，他们说：“战斗员都欢喜早上吃干饭，才够饱！”我想了一想，从下午三时直到次晨八时，中间有十五六小时没有东西吃，当然会饿急了，如果晚饭在晚间六七时吃，那情形或者会不同些。

吃过午粥，带着李富春先生的介绍信，往文化界救亡协会去，它就在大礼堂的隔壁，原来是一座牧师的住宅，牧师及其家庭仍旧住在里面，文协会只向他们租借了一部分。里面住着文化人：诗人、小说家……糟糕，我呢，什

么也不是，倒并不是特地要在这里声明，真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曾经卖文为生的女子，不是女作家，更不是别的。但是我也不管有资格没资格住到这个会里去，为了那个机关里的茅厕，我只想离开那个机关。

走进大门，穿过一个小院子，不见一个人，我就往第二个较大的院子里走，遇见一个男同志，我问他，他把我的信接去看了后，指给我叫往斜对面的阶上那边的屋子里去。一位长着半脸胡子的老先生应着敲门声开出门来，把信接过。

"呵！呵！很好，很好。我——我们十分欢迎你来住！"他说，把信看过，放在桌上。

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着书，纸头、文稿……连地板上也是，只有一只小方凳，他一定要让给我坐，可是我就在近门口的铺上坐下。

"我见过你的！"柯仲平先生又说。

"呀！"我惊异起来。

"我还听见你同人谈话，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

我愈加奇怪了，看见过我，还听见我同别人谈话？但是柯先生说来，却是真的。但我，不是他提起，已经忘了。

我说起要参观鲁迅艺术学院，柯先生就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周扬先生。

关于住进文协会的事，他说："一定成功，至迟明天给你回音。"

送我到院子里，柯先生伸起手来，似乎要拍一拍我的肩头，但又并不，放了下去，说："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他的年龄——其实，后来知道他并不是老头子，还不过三十八九岁，因了他的秃顶，同了他的胡子，看老了，使我发生一种类似怕的感觉，但他的随便的态度，自然的话句，把这个怕的感觉减掉了。他又仔细告诉我去周扬先生那边的路："出城门，一直沿靠右手的一条山路上去，尽上去……早上七时左右，大概他总在家。"

从文协会出来，往西北旅社访丁玲女士。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第二个院子里。"门口的人回答我。

往第二院走，我向左手第一间敲了一下门，走出一个男同志来："丁玲主任么？在那一间，我去……"他走了，丁女士也就从斜对面一间里走了出来，邀我同进这边的一间屋子里去。

屋子里十分简单，一只大土炕上，铺着一条军用毯，一头放着一条折成四方的被头；靠窗一只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副文具……两只小方凳，她邀我在对窗的小方凳上坐下，自己坐在横头。一个男同志进来倒了两杯开水。

"请喝点水吧！"她拿一杯来放在我面前。

我想，要不要说一些敬佩、久仰的话？可是，从哪里说起呢？我又是这样的拙于言辞。并且，真惭愧，我从来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十年来，我绝少读中国的作品。

彼此望着，好似等待谁先开口，“你辛苦了吧?”我终于开始说，但又觉得这句话太客套太形式，恨不得把它收回来。

“为什么住在旅馆里?”

“没有房子，延安是挤满了人。”她说。

“对了，挤得连一个空隙也没有了!”我笑着，耸了耸肩，她也笑了。

“这里的厕所好不好?”

“不好，也说不出，人太多……西北的厕所都是一样的。”知道我就要搬进文协会，她又说：“文协会的厕所比这里的好。”

“这里有一种白色小蚊子，这么厉害!”我说。她看见我手上许多粒子，卷起军装袖管的手臂举了起来，“你看，都是那种小东西咬的!”她胖胖的手臂上尽是疤痕，“这些疤痕不会褪的。”听说她曾在上海住过，但是没有一点上海口语，她的整个湖南音，我要很留心听，才能一个字一个字懂得它们的意思。

我凝视她的手臂及整个轮廓，觉得她真的稍胖了些，这样坐着，她的两手已不很容易平垂到膝头，她是到了“发福”的年龄了，简直怕连医生也没有法子阻止胖。

“你身体健康!”我不禁歆羡地说。

“是呀，还好，可是我饭吃得并不多呢。”

谈到昨晚的戏，她说演戏不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在前

方，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宣传与动员方面，动员壮丁上前线，民众帮助军队……问到他们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她说："以后还是要上前方去；第一次在前方的工作，正在预备作一个结束报告，将来印了出来，送一份给你。"我谢谢她，就辞了出来。

走在延安街上，现在我的胆子大了，也不再感到不自然了，在汗气薰蒸的人群里，我也挤来挤去地挤往我所要去的地方。天气非常热，我的衬衫一天湿几次，也只好随它去，那间房间里是不能措身的，不过还好，晚上，天凉下来，我的衬衫也就自然而然干了。我开始睁大眼睛，望着街上，贪心地看，好像要把一切吞下去。哦！真快乐，延安的街；真激动，延安的街！人们三三两两挽着手走，虽然有点妨碍交通，但延安是一个青年的城市，她在微笑着，好似说："一切请原谅吧！"人们的嘴巴几乎只只都在动，不是吃，就是说，通常是边吃边说：花生摊，香烟摊，与小吃摊，小馆子……接连不断。红头大苍蝇从这个摊头飞到那个摊头，像行人一样，总是不断不停。几块红烧猪头肉，发出诱人的香味。

"喂！你呆在这里做什么？又不买，你馋么？"一个熟人走过，对我开玩笑。实在，猪头肉对我是有历史意义的，小时候，为了暗地里吃了一块家里买来下酒的猪头肉，我受到重重的责罚；可是这个东西对我总很有兴趣似的，但我却没习惯买它，几只大苍蝇又把我吓住，只好无聊地

走了。

苍蝇从猪头肉摊飞到满街堆积的牛粪、马粪、驴子粪上，有时候，停歇在行人的肩背，你只觉得肩背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发出什么小声音，但只要你头一侧，还没伸起手来，它们已经飞了，可是你头不动而向前望时，它们又来了。

延安的街，我实在欢喜它，可是我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它是这样的脏，这样的挤，你没有地方可以落脚的；不要说没有柏油路，水门汀，就是石子也没有，尽是黄泥沙，——最近才铺起了大块的石子，那是最近的事情——，可是我还是爱它。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到法国，——我的脚踏上马赛的街，也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欢喜的心情。我想我所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吧。在延安的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的感情事情，你尽讲，大声地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钉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延安的街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一个乞丐。

十五日的早上，七时，我去访周扬先生，依照柯先生所说的走去，居然给我问到。不过在走出城门时，站岗的卫兵问："往哪里去?"我没有路条，把介绍信给他看过，就放走了。真不巧，找着教育厅秘书处的窑洞，一位老先生——旁边有人正在喊他秘书长——回答我："周厅长今早

恰恰有事，已出去了。平常这个时候倒总在家的。”我把介绍信留下，走了，说：“明天早上我再来。”

午后二时，妇联会的一位女同志来领我到她们那里去。在小山坡下的一个半窑洞里，放着一张长方桌子。好几位女同志，要我到里面去，我就在旁边的一只小方凳上坐下，她们围住我问外边各地妇女在抗战中的工作，我随便说了些我所知道的与我所见到的——自己没有工作经验——说的既没有头绪，也没有次序，为的我没有预备发议论，而且也只会这么说。

长方桌上铺了一块白布，放着一盆饼干，两盆花红，好几只茶杯。一歇，茶上来了，请喝茶，请吃果子，她们太客气了。各人团坐之后，就开会了。我不懂得这些开会的仪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仪式，不过总有一点惯例。想起那天的座谈会，我觉得有点难为情，自回国以来，我关起大门，在家里过着依然像欧洲一样的生活，中国当代妇女的习惯，她们的一切，我太少接触了。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姓应，是从江西来的，她讲了些江西妇女新生活改进社的工作情况，她曾经被派往江西农村去。我是住过江西的，却在延安听到谈着江西妇女生活改进社的工作，并大加赞扬。江西妇女新生活改进社的干事熊芷女士，我曾见过几次，这是一位和气而善于交际的夫人，在今日，她还留在江西做妇女工作，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末了，一位妇联会的女同志立起来讲话，她很能说话，讲得也很详细，大约有个把钟头。旁边的人一边吃着花红，一边听着。散会后，一位女同志名吴瑛的问我在无锡留过多少时候，可认识王枫女士？她说她们现在在筹备一个保育院，是应蒋夫人之电而发动的。将来成立时，邀我去参观，只是一切都受了物质条件的限制，她们希望能与其他各地的保育院取得联络，并希望得着外界的援助与指教。我想王枫女士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她的嫂嫂曹孟君女士是热心于保育事业的，我把王枫女士的最近地址交了吴瑛女士，又答允写信去转达这边要成立保育院的情形。

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是由以前女工农妇代表会扩大而成的，所有全边区的妇女，该参加的，都在里面了。会员有十七万三千八百余人，像别的边区的各种会一样，妇联也是民主制，由下而上，推选出委员二十一人，由这二十一人再组织成一个执行委员会。她们所着重的工作是：武装组织（包括女自卫军、女少先队、女儿童团），战时服务工作组织（看护队、缝衣队……），而特别使我发生兴趣的是保育儿童工作与优待抗属（抗敌军人及工作人员家属）及推动边区落后的文化、教育工作，冬学，乡村妇女识字小组等。

从妇联辞别出来，她们一直送到门外。在院子里，一位有了年纪的小脚女同志，搀住我的手，说："请多多来我们这里玩，多多指教我们。"真使我又感动又惭愧，我能回

答些什么话呢?！我非常敬佩她们为自身、为帮助国家抗战所做的事情，我要用十分诚挚来说这一句延安流行着的话："我还要跟你们学习。"

回到住处不久，柯仲平先生差人送了一封信来，说有一间小小房间，今天就可搬进去住。因为天已近晚，我回了个信，说明早一定搬进去，并谢谢他。

太阳已下山，乘晚凉，我在房间里写信，门外有人声，好似听到说着我的名字，立起来，撩起门帷一望，一位先生在院子里，望见了我，他对那机关的一个同志说："那不是一个女同志么?"一边朝着我走来，带着一些犹疑问："可是陈学昭同志?"周扬先生实在太诚恳了，在忙碌了一天，该是休息的时候，跑得来；幸而我出来望了一望，否则他要被这个机关里的人回出去了："这里没有一个女同志！"我的房间小，也没有凳子，我就移了蜡烛，领周先生到那机关的会客室里去，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去年十一月C先生[①]过南昌，曾对我谈及周扬先生的大名。中等身材，年纪大约三十外，湖南口音，可是没有湖南的典型面孔。一边谈着话，一边周先生为我写参观鲁艺的介绍信。天快暗足了，周先生辞去，我送到大门外，道再见，并深深地向他致谢。

十六日的早上八时许，我搬到文协会去，找不到一个

---

① 即沈雁冰先生。

人搬行李。在延安，劳力是这样的神圣，宝贵，没有一样东西更能比得上劳力的神圣与宝贵的。老百姓，因为生活优裕，他们宁愿他们的驴子空着，何况他们自己。我想到汽车站去叫一个老百姓帮忙搬行李，那机关里的人对我说，汽车站上也没有搬夫的，那天是我运气，偶然碰到一个。至于别的，因为人人有工作，虽然或多或少，重或轻是有分别的，但饭是吃得一样的，何必多花费自己的气力呢？我想也有这样想的。生活如果太有保障，人们是容易变成懒惰的。在延安，没有力气的人是比较要吃苦一点，其苦还胜于吃小米饭；那些病人，也要自己背起行李，走进病院。没法，我只好自己掮起包裹，搬到那边去。路上歇息了好几次，一只较重的箱子，我想向文协会"拉夫"去取，后来一个朋友把它送了来，真该谢谢他，我还同他说笑："在延安，男女是平等的，您居然还有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可是话得说正经一点，我真的谢谢他，因为这是一种友谊，是没有代价的。

我在那个机关住了几天，吃了二十七个葱炒蛋。搬进文协会去，那里面住着四对夫妇。延安的惯例，是夫妇分居的，他们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所以这样，听说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妇的情感而浪费时间，或妨碍工作；除非夫妇两人的工作是同样性质，而同在一个机关的，他们才得经常地过着夫妇生活。这是很好的，可是，后来照我的观

察，这个“星期六制”也并不是没有弊端的，法律是为聪明人立的，正是这样。有些结了婚的夫妇，为了不愿分离，而又不好说不愿分离，大部是为妻的，宁愿牺牲了自己本来较为特长、较能独立的工作，而去做她丈夫的一个助手。这样，“星期六制”本来希望可以增进工作的效能，而其结果，反是减少了。虽然“星期六制”这样普遍，但延安，一切都是非常宽容的，民主的，在不妨碍工作的情形之下，夫妇经常住在一起的，也有这样的例外。好比文协会，就有四对夫妇，其中有一对的男同志往前方去了，尚没回来。他们中三对都捧住一只洋铅小盘烧东西吃，红豆粥啦，白菜肉丝汤啦……我看着真有点馋了。我是这样一个重“物质”的人，那些葱炒蛋正如汉中的酒酿蛋一样，这个时候，我只想变换味儿，肉也好，菜也好，就是一个酱油汤也是好的，这是我的坦白的供词，让哲学家与医生们去讽笑“女子的胃口”吧。

午饭时，柯仲平先生对我说：“这样的菜同小米饭你吃不惯吧?”我笑着回答：“还好。”“我们决定给你另外去包一个饭!”他说。“为什么?”我惊异地问，又说：“我不愿开例外。”他说：“那你如吃不惯，可以想法烧一点菜，这一只小火炉上是可以烧的。”他向院子那边的小炉指了一指，又指着旁边一位女同志说：“她一只一只鸡买进来烧呢!”又接下：“一星期或者两星期可以上馆子去吃一顿……”

我笑了，可是我没有对他说，我是一个怪物，不能上

馆子的，为了肠病，我从不去吃馆子，所有“馆子味”的菜，太油的菜，我都不吃的，一次赴宴要两天肚泻，除非免不了的应酬，必得去领情。延安的生活，确实要算很苦，因为不是一天，而是天天如此，经常如此，胃肠是需要结实一点。有些人，不能自己另外作菜的，就一星期，两星期上馆子吃一顿，特别是一般学校里的学生，他们不比工作人员，他们是绝对无法可以自己另烧菜的，他们平常吃油极少的素菜，小米饭，一下子到馆子里去吃那么多的油，不闹肚子，真使我佩服。

文协会里我的房间是在第二个院子的进口，房间极小，倒有一只大炕，北方的平屋都是这样的，檐子露在外面，总使你感觉到好像住在屋顶的最高层，其实你的脚却又分明踏着地上的泥土。往往要在檐子底下搁了几根高粱秆子或别的，糊起纸，才成为一间像样的房间。“这个地方要糊一点纸的。”文协会的总务科长对我说。因我太急于搬进去，来不及糊上纸。

院子里有一点花木，我们吃饭就在院子里，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立在树旁。“这是延安城里最好的房子呢！”一位同志对我说，他见我望着院子出神。“你看，这样大的花园，你爱逛花园么?”另一位开玩笑。是的，我正在想，这个院子还可以称它做“花园”，但是，小火炉这么多——有文协私人的，也有牧师家庭的——倒也可叫它做露天厨房。我房间对面，是一间很正式的房间，大大的，窗上糊着满

是灰沙的绿纱，里面住着两位先生，一位是久住苏州不会说宁波家乡话的留法同学，一位是徐雉先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小说月报》上常常有他的“情诗”，那时新诗正在萌芽，我记得我曾经很欢喜他的诗。听别人说，他早已不写诗了，现在是延安世界语学会的负责人。徐先生戴着一副极近视的眼镜，穿着一件深咖啡色的呢大衣，挺起方方的肩头，手里常常拿着一只小烟斗装烟，但又并不见他吸，年纪怕过了四十。不言不笑，好似他有说不出的疾痛，或者是饱受了忧患。这是我年轻时代所读的诗中的英雄，不禁感到惆怅，好似看见了一个病得面孔变了相的海涅(Heinrich Heine)。实际上，徐先生对于世界语工作是很努力的。

那天午后，我上街去找鲜肉摊买肉，就在文协会小弄一直向左走过去不远的街上，找到鲜肉摊。猪肉五角一斤，猪油九角到八角一斤，山羊肉三角五分一斤，绵羊肉四角一斤，这是真实的市价。我决定买一斤猪肉。可是我身边只有一张五元的钞票，商人找不出，“同志，你拿去吧，明天走过这里，你来给我好了。”他把肉同钞票都交给我。

我呆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商人。我说：“我把肉寄放在这里，去把票兑开后来拿。”

“不用了，不用了！”他执意把肉放到我手里：“你们的时间宝贵，都是有工作的，下次你走过，你记起，来给我

好了！我总在这里的！”

我实在为难了，他的好意可感，但我不愿为五角钱跑第二次来，又怕忘记了，失却了信用。正在不知怎么好，一个熟人L君走过，“劳您驾！”我说，把钞票交他。L君替我到一家合作社去兑成零钱，结果，他收了五角，我取了猪肉，很快乐的分别了。他们是这样的真诚可爱，这是一件实在的事，可是朋友们恐怕要不相信。

实在，陕北的老百姓，生性是非常强悍的，又加上山地居民的特性：褊狭、固执；积年内战，盗匪的侵扰，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也是使他们更强悍更不信任的缘故。那是求生的经验要他们这样的。自从经过八路军的高度政治教育与动员抗战的工作后，这些善良的老百姓，得以坦白地显露他们善良的本性。他们是这样可爱，竟使我为了有这样可爱的同胞而足以骄傲。但是照一般讲，延安街上能像我所遇见的猪肉商人，终究很少。我猜想，延安在八路军未到以前，一定没有什么市面的，也无所谓生意买卖，现在有百余家店铺，这一定是八路军到后兴起来的。这些商人，他们是从农民转变过来的居多　　也有好些由山西逃难来的，做点小买卖，都发了小财　　或者是些小工，听说替边区医院挖窑洞的一个工头，发了财，现在开设一家店铺，资本也有数千元，就此改工为商，也不愿再做挖窑洞这个生意了。在延安，老百姓要生活，是这样的容易，一天赶赶驴子也可赚好几毛钱，因之这些本来要用气力，

立在这里看什么?”有一次，使我真有点生气，走过一个花红摊，我问：“一角钱几只?”“八只!”“十只卖不卖?”“九只卖!”等我回身去买，他说：“八只也不卖!”也有些时候，使你觉得他们有点讨厌，他们的嘴巴又那么会说，你无论如何也说不过他们。有一次，大早——那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我已经住在窑洞里了，——我为不会买菜，去找文协会的汪仑同志，跟了他去买，这位出名的模范丈夫，是很会买东西的，文协会的每天伙食是由他陪同了管理员同志去买的。我们已买好萝卜，还要买一点葱。“这个太不好了，给我们那边的几把!”“不能，绝对不能!”“好了，老乡，卖给我们吧!”汪同志说，一边伸手去拿，旁边的管理员开了一句玩笑：“你总不是想留给日本鬼子吃的吧!”好，这一下，老乡的话就多了：“对了，日本鬼子来了，你们不开心，我们也不开心，大家不得活，你也不得来买东西……”确实，我只好对他笑了。汪同志转过头，对我伸了伸舌头。终于，我们只好换了一个菜摊。汪同志会买菜，是由于他使用极大的耐心，同时也兼用一点外交手腕，他总是先看好要买这件东西，面孔上又表示不怎样要买这件东西；虽然如此，对于刚才这个“绝对不能”的老乡，他也还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延安的商人，这么抬价，H先生对我说，因为边区的各机关学校的事务长，事务员，管理员，买东西都不还价的，“反正是公家的钱，省也省不到我自己。”这种

辛辛苦苦才得谋一饱的，现在他们发现了新的路，两个钱买进，六个钱卖出，只要经过这一番手续，钱就很容易地进来了。“越吃越要吃”（L'appétit vieut en mangeant），这句法国成语是很对的，越赚越要赚，他们的索价不划一的，往往听你的话音，看你的服装，而他们不知是从何处学得来的本领会分辨这个买客的有钱没钱——往往是有错误的——把价格抬到如何程度；这方面，大约他们是有了经验的，价格无论如何高，东西总有人来买去，那是因为延安挤满了人，一切东西，吃的，用的，总是供不应求。但我推究为什么物价只见增高，就连本地出产的农产品也如此，人家对我说，在八路军未到之前，猪肉比菜还不值钱，一元可以买到十二三斤，而且陕北的人脾气很特别，猪肚里的东西是不吃的，猪肝呀，猪肠呀……都抛了的。但现在，猪肝卖五角一个。八路军当时来的时候，我想，一下子，人太多，无论日用品与粮食都发生不够的事实，同时，他们里面，一定还有一部分人身边有一点钱，于是大家为争得这些必需的东西，而愿出最高的价格，据说当他们经过甘肃某地的时候，一块钱才买到一个馍。他们，这些延安的商人，有农民性的固执，而没有普通一般商人的圆滑，与应有的一些和气、客套。有一次，我走过菜场，看见两只鸡，我问价。“一元，”鸡主人说。“九角两只卖不卖？”“不卖，差一分也不卖！”我正在想“一元买了也好”，可是正沉思着还没有决定的这顷刻，他说：“你不买，走开吧，

意识或者也是有的。他说有一次，到军人合作社去买纸，他自言自语的："这几张怕够了吧！"合作社的人问他："公家的？你自己的？""公家的。"H先生回答。"公家的，那你多买些吧，有什么关系？"其实，在抗战期间，每一个人应当把公家的看做是自己的，与自己的东西一样的爱护，事实上，公家，正是人人自己的。H先生又对我说，他在西安街上，一天曾经看见一个八路军人与几个别的队伍的军人在一家店铺前："这条绒毯几元？"其中一个军人问。"二元五角！"他们还价"二元！"这位八路军人却摸出了二元五角把绒毯买去了。别的军人有点不解的表情，惊奇的表情。这种事情或者是容易引起摩擦的。这样事情，并不足为八路军看重，为什么他们同民众的关系这么好，在这类事情上也有关系的吧！

在文协会，我住了两夜，十八日的午前，搬到城外的窑洞里，这是一个小小的土窑洞，里面用石灰粉了的，也还洁净，面南。那些住惯了西式房子的人，他们一定不能想象住窑洞的乐趣。那天我住进窑洞，实在太快乐了，这近乎一间半大的西式房间的土窑，你也可以照你的意思，用了随便什么东西，破纸头，旧钉子……你也可以把它装饰布置，安排得很好。午后，我正在布置，一个熟人跑来，他看见我这般兴奋，便说："你这么爱窑洞，将来回南方老家怎么样？要去平地挖窑洞了吧？"窑洞，的确冬暖夏凉，至少夏凉已是我所尝到了的；光线也还充足，在窗口，只

觉得光线太强烈，有时我只好戴黑眼镜，并不如我有一次在一个外国医生所写的一篇东西上读到的："光线不充足"。后来，在荷兰驻香港总领事来延安参观的时候，遇到他，我曾同他谈到这个。"窑洞一点也不暗黑，像我住过这一类窑洞。当我们从热阳下走进窑洞，眼睛前会感到一阵黑暗，因为外面的阳光太强了，当我们从热阳里走进屋子，也有这种感觉。"我说。"对了，那是一个错觉!"可是我得承认，如那个外国医生所说的，窑洞的空气不够流通——打通的窑洞也有的——那么就没有这个缺陷了。陕北的窑洞，有好几种，如果严格地分起来，可以分成四种：石窑、土窑、半窑，还有一种只有一个门，没有窗的，一种极简单的窑洞。有些老百姓的石窑洞打得非常巧妙，从整块的山石里开出一个洞来，不知道曾经花去多少的人工与时日。老百姓所住的土窑，同石窑一样，有的是几百年下来的，这样的结实，我想可以抵得住飞机的轰炸。陕北气候干燥，但是有些窑洞里，非常潮湿，东西都霉了。老资格住窑洞的天天一起来就把被褥晒在外边，说是必需的。自从我住在山上，我就老爱参观窑洞，我觉得第一，方向是有关系的，第二，要小，不要太深，那也可以减少潮湿。搬进窑洞的第一晚，我没有睡好，一方面是窑洞门外，人声嘈杂，住在里面，好像住在街楼，每个窑洞门外，就是行人路，我的窑洞正好在一条山路的转角处，高坡的地方，恰恰是在路口，又贴近一个机关的收发室，在起初的第一个月里，

我几乎每天替那个机关做收发。上山来的人，因为顺路，又因为我一天到晚总在家里，人们就找到我窑洞里来。人声，驴、马蹄声……时刻好似有人会来敲我的门；同时，窑洞毕竟对我太生疏了，好像一个刚刚要认人的小孩，端详他的母亲的面目样，我的两眼尽睁大了望住这个洞内的一切，它的圆形的洞顶……

傍晚，当炎热退去的时候，我欢喜上坡下坡，瞭望延安的城市，延水在山脚下潺潺地流着，延安的市容，比起在南岸望重庆，美丽得多，它没有茅屋，也没有假洋房，虽然很少树木，枯燥严厉一点。晚霞贴着远山，几匹棕色马在晚霭与黄沙里驰过，“四周山色中，一鞭斜照里”，正是这个情景。我不会骑马，可是却很爱马。傍晚，延水边有许多的马匹在喝水，它们的姿势没有一只相同的。“饮马傍交河……”这句诗引起我许多想象，也有许多回忆；小时候，家里每值炎夏，必要把画拿出来晒，我也曾见过几幅画得很好的饮马。

天下过雨，延水一下子涨了，在寂静的深夜，它的声音像一只大船拍浪，海波滔天，我同一个友人说：“你听，这不像船行在平静的印度洋上么?”这句话受到了惩罚：我梦了，梦中坐着海轮又往异国去，海涛的声音，把我送去，远离亲爱的祖国！可是现实，却是烽火连天，国土正在受强邻的侵略，我们正在受无比的磨难，为了要自由生活！

月白风清的黄昏，马也好像为一天工作后的疲乏，与

炎热的消去而快乐地长嘶起来，“风和闻马嘶”，虽然这时不是春天。驴子叫的声音实在太难听了，它好似转不过气来，而这样急叫的，好几次，我听错了，以为是警报。在窑洞前踱着步，我真想弹一曲 Schumann[①] 的《春天》！高粱长得比人高，风过去，摇曳着，叶子发出窸窸索索的声音，好像有人在私语，偶然送来一声、两声的笑声，清脆得像竖琴弦的拨动，于是语声、喊声、步伐声、号子声……把四围的山都震得撼动了！青年人，正为着国家、民族、自身，尽量地叫，尽量地流血……这是一曲“未完的交响曲”！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不能不激动起你的热血与热情！

住在窑洞里，每天大早起来，开出门，就见山。“开门见山”，家乡的乡下人过新年，欢喜请人把这几个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的当中。山，在没有山的地方变成一种祝福的东西，甚至于这字，也变成了口彩。现在，我却真的“开门见山”。这些每天看见的山，却是每天不同的，水流的声音因着水的涨落而时刻变化，同样的山的容貌，因着天空云彩霞光的闪动而时刻变化。我常常呆对着山，许久不厌，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捧了一只饭碗，站在窑洞门口，一边吃、一边呆望着山，有几次，瞥见熟人来，我连忙跑进窑洞。可是有一次，却给一个熟人看见了：“你这样

① 舒曼，德国音乐家。

子吃饭？”旁边一个朋友说：“我说过她几次，她说这样容易消化！”我笑着喊：“天知道，这些小事情！”虽然这样，但我不去管他们的话，反正现在没有一人会因了这些小事情而责罚我，把我关在一间房间里，脱掉鞋子，责罚我坐上半天。

住在山上，消息可不大灵通，特别延安，这个城市，它是天天在变，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改良，几天不进城，你就会起一种跟不上了或隔膜了的感觉。它虽然依然满挤着行人，堆积着牛粪，马粪……还有那些诱人的小食摊，可是墙头上有了新的壁报，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俘获多少……标语、街头诗，还有边中附小的宣传队的唱歌。偶然有人聚在街头，有的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有人会回答你：“哦！一年前还糟，你没有见过一年前的延安，现在好多了！”又有人回答你：“三个月前的延安也不是这样，现在比三个月前好多了！”总之，它是天天在改进的，还有希望。如果你要批评，旅客、参观者，那么请你留心一点，慢一点，请你别性急，慢慢的，你看，什么地方是可以批评的。也有许多事情他们已经努力在做，或者正在开始努力做，还没有发生期待的效果，可是，他们并没有把需要做的事情漏过。

在边区，生活是苦，可是我想，那些吃腻河鲜海鲜各种肉类的人们，到延安来过一过这种苦生活，也是好的，好似肚胀之后，吃一服清淡的泻药。

在边区，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比中国任何地方好多了，这些人类丑恶的感情，嫉妒，彼此挤压，是比较淡薄多了，这些人类接近于兽的本性也比较地减少了，他们能够把一个极大的目标，也是人人所仰望着的，清楚地摆在各人的面前，使人们能明白，至少时时会反省到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这种工作，不但对于我们抗战是好的，是需要的，实在对于全人类也是有益处的，人类存在一天，这种工作是有极大价值的。在这里，女子是一个人，你行走在冷落的远郊，不会有男人跟在背后对你说侮辱话，也不会有人跟在你背后发怪声，当你一件怪物看待。在热闹的街上，从不看见有人扭住头发或领口相打，也没有彼此辱骂到祖宗三代的吵架；倒是有一句话是他们的口头语：“妈里个……”可是并不严重，底下是“我鞋子上的洞这么大……”等等，往往笑着，自嘲自讽的，骂他自己身上的失意事情，倒霉的小事故。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改善了，但还没有到理想的程度，中国一向的人与人之间敌对与怀疑的根性与习惯是没有了，但还没有做到人与人间应更好的亲密，关切，我想，这个，正是他们所要努力的。他们来到陕北，不过三四年，我们期待着吧。

五　几处参观，几次访问，几个谈话

那天午前，邻近的一个机关里差人来通知我，午后二时，可以去见毛主席。毛泽东先生——延安人人叫他毛主席——是非常的忙，听说每夜只睡三四小时，成年担负着重要而过度的工作。可是毛先生，什么小事都不忽略，谁如果有什么要申说，可以直接写信或请求见他，都可能的。总之，人人都可以去见他，听说毛先生也欢喜同外来的人谈话。

午后一时半——延安是没有标准钟的。这时已二时，也许还不过一时，那个机关派一个通信员，对我说可以领我去。下得山，又走了好些弯弯曲曲的路，到了毛先生的寓所。门口的卫兵经通信员说了几句话后，就很客气地让

我进去，通信员也就走了。

进大门，是一个很清洁的院子，院子的一边有两三间屋子，有一间门开着，屋子里有人在打乒乓。我走近门口，一个瘦个子的青年问我做什么，我回答了他，他好像早已知道了这个访问：“哦!”他说：“请进里面去!”一个卫兵把我领上石阶，让我进正中的屋子，那瘦个子青年也随我走进屋子。我把名片拿出来交他，他拿着名片向右边的一间进去了。不一歇他出来，示意我可以进去。我走进门，瞥见毛先生正立起来，握了一下手，他向他的写字台边座位坐下，同时，伸起手来做了一个请我坐的姿势，我在写字台对面宾位的椅上坐下了。

很礼貌，很客气，也很温和文雅，而很质朴，只有阔大的额角与锐利的眼光，透露出智慧。偶然看见，觉得毛先生的个性是很沉静寡言的，但听人家讲，毛先生欢喜说笑话，做譬喻，每次对抗大或别的学校学生做报告时，总有些笑话与譬喻夹在中间，恰恰与那些新闻记者所写的相反。我觉得毛先生并不瘦，面孔胖胖的，头发是整饰了的，一套青布单军装，上衣的钮扣没有扣上，很随便的样子。我为他锐利而仁慈的眼光所感动，懂得为什么延安街上，延安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着这么多怀着热烈情绪的青年。在我，毫无成见，也从没有党派观念，只是一个中国人，简单的一个中国人，对于毛先生，我的心不能不肃然起敬，为了他的贤明而正确的领导，使我国得保存这一部分的实

力，而在如今全面抗战中，像祖国别的忠勇队伍一般，给敌人以不断的打击。

屋子里很简洁，大约这屋子就是毛先生的办公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全国明细地图，靠窗是一只白木写字台，还算新式，大约木料不好，台子的面已经凹了下去。台面上铺着一张暗色花纹的漆布，已经开始破了。台上堆着些书籍、文件与文具。靠壁有一只行军床，还有几只有靠背没有靠手的椅子，该是总工会的木材合作社送的吧，毛先生与我所坐的就是这样的椅子。这屋子，在外面看，是一座瓦屋，走进里面，实在是一连几个的半窑洞，非常阴凉。

因为几个问题已向李富春先生用书面提出了，我就没有预备什么要问的，又知道毛先生时间的宝贵，更不愿耽搁他，把谈话拖长。那天我只是问："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与西南的交通阻隔了，受到封锁，粮食发生问题，怎么办呢？"

毛先生微笑着回答我："有办法，靠老百姓……我们还可以打游击。"他的话声是沉重而迟缓有力的，那样地有把握。

我问起八路军一年来在前方作战的成绩等，毛先生说可以介绍我去见李秘书长，那边能设法找给我所要知道的种种。他就提起笔来写在我的名片上，介绍我去见李六如先生。"就是在离这里不远，有个卫兵站着的那个屋子里。"

他补充说。

立起来告辞时，又握了一下手，毛先生拖着迟缓的脚步，送到正中一间的门外石阶上。高高的个子，与其说是迟缓的，毋宁说是持重的脚步，使我联想起当年北平的李大钊先生，有一次，是在西单附近的街上偶然碰见的。那些大仁大智的人，他们的外表举动总是好像很持重的。

从毛先生寓所出来，在几步路之外，找着了李六如先生的住处，把片子交给门口的卫兵，就让我走进院子。它是半窑洞，刚上石阶，走进正中一间，李先生已从右边一间出来了："呵！呵！陈学昭女士……"一边说，一边欢跃着。李先生年纪该有六十外了，瘦瘦的个子，那么样的年纪，也渡过千山万水，吃尽人间的苦头。因了他的欢跃与活泼，使怕生人的我也感觉到自然起来，于是，兴奋地谈着话：什么地方人，来了多少时候……

这位可爱的老年人，有一点欧洲老年人的风味。在延安，没有人压迫人，也没有人欺侮人，所以，一个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有时候，在街上遇到一些刚认识的人，他们会快乐得对我跳起来，好像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也有些人，整天哭丧着脸，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忧愁的事，不过性格如此。这些人，都使我欢喜。对于我，引用法朗士（Anatole France）这句话是最好的："不虚伪矫作的男子，很少使我讨厌的。"（Les hommes qui se montrent tels guilleret sont m'ennuient rarement.）——Lys reunir.（百合集）

谈了些话，说到正题，李先生说他这里没有什么及时的东西可给我。这间客室里有一个白木的书柜，我立起来看了一下，的确只有些《塞上行》、《西北散记》……等书，另一端，挂着几份《大公报》、《新华日报》、《扫荡报》……

"谭主任那里或者会有你所要知道的东西，我来打个电话，"李先生走近窗前的电话机，打电话给谭主任，谭主任出去了。他想了一想，走进里面去，一歇，拿了写好的一封信给我。谢了李先生，我就告辞出来。

在山上过日子，好似特别来得快。其实在清凉的夏早，通常我在五时半光景就起身了，但是总做不出什么事情，我已经养成了一个极坏的习惯，必得把房间整理好，我才有心绪拿起书来看，或做别的事情。还记得初在巴黎学钢琴的一年：一个朋友，一早起来，蓬头散发，也不洗脸，就练钢琴；但是我，决不能，一定得把那些使我不安心的灰尘拂去，才能练琴。那时有些朋友同我开玩笑，说我该同一个不知整洁的男子结婚。可是这样的男子，我决不会爱的。在这里，有些行军过来的熟人说我这种古怪的脾气经过行军或者就会减掉一些，或许是可能的。我承认这种生活古怪的小节目，却也是影响到一个人的幸福，我相信有些人的独身就为了这些小节目难以解决。在延安，过的不是欧洲大学生生活，早起你可以出去散一下步，让侍者把你的房间收拾好。而却是北平的大学生生活，如果你自

己不照管，你的房间可以弄得像一个猪窝。揩揩桌子，抹抹凳子，而且黄沙满天飞，桌上凳上时时刻刻揩，也总不干净；洗洗衣服，手巾，甚至于被单，也得自己洗。给老百姓洗，三角钱一条，还要给肥皂，但是洗了拿回来，依然等于不洗，肥皂也根本没有用，反而把虱也带来了。每个人都要消费一部分精神与时间在劳动里，这类劳动是最好而最实际的运动，原是很好的；可是我相信，对于有一些人，有专门工作的，终究还是一个损失。人终究是一种不平常的动物，求生的本能是那么大，很小时候，我没有洗过一块手巾，后来，环境的逼迫，我只好洗手巾同衬衣；在延安，我居然会洗被单。可是我的身体，比任何一年来得好——自从我回忆得起——肠病也还没有发，也没有因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而闹肚子痛。“人是贱的”，这句通俗的骂人话，我却认为有几分道理。

要参观的地方是那么的多，只恨两条腿跑不够劲。延安没有一辆车，大家都得安步代车。下山，上山，弯弯曲曲的山路。可是走走也好，不用另花时间来散步，虽然是不得不然的练习。

李富春先生已有信来通知我去各方谈话的日期，遵照李先生所写的日期，作了几个访问与谈话。

二十日，上午十时，去抗敌后援会访齐华先生，谈关于民众运动。齐先生出去了，一位女同志，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孩，很客气地请我坐：“齐同志刚出去了，马上就会

回来的。”她说，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我面前。我正走得口渴，不客气地拿起来一下喝完了。

等到十点半，十一点……外面中午的太阳正炎炎如火烧，可是在齐先生的石窑洞里，非常的清凉。静静地坐在凳子上，我竟觉得衣单了。这位女同志，可爱地同我谈着话，好像为要消磨这个厌倦的等待时刻。我看见靠窗的一只方桌上堆着好些报纸，向她借了一份《新华日报》看。

“你是浙江人？”她开头就说，我惊奇了。“我一听你说话口气，就知道了。”她又说，“呀，杭州，那一边，我知道，那一边的地方多好，那一边的人也是顶清秀的！”

我连声回答：“哪里？哪里？”

“同志是……？”

“我是这边人，”她说，看我有点不大懂得，她又添上去说：“我是陕北人。”

陕北人？陕北的妇女，已经解放到这样！人们怎样责备陕北的妇女，文化水准低，缠小脚，懒惰，笨拙……甚至于连一双鞋子也不会做。可是这位女同志，我觉得她是聪明的。

十一时半，齐先生回来了，跑得满头是汗，他是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事情是很多的。女同志把小孩放在一只有靠背的白木椅上，叮嘱齐先生稍为照顾一下，就出去了。

齐先生说着一口浙江官话，才知道他是杭州方面的人。看看刚才女同志对齐先生的态度，猜想她是齐先生的夫人。

我心里暗暗佩服他对他的夫人替浙江做了这么好的宣传工作，使她对于浙江与浙江人有这般好感。

小孩哭了，齐先生用手拍他，仍无效，他或许感觉到父亲的拍与母亲的不同。他把他抱了起来，哭刚停，小孩又小便了，一直流到父亲的裤脚管上。齐先生简直非常为难，轻轻地抱着小孩，不知如何才好，好像捧住一打鸡蛋，怕打破似的。

我们的谈话，穿过小孩的哭声，时断时续。

"这里做民众运动，也不是没有困难，第一是因为交通不便，加之地广人稀，往往隔多少里才有一个村，村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后，要使村与村间经常发生联系，也是不容易的。"齐先生说着，立起来在窗口的桌子上拿了一本小册子给我：《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概况》。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的缘起及成立经过是这样的："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并与各省市县抗敌后援会取得一致行动……"主任是齐先生，副主任是肤施县县长，参加在抗敌后援会里的民众团体有二十多个，像边区总工会、边区妇女联合会、市商会、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防教育研究会……等。虽然地广人稀，民众运动的工作不易开展，但照我后来住得较久的观察，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是边区做得最好的一部分工作。在边区，我没有看见过壮丁用绳索牵了走……

从街上的牛粪马粪，谈到土地的肥瘦，人民的生活，

与粮食，生产。

“今春我们曾动员开荒，就是春耕运动，老百姓他们是不知道粮食生产直接有关抗战，他们只顾自己够吃，或者求稍微宽裕一些就满足了，不愿再多耕了。至于这里的土地，其实并不瘦。”齐先生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对了，我也这么想。”齐先生的话确实使我同意。

“你看这些白菜，长得那么肥，上海那边我们从没有见过这样肥大的白菜，是不是？”齐先生又接下说：“这里的老百姓不知道用肥料。人口少，土地多，他们往往把这块地种了几年，嫌它不肥了，就把它荒起来，让牲口与人自然去下肥料，另外找一块来耕。”

我想这些肥料如果在我家乡，种田人一定会抢得打起架来，可是在陕北，老百姓不要。

“你下去时，请你注意山底下的白菜，那块地是老百姓不要种了的，我们去下了肥料，种了白菜。那些白菜不是长得顶大么？”

“为了老百姓不用肥料，肥料不被重视，牛粪马粪满街堆，我们曾经教他们使用肥料，并且组织拾粪队，动员小孩子去拾粪。但他们已经那样习惯了，一个时候不容易得到效果。”

“哦！”我心里想，可见我不能冒冒失失地批评延安的街道太脏，它是有原因的。

延安也出西瓜，这是我来延安之前万想不到的。在延

安有时居然吃得到与我家乡及无锡、江西一样的好西瓜，有时也很甜的。常常在进城回山的时候，带一个上去，大一点的三角钱一个，小一点的二角。齐先生说如果老百姓在地里下肥料，那么西瓜长得一定还要好。这话很对，我也这么相信。

是午饭的时候了，而且齐先生也需要休息，可是话谈得正很好，只得告辞出来。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去访边区财政厅厅长曹菊如先生。曹先生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窑洞里——该是会客室，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标语——接见我。

曹先生一边要我坐，一边叫勤务员倒开水。他一口广东音，说得较快时，我就有点听不懂了。

讲到边区的财政，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边区这个地方政府更穷的。这里没有杂捐杂税，就连正当的税，他们也不收，如像营业税，延安是没有的。去年，延安三百多家商铺，家家盈余的，政府没有叫他们缴一个钱的税。他们认为这三百多家商铺，是不够称为商业繁荣的，深怕一收营业税，连这三百多家商铺也会减少下来。

“但是我们也不拒绝征收正当的税，如果连正当的税也没有，那么政府怎样维持呢？这一点义务，人民是不能不尽的。今年我们想开始收一点营业税，怎样收法，收多少，还没有决定。可是他们商会，自动的提出了三千元来整顿

市容，这三千元由商铺担负，拿来修理街道。这样，他们已负担了三千元，我们自不能再收税了。”曹厅长又继续说：

“现在我们唯一的收入，只靠盐上收一点，与皮毛上收一点，但都是微乎其微的（曹厅长曾将确实分比告我，可是不会处理经济的我，恨当时没有记录，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就是盐税，本来也是不收的，因为这是劳苦大众日常的必需品，我们希望越便宜越好给大众享用。但是，你也知道，关于这种东西，有许多事情，事实会与目的相反，我们是阻止不住的。我们没有收盐税，盐价并不见得便宜，老百姓还是吃与不产盐的地方一样价钱的盐……”

“对了，一定还有私贩。”我说。

“当然，那是免不了的，商人要赚钱，他们各种法子都有。后来，我们觉得收一点点税，对于老百姓生活并没有妨碍的，譬如一角六分钱一斤的盐，增加二三厘税是不成问题的。”

我接着问：

“现在边区是不是欢迎外界来投资呢？”

“万分欢迎！我们欢迎外界有人来投资，我们还欢迎外界有人来开设一家银行，做些贷款与流通经济，我们是万分欢迎的！去年有一个华侨已决定来设一家银行，他曾来这里各处参观，但到现在，不知为什么没有消息了。如果有人来投资或开设银行，我们欢迎到极点。对于这方面，

外界的人不免尚有些怀疑，实在，我们从没有摧残过资本，就是在苏维埃时代，我们没收大地主的田地，对于商铺，对于资本，我们从未没收。这是事实，只要看，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商业总是特别的繁盛。我想误会也许是这样起来的：当我们没收一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个地主同时开设商店，他见田地被没收，就连商店也抛下逃走了。实在，我们从未摧残过商业。"

我问到关于农民的负担，曹厅长这样回答我：

"边区的农民也没有什么负担，土地问题，在这里，地广人稀，耕者都有其田。去年，民国二十六年冬天，我们发动交救国公粮，这是边区农民第一次的一点负担，他们都自动地来缴，超过了政府所希望的数目。原定的办法是三百斤以上的负担百分之一，三百斤以下的百分之一也不到。可是要知道，这个三百斤是实数，是把农民家里人口消费食粮的负担数除去之后，剩余之中抽的，在他们是微乎其微，满不在乎的。"

谈了两个钟头，这时已正午过了，我告辞出来。

曹先生给我一个好的印象：这是一位能干的实事求是的财政专门人才。在边区，一如在全国，需要这类的人才。他的直爽与诚挚的谈话也很使我感动。

走在路上，我深深地感喟：在边区，是人民吃政府，而不是政府吃人民。当然，这是原该如此的，好的政府原该给人民吃，它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可是在这吃之

中，人民对于政府应该有一点“义气”——不要笑我用这个俗字，或者以为读《七侠五义》中了毒——延安的商人，与农民，他们的荷包是厚厚的，无论在一些买卖的事情上，或别的事上，显出一些骄横与了得的神气，他们的政治意识停留在半路里，他们还没有望到前面，也没有看见后面。

延安有一家边区银行，行长是曹先生兼的，这个银行不印发钞票，只办理些兑换的手续。存款也接收的，有一次，我曾看见一个第二战区的军官向边区银行作“友谊的存款”，这个军官如此说。

走到钟楼附近，我想起了忘记问曹先生一个问题：鸦片捐。二十六日我要去民政厅，那么只好留着问民政厅长了。

二十四日，我准时去访教育厅周厅长（周扬先生），他在窑洞里，我们随意谈了一些话后，始归到正题。蒙周先生送了我一些刊物，内有一份《边区的文化教育》，一份柯柏年君著的《国防教育之基本原则》、《边区儿童》……等，与几本教育厅自印的小学教科书。

边区文化，过去是非常落后的，虽然这地方本来是我国的文化发源地。我觉得十分怅憾，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一点遗迹？战争的破坏性是这么厉害的。在历史上，延安是西北的屏障，凡遇战争，欲占长安，必经延安。我想，在南宋偏安之前，这个地方不但是军事重地，而且文化也一定很发达。延安曾是“韩范旧治”——延安城里的钟楼上

挂着有这样四个字的一只匾——韩琦与范仲淹都曾来治过这个地方，说不定《打棍出箱》的故事就出在这里附近。

这两年来，边区当局，大大努力从事开展文化，以前只有一百二十个小学，现在增至七百零九个了，小学生的人数在一九三六年春季只有五千六百人，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增为一万四千二百零七人。从小学校与小学生的数目字上，固然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进步；可是在学校行政，教育方法，师资人才方面，我想一定也同样改进的。直属于教育厅的，除全边区的小学校外，还有一个中学校，那是新近成立的延安边区中学。以前的鲁迅小学，现在改为边中附小了。抗大、陕公、鲁艺是独立的。

教育厅所从事的工作，不单只是推进学校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如识字组，夜校，半日校，俱乐部等，都是他们工作的对象。

勤务员同志已把周先生的小米粥端来，我遂告辞了。

赶回自己窑洞吃午粥，帮我的那位小勤务同志（也是帮隔壁窑洞里一个同志的）把粥拿来放在我的桌子上，这时已凉下来了。在跑路之后，又渴又饿，吃着凉凉的粥，简直成为我从未吃过的好东西，那味道比熏鹅与烤猪更鲜美。

午睡时，倒在铺上，翻看刚才带回来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至第五册。

这些课本印得不坏，很新式的：毛边，纸张是毛道林

纸。里面的内容像别的所有边区的事业一样，也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这是真正的国防教育。但有点可惜的地方，是自然科学材料少一点。十岁以下的小孩，如果装进许多空洞的理论进去，是不是适合于小孩智慧的发育？这些小孩是十几年后，建设新中国的一代，那个时候，我们不再需要许多政治工作人员，我们需要的是工业工程师，农业工程师，各种科学技术专家与技术工人。

在这些课本里，我还感到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十几年来，我国的小学教科书上，开始有起希腊神话式的故事对白来，“五四”运动，与大革命后的西洋文化的介绍，西洋书籍的翻译，好似只带来了这些给我们。

“母鸡说”，“小牛说”，“火车说”……火车会对小妹妹请早安，母鸡会对小弟弟发一大篇议论。

这几年来，我极少同任何教育机关接近，更不用说起小学教科书了。只记得有一次，在朋友家里吃夜饭，大家在饭后坐着谈天，他们五岁的小孩跑进来玩，手里拿着一本幼稚园读本。

“喔，喔，喔，喔，喔，喔，”他走近一个客人，这么喊起来。他的母亲责备他，“这算什么？”

“母鸡同公鸡说话，”小孩回答。

“母鸡不会说话的！”他的母亲带一点讨厌的口吻。

“书上说：‘小弟弟你早，早！’母鸡不是说话的？”小孩又皮又呆地问。

大家笑起来。

“为什么现在的幼稚园与小学教科书弄成这样，简直一点也不通，一点也不近人情！”

“我记得我小时候念的：犬守门，鸡司晨，人而可无业乎？虽然是文言，可是从情理上说比那小羊说小牛说通一点。”

“对了，我也还记得小时候念的什么：大雪纷纷下，柴米油盐都涨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讲。

“不是么，说商人乘下大雪抬高物价，可不是顶实在的？”

他们的话使我有同感，可是我对于教育一点也不懂，只能希望从事教育的人注意这些。我想，编教科书的人不要把编教科书像写什么随感似地写下来，最好可以设一个编教科书的会，这里面的会员要包括各种有专门学识的人才：天文学者、地质学者、……都有。不要把教科书成为单单是一些文化人的感情的产物。

这些希腊神话式的对白，在边区教育厅自印的小学国语课本里，也未能免俗。

小学教育使我发生兴趣，二十五日的下午我就去参观边中附小。这时在暑期中，还没有正式开学，只有那些无家可归的东北流浪儿童，与一些父母因工作太繁重，而照顾不到他们自己的子女——有些孩子的父母在前方打日本鬼子——都留宿在校中。

学校在城里，校舍够破旧的，是瓦屋，如果同南京、上海的那些市立小学校舍比起来，那真是无从说起了。

我很抱憾不能一一去参观全边区的小学，有机会时，我总想多参观几个。可是延安的边中附小，我后来又去了好几次，曾与附小主任吴燕生先生谈了一次话。

边中附小过去是延安县府所属的一个小学校，后来因感经费困难，官方就不续办了，边区政府将它接收过来，与原来的工作人员子弟学校合并。起初名为鲁迅小学，后来，边区教育厅为了人力、物力、财力的种种关系，把它改为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全校有四百多个儿童，抗日工作人员的子弟一百多，他们食宿在学校里。

刚从繁华地方来的人，看到在这样艰苦情况下生活着的小孩子们，印象与刺激都是非常深刻的。

每次到边中附小去一次回来，我总要坐立不安，恨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使这些小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这些孩子，他们吃的是小米饭，素菜，有时候一星期吃一次肉。因为营养的不足，面孔黄瘦的也不少——陕公、抗大，每人有七分钱一天的伙食——他们睡的是土炕，许多人睡在一个炕上；穿的是灰色小军装。实在，这些小孩子们，你给他穿的住的吃的更坏些，他们也许仍不会觉得苦的，在这个年龄，孩子们只知道一件事情：玩耍。所以就是照现在的粮食给得更坏些，他们也不会叫苦的，他们不会像成人一样替自己说话。但是问题却存在着，他们的发

育恐怕要受到妨碍。听说伙食方面最近加到了七分。

小孩子们的生活是非常有纪律的，大早铃声一响，他们就集合起来了。为了防空，吃过早饭，他们就排队到南门外去上课，背了一个小包裹，一些书籍、饭碗箸等。在延水边的一块空地上面上课，吃午饭，一直到太阳快落下来的时候才回去。延安是处在敌人的轰炸、威胁之下，敌机不知多少次曾来侦察，来投掷荒谬的传单。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幸而他们走得快，一个炸弹落中了他们破旧的校舍，他们连这个破旧的校舍也没有了！

在我窑洞口，每天早晚我都能听到这些孩子们的歌声：清脆的　　可以想象得到合着他们的步伐：“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上前线，杀敌人，发动游击战争。一，二，三，四！老百姓，会打仗，才能保家乡……”与“小米饭，黄又黄……”可是，生活是这样的苦，他们没有一点玩具，自然更谈不到自动的小汽车，电动的小火车，一条延水与黄沙泥是他们玩不尽的宝贝。

抗大与陕公，有募捐委员会，学生们为爱护母校，自动的募捐，外界响应的也不少。可是边中附小，它虽然那样的需要帮助，却是一分钱的捐款也没有。我觉得在这里，必须照着我的良心，来作一个微弱的呼声：希望全国热心儿童教育，热心保育事业的人们及贤明的父母，不论多少，捐赠给边中附小！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以民主的办法，将一个一个的钱合理地用在小孩子们的身上的。

这些抗日工作人员的孩子，衣、食、住由公家负担外，还每人发给一块钱的津贴做零用。在我看，这一块钱的津贴不是顶需要的，有这笔钱来发津贴，还不如增加在小孩子们的伙食上，把伙食弄得好一点。十岁以下的小孩子，有的还不知道用钱，有的进学校之前没有吃零食的习惯，进了这个学校，吃起零食来了。肚子泻，肠胃病都从吃零食的习惯里带来了。吃零食延安是那样的普遍，成人与小孩都一样。欧洲人嘲笑中国人是一个吃零食消费时间的民族，这句话不能不引起我深深思索。小学校门口的小食担上在放学的时候总是挤满了一群小孩。一个朋友托我照顾的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在进边中以后的一星期，八块钱给偷掉了。她说是一个夜里，大约是男同学把门推开，进她们的宿舍来偷了的。我也不十分相信她的话，因为她自己吃零食吃得很厉害，也许就是她自己吃掉了的，造出这故事来，俾可向我拿钱。但是不论对于吃的或用的钱，打游击的风气都是非常严重。看见别人有吃的他就讨，别人不给他就自动去拿；没有钱可以买吃的，就去拿钱，哪怕是别人的。

小孩子们，离开了家庭，不再看到听到父母怎样艰难困苦找钱来养活他们，买一切日常需用的东西；现在，只看见公家的东西，一批一批地发出来　　虽然没有好的，物质条件限制住，　　衣服破了的，有人在负责替他们领到新的……孩子们不知道公家给他们这些必需品是经过多

少的困难。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必定要教育每一个小孩爱护公家的东西。

孩子们的衣服是自己洗的。他们生活上的一切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说有绝对的独立性。七八岁的小孩太小了，洗一块手巾也不会，年龄较大的同学帮他们洗。可是这些较大的同学，他们自己有功课，况且自己的衣服已够他自己洗了，他们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我因此想，不如把每人一块钱的津贴取消，把这款子拿来增加几个洗衣服的女同志，替小孩子们洗洗衣服，补补袜子。原先，听说洗衣服是由保姆负责的，现在，一方面是小孩子多，保姆太少——只有三个——工作来不及；一方面也是做保姆的不知道工作的方法，以至有些小孩子生了虱。

他们的功课，除了增加一门政治外，其余都同别地方的小学教程一样，政治水准高于文化水准，这是一个长处，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我想一切最好能够并进，希望增加自然科学。有一次，一位有小孩放在附小念书的女同志对我说："小学里的教师，大都是抗大毕业生，他们把他们刚学过的'中国问题'、'统一战线'搬给小学生，当然也是好的，可是，多讲些自然科学的东西，对于小孩不更有兴趣么？"她的话我很以为然。

在延安，老百姓有时候的表现是很奇怪的，像有些极少数的工作人员，对于权利是斤斤然计较得很厉害的，对于义务，却不一定要求去尽。吴燕生先生曾对我说，他觉

得苦恼的，是群众子弟——老百姓的子女——与工作人员的子弟在一起，这件事上常常引起许多麻烦：好比工作人员的子女发一元一月的津贴，老百姓就几次要求也要同样待遇。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开店铺赚钱，没有一点税捐负担，子女不要他们花钱入学校，而工作人员，他们每月有的只拿一两块钱的津贴。

另一方面说，这些小孩子们，你说他们是不幸的吧，但他们却又是幸运的，正如吴先生说的："这些丧失了父母的伶仃的孤儿，失了家乡的流浪儿，离乡背井的'小叛逆'……他们得以生长在革命的熔炉里，他们可以呼吸在自由的天地中，他们享受着孩子的权利，他们看见真正'人'的生活，谁能说不幸呢？"

他们所受的教育，是用极新的方式，他们不是玩具，也不是被大人残压的小东西，这是这里小学教育的特点，这特点，除了严格地实行国防职务之外，就是那种在中国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彼此互助的精神。哪一个同学犯了过错，在开会的时候，大家提出善意的批评，促使他改过。在全边区，体罚是不存在的，就是骂人的话也不作兴说的。

"我们也不敢说这个教育方法已经成功了，可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里曾有一个长征过来的小朋友，他有十岁多了，小时候是很苦很苦的，没有见识过什么东西，他见了钱要偷，见了东西也要偷，开了几次会，大家

批评他……他还是要偷。后来小朋友们大家决议全体不同他玩耍，不同他说话，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不再偷东西了，变得很好。可是我们并没有谁打过他一下，骂过他一句，他就是这样把恶习改掉了的。”

孩子们对于他们的吴主任是很欢喜的，当然也是吴先生对小孩子们负责与爱护的缘故，小孩子是不会装假的。有几个在边区参观的人，曾对我说过吴燕生先生给他们一个好的印象。以前他在沈阳北平先后办聋哑学校，曾发明了一种助听音机。很艰苦地得到友人的帮助往日本去学聋哑教育，聋哑教育是他爱好的一件事业，但日本鬼子把他两次辛苦办起的学校摧毁了。前年，他曾经从内蒙古那边带领了一批流浪的儿童来，经过沙漠，好不容易地达到这里。他是陕公的毕业生，大约是最早的一期吧，我猜想。

“现在抗战期中，国家有多少事情被财力限制着，战争结束以后，炸弹炮弹的震动，聋哑人一定会增加，那时候我还是希望能给我做聋哑教育方面的工作，但是现在，我负责这小学一天，我总要一天为这些小朋友们谋幸福。”

吴先生的话使我感动了！

“小学教育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知道！”我说。

他望着我，好似同意，而又不肯表示同意。

“唉！”他轻轻地叹了一声气。

小学教育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照我的观察，尤

其是在边区，这是一种很艰苦的，没人知道与关心的底层工作，需要一些无名英雄的精神去干的。小学教师，他们没有部属，没有几千人听他们说话，一天到晚，为了小孩子们的芝麻细碎的事情，耗费他们的精神与时间，他们没有一刻工夫是自己的。有时候，他们还兼负着母亲的职务。

近年来，我国大都市里的市立小学，对于小学教师的待遇比以前改善了——乡村里还是一样——可是若与国立大学教授的薪水比起来，还是相差太远。在欧洲，小学教师与大学教授薪水相差很近。固然如此，实际上总还是大学教授生活富裕，因为往往文科大学的教授同时是作者，有版税收入，法科教授兼做律师，医科教授同时是开业医师……

边中附小共有教职员二十三人，大家平均都是每月津贴三元，若说全国的小学教员苦，那么边区的小学教员更苦。他们学校里只有一个通信员，一个勤务员，那一天，在街上，我遇见吴先生背了一个皮包往边区医院去领药，我很惊奇，他说怕别人去托不下。这种精神是难得的，确实把坚强的政治信仰表现到实际上来了。

在延安，炊事员同志很感缺乏，好一点的都已被别的机关调去，附小花了六元一个月的工资用老百姓当炊事员。伙食上面时常弄不好，这也是当然的，这些老百姓，没有专门训练，能烧什么呢？

那一次，谈话的末了，我问他："什么是你觉得最困难的？"

"我觉得，"他想了一想，"把小学教育当做毕生事业的人实在太少！"

几次参观与几次同小孩子们的谈话，我已经观察出来了，附小确实缺少以小学教育为毕生事业的人。有些教员，当上面分配工作的时候，觉得这样也不配，那样又不会，于是就送到附小当教师。在上边分配工作的人，这方面似乎疏忽了，或者是不得已，因为前后方都需要优秀分子。如果有一个较能办事较为适合的人派在附小，那么这个人也不肯安心做下去，他是一定要走的。女教师与保姆，有些是大着肚子，快要生产，因为要生产了，不能做别的工作，才勉强来暂时教一点书，生了孩子，就不愿再留在附小了。小孩子是爱动的，可是，怀孕的女子，在那个时期需要休息、清静，结果她们的疲劳与烦躁都发泄在无罪的孩子们身上。在我个人想，小学教育，像保育事业一样，妇女可以尽一部分力量，但是我直爽地说，来边区的妇女，她们竟没有懂得妇女自身的利益，她们同别的人一样，大家都要做革命大事业，要到群众中去，这固然很好，我希望在这次民族生死的战争中，我们要有不止一个的花木兰，成千成万的花木兰。可是在另一方面，妇女自身如果不肯去从事与自身利害有关的事业，那么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有一次，一个女同志，她哭着对我说："我害了他！我害了

他！我不应当把他放到保育院里去！”可是我却想，如果有优秀分子肯去保育院工作，这种悲惨的事情可以减少一些。边区当局已把所有好的办法都想了出来，但是没有人去做，缺少优秀分子去做。

我希望，对于后方的小学教育，边区当局能比以前更注意些；一方面，小孩子的父母们，也要尽可能地与学校及他们的子女多接近。伟大的革命者，我想不是机械化的，多多与学校与自己的子女接近，了解这一部分的工作，鼓励从事小学教育者，提高待遇，也是一个办法。

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教育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了，可是在沉思之后，却有一点担心，这个担心是否是不必要的？在这个小学校里的抗日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他们是远离了父母的，有些实际生活的知识，与日常生活上的监督、引导，能得之于父母的，他们现在得不到；十四五岁的男女孩子，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一个人怎样能够幸福，如果不把他们有些好奇心给予解释，如果不武装他们的体格，与不武装他们的头脑——政治教育——有差不多的危险。我们的幸福一半基于健康，我们民族的强盛也一半基于优秀的种子。这些孩子，家庭把他们的前途整个托给学校了，学校的责任更重大了。学校只得把家庭教育未能完成的工作也同时去做，一句话，我希望边中附小——边中也在内——增加一点性知识教育。

二十六日午前十时去民政厅，高主席正在开会——民

政厅厅长是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先生兼的。他说最好能够改在明天这时约谈，问我有没有收到他的信，为的怕我白跑一次，高主席昨天已托人交信关照我了。在窑洞门口讲了这几句话，我就告辞了。那天近晚，我到文协会去玩，才看见高先生通知我延一日谈话的信。

二十七日上午在高先生的窑洞里，谈了近两小时。这是一位年纪五十开外的长者，在不久以前爬山跌了一跤，把嘴唇跌破了，现在留着一个新的疤。性格看去是很质朴的，说话带着又似江西又似福建的口音，我得很费力地才能听懂高主席的话，有些字眼我还是没法听懂，可是我相信高先生也一定很难听懂我的话。

一般的情形都谈到了。

边区的一切事业都在十分困难之中进行着。目前，他们尽量集中力量，以求多多贡献边区的人力物力给国家，可是有些事情却有待于国家的帮助，特别是在财力与人力方面。延长一带有煤油矿，用的机器是破而旧的，以极老的法子，成本很大，油质不好，产量也低。许多煤矿也因为财力人力所限制，不能开采，就是已开的煤矿也只仍用老法子——人工开采。

我拉杂地问，高主席都一一回答我：原来延安城并不是属于边区的，原先，那时候红军来到陕北，延安城包围了一个多月——这是我听别的长征过来的人讲的——城外红军，城内东北军。可是大家没有打，有时候，城内的军

队还往城外开联欢大会，彼此交换没有的东西……后来和平统一，大家只求团结御侮；有些在行政上成了悬案，因为当时大家都马马虎虎，反正都是自家人。但是那些存心捣乱的汉奸，却常常想从中引起些无聊的摩擦。边区政府如果能早日得到国家承认为一个合法的政府，把界线划一下——当然不是分家——在行政上可以方便一些，汉奸也较不易活动一些。

在我，一个没有党派观念，一个没有组织头脑的极散漫的人——只不过要做一个真正中国人——我冷眼看，边区为了团结御侮，为了国家统一，他们的确放弃了某些政策，不惜牺牲他们自己。我尊敬每一个党派的信仰与理想——只要是不出卖民族利益的——，为的我自己，我，无党派的人，也希望别人尊敬我的理想，一个老百姓的理想。

问到鸦片，高主席说这里关于戒烟，是从教育着手，并不加以枪毙的重刑。对于有些老病的人没有法子戒除的，也不加以强迫。私贩烟土或私自吸食的，在这方面，得到妇女的帮助不少，她们常常会来报告她们的丈夫或邻居在做这类的事，因此而得以减除。在陕北，以前是遍地鸦片，现在可不了，偶有人私种，如果还没有长成，一经发现，就给以劝告，把烟种拔掉，下别的食粮种子；如果烟已快收了，那么政府出钱买它，而劝导他下次不要再种。政府所以收买它，不过是顾虑到老百姓的生计。其实，照我看，

现在陕北的食粮，凡是小米，豆子，及菜类，没有一样不是售价高昂的　　小米四元三十斤，白菜五分钱一斤　　，我想老百姓实在不需要种鸦片。收买，这个很对，也是减少吸鸦片的一个帮助办法。

已过正午，我告辞了。天气很热，太阳的光正威逼着整个山城，爬下高山，又爬上高山，几乎用尽我的平生之力，爬过了许多山坡，才回到我的窑洞里。累了，可是很快乐。

自从八月中旬到十月，天常常下一点雨，有些日子，几乎每天午饭后　　一时左右，当我正午睡的时候　　先刮一点风，接着下起微雨来。当我起来的时候，雨过天晴了。地上是那样的干燥，一下子把雨吸收了进去，变得那样干净，没有一点灰沙，好像用湿木屑扫过的广漆地板。踏在这样的地上，感到十分爽气；空气里也一点灰尘没有。我欢喜在微雨后，立在窑洞门口，呼吸明洁的空气。望着远山若黛——那是北方美人的黛，非常粗糙而自然的　　一重山，一重山，这些山引起我许多遐想。

那几日，天日夜下着雨，山路太泥泞了，不能下山，交通好似隔绝了，不见一个人，只在附近机关开饭的时候，那些男女小勤务，他们手里拿了饭菜，像背纤似地走上来，像滑冰似地走下去，间或夹着一两声尖锐的叫声："啊唷！""妈呀……"

心境随着连绵的雨静下来，唉，太寂寥了，晚上，不

禁想望有一个熟识的友人——像他们惯常所做的，偶然地来谈谈天。

怀着这个徒然的想望——在延安，我还没有熟识的朋友，也还没有无话不谈的朋友来消磨这个寥寂的黄昏。朋友，我想念你们！在抖动的蜡烛光下，想起纳兰的这两句词来："最忆西窗同剪烛，却话家山夜雨。"延水铿铿地，若远若近，在雨声里，像一个交响乐里的高音提琴声。烟霭笼罩住了所有的山，在蒙眬中，几点灯光，浮在延水上，好似西湖里迟归的划子。这个发现，顷刻激动我，战争，家乡……把我送进了一个忿怒而忧愁的情绪中。

远处，一点灯光，时高时低，在动着。呀！这一点灯光，是不是哪个冒雨归来的人？也许正是对山那个窑洞里——透出灯光的人所爱着的，为了抗战，为了工作，他们终年分离。"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是的，正是这样，我深深地想。可是，他们，那些革命者，会不会像我这个渺小而简单的人，起类似的感情？

一个傍晚，张君来看我——就是在西安招待所中认识的——他最近才回延安，面孔瘦得认不出来了。说在洛川，天雨耽搁了七八天，就在那个地方生起疟疾。

我因为不认得八路军政治部，还没有拿李六如先生的介绍信去见谭主任，问张君有机会能不能领路，如果对于他没有妨碍。

张君看过介绍信，他说下一天的上午九时来同我去。

照着约定的时间，张君同我到政治部去。托他把介绍信拿进去，他回出来，说谭主任身体不好，正患肚泻，可是能够见我，希望谈话不太久。

谭先生在一只旧藤椅上休息，见我进去，起来招呼，握了一下手。

我在长方桌旁边坐下，请谭主任随便些，可是，他还是坐到桌子旁来。

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材料可以给我，一般材料，在《解放》的纪念专刊中，朱总司令的《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中可以看到。别的，还是介绍我到文协会去。文协会这次从前线回来的文艺工作团曾经展览过照片，我说想要几张，谭主任就提笔写了一封信。谈到敌军工作，谭先生带着强硬的湖南口音——但还容易听懂——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平型关一仗，敌人给我们包围在山谷里，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缴械。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一向在那里荒唐宣传我们残暴，所以敌兵的脑子里都以为与其被俘，给中国人剖脑子——日本帝国主义是这样宣传的——还不如战死；一方面是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他们作战是极勇敢的，这是应当承认的，他们觉得被俘是一件极耻辱的事情。平型关后，我们俘到几个伤兵，有一个，担架队抬着，往救护所走，出其不意，这个负伤的日兵从担架上滚到山沟里去了。还有一次，一个放在救护所的手术床上的日兵，医生正要给他上药，他怕得发抖，忽然，乘医生不备，他拔

出刺刀来刺医生……他们是那样的顽固，譬如已经逼到墙角落里了，”谭主任做着手势，指着墙角，“应当可以缴械了，可是他们不肯，这样打仗，是很费力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我惊奇地问。

“那或者，在第一次抗战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敌军工作，老百姓也许有杀害被俘敌兵的事情……”

“第一次抗战？绥远么？”

谭主任没有否定与肯定的回答，好像不欢喜我这个问句。

可是我，心里忽然想到《夏伯阳》中费多尔的一句话：“有时候，血的债还得用血来还。”

“现在这里有多少俘虏？”我问。

“很少，只六七个。一则是很不易俘到，二则，交通太不便，无法送到这里来。而且游击战，有时为了迅速进退，不能把他们带了走。我们现在的办法，在前方，我们俘到俘虏后，就对他们讲话，马上放他们回去；负伤的，给他们上过药，也马上放他们回去。我们从敌军文件里知道：如果三天之内不回去，回去了，他们有生命危险的。”

“可是那样，我们不太吃亏了么？他们回去依然拿起枪炮来打我们。”

“是的，不过至少我们释放俘虏，优待俘虏的事实，他们是知道了，至少给了他们的一个印象，也许在下一次作战的时候，他会想起这个印象。并且，这个俘虏回去，别

的同伴一定会问他怎样经过，身上伤口的药是谁给他上的……”

“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效果没有呢?”我问。

“还不多，可是已经有了，从前方报告中，最近居然有一个自动过来的日兵。是这样：在冲锋时，这个兵没有冲过来，他站在战壕里不动，等我们的队伍过去，他过来了。”谭主任接下去又说：“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人民已经实施了多少年的侵略教育，我们只有从政治上去争取他们。”

我说：“我想去参观一下俘虏。”

谭主任那严肃瘦削而无血色的脸孔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可以的，我替你写个介绍信!”他提笔写。

我想，他是不是笑我这个平庸的好奇心?外边来的人一定有许多要参观俘虏的，我也可算得不能免俗了。

写好介绍信，谭先生告诉我怎样去找负责人，送到门外。他要叫一个通信员带我去，张君听见了，从边屋里出来说，他可以领我去的。

告辞出来，张君领路，就在政治部后边，很近，在靠着一个没有围墙的空院子边，一座低低的瓦屋，就是敌军科了。公事公办，我把介绍信托交一位正在门口的同志，他要我待一下，接着就回出来领我进去。敌军科的科长好像是姓刘，就是张君工作地方的负责人，当我回转头来，张君也进来了。

刘先生好像是非常怕羞的，低着头，话声很轻。我见了生人也不会说话，幸而张君把我的意思转达了，于是刘科长说："好的，那么你陪了去吧！"又对我说："请你统统问张同志好了。"

俘虏是住在北门里大街上的一座老百姓屋子里。张君同我进去，他们有四个人在炕上打麻将，靠在一只矮小的桌子上，盘膝坐着。麻将牌是用一块一块小方木头，上面贴了纸，写上字，画点花。据说是他们自己做的。我可佩服他们的创造精神，边区也有人玩麻将？幸而不是工作人员，他们是俘虏，我虽然觉得讨厌，可是与我们无关。还有两个正在烧午饭，他们吃小米，柴是公家发的 与边区工作人员一样。菜是发的钱，他们自己去买。他们穿着与边区工作人员一样的青布军服，只不过他们还保持他们的特别习惯，脚着木屐。

这些俘虏，他们没有管束，享受绝对的自由，满街乱跑，成为延安街上的奇货。 我知道有些学生，特别是从上海方面来的，那样地崇拜外来的一切，竟至找俘虏说话，以为荣耀。这样地优待俘虏，真是历史上从未有的。可是我觉得在"人"的立场，他们这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不是道理，我们可以给他们做些工作， 当然不是像欧战时给俘虏做苦工——给他们做些他们所欢喜而擅长的工作，并且可以给他们报酬。我对张君说出我的意见。最近，八路军政治部对于俘虏已在那样地做了。

我现在还没有见过一个高级的日本人。从前，在北京、上海那些留日朋友的家里，见到些专门打胎的流氓医生，与一些狡猾虚伪的茶叶商人、书店商人。我讨厌他们那种几乎快要俯到地下的鞠躬，我常常十分奇怪那些朋友，他们欢喜同这类日本人来往。上海虹口一带的日本流氓小贩，也是我能见到的，他们公开做商人，秘密做间谍。

这几个俘虏的面孔是这样的庸俗，一如我以前所见过的那些面孔，特别有一个矮小极的，他那副傲慢的神气，与那时时转动的小圆眼珠，给我一个极不好的印象。他们这样自由，要做间谍工作，恐怕倒很方便。

其中有一个朝鲜人，他的面孔，我直觉的觉得还老实——恐怕有人要笑我好像是相面先生。不过我觉得一个人的本质好坏，有时也能直觉地从相貌上看出一点来。“八·一三”前，他在青岛做汽车司机，他说日本人并不强迫他们去打仗，不过用种种方法使他们“自动”去投军。他同张君说着日本话，我听得很难受。灭亡一个民族，在军事取得优势后，马上就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可说一大部分寄托于语言，与语言发生联系，人们想念家乡，为的家乡有自己熟悉的声音、语言。从语言里带来了各种脱离不了的习惯：吃饭，睡觉……甚至于一把裁纸刀，吃着玩的冬瓜糖，我看见几个留日朋友都要跑到日本店铺里去买，使我感到不快。

我没有同一般访问俘虏的人那样问他们这些问题："你对于八路军有什么感想？""你对于中日战争的观察怎样？"……我觉得他们的回答有时固然会极真实，但也多少带一点虚伪，我为什么一定要听那些虚伪的话呢？我只同那个朝鲜人谈了几句话，他说他很爱中国话，可是觉得太难了，我鼓励他多多学我们的话。这样就出来了，谢过张君，便回到山上。

六　继续参观，继续访问

那天上午九时，拿了妇联的介绍信，去接洽参观抗大，往各处探听如何办理参观的手续，终于找到了一点头绪，说是须先往校部去。好不容易地寻着了校部，是在城里，延安师范旧址。我把介绍信给门口的收发与传达，他们拿起介绍信端详了一歇后，把信收了起来。

"同志，我是来参观的。请你把信代我马上送进去！"我说。

他们抬起头来望了我一下，把信交回我，用手一指，"往那边去！"

"是不是把信交给门口站岗的？"

他们没有回答我，只挥手叫我去。

我走进大门口，把信交给站岗的，他叫："送传达!"一面拦住我。于是我把信交到原来的地方。这样地循环了两次，又回到传达的窗洞口。

"这是怎么的?"我终于有点不大高兴地问。

"怎么的?你怎么的?"一个年轻的男子，他反问我，好似准备吵架。

有两个衣襟上挂三角徽章的男同志来窗洞口送信，我只好让到一边，窗口里面的人还是像对我一样的态度，把信看了一下，懒洋洋地放到桌子上。

"赶快送进去!赶快!上次你把我给×队的信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其中一个开始严厉地说。

"好好!这次好好送到。"另一个男子文不对题地说。

"对不起，请问一声，我来参观抗大，这封介绍信应当怎么办?"我问他们。

"你可以叫他们送进去!"矮个子的对我说。

吱唔开始了，里面走出了一个人来，"什么事?"我说了原因，他把信交回我："你进来好了!"站岗的人仍旧拦住我，可不十分坚持，我于是走了进去。

走进大门，过了一关，可是总得找个人来问问，把这信交给一个负责的人。

院子里有人走来走去，我拦住了一个问路。

"那里!"这人回答我。我走去，到几间屋子的面前，被人阻住了："你做什么?"从头到尾又把原由说了一遍，

再问路。“那里！”叫我往原来的路走……这样，在大门里的院子内各个方向我都走到了，终究又回到大门的进口。“在那边！”一个年轻的男子对我说，指着对面的一个院落，他说过，吃吃地笑起来。

对面的院落？我明明知道他在开我玩笑，“他把我当什么东西？人？畜生？匪徒？”这么想时，我的耐心到了极点，其实，若在外边，这种情形之下，我早已发脾气了，可是在延安，脾气是不好发的，难为情发的，但这次，我确实忍不住了：

“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若说你不愿我进去，你可以干脆打发我走，何以要把我送到这边又送到那边？”

越是不知道尊敬别人的感情与自尊心的人，自己的感情与自尊心也越碰不起，这也是一定的。把别人的感情放在地下践踏，拿在手里揉弄——这是一位女同志对我说过的话——可是这些人自己，他们的感情脆弱到吹一口气都受不了的。

“什么态度不态度？你自己是什么态度？”他对我排起马步，两手叉起，大声地问。

“我有什么态度？”我想，可惜我没带镜子，但我心头不禁懊恼地想：“天呀！我在这里做什么事呢？”我的脚步已经移动往外走了，可是“参观抗大”这个念头又使我停住不走。

“你自己看一下，你这一副是什么态度？”我说。

他更提起嗓子，想用大声音来压倒我。真巧，下台的人每次总是有，正在这时候走出来一位女同志，她把那个青年劝开，对我问："什么事？""呀！对不起了！他们不知道！"但是老实说，我很不满意她这个态度，是与否，两者之中，总有其一，既不责备我，也不责备他——或者在她是不可能的？王家村婆子或许是这样劝吵架，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后来，照样又有过一次，那是我去看许光达先生的夫人，许夫人邹女士，就是与我同日由西安坐车来延安的，到延安后，在她尚未进校的时候，她与她的小姑许女士曾来我山上玩过两次。那次是约好我去看她们，日子与时间都约定了。她住的地方，没有地名，唯一的标记，就是在一棵大树下，因之叮嘱我往抗大校部问许教育长家，就会有人指示我。哪知到抗大校部，又是这么一套，"请你把字条拿进教育长室。"——教育长室就在大门的进口——他们不肯："教育长不在！"后来也是一个女同志来下台，问我做什么，我把字条交给她，怅怅地回出来。我失信了，害朋友白等了，但并不是我的过错呵！

抗大的门禁这么森严，不知道是否对于每一个参观的人都这样？我很好笑地记起上海震旦大学的门禁来，那是圣地，每逢女子一走进门口——哪怕就是他们培植出来的校友的太太们——校门口的人就要不客气地赶："请出去！"可是抗大是男女同学的，自然更不是圣地，有些人描写权

贵之门的可怕，但我没有这个经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去奔走权贵之门的愿望与需要。

我曾同延安的熟人谈到关于抗大的门禁，那个熟人说：“为防汉奸。”我可不相信，这只是他临时想出来的解说，我想汉奸一定不会像我这样呆头呆脑拿了一封介绍信去参观的，早已什么都知道得明明白白了。另一个对我说：“抗大的勤务与收发是顶讨厌的，这是薄弱的一部分。”这话在我看去，比较对一点。抗大是太大了，当然免不了有薄弱的部分，或者有些个别分子，他的行动表现，会使人惊诧的。有一天上午，有一位抗大的工作人员，他找到我窑洞里来，他是找离我不远的一个窑洞里的医生看病的，找错了。“看病！”他对我喊，一嘴巴酒气味在我脸上冲，该是刚刚吃饱酒饭。在门外，我看他走向那个医生的窑洞：“看病！”他喊：“这不是姓×住的，一个医生？”“是的，我就是姓×。”那个医生走出来回答他。“那你不是看病的？给我看病！”“现在不是看病的时间。我门诊的时间已由医务机关通知各机关了！”“不行，你必得现在给我看，我是抗大某某科科长。”他指着他衣襟上的三角章与荣誉奖章，“我只现在有空，我们没有多少空时光！”“我也没有空时光，我的看病时间是排定了的，现在要出诊去。你要看病，请你往底下泥屋子里去问医务科长。”那个医生说话的口吻是那么客气，还做着一个非常礼貌的请他下去的姿势，使我想起在欧洲见到的，人们用极端客气来表示他们的不

高兴。

本来，那天兴致很高，想去参观抗大，经过这样一番波折，我觉得很疲累了，只想回到自己窑洞里，安安静静地睡一觉，什么都忘记掉。

可是这位女同志，她请我在里面的小院子里坐一下，搬了一只小凳子给我。“这里不好，近墙可以阴凉一点。”她说，又倒了一杯开水，送到我手里。她的一番好意，在我那时的心情上起了一种不可修理的修理（Réparation irréparable）作用，毕竟我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人们对于我的好与坏都一样地碰不起。于是我坐着，揩着额角的汗，开始同她笑谈起来，像对一个老友似的。

“请你等一下，我们派一个女同志陪你去，领你路！”

“那不是太麻烦那位女同志？”

“不，一点也不！”她和气地说，立刻使我想起，国外的各个国籍不同的女同学，往往我们只第一次见面，但大家谈得已像老友。

这个女同志，她有一张拉得很大的嘴巴，可是并不讨厌。

又走出了两位女同志来，她们手里拿着两封信，问我欢喜参观哪一队。现在女生队有两个队，三与四。我问路远近，说三队比较近一点，就决定去参观三队。但她们的意思参观四队好，因为军事与政治队都有。

一位高个子的女同志，穿着一套已退色的蓝布军装，

衣襟上挂着一块三角章，她的面孔长长的，面色不黑也不白，不红，略带一点灰青色，两手插在军装袋里，看她的步子像走一步退一步，其实却还比我走得快——因为个子长，脚步大——陪我走往三队去。

走在路上，为消遣别人也消遣自己，最好是聊天，但是这个办法有和气的对手时可用，为怕讨没趣，我就不开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极冷的。

走进城门，突然，她问：

“你今年几岁？”

“三十二，算中国岁，叫三十三了！”

“倒看不出，一向生活很好吧？”接着，停一歇：

“什么地方人？”

“浙江。”

“呀！”她长长地喊了一声，好似有无限的思感。

“你受过什么教育？”

我吃地笑了出来，“你是不是要给我做媒？”这个滑稽的念头使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太失礼了，我连忙掩饰住笑，说：“陕北的山多么高！”

“你们那里没有吧？”

“有也有，不是这个神气。”于是我问：

“你是北平人吧？”

“对了！”她说。

“那个地方我顶爱！”我说，“那里的人多有礼貌，就是

商人，也不讨厌！”

“你到过那里的？”

“是的，我住过一年。”

“你在那里做什么？”

“教书，也念一点书。”

“呀！在哪些地方呢？”

“在黎明、适存教书，在北大听一点课。”

“黎明中学，我听见过。”她说。

“是的，那两个中学都是北大出来的学生办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出去了。”

“出去？”她追问。

“我离开中国。”

她不再问了，我们已出了城，指着对山的一排窑洞，她说：“那个山上就是女生三队！”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好似结束了一个口试。

其实，这个并不是口试，后来，我觉得这样直爽的问话，在延安是流行着的，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男同志问另一个：

“你有老婆的？”

“是的，老早有的。”

“那天的是你的老婆？”

另一个点了点头。

“她识字么？”

“识几个。”

“小学毕业？”

“不。”

“那么是文学家！”

把自己的资格头衔都搬出来，像旧小说里的“通过名来”也常有的。有一次，在大礼堂门口遇见几个熟人，旁边有一位女同志，他们给我介绍：

“燕京大学出来的……”出于我意料之外的，她自己接着也说了一大串头衔。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裳姐[1]的老友，招呼一下之后，她邀我去玩。

“我不知道你的住处与你的大名！”我说。

“你只要找××，×副司令。”她说，又着重地问我：“×副司令，你知道么？”

我们走到山脚下了，山石上，泥墙上，满是标语：“完成学校突击任务”、“抗战到底”……各式各样都有。先去找大队长，大队长住在山下的泥屋里。

在山下，这些泥屋东一座，西一座的很多，不像营房，也不像宿舍，里面一小间一小间拦起来，这类泥屋子南方人是绝对想象不出的。这种房子实在找不出比拟，如果要

---

① 即陈云裳。作者早年的同学，1938 年去延安。

比拟，那我觉得太不好听了，因为我只觉得有一类的房子勉强可以比拟，那就是在北平，我所见过的。据说这类屋子并不便宜，虽然照我看去，建造的法子是极简单的：用两块木板夹起来，中间叠碎泥，稍稍用木桩把泥敲紧，就成功垛墙了；屋顶架几根木头，木头上铺起高粱秆子，再涂上烂泥，就成了，可是合起来，也要五六十元一间。

我们进大队长泥屋子里去，他从里面一间走出来，笑着说请坐。军装穿得齐齐整整，干干净净，方方的面孔，笑起来两个金牙齿露在外面，这样的军人，我好似见得很多，但是一听他说话，却有点不同。

“她们今天大早出操去了！请坐一会吧！”他一边说，一边叫人拿开水，当一把缺嘴的茶壶拿上来时，他自己接过来倒。

在那间泥屋子里，我们随便谈谈，天已正午，热极了。

“你们辛苦吧？”我说。

“也不怎么，从前过草地的时候才苦呢！”他说。这位大队长，听说曾是团长，是从江西出发，长征过来的。他听我说曾住过江西，热烈地问我江西的情形，但我说只在省城里住过，他有点失望的样子。

他时时派人去看学员回来没有：“她们今天早上四点集合的……”微笑着说，好像谈着自己的子女。

“她们已在回来了。”一位女同志进来说。

“我们去吧。”于是他与那位陪同我来的女同志领我上山坡去，我们在指导员——一位女同志的窑洞里，刚刚坐

定，听见人声喧闹，“你们俘到了多少敌人？”……“哈哈××当俘虏了……”我也就跟着大队长与指导员出去，看一个一个身体健壮的女同志从山坡上来，每人拖了一支木枪。指导员立在山坡上快活地同她们每一个搭着话。她们有的喊：“热死了！”“口渴死了！”我真的自叹不如。

忽然，她们来了一个集合，说是欢迎我。糟糕！我怎配她们欢迎？她们立正，稍息……之后，副队长又来了一篇欢迎辞。怎么办？她们还要我说话。在无可奈何情景之下，我只好开口说了几句，好像同一个老友谈话，无头无尾的。我说我非常羡慕她们，敬爱她们。真的，她们的精神实在使我歆羡，就是在不去“打游击战”的早上，通常她们在五时已出操了，在我的窑洞门外，大早，我常常可以听到许多脚步声，不是抗大的男同学就是抗大的女同学爬山出操。她们是民族与妇女自身解放的先锋队。我太感动了！

在散队之前，指导员同她们说今天吃过午粥，每个人都要好好地睡觉，不要偷看书，她们今天起得太早，如不睡觉，晚上的功课会没有精神听的。

我还想参观学员所住的窑洞，指导员对大队长说：“今天恰恰弄得不十分整齐，因为被褥在她们出去以前已乱七八糟拿在外边晒了，现在呢，她们肚子饿了，急等饭吃。”

我想也好，不去参观了，不要难为她们。就告辞，大队长与指导员再三留我午餐，我谢了他们，下山坡来，送到半山。他们喊：“有空来玩！”

抗大自抗战以来，栽培出了许多抗战优秀种子，散布到全国前后方，已经不知有多多少少，他们自然已起了极大的作用，将在那些地方出芽、开花，结果，我们期待好好的收成。抗大的精神外边大家都已知道了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新华日报》上杜映先生的《延安半年来的国防教育》可以看一看——他们的校训：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确实是做到了的。

抗大的校长林彪先生——延安抗大的学员称他做林校长，外边来的人称他做林彪将军或林师长——我在一个晚会上遇到，一个熟人对我说："我来给你介绍抗大校长。"我说"算了。"——那一晚，我遇见西安招待所中认识的李女士，她跑来跑去已很熟识了，正拿了一本小册子在请林彪将军签字。——我不欢喜在晚会上去招呼忙人，他们，可怜的忙人，好不容易在晚会上舒舒服服透一口气，为什么要去麻烦他们呢？虽然在后来，几次群众大会上见到林师长，但我并不认识他。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先生，也是在一个晚会上见到的，恰恰坐在前后排，一个熟人替我介绍，可是没有谈什么话。

好些人曾经描写林彪将军是一位矮胖的年轻军人，我看去并不矮胖——有些人说以前胖，自从隰县受伤后，瘦了——至少并不胖，在那些大会上，我从没有见他笑过，总是一副好像有什么不快心事的脸色。罗瑞卿先生，正如好些人写的，瘦长得像一根铁丝。

军事委员会的犒赏队队长，他曾对我说："他们这种地方真好，你看见林师长受伤后，委员长送了一千元，他自己一个大子也没用，统统捐了。"

"是的，"我说："这固然是个人的高洁，却也是一个集体的反映。"

十一月十二日，抗大女生大队成立的那一天，我也很荣幸地收到一张请去参观成立大会的短柬，那天我听到边区的许多领袖们讲话，毛泽东先生，是在那个大会上我第一次听他讲话，他的声音不怎样高，可是他的冷静，好像与听众不发生一点关系的冷静，把每个听众的注意吸住了，那天他说得不长，人们疯狂似地拍着手。

接着说话的，有十几位，林彪先生，贺龙先生，罗瑞卿先生，滕代远先生，——延安人称他做滕参谋长——徐特立老先生……他们个个都像妇女运动专家，而且他们的口才个个都那么流利。在延安，这是一个奇迹，好像全中国的演说家都集中在边区，每次大会上，那些说话人的口才，个个都是 orateur。

中国女子太不幸，却也太幸福了，有这许多同情我们解放的男同伴，在替我们叫喊！

"今天是你们女子扬眉吐气的日子……"罗瑞卿先生说话咬紧牙齿——听说是受过重伤的——"我希望抗大女生大队培植出许多妇女干部来，那么我愿往前方去，这个副校长的位子，我可以让位的……"一阵哄笑，继以掌声。

可是我在这里，也要说笑话，若说那天是我们女子扬眉吐气的日子，不如说是男子替我们扬眉吐气的日子，为什么那天说话的尽是些先生，而女子只有三位呢？——一位是女生大队长张琴秋女士，一位是女生大队政治教育主任孟庆树[①]女士，一位是河南老太婆剧团团长薛士英老太太。

徐特立老先生的话引得每个人都痛快地笑了："小时候，我觉得女子真伟大，她们会烧饭，会洗衣服，还会生小孩子……"平常面孔拉长得有点可怕的成仿吾先生，在台边，也笑开了嘴巴。

"假使女子不同我们合作，那我们男子怎么办呢？我们还能像平常时候一样的工作么？我们的工作效能一定会减少，我们只能作半天工作……"人们只是笑着。徐老先生的话是对极的，真的，如果我们女子不同男子合作，看男子能怎样，有许多地方，因为有女子在做宅基，男子才得安安心心造他们的屋子。

贺龙先生，他希望女子也能带兵，滕代远先生，他希望女子就她们身心所近，多多参加通讯与卫生两部门的工作。孟庆树女士总结说："我们但愿能努力达到各位首长的期望！"

抗大实施真正的国防教育，在现阶段，可说一切都好。

---

① 当时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王明的夫人。

但我也曾听到好些人说抗大出来的人，有极少数的人，常常态度很骄傲，　　也有些女同志，不肯上前方，也不肯往别处，只老愿在延安当一个文书等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抗日军政大学，这样一个大学，什么都全备了。可是抗大的军政，好像是教授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一切还须从实际中去磨炼、应用，才得尽量发挥。里面学员的文化水准是很不齐的，有些人能随手记录，有些人还不能完全理解教授们所讲的课。抗大录取学员，及格与否，主要看他的抗战信念坚定不？在外边，我曾看见有些青年，为想进抗大，特地补习代数、几何，他们是没有明白抗大的教育。

有些外来的大学生，因为文化水准高些，他们觉得有点苦恼，而不安于抗大："我们听得有兴味的，有些人听不懂。"抗大的学员实是太多了，要文化水准很齐，实在也不可能。

"我有点懊悔来进抗大，那里都是些没有办法的青年，人家知道我本来在××大学念书，竟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来进抗大呢？'"

延安有一种极奇怪的空气，不止抗大如此，在外边，我从前也这样想，延安总是充满了抛声名，弃地位，纯粹为着抗战，无条件地来到边区学习或工作的人；哪知道延安的空气并不完全如此，有些人，他们对于真正抛弃一切而来的青年或别种人，常常表示极大的惊奇，有时也会天

真地问："那你何必到这里来呢？"好似不便说："你既然本来有饭吃的，何必到延安来呢？"我也推究不出为什么有这个空气。我想，自从抗战以来，为着抗战，抛弃一切的人一定太少，因之这些人会被看做怪物，甚至傻瓜。实在说，抗大里虽然有许多没有办法的青年，但也有许多有办法的青年，他们捐款给学校，有一人捐到一两万元的。

"在黑暗社会里所用得着的吹牛拍马，有时在抗大里也应用得着，如果你常常去接近大队长、指导员……吹吹牛，拍拍马，那么分派起来，你总能得着较为适合的工作。"

"我们学员有意见，不能直接提呈校部，必须交给班长，班长解决不下，而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再交给区队长……这样推上去。往往有许多问题就是这样按下去的。这些指导员有的是抗大前几期毕业生，我们不能解决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也不能为我们解决。"

"有一次，在大会上批评区队长。我们同队一个女同志，她的丈夫在一个下午来看她，为的小孩子生病，医生说要检验大小便，父亲从二十余里外取了大小便来，再叫她送往医院……在场上，两人正要会面了，还来不及说话，区队长赶来，把女同志的丈夫打发走：'这不是会客的时间！'这个男同志来不及把大小便交代，提起走了。许多人都同意我的提出，但是会毕后，夜晚，区队长差人来叫我去谈话，房间里没有别的人。"

"你要对我说话，同我说好了，为什么在大众之前说我

的话？批评我？”

“真要一些光棍的人，才吃得消抗大的风气，越光越好。”又有人这么说，“好比一只面盆吧，你有一只面盆，大家拿着用，洗衣，烧开水，煮粥……一点也不爱惜，用完也不放在原处，这个也不要管它，一天，这只面盆烧破了，面盆主人有点不高兴，或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面盆给人弄坏了。’有人报告区队长，批评起来，说‘东西大家用用有什么关系？’可不是，只怪这人有了一只面盆。”

有些抗大的学员同我谈到抗大里的民主，听说抗大这次大检查工作是用极民主的方法，一位名教授对我说：“一定有些东西的。”意思是一定有好成绩。

民主集中制，这是边区在号召的，我国现在是在战时，不要忘记了这个战争，就是在平时，我们需要的也是民主集中制。

缺乏人才，就是说缺乏干部，这恐怕是一个事实。抗大栽培抗日干部，但是怎么选拔呢？恐怕这倒是困难的。从各方面讲，好比一个抗大的大队长或指导员，在一年或六个月中间，他能不能普遍接近几百个人？这在时间上已经不容许他了；从大队长与指导员本身讲，他的眼光是怎样的？他的识人的标准又是怎样的？他既识人了，会不会用人，能不能容人？如果能够用人容人，但是对方受用与受容不呢？所以选拔干部，还是决定于本来的干部。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抗大校部干部，也不知道分派

工作的标准是怎样的，照我日常浅薄的观察——有些外来参观的人都有同样的观察——边区各种工作都由会说话的人去担负做。政治主任，由一个会说话的人去，指导员由一个会说话的人去，事务主任由一个会说话的人去，教书，也由一个会说话的人去……可是我觉得，在边区，会说话的人够多了，就是缺少去照着领导者的话不折不扣地做出来的人。分工合作，民主集中，就是要把这两个大原则推广到一切事情上去。

有些青年，抱了一种非常美妙的理想来到延安，但延安是不是一切都好？我们就说这些老百姓吧，老实说，他们的顽固，他们的狡猾与偏狭，那种牛皮糖似的脾气，少有使我们江浙人同情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历史、地理，特别是生产方式这样造成了他们。他们把适合于他们一己利益的口号与标语学了去，把不适合于他们一己利益的推了出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种种方面的要求，是的，正在这样做，但在这个时间，你要痛快，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还有，正如有一位边区的领导者对我说过：“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延安的物质条件是不好的。”我非常欢喜这句坦白的话，惟有坦白与真诚，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延安的物质条件太差，比不上巴黎、纽约、莫斯科，就是连江浙的一个小镇，好比海宁县属的长安镇之类也比不上。我也像陕北的老百姓，来说一说关系我个人利益的小感想吧。在

我窑洞的隔壁与门外，常常有人在半夜谈笑，大声地说话，大步地走路，我们可没有像北京、法京、英京一样的街上警察，在夜晚十时以后，制止这些吵闹而保障人们的睡眠！我也不能敲着窑洞的墙，客气而强硬的说：“同志们，请静一点吧，这是睡眠的时候了！”将来，当大家有了睡眠需要保障的要求时，自然会有办法的，我也用不着头红面热，忍耐着烦躁而过这些黄昏了。

星期日，渡延水，去访看几个朋友。清凉山下，一只破船上，搁了几块跳板，　真正的“跳板”，又薄又狭　每次，许多男女青年学生，挤在这些板上，推呀，挤呀，大家要在同一个时候渡河过去，一秒钟也差不得。你挤我挤，你推我推，小孩子，小脚的妇人，站立不住，挤下河去了，大家哈哈地笑了。你说这些是可爱的中国青年吧，是的，我正觉得是顶可爱的，不管这个是麻子，那个是红鼻头，那个是大嘴巴……我不能不爱他们，他们身上有我切爱着的祖国的泥土气息。你说他们是受教育的吧，是的，他们个个都有坚强的抗日意志，他们受到极好的革命教育，但同时我不能不讨厌他们这种带一点原始性质的行为，有两三次，当他们挤得像疯狂了的时候，我喊了出来：“挤什么？”

总之，一九三八年，这一年，对于延安，以及延安所有的学校，将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延安的门开始大大地开了，吸进中国各地进来的青年　抗大初办

时学员仅限于旧时红军的一些干部。这些青年，来得很多，大都是优秀分子，可是质地的分别是否像米谷样的筛过了般分明，我就不敢说。从本质上去认识人，那么我觉得不能也不曾像孙行者样的摇身一变，一到延安，就脱胎换骨的。但无疑的，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却也带来了许多坏习惯，当他们进入边区，开始发现许多别的地方见不到的特点，优点，同时却也发现一些缺点；在里面的人，隔绝了十年，也十分惊奇的，看见外边来的人，他们虽然并不曾恰恰走二万五千里，但在这十年之中，这些外边的人，他们也在那里走，向着一个目的地走，而且有的人还走得相当的快。于是彼此惊奇，彼此赞叹，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一些摩擦，一些小事故，使大家认识得更清楚了，彼此携着手，再走路，从前走过的路程还着实不够，彼此的优点融成为大家的优点，彼此的缺点，大家督促着逐渐改除。抗战，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呀！携着手走吧。

八月三十一日早上八时，我去参观陕公（陕北公学）。往城外走，延水的声音一下子近一下子远地送进我的耳朵。田野里，高高的是玉蜀黍、高粱，在离陕公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地上种着毛豆，已经结了豆，忽然我想起今年连毛豆也没有吃过，“唉！这个地方是太苦了！今年会连毛豆都没有吃过！”当我的心静下来，好似立在山坡上，望着这一片的黄沙与黄泥上，我不禁有点凄惨起来，“这个地方是太

苦了!"而惊奇我自己到了这样苦的地方，那样地远离我的家乡！在初到法国的时候，我曾经想永远不愿回国了，大约有三年，我的确不想念家乡与祖国，到第四年，第五年，我开始做梦了，见着老母……后来，不相干的人也到我梦中来了，最后的一两年里，就是以前我讨厌的人我也想望见着他们。在延安住了几个月，我也有了这类心情，只要能使我回家乡，任何代价我都愿出，但是，家乡不是被日本鬼子占住着么？那么怎样赶去日本鬼子呢？……我想，尽望着田野。荞麦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些小小的植物，有点像兰草，各色的花，粉红，玫瑰色，大红，翠绿的叶子，像绿宝石一样的绿，红红的根，在热阳下，是那么的艳丽。几只肥大的黑猪，在一座小小泥屋旁懒懒地走，有一只母猪在那里吃东西，胸下一只小猪在吃奶，老鸦在母猪背上走来走去……这一幅米兰的风景，使我惆怅地想起田园风物来，唉！是这样的遥远了！

在一座泥屋旁，我看见有好些青年，就拦住了一位问："陕公是在这里么？""是的，正是这里。"那青年很客气地回答我。"你找哪一个人？""我找成校长。""就在这个山上的窑洞里。"他伸手指给我看。我谢过他，便上山去，把名片交给门口的站岗同志，他送进去，一歇，成仿吾先生出来了："陈学昭女士？"他招呼而又不敢确定似的。"哼，哼，哼!"他笑着（我有点怕他这个笑声，但后来较熟之后，觉得这个笑声是一点也不可怕的，完全是一个自然而

质朴的笑)，领我进去，"有一个客人在里面。"走进中间的窑洞，他对我说。我迟疑住了："那么我改一天……""不要紧的，来，我介绍!"他没有让我说完，打断我的话，领我走进隔壁的窑洞。当我们推进小弄的门，里面的客人也立起来了。"今天上午，朱总司令要在我们这里作报告!"成先生对我说，又将我介绍给他，"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女作家。""请你不要同我开玩笑，"我说。"一点也不……"哼，哼，哼，成先生笑着。

朱总司令，我在欢迎朱总司令的大会上曾听到他说话，那天我的手掌都拍痛了。这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福将。大将风度，确实是这样，在他不笑的时候，是很严厉的，但他常常是笑着的。一点也没有年老的样子，看去不过四十外，我笑着问："究竟几岁?""我也记不清了，五十四吧!"朱总司令说。他这样接近青年，难怪许多青年战士像疯了样的爱他。成校长请吃梨子，朱总司令拿着一把小刀削梨子皮："吃呀。"他指着碗里的梨子对我说。我问："有什么方法使得您能这样的健康?""运动!"他说，又想了一想："当然有许多地方要自己留心!"完全像一个久别重见的父亲，这样对他的子女说话。忽然，他拿出了一个小册子，"请你写几个字。"他对我说。成校长在旁边笑了："你也学会了这一套!"我写："抗日民族英雄朱总司令万岁!"轮到我请朱总司令写几个字。"写什么?"他问成校长，"坚持华北抗战好不好?""好!""不用写日子吧?"他问我，"随便

的。”“那就不写了。”

我说今天我的运气很好，可以听到朱总司令演讲

在山上，什么消息都不灵通，许多珍贵的演讲都因不知道而没有听到——“要四个钟头呢！”成先生说。

下山的时候，朱总司令问我：“德国去过么？”“只经过，”我说，“柏林车站与那个近郊的车站逛了一下。”“是的，那个地方中国人很多。”

这天，朱总司令讲的是关于华北一年来的游击战争。清楚的语句，略带一点四川音，常常用极通俗的字眼来形容日本鬼子怕我们游击队的窘态。屋子里挤满了人，连一点空隙也没有，坐在地上，立在窗口，就是门外，也有坐的、立的，挤成几排。听讲的人，把簿子放在膝头，起劲地记录。朱总司令的精神是这么好，一直讲到十二时过，其中只休息一次，十分钟。

“讲得好不好？”在休息的时间，他掉过头来问我。

“好！”我说。

他天真地笑了。

散出来，成校长留午餐：“午饭后我陪你参观一下。”

他们已经上了山坡，我落在后面，朱总司令回头来望着山下，“哈哈，还没上来！”他说着，笑了。我想总跑不过他们，在他们立定等我的时候就透了几口气。

在当中的窑洞里吃饭，一只圆桌，他们都让座，“太太们应当上面坐。”朱总司令说，成仿吾先生也附和着：“一

定要上坐，你是太太们。”我想，在延安也这样讲究礼貌，可是朱总司令一定累了，而且饿了，干脆一点吧，我就没有再推让，坐了下去。

那天菜只有辣子，连炒鸡蛋里也有青椒。同桌有陕公的教育长　忘记了大名，成校长介绍时说刚刚从欧洲回来的　还有一位有了年纪的受过伤的先生，一只手臂是截掉了的，眼睛也只一只，他们像秋风卷落叶般吃着这些东西　想是行军的关系，这样惯了的　一碗又一碗，朱总司令已吃到第三碗了，大家正在谈饭量。

“我平常吃一碗半，有时两碗。”朱总司令说。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是第三碗！”“呀！我添过两次了？”

吃过饭，在成先生的窑洞里吃着水果，一位男同志拿了无数的小册子来请朱总司令写字：“要请字句写得多些！长些！”学生们的要求。

“钢笔写呢，毛笔写？”朱总司令问成校长。“钢笔写也好！”他自语，于是一本一本写起来。写完了，成先生与朱总司令又交换写了几个字。

送朱总司令出去时，我立在窑洞门外，看着他下山，不禁歆羡地说：“简直健步如飞！”“是的，他顶爱爬山，”成先生说，又指着山坡下几个小勤务：“也最欢喜同小孩们打球，没有一个小孩子不欢喜朱总司令的。”

回进窑洞，坐着谈天，“今天你不能午睡了。”我对成先生说。

"也不是天天午睡的。"他叫勤务去买葡萄。勤务一忽儿回来了："没有！""怎么没有？昨天我看见的。"我很惊奇他这一点小事也要认真说明。因为在延安，我常常见到，更大的事情也总是马马虎虎过去，说明是从来没有的，更不要说是带一点责备的口吻了，那可说是绝对没有的。

午后二时，成先生领路，走下山再上山去参观陕公与陕公高级研究班。陕公的窑洞听说有许多是学生自己打的，很开阔，窗子比较大，实在比老百姓打的好，旁边还有一些像花台似的泥墩。明天，九月一日，正是陕公成立一周年纪念。走过一个窑洞，里面挤满了人，正在装订《陕北公学周年纪念特刊》。"有装订好了的么？"成先生问。"等一下就有一本！"当我们从窑洞那端回来，第一本已经装订好了，成先生接过交给我："这第一本送了你！""谢谢！"我对成先生与窑洞里的先生们说，接在手里，洁白的纸张配着新鲜的油印第一本！这样一件珍贵的礼物，我怎有资格收受，我，一个不相干的参观客人？

往高级研究班，时间正值午睡，静静的，救亡室里有几个人在写标语　　给明天一周年纪念的　　我说想见一位学员某某，成校长托一位学员去邀那个人来，"他睡着没有起来，问校长有什么事情。"去的人来回复。"要他起来吧，他家里托人带口信来了。"

某某走来了，一个清瘦的青年，简直与他的弟妹像一个模型里印出来的。

“你母亲大人记挂得很，要你多多写信去，嘱你自己保重身体！”我把他母亲的口信交代了。“你务必多多写信回去，”我又叮嘱他，“你爸爸听说也要回川了。”

在回出来的路上，我们就谈到了这个青年，“他好吧？”我问。“好，很用功。”“但愿这样！”于是谈到我怎样认识他的家庭。“这个孩子的妈是我爱国里一个老同学的表姐，就是×××的夫人。”成先生有点茫然，他一点记不起这些人了，这些已经做了官的人。“就是从前创办××××杂志的一个，不是也写过好些东西？”“唔！”他记起了，“现在做什么？”“××省××厅长的亲信人。”

“他们到处玩舞女，”我说。睁大眼睛，面孔更拉长了，同外界隔绝了好多年的成先生，舞女这样东西一定使他难以想象吧。“他爸爸到处玩舞女，把妻儿都抛了！”

“呀！那更加难得了，这个孩子！现在是儿子的时代了，不是父亲的时代！”成先生哼哼地笑起来，“是不是？”他问我。

谈到这孩子的家庭，成千万中国这样的家庭映到我眼前来，心里很觉难受，也懊悔对成先生说到这些，真的，我带些什么给延安，还不是些可怜的荒唐的烦人的故事!?

在山脚下，又走了一小节路，于是这位赤着脚，穿着草鞋，严肃的面孔，朴素的外表与朴素的性格，像一个老农，把事业做毕生的寄托的成先生的影子，在我眼前远去了。“平常女子一定怕成先生。”我心里想，然而他该不是

一个叔本华，可是在结婚与离婚的潮流高到极点的延安，成校长听说还是独身。

延安一般人口中常常流行着这样的话：“抗大精神比陕公好，陕公比鲁艺好。”这话未免太幼稚了。好似小孩子说：“岳飞比关公好”或“关公比岳飞好”。抗大与陕公可以称为兄弟或姐妹校，抗大有抗大的特点，陕公有陕公的特点。抗大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正如大家所说的。至于吃苦精神是一样的。在我看，陕公的学员在文化水准上比抗大整齐，成分上讲，也好似比较纯粹一点。特别陕公高级研究班，有极好的声誉。

九月一日，天不做美，下着沉沉的雨，到傍晚才止，透露出一点淡淡的落晖，路上太泥泞不能走，把陕公这天极盛大的集会——有报告，会餐，晚会——只好错过了。

一天午后——三时过了——拿着周扬先生的介绍信到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去找院长沙可夫先生。“沙可夫”这三个字的声音，总使我意想是这样写的（“Sakov”），其实，沙可夫先生是一位中国人，而且还是我的真正老乡呢——浙江海宁人。

“我们虽然是同乡，可是总没有机会见面。”沙先生对我说，一边请坐。一下子，谈到家乡的熟人，于是我就像到了一个老朋友家里那样，舒舒服服地坐下来。

我们谈着海宁，我记起已过的四叔曾对我讲起有这样一位学音乐的留法同乡。“是的，我欢喜音乐，但没有住上

十年，在巴黎住了两年，后来到莫斯科……”我们谈到裳　　不意在两星期的后来，裳终于脱出家庭的牢狱，由香港到延安来了　　的一家，是沙先生所极熟悉的，他像一个老书生似的摇起头来。

小勤务开上沙先生的晚饭来了，留吃晚饭，鲁艺教育长徐一新先生，一位看去十分精明能干，外貌像一个军人，一同吃饭。吃着鲁艺出名的艺术饭，小米同赤豆一起烧，很烂也很香。这类赤豆，就是南方用以煮烂做甜食馅子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延安市面上没有这些豆子出售的，别的机关也不见吃赤豆饭。

吃过饭，沙院长领我去参观。这时候，学员们有的在山下一个大坟场上散步，窑洞里很少有人，偶然间遇到那一对西安同日登车来延安的夫妇，先生有一脸胡子，太太是个长条子，走起路来，像一个男子，他俩现在鲁艺文学系。当我参观完了回下山来时，有些戏剧系的学员正在坟场的一角排演戏。

鲁艺现有戏剧系、音乐系、文学系、绘画系。这个学院够得上为世界上最困苦的艺术学院，也可以说是最不艺术的艺术学院：生活与抗大、陕公一样，军事纪律化，也一样的吃素菜，小米；可是延安有些人已觉得他们太艺术化了，太散漫不紧张或太浪漫了，这是曾在道听途说之中得到的。学员们住的也是窑洞，与陕公抗大一样，十多个人挤在一只土炕上。没有戏台，没有音乐厅，也没有画室，

排演、演奏……都在露天。

鲁艺的戏剧——戏剧系与实验剧团——他们的话剧，在技巧上值得称赞，特别是布景方面，往往用的是极简单的物件甚至于破东西来做成的，却是那样的动人。布景的负责人听说是从上海来的，一位嵊县人，钟敬之先生，我确实佩服他的细心，认真，这是一位后台的不出面的英雄。

技巧是较好了，好戏还是少，缺少好的话剧脚本，也缺少话剧角色。但有一个特点，是不能忽略的，鲁艺的戏，他们的确做到了莫利哀（Moliere）所说的："戏剧是在人们的娱乐中改正他们的缺点。"（La comédie est le corriger des fauts des gens tout en les amusant）所以不是纯粹的娱乐品，换句话说，是教育与宣传的武器。有一次，在晚会上，看到演什么寺（我真正糊涂，已把戏名忘记了），内容是在河南的一个乡村里，汉奸利用人民的迷信，利用寺僧来做活动工作。在内容与结构方面都好，因为曾有这样的事实，所以内容是充实的，演员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又有一次，我看他们演一幕短剧（独幕还不知是二幕三幕，忘了），演一个意志薄弱的工人，被诱被逼做汉奸，放信号，在敌机轰炸中，他的好友一家被炸死了……情节是动人的，也可能真有这类的事情，但工人与他的好友的对话太长了，这种字眼的玩弄（jeu de mot），好像英国的低级小说里所常常用的——为使读者觉得滑稽。在巴黎，我曾两次在不同的戏院里看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wski）的

《罪与罚》，每次都使我觉得不痛快，总是为了那个大学生（犯罪者）与法官的捉迷藏式的对白太烦人了，那次短剧也犯了这个毛病。

中国的一般群众是不爱话剧的，话剧还是“五四”以后才有。最近几年来，在上海一带更热闹一点，它比较还是被知识分子爱好着，民间只会理解京戏与各种带地方性的剧种和杂耍。但我觉得不应当太迁就民间，反把戏剧的大路弃了不走。对于戏剧帮助动员民众，那我想鲁艺的剧对于老百姓一定及不上民众剧团 文协会主办的，由柯仲平先生带领往各地演出的 受欢迎。民剧团演秦腔，我曾看过他们的《好男儿》，虽然粗糙一点，可是老百姓是爱好的，我想鲁艺尽可以把话剧稍微艺术化一点，不要太迁就民间。

在延安，从事学习话剧的人听说有相当的苦闷，为着时势的需要，大鼓、相声、各种杂耍……都变成极受人欢迎的娱乐。艺术家，在延安，就是会唱大鼓，玩杂耍的人们，他们被一般人活宝似的捧着，变成 Homme de jour[①]，是不是有一技之长能娱乐人们的这类人就是艺术家？我想一定有人在思索。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然，话剧工作者们也不用苦闷，“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话剧研究者们拿出些东西来，给人们看看怎样是理想的艺术作品，或者庶几乎近矣！

---

① 法文：意为“每日要人”。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的新年里，延安第一次演歌剧《军民进行曲》。街头贴着动人的彩色广告，在第一次预演的那晚，蒙老乡沙可夫先生来领我去看。

从内容讲，太简单，至于台词，没有印发本子——演歌剧，印发谱与词怕是必需的——听不清楚，音乐方面，歌曲是冼星海先生作的。那晚演姑嫂的两个女角，太没有嗓音了，曲的本身已是低音，而她们的声音又只半音。老头子的声音还宏亮，但欠圆润。还有一最大的毛病，唱与动作配合不起来。演完后，他们当场请观众批评，先请丁玲女士，丁女士推让了一歇后，立起来，说她过天送一个书面意见，再请她说，终于说了："……音乐太带一点洋味儿……"接着请一位会唱大鼓的吕什么先生（不知他的大名）批评，正在那时，我就走了。

歌剧在中国是没有的——在上海，听交响乐也只好往工部局市政厅去——，如果勉强要说它有，那么算是昆曲吧？可是我不同意，昆曲，清唱多于扮演，那些内行人都得承认的，虽然《牡丹亭》、《长生殿》……都可以扮着唱，可是一般人爱它，还是欢喜独个儿在眉月下，天井里，"天淡云闲……"这样哼哼的味儿来得深长。

我觉得《军民进行曲》的情节比土气十足的《农民曲》还不如，固然，《农民曲》里的歌曲是东拉西凑的，好似青菜豆腐汤放肉片……《军民进行曲》是一气写成的，是一位作曲者的心血；为了急于上演，仅仅费了四天工夫，应

该珍视作曲者的努力，与迅速的创造力。看过瓦格业(R. Wagner)[①] 的歌剧，或者，还是说近代的特彪西(C. Debussy)[②] 吧，被苏联的人民这样爱好着，怎样使西方的歌剧，有一个概念（Notion）。中国的作曲比以前是进步了，但还不能表现中国民族的伟大而庄严的灵魂——像这次抗战。在《军民进行曲》里，我期待一个忿怒，一个惊恐，一阵暴风雨样的声音，但总没有。缺少气魄，而觉太消沉一点。但这些，也得原谅，没有一只钢琴，不要说大提琴、小提琴与竖琴了，总共只有一只可怜极点的小风琴，同一些中国的旧乐器。

文学系里有近五十名学员，每次招生，来考的人总是很挤，听一般青年口中的谈话，延安好似流行着这么一个风气，不进抗大，就进陕公，不进陕公，就进鲁艺；不学军事，就学政治，不学政治，就学文学。“延安大小有二百多个诗人”，到延安三四天后，一个熟人对我说。我真的吃惊了！鲁迅先生在遗嘱上劝人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学文学，我想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志们一定更加能珍视鲁迅先生的遗言。

文化水准太不齐，这是常常听人讲起的，“改卷子的工作实在太乏味了，一篇简短的纪实文字还不很能写，怎样研究文学呢？”

---

① 瓦格业，德国作曲家、文学家。

② 特彪西，法国作曲家。

我没有索看鲁艺的章程，可是我想，当然同抗大、陕公一样，应抗战的需要，实施国防的艺术教育。我曾听一位边区文化界负责的人说：“培植那些小说家，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只要是能够接近群众……”好像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不是把一般人对艺术的理解提高，却是把艺术本身拉下去，以求适应群众的胃口。我也相信，对于帮助抗战中的动员工作，一定是很好的；实际上，学习的时间只有六个月，在这短促的时间里，要有怎样艺术修养也是不可能的。

胡考先生，这是一位聪明绝顶，极有天赋的中国漫画家，去年八月中他同陈依范先生来延安，曾举行了一个速写展览会，后来被鲁艺留住，在鲁艺的绘画系任教。在未来延安之前，他曾有一个极大的对于向国际用绘画宣传的计划，可惜因为人事上的更动，没有实现。他的计划是召集全国画家征求抗战画，这样一来，无疑地把全国画家的心血集中了；再组织一个会，在这许多画中选出若干幅，把这若干幅送到世界各国去展览，展览会的名称，不妨用中国现代画展览会　在苏联不妨公开用中国抗战图画展览会，同时把展览的画印成册子，向观众募捐。这是一个极好的办法，因为人们捐款，往往欢喜带一点纪念品回去，这小册子的销路一定很大，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方法。可是这样的宣传工作，不是一两个人能力所可负担的，必得有组织地由国家去领导办理。他这个计划，我十分同情，当

"一·二八"时，我在法国，实在那时是我国最好作宣传的时候，但我国一点也没有做。有几位同情我国的大学教授与新闻记者，他们对我说："我们诚恳地说，中国太不会做宣传工作了！"我至今想起，还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在星期日，胡先生常到我这里来午饭。"长久没有吃油了，今天要到你这里来加油呢！"他幽默地说。有丰富的上海生活经验，加上天性富于幽默，他的对于各种事物的轻松的讽刺（Humoristique），使人百听不厌。能说一口极流利的英语，一个朋友说他的英语是极漂亮的，极英国化——绅士派——的。

在整个精神上讲，我觉得鲁艺一点也不能说不好，有些地方要"就事论事"。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能比得上鲁艺那样谨严的艺术学院。艺术者的生活与习惯，因了工作关系，有些与别种职业者不同的地方，虽然，我顶讨厌一些艺术者们故意夸大他们这些不同的地方，我想或许不止我一个人会起反感。一个白天有五六小时安定工作的人，他没有理由可以睡晏觉，到日高三丈不起来；可是，一个工作多到极点，早上二三时才得睡觉的人，如果睡到白天七八点钟，他的睡眠还是不足的。在晚会的时候，人们被台上的戏大大地感动了，用力拍着手；到次日早上，人们知道或看见鲁艺有些人到八点钟还没起来："这算什么？在延安，他们这个样子！"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昨夜的晚会到十二时才完，演剧的人回去已

一时过了，夜夜这样，或接连几夜这样，不比看戏的人难得为消遣而迟睡了一夜。艺术者的工作是消遣别人，而在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消遣，这是第一要认清楚的。看他们在台上演戏，看的人非常受感动，快乐，拍起手来，但做的人并不快乐，他们的动作在他们是极严格的，像化学公式那样。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听琴的人被美好的琴声感动了，弹琴的人，他注意音调、拍子、节奏、手的姿势。背痛，手酸的结果才弹出一曲被人们觉得很好的音乐。

在目前情形之下，鲁艺还不能负担起号召全国艺术界来建立新中国的艺术使命——他们本来没有这么想——为了缺乏财力与人力，师资方面，及学员方面程度的不整齐。在我，我觉得提高是好的，固然不一定要培植那些小说家，但又何必一定拒绝培植呢？

七　工作与技术人员

朋友们欢喜知道，在延安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着的？特别是对于工作，人们是怎样做着的？他们对待技术人员，又是怎样的？延安的生活，我留在以后絮絮地谈吧。这里谈谈工作与技术人员。可是，我得声明，第一，我没有在延安工作，工作深层的优点与缺点，我是看不出来的。并且我所到的地方，到现在为止，只是延安，前方天天有许多壮烈的惊人事情，我见不到；第二，我不是技术人员，所以，这些话一点也不能算观察，只好算是拉杂闲谈吧。

到延安的第二天，住处的一个邻近机关里，一位八路军的老干部——是个技术人员——对我说："这里工作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当时我吓了一跳，工作方式不

同，那对于我，可以不去管它，生活方式不同，那可不是糟透了！在延安一天，我当然要生活一天，吃饭，睡觉，……都是事实，这个不同方式的生活，我是无可逃避地要和它发生直接关系的。实在，并不是我在这里“正名”，从工作与生活的本身上去讲，那么工作总是工作，生活也总是生活，不过怎样可以达到工作的目的，与怎样取得生活的方法，是有些不同就是了。

在这里，一个人的工作是用政治教育来代替了薪金的鞭子，每个人，无论担任哪一种工作，都可以自豪是为着革命而工作，为着抗战而工作。他们有组织的人，要遵守极严格的纪律，在后方——这里称延安为后方——党员与非党员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区别与分歧，但在前方，听说艰苦的事情都由这些组织的人去担任，就是他们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精神。在急难的时候这种精神鲜明地表露出来，有一位曾是山西民大的教授这样对我说。如果犯了错误，就把本来担任的重要工作降下，给他一个不重要的工作，一个政委降到马夫，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想，这种责罚，只有对于有工作爱好心的人才会发生效用，使其精神上感到苦恼，如若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做马夫吧，也好，反正吃饭、穿衣、住处，这是一样的，就是他的爱人与子女的生活一切也有人替他们安排得好好的，他是什么也不用担心。在这里，最大的罪是死罪，——汉奸重的是死罪——死罪以下，就没有什么可怕

的罪罚了，大不得了时，就是请他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去住一下，但还不是像在机关里工作一样，吃饭，穿衣，住窑洞。往往在清凉山住了些时下来，他们的文化水准比从前高了些，因为在山上，有人教他识字。这是人道的感化教育，我衷心深深地赞同。这种感化的教育精神，正像苏联作家 Affigevou 在他的短篇《Hisa Sarokina》里所写的，也是那个有名的影片《生命之路》中所表现的。

这里的高等法院，虽然离开我住处不远，但还没有机会去参观过。在我住的山脚下，有时看见犯人在修山路，他们个个十分强壮而毫无拘束。我有时傻想，犯错误的人，有时可以请他上清凉山，或者降他工作，但假如有些人，他们并不犯错误，可是也不起劲工作，你批评他吧，他笑笑，那不知道怎样对付？在这里，坏人是极少的，虽然不敢说没有，外人所常常笑的“同情的懒坏”，恐怕也有的吧。如果有一些人，不在工作本身上努力，并不替整个的团体利益着想，不从正确的路上去爱护群众，却只一味去乱讨群众好，无是非的只求适合群众胃口，那样的人不知用什么法子对付？如若有一些人，他“一条裤子一根绳”，政治教育，他不理你，请他上清凉山吧，“好，你尽管再送我上清凉山去。”那又怎样对付？当然，这类害群之马的人，是到处有的，在最好的政治之下，“没有饭吃的人给他们饭吃，没有工作的人给他们工作”（加德林第二女皇的话）的地方，这类的人还是有的，他们是费露特教授研究

的对象。可是这类人，他们会冲淡了严肃的工作空气，只会在纯洁而善良的人类集团生活中起破坏作用，所以必得想法子对付的。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劳动纪律这样东西，平常一个工人一天做工几小时？机关里的公务人员一天工作几小时？学校里的教授与技术人员一天工作几小时？我不知道。我看起来，在这里，当然做老百姓是最幸福，只有他们的是，没有他们的不是，做工人，也是最幸福的。这里的劳动力是这样缺乏，他们可说是八路军的独养子。就木匠与打窑洞的工人来说，每天工钱四角，饭食每天三角，七角钱一天。这些工人，他们不愿领三角钱饭钱，常常一定要雇主供给饭食。他们的食量那么大，一个工人每天要吃三十两小米（小米每三十斤四元），工人们的架子是很大的，技能呢，并不高，可是他们的工作，却还是很俏，真应用得着这句欧洲俗语，“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的是帝王。”劳力神圣，普通劳力还缺少，更不用说技术劳力了！

在我住处附近的一个机关，他们雇老百姓开窑洞，我常常从那个山弯里走过，看他们做工，同他们搭话，他们的原始的狡猾往往使我好笑，当我说他们好，称赞他们时，他们句句不懂，当我说他们调皮等话时，他们句句都懂。也有时，他们在我门外一带走来走去闲荡。早上，他们在早饭之前，是不动工的，因为没有吃饭；吃过早饭，又得抽几筒烟，抽过烟，才慢慢地动手，一个人挖泥土，一个

人倒泥土，两个人站在旁边看，说是帮忙做，这时候已是九时过了。到十时，休息，等吃午饭。乘着暖和的太阳，在太阳光下，脱下短袄来捉白虱，一个又一个，出神地夹在两手指甲间弄死。午饭后，又要休息，有的还要去“打个火”，到三时，吃晚饭，吃过晚饭，更没有工作的理由了。总算起来，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不过三小时，而这三小时的工作，又是未曾用出气力来好好地做的。小时候，在家里，听老年人用这四句来笑不肯念书的人：“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夏去秋来冬又到，大家快活过新年。”陕北的工人，倒可以借这四句来送他们。“春天不是做工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大家快活过新年”。如果你催紧他们做——在这里是没有人催紧工作的，大家是那样客气而体谅——他就会这样回答你：“你这个事儿我们干不了，我们要回去。”你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婉和恳求他们，因为除了他们，你有找不到别人的危险。

就是在那个机关打窑洞的时候，我曾去商量要了一个工人来给我打个小灶头；而工头偏偏送了两个人来，我说只要一个，他说一个要砌三四天。一个工人懒懒地做，一个工人站在旁边看，在我的窑洞里这样的一个小灶头，就在土炕口接出来，其实很容易的。我画了一个样子给他们，他们不肯照我的样子砌，锅子与火灶砌得隔离太远，火力不能上去，“我们这样灶头砌过几十个了，你懂什么？”当然我该承认我什么也不懂，只好听信他们，结果不能够烧，

火力不上来，又改砌，还是不能烧，冒烟。这样一个用泥与石片砌成的灶头，费去四工，午饭后我等待他们来，见他们笑微微地从我门外经过，“去打个火！”我不懂，以为去取个火来抽烟，老等不来我就寻过去，找到山顶上，一个机关的栈库里，他们在那里睡午睡。我把他们叫醒，他们不情不愿地下来砌灶头，表示十分忿恨，如果，我不催紧，不知他们睡到什么时候才下来，更不知道他们要做几工。这个小灶头实在使我生气，花了好几个钱，并不能烧，特别是那个机关客气，没有让我自己出钱，我从来没有用过一个不劳而获的钱，更是公家的钱，弄得我夜里睡觉也不安。

十一月初，陕北的气候已相当地冷了，下过一两次小小的雪，有的人已穿上新的皮军装，棉军装，但是我把旗袍上的皮拆下后找一个店铺做一件皮的上衣，一条棉军裤，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法兰绒衬衣，绒衬衣绒绳衣……所有可以保暖的衣服都穿上了身，外面套一件单布军装。找遍了延安市，没有一家裁缝店肯接受我的衣服。“钱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还要同他们讲人情”，我拉住一位原籍山西的女同志，看见她做成了一件皮上衣，请她领我到她熟识的裁缝店去，那家裁缝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她先为我介绍了，接着说了一番好话。店主人老皱着眉头，好像我们在同他商量借债，“现在没有空，”他回答。于是恳求他：“老乡，你看一下，这么冷的天气，她还穿着单衣。”他笑笑，“这

不干我事！”实在，他这话是真实的，我冷，干他什么呢？因之，我觉得难为情了，要这样求恳他们。末了，他说为了看同乡面上，要我们在三星期之后拿去给他做。“我们今天就将它留在这里吧，请你千万在五六天内抽出工夫来做一做，做得马虎点也不要紧。”“不，绝对不能！”他连连地说：“绝对不能！”我想只好把衣料拿起走，可是那位女同志示意我放下，她轻声说：“放下他总会做的。”过了四天，我走过那个地方，去望一望。“你赶快拿回去！不能替你做，三星期也不成！”他太使我难堪了，因此，我忽然想，这些常常为我讨厌的海宁人，杭州人，如果在陕北有这样地方人开的一家裁缝店，说不定他们会给我一点老乡的情义而抽出时间来替我做一做。北方人是这样讲同乡感情的。偶然在街上遇到一位江阴人，他是在防疫队工作的，讲到棉衣，他说：“有办法，我介绍你到缝衣合作社去！”“没有用的，缝衣合作社，我早去过，而且借了一个团体名义去的，他们太忙。”“不会，我与你不同，我们替他们打过防疫针，有时候，他们生小毛病还要来向我讨药……你跟我去好了。”我似信不信，跟了他去，果然，人情到底路路通，答应在三天之内给我做好。说到工资的时候，那个江阴老乡很精明地还价，带着杭州口音的工人说“不管外来的，里面的，八路军有的也有钱！”这句话我好似觉得刺耳，虽然我不是八路军，但八路军的没有钱，他们的穷，是我亲眼目睹见到的，这位合作社里的工人说出这样的话

来，太奇特了。在延安，的确如那位女同志所说，许多地方，钱是没有用的，还得讲人情，讲人情并不是不好，在人类社会，当然有人情这样东西，可是，我还有更进一步的希望，希望现在这些人情都变成办法，不但一两个人能享受，而且人人能享受。

工人们的嘴巴是非常厉害的，有一次，在我窑洞的附近，我看见一个木料合作社的工人——或许是经理——与一个工作同志吵架，后来知道那个同志是外来不久，正在替一个机关办什么事，做了一个柜子，讲好是十五元，要做得道地。等柜子做好之后，买客觉得做得不好，说工人没有执行他们的预许，钉子的脚露在门外，人在柜子边走过，衣服给钉脚拉破了，只肯给拾元，除非木料合作社来把柜子拿回去，或者，至少把钉子的脚设法不弯在外面，那么仍给十五元。合作社方面允许把柜子拿回去换一扇门，或者把柜子的脚弄好。可是没有执行诺言，从他们双方的争执中所听出这事的经过。

"把五元钱拿出来！"

"现在我早已报过账了，你们为什么几次三番失信，约定的日子，不来拿柜子，害我白白等待你们，不能做别的事。你评个理吧：最后我那天在路上关照你过了，又不来，我要报账了，在这之前我等你们，你们又不来。"

"我们哪有工夫，跑来跑去走十五里路呢！"

"那我就有工夫天天等你们来拿柜子！我只知道公事

公办。”

“不成，把五元钱拿出来！”工人喊起来，开始骂了：“好，你这样认真，你不要拿出汉口的那种对待工人的脾气来，你看吧！”最后，他威吓这个同志：“你不拿出五元钱来，也好！我们向边区政府告状去！”

我不知道这场吵架是如何结束的，如果告状，我倒很欢喜知道这个官司的结果是如何的；我又不知道这位吃官司的同志心里起些什么感想，为了省公家五元钱，弄到吵架……或许他要消极的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好好把五元钱给他们，管什么这个柜子做得好不好，反正又不是自己的钱，落得慷他人之慨，倒也讨人说句好话：“这个人的脾气好！”可是对于这位吵架的工人，我却有一点感想，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我不禁想，他们对于这里的一切机关应该看做是自己的家，何以他们同固执的老百姓一样，对于公家的一切总是取那样对立的态度？他们是不是该这样工作？他们的利益何在呢？

从各种人的口中，听说延安的模范工人，要算印刷厂里的印刷工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全世界，印刷工人总是站在最先锋，他们如机械工人一样，文化水准高，敏捷，灵活，也能彻底了解他们自身的利益。印刷厂里的工人，他们在黑暗的排字窑洞里，工作时间超过任何普通工人，并且有时为赶印一本书，做加倍的工作。

延安的烧饭大师傅工作，恐怕也够算得上最艰苦的工

作，在那些人数有几百以上的大团体里，像陕公，抗大……学员们六时多就吃早饭，烧饭的同志在极冷的冬天，他们也须在早上三四时起来烧饭，虽然烧的没有怎样好的味道，但他们终究每天做着分内的工作，没有偷懒。他们连星期日也没有，只有在新年或节日，学生们为体贴他们而代替他们烧一两天饭。

在这里，有些工作特别能迅速地得到人们的承认，哪几种呢？会说话，会唱，会演戏，末了，恐怕就要算是会写。说这里是文化人的天堂，一点也不算过分。若以他们所享受的荣誉来比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当然是赶不上的。

在后方，工作最忙的人，当然是那些负有重责的人，听说他们经常做着过度的工作，也有抱着病依旧工作。“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鲁迅先生曾经这样写他自己，在这里倒也应用得到。因为他们平日所取，又是些什么呢？所取的东西，比人们少。

这里的工作，有他们的特色，如果用延安的新术语，就是有“特殊的作风”，工作不是受命令的强迫，却是自动而活泼的。固然有些人忿慨，延安也有一些整天吊儿郎当，什么也不做，倒也吃一斤二两小米，五分钱菜一天的人，自然，饭该给好好工作的人吃的，对于这样白吃的人，谁也莫敢奈何他。这种吊来吊去的人，固然是无法对付他们，只好希望自然淘汰他们，但是我觉得可担心的，并不是在

吊来吊去的人本身上，却在乎他们的懒菌要传布到人群中去，恶劳好逸也是人之常性，所以极少看见懒坯跟勤快的人学得勤快了，却只易看见本来勤快的人跟懒坯学会了偷懒。这种自动工作的方式下，固然有些白吃小米饭的，但是如果是能干的人，有才能，肯负责，那么他如果埋头工作，就使他不愿被人们注意，人们却还是会认识他的真价值，很少会被埋没着的。

这里的老百姓工作，也与外边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工作也是非常活泼的，三四十岁的男子，一边哼着陕北调，一边作着工，悠哉，悠哉，我真的羡慕他们。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们的活泼，好似太过分一点，太不像样，太不真实，好像三四十岁的妇人，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的活泼。在我住的山脚下，附近一个机关在那里盖一座泥屋，当我每天在窑洞里感到头昏眼花时，就出窑洞来透空气，看造泥屋，一个月，一个半月，看这些老百姓工人们，嬉皮哈脸，老在打诨，一个人在屋顶上糊泥，另一个人拿泥给他，当屋顶上的人伸手来接时，底下的人又把泥缩回来，这样嘻嘻哈哈尽笑尽闹，好久好久……常常在窑洞门口，看见一些抬着病人的人，把病人放在半山里，他们打架开玩笑，彼此投泥石，真使我看得要发神经了！事情不当事情做，我顶恨，这固然本来是中国人的特性，外国人也早看出了中国人这个特性，所以辱国的条件都是在酒宴席上签字的居多。把工作当玩笑，玩笑当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

开玩笑，什么时候该工作，工作与玩笑不分开，陕北的老百姓更甚一些。我特别为陕北老百姓的原始的狡猾性格，觉得难堪。有一次，我叫老百姓洗一条绉纱被面及夹里 是一条丝棉被套子 ，拿回来的时候，两幅只剩了一幅多点，两边两头都给他们剪掉了，变成四方形，小得只好做一条桌布用；又有一次，要老百姓做一个锅盖，交涉了几次，他们总不肯照他们自己所做的法子做，“我们保险，”他们说。但他们自己为什么偏偏做得那样讲究！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并不如我所想象的愚笨，不过他们对军队不好，总有一点对立的观念，为什么他们给自己做的东西总很讲究，至少是尽他们的力认真去做，而对机关里所做的东西竟好像故意开玩笑不认真呢？因为老百姓是这样的脾气，恰恰与我个人的脾气相反，一尺是一尺，一寸是一寸，差不得毫厘，可是在这里，我的脾气却要到处碰壁的。随便什么事情，什么计划，实现起来，都得打折扣，因为老百姓不肯依照你好好地去做的。阴历的年夜，我睡得很早，大约十点左右，听门外有好些人声在喊：“拉到了没有？”我想，这个时候，会有狼吧？把电筒往自己窑洞里照了一下，就不去管了。过了几天，才知道，我邻近的有两个没有门的窑洞里，住着七个青年，那晚他们大家出去了，回来，被子都不见了，只剩了空窑洞。再看看隔壁窑洞里住着的做工的人，也不见了，追出去，总算运气好，追到了。可是对于这几位证据确实的洞里君子，大概

没有什么责罚。在有些地方，从前，听说有军队欺侮老百姓，但在这里，却给人有一个相反的印象。

今日边区在工作上所存在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一切办事机构太不科学，我这句话说得太老实，太不客气了，　但是我想说老实话的人未见得是坏人，我还是显露我的真面目吧　或者有人要不高兴我的话，如果我说“一切办事机构太手工业化”恐怕倒有好些人首肯的。其实，手工业化，就是不现代化，不现代化，就是不科学化。这是一。其次，有些办事方式，还是军队化，有些下级干部只认得一个头儿，一个人的命令。好比一个与军队毫无关系的机关，譬如这个机关里的通信员吧，他只认得这个机关里的主任或什么长的信件是要紧的，其余的人的信件都是不关紧要的。这是二。第三，机关与机关之间连接不起来，就说一件小事情吧，我想讨几张文协会的文艺工作团带回来的照片，八路军政治部谭政先生给了我一封介绍信，但是接洽的结果，好似没有一个人能负责地给我几张照片。因之介绍信还放在我的日记册里，而我不知道究竟怎样办法可以弄得到那几张照片。

一般人认为行政，事务，管理这三件事情是这里工作的薄弱部分。这里缺乏行政人员，就是说缺少官，这怕是一个事实。这里所需要的官当然不是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也不是那些贪官污吏，说官话，摆官架的官，而是真正能为国家行使权令，替人民谋利益，负责，耐劳，吃苦，克

己那样的官。说到事务与管理这部分工作的缺陷实在碰到了这个基本的缺点：太不科学化。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缺点呢？譬如一个人要领两斤炭，照理，这个事情他可同总务科讲，或同事务科讲，或同管理科（可讲的人太多了，反而没有一个人负专责）讲，结果他统统都讲过了，两斤炭总是领不来，总没有地方可去领，最后，他大胆的去信请求部长。这两斤炭也要闹到部长的办公桌上，那么这些总务科事务科可是做什么的呢？事务与管理上的弱点，听说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工作部门，很有些犯过错误，或在道德上有些缺陷的人。为什么放这些人在那种工作里？是不是认为事务工作是不重要的？还是缺乏人才？在我看，在今日边区事务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说别的，还可以影响到统一战线。我可以说，好些机关里的收发都是不大负责的，信件的迟到与失落是常事。他们这些收发与通信员，有的从七八岁起就跟着军队到处行军，没有家庭，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从来收不着一封信，也从来不寄发一封信，对于书信的尊严与宝贵，他们是不会理解的。那么还得原谅。

有人一定很好奇，这里有没有贪污？这个，我不知道，不能肯定地回答。但照人情上讲，特别是爱钱如中国人，——我自己做了中国人，却不能不很悲哀的承认外人对中国人的这个意见。既然这里也是中国人组成的一切团体，社会，那么贪污，也许可能有的吧？贪污要在人类社

会绝迹，不知道还需几世纪。中国的老话："钱不过手"，还有一句，"红萝卜上了蜡烛账"，前者形容贪污，后者形容糊涂账，……这些事情，在我极小极小的时候，家庭里我也看够了。大约极小极小的时候，这类事情我见得太多，贪污与糊涂账特别令我起反感，到欧洲，我看见外国人的账，父子之间连一分钱也算得非常清楚，如果做交易买卖，就说明有几扣几折，非常坦白，非常对，只能这样，才能减少贪污。我没有什么处世的经验，只好说说管家的一点感想，回家后，我理想中，要用一个不落钱（上海人叫不揩油）的女工，我宁愿出极大的工资，最高的女工工资，我出过十二元一月，（那是在抗战以前）可是她还是要揩油。许多许多的碰壁事情之后，我改变了观念，觉得贪污，对于人类，只能容其相对的存在。在一定范围之内，只好任其贪污，相对的算不贪污，过了一定范围，那就是贪污了。佣人的揩油方式是很多的，男佣有男佣的揩法，女佣有女佣的揩法，普通我认为揩十分之一的 一元里一角，百元里十元 还不能算是黑心，竟还可说是清高的呢。几年的管家经验，我曾把人们的贪污心理大大地研究了一番。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有许多旧习，它就是叫人贪污的。譬如一个佣人，或者一家公馆里的外账房或内账房，他即使不揩油，人们也强迫他要接受些非分的钱与物。谁都知道的，在浙江，江西一带，譬如你买柴，柴主人必得送一笔钱给佣人，在你经常买东西的店铺，绸庄，肉店，

水果店，……佣人到节年可以去向他们取一笔钱的，普通在百分之十以上，三十元柴，佣人可以拿到三元多　在江西，甚至于做一件衣服，佣人可以到你做衣服的裁缝店里去拿钱。有些人迷信发票，其实店家写发票就是听从买客的主意。小时候，我总要记起那个老实的老仆，当他来同我放晚学回家的时候，到南货店里买花生吃："花生一角！""包九分呢？八分？"（在以前是"二百六十呢，二百八十？"）"包十足！我们自己吃的。"

这里贪污事情怎样的？我不知道，不过就是有，我想一定不多，数目也没有其他地方的大吧，这个，自然也不一定的。譬如一个经手打窑洞的事务人员，他经手挖六十个窑洞，又譬如每个窑洞挖工二十元，他若吃五元一个，六十个，就是三百元。三百元，这个数目，在这里也不能算小了。

把有些个别犯过错误的人放在事务与管理工作岗位上，这是因为在上者表示君子不念旧恶，原是很好的，很人道的，知过能改，等于无过；但若如有些人他知过而并不怎样能改，则如何办呢？这些事务工作，需要负责做的，譬如一个马夫，听听好像只不过是一个马夫，但如果他做得不好，譬如不给马吃饱，马会生病，瘦下来，甚至于死亡，看看是一头畜牲，倒也值一百多元钱呢！又譬如，有一匹马已经指定给一个工作人员骑，而马夫同志虽然不能同直属的上面人发脾气，可是他，常常用他的脾气发泄在旁人

身上，高兴给匹马你骑骑，不高兴骂你几句："吃大米饭，还要骑马！"你怎敢奈何他？"好！你们可再请我上清凉山去的！"……事务工作做得不好，会弊病百出，人事上的摩擦，可以弄到无休止。我想有些个别的这类分子，最好请他们做些可以不负多大责任，不用心脑的工作，如生产工作。生产工作，并不是一件苦工，最近在当局号召之下，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工作。

有些人说中国人办事只能用中国法子，难以科学化，何况在这里，农民成分居多。这话我不以为然。如若这样，那我们中国还要什么革命的抗战呢？我们永远不能希望变成一个现代科学的农业与工业国家！我以为什么都是训练问题，不过训练是有一个开始的，这是一个不能避免的阶段，而这个训练的开始，比较困难一点。中国人是不是绝对无法训练他们办事科学化？我又不相信，我以为是可能的，只要训练，我常见许多替外商做事的经纪人，他们的办事都会变得十分精明，能干，公事公办等等；我也常见外国人家里的中国厨师，他们会十分清洁。关于这方面，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

要使工作做得好，固然是要依靠政治教育，可是另一方面，我想赏罚分明，也是一个附带的必需条件。如果只有赏，不足以警戒坏人，如果只有罚，不足以奖励好人，赏罚必须并施，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看着陕北的老百姓，我总要想起《左传》中《子产论政宽猛》中这几句：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我的观察也许是不对的，也可能那些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人，看法会与我不同吧?!

我想，无论一个团体或一个机关，要本身工作做得好，第一当然要有正确的目标——政策也可说，接着自然要有贤明的领导人，负责人，第三就是群众，这是不用说的。在上（领导人）与下（群众）之间的中级干部，却是工作的成败主要关键。因为中级干部是执行者！中级干部如果不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上面所给予的使命，完成他们所负担的任务，那么事情就会弄糟，发生一种可怜的现象，或者中间人做了一垛隔墙，把上面人的耳目蒙蔽了，——关于这个，中国人民是很够有苦痛的经验了——他只在上面人之前，把他好的一点尽量表现出来，使得上与下之间脱了节。一个团体有正确的目标与贤明的领导还不够，还需要团体里的分子好。如果团体里的分子平平居多，那么会发生一个可怕的现象：上面的人要跑，而中下的人却拖住不肯跑，要歇力，变得要上面的人拉住了他们跑。这样，领导者将是多么的费力啊！一个团体所需要的分子——它的细胞——的条件，该是相当的复杂，可以分为纪律与事业两方面。忠实于团体的组织，不破坏，不出卖，临难不苟免，勇于牺牲，这是好分子，可是单单依靠这样的分子还是不够的，团体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个乖乖的孝顺儿子就

完了，固然在纪律上，这类分子尽了最大的贡献；团体还需要一种有眼光，有远识，有特长，能容人，能用人

我所说的用人，并不是如有些人说的："这个人你可用他，那个人我可用他"，把人当做工具、楼梯或踏脚使用，却是以团体立场来谋整个利益　　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使团体的事业扩大，优秀分子不断地加进团体。总之，在团体的正确领导之下，敢于有所作为的分子，这种事业的分子，是特别来得需要。

这里对于政治的忍耐力可说是惊人的，但他们对于人事，有时好像比较容易烦躁。我不知道那些科学的革命理论对于那些人是怎样说法的，可是我只记得小时候听过读过的故事，历史小说，与《纲鉴》，及那些史书……我还记得《秦琼卖马》，《萧何月下追韩信》，与太史公的《史记》，"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我想司马迁不是徒然掉掉笔头，其中有些道理。

现在来说技术人员吧。在四川时，曾听一位在延安学习的学生家长说，延安对于技术人员，欢迎是欢迎，但是很怕的，他们怕技术人员。为什么呢？说是技术人员吃不了苦，而且太难对付了。这个，使我觉得很好奇的。"大盗亦有道"，我又要这样想，难道技术人员是这样一种可怕的东西么？在延安，也常常听得到有人对于技术人员说这样的话："我们已经给他们吃大米饭，给津贴，尽力优待他们，这里物质条件困难，哪有洋房汽车给他们？"这样的话

听去好像很对，但如仔细体味一下，或观察一下事实，又觉得这类话是多余的，不知道技术人员本身听到会起什么感想？就说有些技术人员，如果他们是有一点技能的，他们原来也不是没有地位，可是他们放弃了原有或原可以找到的一切，不去找可能住得的洋房，而跑到陕北来，志愿地跑得来，难道为了到延安来找洋房住？难道延安只有土窑子，他们不知道的？我想这样的人，若不是有深深的民族意识与坚决的抗战心，他们是不会远远地跑来的。人们还能责备他们什么呢？除非责备他们太傻了么？

有一位外边来的爱说笑话的先生，他有一次说笑话：“当然，八路军是要优待技术人员的。十年二十年的工夫，几万元的资本才学出来的一个技术人才，现在跑到八路军里来服务，固然是为了国家，为了自己不肯做亡国奴，可是八路军从来没有关心过他，对于他技术的造就也没有花过一个大子……”这话是太滑稽了，可是如若这么想时，也好，对于有些技术人员，可以不至于太苛求了。其实技术人员自己，他们并没有要求优待，也没有要求津贴，或多少津贴与吃大米饭，不过如若给他们优待与吃大米饭，他们也会感谢而接受。的确，很可能有些技术人员他是过惯了舒服生活而吃惯了肉的，如果要他们吃苦，他们也愿意，不过只能吃相当限度的苦。可是我也曾听到过外来的一个技术人员带着苦闷的情绪对我说：“我想吃小米饭一定比吃大米饭容易消化得多！”

十多年来，我交往的朋友，大多是技术人员，我并不是单单尊爱他们的技术而欢喜同他们交际，我特别是爱他们的简单而质朴的灵魂，我更爱他们的个人道德方面。他们，不但是些好国民，还是好丈夫，好爸爸，好朋友，好儿子。

技术人员来到这里，他们要求什么？不是洋房汽车，已经可以断定，那么来做什么呢？他们该是要工作吧，他们要求工作的条件与环境，不错，这里物质条件困难，种种受钱的限制，但是一切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就使没有钱办不到，也一定能得技术人员的谅解。

有人说，外来的技术人员，如果他们不是加入组织的，于这里少有用处，而对于这类技术人员本身也是没有出路的，他一辈子像摸暗弄堂，他所做的事情也是劳而无功的，永远不会被人认识的！

"为什么呢？那又何必要统一战线呢？"我不禁好奇了。

"那是因为如果没有组织关系，就算上级干部认出你的才能而用你，而下级干部永远不会承认你的。"

我不同意这种人的话，我想，这里该是一个革命的集体，并不是原始结社，我们只能说，有些个别分子，在今日边区，还不十分了然统一战线，对我说上面的话的人也该是一个。

对于技术人员，我以为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希望一般政治工作者能了解科学，与技术人员的工作这个上面。如若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优待技术人员”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在这里，固然没有技术人才，就是在最近的将来，也培植不出如何好的技术人才，所以“优待技术人员”还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这里，政治高于一切，许多男女青年，都欢喜学政治，特别是爱做政治工作，有一次我与一位抗大的教授谈到这个：“为什么人人都要学政治？是不是政治工作者说出来的话，与开出来的条子，效用有些不同？大家要占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是这么宝贵的？”我问。

“也许有一点，这也要归罪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呀！”他说。

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若不是官僚主义，中国人也不至于吃这许多苦！可是这个官僚主义，到什么时候才完结呢？

我真奇怪，这个官僚主义的恶魔是这般厉害的。

有些青年，在理应当是顶革命的，他们从没有见过官，听过官话，但是他们自己却那样会打官腔，装官架，这是怎么的？恐怕是从电影与话剧里看得来的吧？一个朋友好笑我的分析，“根本在中国人的皮肉里就有官僚主义这个东西！”他说。

中国是没有科学的，一个特殊的东方民族，在中国，有许多枝枝节节的问题，不大也不小的问题，文艺上有旧瓶新酒问题，医学上还有什么中医与西医问题……在任何

别的国家，就没有这类问题。现代的技术，本身就是科学，而中国没有科学，要中国人了解科学的技术自然不很容易。

有些政治工作者，好似不十分看得起技术人员，再则自己以为自己是政治工作人员，政治问题再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样认识清楚的，在他看起来，科学的技术人员不过像一个木匠，或手工业者——木匠或手工业者是一个群众，而科学的技术人员好像不是一个群众，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有一次，我听一个政治工作者对一个技术人员说："近来生活怎么样？应当多多参加政治生活喽！"

"我连休息的时候也没有，吃饭的时候也没有！"技术人员说。

参加政治生活，怎样参加呢？一天到晚，他工作着，人家到他耳朵边来发议论，他可连听的精神也没有；无线电讯，他得不到，报纸吧，也没有，他也没有工夫去向人要，也不知道该向何处要，在外边，他还能过得到的起码的政治生活，在这里，他连一点时事的消息也得不到。"近来打得怎样？"有一个技术人员常常问我："真的，日本鬼子打到我眼前，我也不会知道的。"技术人员，他们比不得文化人，教授，需要知道这些，而做参考，可是他们是不是不需要知道呢？如果有晚会吧，难得送技术人员一张戏券——人们以为这些人是不懂得什么文艺戏剧的，——却是在最后面的一排，椅子前后没高低，他看不见，又太挤，

只好回去。不能参加政治生活，这是谁使他这样的？怎样使他工作有规定　　不至于像一头无可告诉的牛一样有余暇，有休息，并且帮助他不但使他本来的技术尽量在抗战中发挥出来。先生！问题是在你，不要完全把他们抛在一旁！因着你，做政治工作者，不理会他们，遂使他们苦闷，不安！所以，问题是在你，做政治工作者，而不在他，技术人员。有什么可怕呢？技术人员，就使是一把利刃，也要看怎样使用。不会使用的人，会割破了自己的指头，过于乱用把锋口折断；但若好好地使用，使用得当，不会割破自己指头，也不会折断锋口，问题是在如何使用它。

有的技术人员说，技术人员来到延安，还嫌太早，再迟十年，情形一定不同。这话也许对的，　　不过延安的事情积极来做，有些事情推动得很快，几个月也够了　八路军多年来老在行军之中过日子，建设工作对于他们或者比较外行一点，不过听说当时在江西，虽然在极不安定与极端艰苦之中，他们也做了不少建设工作，日常需用品及军火，他们都开工厂自己制造。现在这里急需技术人员，这是一个事实，而他们优待技术人员也是一个事实。

在延安，一讲起技术人员，人们的脑子里马上就想到医生，因为除了医生，延安还极少有别种技术人员，本来有一个摩托学校，现在听说已停办了。

边区的医疗工作，边区政府并不像全国别的地方政府，

设卫生处，管辖地方医务与军队医务，这里就是有一个第十八集团军军医处，他所领导之下有许多的前后方医务所诊疗所及边区医院。边区医院要算是延安技术人员集中之所在。那天，我去参观，正碰见西安招待所中认识的李女士也在参观边区医院，她比我关心医疗工作，什么都问到，什么都记下来。

边区医院能容纳一百个病人，工作人员连医生在内一百二十多人——红十字会派来的医疗队及救护队在外　每月经费二千四百元，在这里，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呢！病人的伙食，米在外，　是发一斤四两一天每天菜一角。工作人员的米与病人一样的量，不过是小米，菜是四分一天。问病人说，他们并不天天吃大米，也吃小米，一角与四分的菜也没有分别，病人也常是一星期才得吃一次肉，有时十天才得吃着一次呢！病人所住的窑洞是西向或西北向，工作人员所住的窑洞是南向，有极好的阳光。病人进院，并不是一定经医生诊治过后证明需要入院治疗，每个机关的负责人都可以介绍病人入院。这是一个极特别的地方，所以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一个调养的所在，因为医生并未能严格执行他的职务。进院的病人既然并不一定是有病的，出院也不是医生所能决定的。院长是一位生长在八路军里的二十几岁的青年，他是卫生学校毕业出来的，虽然这样年轻，但看去好像已做过二三十年的院长。听说他不看病，那么他是办医务行政的。他的津贴与八路

军军医处处长及边区医院最高津贴的医生一样，每月十五元。卫生学校六个月毕业，毕业出来就是医生。这样的医生也有十五元一月的津贴，而子女妻子等的生活一切均由公家负担。在外边，两三年学出来的看护，赚三四十元一月，还得养家呢。边院的女看护，身体都十分强壮，胖得简直变成四方，不像女孩子，像一个装足了书的藤箱，她们有的是长征过来的。

卫生学校也是属于八路军军医处的，我还没有机会去参观，听说里面的学员最近已增加许多人，好像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培植阵地医生，学习时间为六个月。

有一次，敌机轰炸延安时，我恰在一个较幽僻的熟人的窑洞里，有几个刚从卫生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医生与几个正要往卫生学校去的抗大女生，进来躲飞机，大家就一同聊天。

“外面来的医生，就是技术好也没有用处，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政治，不懂得政治，要动摇……”一个年轻医生说。听他们说来，他们并不是一定要着重医疗的本身工作，第一还是政治工作。但是我个人，对于医生，我却只苛求他们的技术，记得我回国后，生了一场大病，牙齿都坏了，有一晚，我痛得几乎想从楼窗口跳出去，家人怎样安慰我也不生效力；次日我找到一个牙医，我什么也不要知道，只求他快快把我的牙治好。

对于办理医院，我最佩服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他

们的工作人员（医生是他们用薪金及种种优待方法请去的），都是些姆姆（女修道士），我曾见一个天主教医院，收容一百八十个病人，厨房有两个（中与西，西式厨房做面包，点心，与各种外国菜），管理这两个厨房的是两个中国籍姆姆，一个已六十开外，走也走不动了。她们对于工作那样忠实，勤快，是不是教会训练她们成这样的？还是出于她们自动的宗教信仰？

抗战以前，这里志愿的医生，只有一位唯一的傅连暲医生，他是福建汀州人，听说从前是自行开业的医生。到延安不久，我曾见到他，长长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在长征中，他吃尽千辛万苦，有两次几乎落水而死。他很直爽，富于感情，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或者使人惊奇，其实，最初的基督教，为反抗旧教的统治，原是极富于革命精神的。在一本小册子里（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法国《救国时报》登载的《一个基督教的医生傅连暲氏在中国红军内十年来的经验》），他说得很直爽也很详细。他至今不是党员，说因为身体不好，吃不消纪律与小组会议等等。

我想，傅医生是一个医学技术人才，与其把时间精神用在会议席上，自然还是用在病人身上的好。在小册子里，他说：

“我们一如国内其他反日军队，迫切地需要近代的各种医生，不管其为外国人、中国人，男人或女人”，他再三申

说，希望各种医学专家能到这里来。

从前为着人道，正如他所述的："汀州是游击战争的区域，曾在红军手中屡得屡失，我医治双方受伤者，无所偏袒。"十年来，他还是这样，不但医治了许多病人——军队或公民——而且还训练出了好些医生与看护，八路军今日所以还有这点医疗工作的根基，实在还是他创办出来的。现在，不单为人道，更为了抗日，为了求民族解放，傅医生的工作更为重要了！

正如这位世界闻名的法国科学家——中国人民之友——Langevin[①]（中国的电讯及杂志上，有时译作"郎士迈"）教授，曾经公开宣示的：有些文化人，学者与科学家，他们无条件地同情某种主义与政策，因为觉得这种主义的实现，是比较最接近人道的，而能使人类从被自然与被其同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傅医生是这样一位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与世界文明的真正拥护者，像这位教授所说的吧。

在边区，要建一个模范医院，当然不是一些军医所能做到的，全世界任何各国领导医学科学与医疗工作的，不是军医。可是细想，现在与从前不同，如果愿花一点钱，动员些专科医生进来，一些有气魄，见过大局面，不贪钱也不爱虚名的医学者，而把他们集中起来，配合上得力的看护人员与事务人员，办一个像样的医院，现代的医院，

---

① 法文：朗之万，法国物理学家。

也不是不可能的吧。医学专家们，来吧！——我不是学某先生的“三请医生”，前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某报上刊有某先生的“医生，医生，三请医生”，某先生在他的书房里三请医生，而不知已有多少医生不用去请，已经抛掉了洋房跑来了，但因报国无门，或者有些情形太奇特，无可工作，只好回出来；有的退回昆明，有的跑到上海租界再去住洋房。中国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也难怪，人们走这个圈子，是不会知道的——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抗战，这是谁都知道，不用费辞。

谈到这里的工作与技术人员，我记起那次访吴玉章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谈话。吴老先生刚从国外归来，耳目都是新鲜的。他谈抗战建国：“现在必须同时做建设工作，抗战与建国是分不开的，不能现在抗战，将来建国，将来又哪有时间呢?”他又说：“斯大林说得好，计划只是一个计划!”谈到工作，他说：“一定要做到分工合作，如果一个人兼上二十个职务，结果一个也做不好。”这也正是我常常在想的。对于建设事业，吴老先生有极远大的计划，那天他与我谈到黄河水利：“隋炀帝下江南，黄河里能行五百人坐的龙船，几百人背纤。那时黄河的沿边各地，开了许多渠可以种稻，成为极好的水田……”实在就不说那样大的计划吧，正如吴老先生的意思，陕北也可以从事些手工业，改良的手工业，这里出羊毛，所以绒绳绒布，都是可以做的；还有，出产棉花可用以织布。我想如有农业工程师来

开农场或畜牧场，养羊，养牛，养猪……也一定是很能成功的，到那时陕北生病的人还可以吃小牛肝来补补呢！

吴老先生，他亲眼看苏联如何使用技术人才，如何艰苦建设，他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他的话，也是最恳切的。

八　两性与恋爱

“两性与恋爱”，如果把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已有专集引录起来，不知道要占好多页数，在我国，抗战的今日，来谈“两性与恋爱”，当然是非常不时髦的，但我不去管这个，我觉得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类，“两性与恋爱”这个平常的问题，总是一个永不干涸的问题，在大宴会中或几个朋友的面前，常常成为人们最感兴趣最欢喜说着的一个中心资料。就是在边区，有时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也并不漠然。

十二三年前，我在《新女性》上发表了一篇《现代中国女子的苦闷》，接着，宣昭姐[1]来了一篇同意我所说的文

---

① 陈宣昭，作者年轻时的女友，二人曾结拜为姐妹。

字，我们受到多少男先生们的严厉的回答，果然也有很少的男子同情我与宣昭的。离国多年，主观与客观的情形都有了点改变。就说宣昭姐吧，已于美满的结婚变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从一个职业的缫丝女工程师，因着儿女养育的担负，几乎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在另一方面，这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有时进步，有时打圈子，中国妇女在这个圈子里面跟着打转，好似有一些改进，但是微乎其微。所以在今日，我仍要说“现代中国女子的苦闷”，我想宣昭姐也还仍旧同意我的话。并且还要加一句，也许在民主的边区，有个别的女子，也还未能完全脱却苦闷。

若说中国社会损害人的东西太多，那么中国社会损害女子的东西更多。我们这一代的女子，是无法找到彻底幸福的，或者“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的努力只能使我们目前的痛苦减轻，将来我们的女儿或孙女，她们比较我们有运气接近彻底的幸福。

我们，中国女子的斗争，是两方面并进的：在民族、社会的利益方面，我们女子的利益就是劳动者的利益，要劳动者得着解放，我们女子也方能得着解放。在目前，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当然是积极参加抗战中的前后方各种工作，以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权建立，民生改善。在两性方面，我们要同这些谋民族解放的共同友人，但却是统治惯了的，背上负着重重历史的、封建的、歧视女子的恶习，这样的男子作斗争。这个双方并进的斗争是同样

的艰苦。无论怎样新的中国男子，他摆脱不了旧的根性。我常常要这样说，有些男先生们要以说笑话的口吻反对我这句话。在欧洲，我听好几对中国夫妇说中国社会是很不容易有幸福夫妇的。我也相信中国社会损害幸福夫妇的东西太多了，政治与经济，当然是最大的原因，在华洋杂处的大都市里，特别是经济。封建社会下所遗留的种种重男轻女的恶习，对于男女平等问题，在东方的中国，也是特殊的，譬如承继权吧，在欧洲，远在帝制时代，有些国家女子已有承继权。我并不说中国社会绝对没有幸福的夫妇，有是有的，我想总不会多。夫妇爱情的关系，在乎能够维持经常的关系，像一个人工作一样，是要依靠经常性，才能有成绩，如果一天好，两天不好，当然不能算是幸福的。

京、沪、杭一带的朋友常常说，在这一带的夫妇是极难以维持爱情的（这一带是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封建宗法社会一切罪恶集中的地方）。“为什么呢?”我问。“通货膨胀，”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譬如一个赚一百元一月的男子，有配一百元一月的女子向他追求，赚二百元一月的，有配二百元一月的女子向他追求，如果赚四五百元一月以上的男子，那他要多少女子任他选择。只有苦力们是找不到女子的。但是赚二三百元一月以上的男子，在全中国的男子总数中，终究只占到极小极小部分，许多女子却都向这样的人集中目标。多妻，开小公馆，被抛弃，不断地发生‘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

每一个稍有地位的中国男子，他们还要自负地以为他们是这样容易猎取爱情的，却不知道这些根本不是爱情，是镀了金的，或者是一种求生本能所促成的。真实的爱情不容易存在，也会被这些情形所蒙蔽。有些男先生们曾对我说：'开条子叫来的并不算稀奇，一个电话到××大学，可以请到会跳舞、英文说得顶好顶摩登的女学生。'于是他们把一个一个的学校说出来，继之以人名。'五十元一夜，'他们下结论。'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学生，她是苏州一个女学校里的，星期六下半天，她到上海来，星期一上午回去，那一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同她谈起来，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我知道她父亲是有钱的，而且对于子女手头也很宽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她说上海好玩，同时弄几个钱来做零用……'"我，既然是一个女子，无法去证实这些事实，但听着男子们这样谈着我们女子，即使只能代表一小部分，我心头还是很难过。

我觉得即使有少数女子这样堕落，实在也还不是女子自身的过错，如果男子不玩弄女子，这种现象是不会存在的。正如鸦片是卖给抽鸦片的人吸的，虽然有时也相因为果。

有些男先生们也爱笑中国女子爱金钱，崇拜权威，但我觉得即使有点这样，也不是女子自身的罪过。在另一方面，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女子，有几个不为了丈夫欺压她而苦痛的。就是在思想前进的男子，对于女子也常常还是

思想是思想，实际是实际，不能不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形。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她们在妻权与母权方面已获得了一点，虽然与完满还有距离，这种距离，是根本与争取面包，工作与和平有关的，无法独立解决。可是这方面，我们中国女子，还未脱离封建地位的女子，已经可以羡慕她们了。在幸福的消极一方面讲，做一个欧洲女子，男子可以使她痛苦，她也可以使男子痛苦，他在外面结识情人，开小公馆，她也一样找情人，在外边租房子，与情人约会。人家并不因为她这样，辞去她的职业。感情事情纯粹是私人的事，男女双方都是一样，与职业及政治……无关，只要不犯法。但是在中国呢，只有男子给女子负担苦痛，而女子是不能给男子负担痛苦的，他们就是在感情方面，也是统治者。只许男子放火，不许女子点灯，男子可以开小公馆，女子却还须忠实于这样的丈夫，为他哭泣，为他徒然消磨她的青春，假使有一个女子公然报复不忠实的丈夫，那她要怎样地受到人们的讽骂呢！

在中国做女子，是非常苦恼的，特别是有些跑出过国门的女子，更会这样感到。我可以这样说，在祖国，我从来没有，的确从来没有被看待做一个人，我总被看做次于男子、小于男子、轻于男子这样的一种动物：我不是男子，更从来不是一个公民，更不要去说那些大话，什么经济、政治、法律、职业上的女子平等的权利，一点也不要去谈它。日常，我们所受的，常常是一些讽嘲与鄙视。

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起初，在巴黎，我的生活可说是不幸的，语言不通，生活不惯，而我又不交际同胞同学 只有这两位对我像慈母一样的女友×与×夫人，我至今还时时记得她们的友谊 有些人骂我傲慢。可是，我总不能忘记，那些和气的外国朋友，他们无邪地给我帮助，什么地方有一个好而便宜的饭馆，什么路上有一个私立戏院正在演国家剧院演过的什么戏……他们告诉我。这些对人应有的公民间的关切，友爱，坦白，无邪，毫无利己目的与私心，只有在欧洲，我尝到一点。

我至今还想到在华沙换车时，遇到的一个青年同伴。波兰车站上的行李脚夫不很多，又是旅客拥挤，所有的脚夫，一下子均给人抢去了。行李简便的人就自己提了换车。我带着塞满了衣服与书籍的两只大皮箱，用尽我平生之力，也只能提得动一只。一个青年来帮助我提箱子，并问我："你换车的么？""是的。""到罗马？日内瓦？""不，我到巴黎。"他两手一手提一只，跟了我走，帮助我换车，找到座位。在柏林车站换车以后，他同我偶然碰在一个车厢里了。他告诉我他是挪威人，去华沙看他的姑母，是在比国沙绿华（charleroi）劳勤大学学工程。他有一种北欧人的美丽、深沉的眼睛，高高的个子。他开始赞美中国的绸料与皮货 那时我穿着一件深蓝色绸面皮里大衣，领口上翻出银鼠 又说他学校里有两个中国同学，都聪明而肯用功。他不像有些外国朋友，一些小贩化了的，见了中国人只知

道谈中国女人的小脚、辫子、咸蛋、皮蛋与荷花　从前我是非常欢喜荷花的。听多了它与小脚齐名，竟使我讨厌这种花了　我对他的话有着好感。我说我非常欢喜挪威，易卜生的故乡。“我只想在那里过一个冬，什么事情也不做，整天溜冰，给我溜个爽快！”我说。“那你要多少冰呢！恐怕你要看厌。”那一年　一九二八　欧洲奇冷，老年人说五六十年来未有过，国际列车上的自来水都冻断了，西伯利亚是更不用说，从华沙到巴黎，我们每早洗面只能在双层玻璃窗里面一层所结着的热气成功的薄霜，拿下来，放在手心里呵一口气，这样洗面洗手。“你从西伯利亚来，还没有看厌冰么?”他说，笑着耸了耸肩。

到沙绿华，他下去了，同我要了一个通信地址。彼此道了“再见”。

他没有写信给我。到复活节，一天中午回寓，房东说有人来找过我，留下一张名片（他是先找到我友人那里得知我的住处），待我打电话给他，他已走了。就是华沙换车认识的那个挪威青年，后来没有再见，也没有通信。

如果是一个中国的青年，恐怕我会遭受麻烦，收到许多信……像这样的事情，在欧洲旅行，可以遇到很多很多，但很少很少会引起麻烦与纠缠。

回国后，我第一次去西湖玩，是在大病刚好，恰恰是杭州烧香节快完的时候，西湖边上比从前更讨厌了，在湖滨公园坐一下，就有一些男子坐到你旁边来开玩笑，搭话。

坐了划子开出去，他们也叫了划子跟上来，尽对我们说鬼话。真令人不胜其烦。那时我同着一个女朋友与一个男朋友，有男子陪着玩，那该算是有“保镖”的。有三个穿着××学校制服的青年一直跟着我们，在岳坟，我们停留下来。“我们在灵隐等你们！”我们的男朋友不爱访古迹，更不爱跑路，所以就在划子上不下来，这三个青年看见只有我们两个女子，就尽量开玩笑，说轻薄话。

到灵隐，他们果然已先在那里了，在寺门外的亭子里，“呀！你们来了！”他们对我们喊，嬉皮哈脸的。一个很不好的念头穿过我的脑子，于是我竟忍不住大笑起来，“怎样的下作！”我对女伴说，我们尽量笑，不知怎么，他们忽然溜走了，或者疑心我们有什么诡计。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女子出外旅行，但这样的麻烦，对于我，不能认为是痛快的事情。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就是说公民与公民间的正常交际，在封建社会是没有的，随着几次革命而转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还是极冷酷的。人与人的往来，以冷为准绳，彼此对着像仇人似的，就是情人间的情书也写得愈冷愈算好。一封普通办公的信一定要写得像训辞似的，特别是一个女子对于男子，如果她像欧洲人的脾气，写得婉转曲折一点，用一些“感谢”，“对不起”……的字眼，即使接信的人不觉得特别，旁边的人要奇怪起来，而追究他们间的关系。所以，特别是女子对于男子，冷酷是必要的。还记

得有一次，一个夏天，从苏州回无锡，在女友家里吃畅了各种甜点后，她又要我带一盒马拉糕回无锡，说是无锡买不到这个东西。上得车去，京沪人所叫为飞快车的车厢中，总是异常拥挤，毫无空隙。一只手拿着皮夹，一只手拿着这盒碰不起的马拉糕，人们的眼睛，集中在这盒东西上。“贪嘴的女人!”好似他们在说。车子开得快，颠动得非常厉害，我挤在立着的人丛中，四周没有依靠，这盒东西与我人一样的摇来摇去，而又不愿把这盒东西抛掉，真是很可笑而又是很狼狈的。在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位男先生对我说：“这盒东西放在桌子上吧。”他把他们茶桌上的茶杯放过一边，我没有话说，把盒子交他，他接去了。接着，他经过与对面两人的商议之后，又让了我座。他们三个人紧紧挤在一起，带着杭嘉一带的口音说着话。又是常常轻声地谈着别种语言，很快也似很流利，我只听得懂 Do 与 Zo 这两个德语声音。那个让座的人他穿着一件春季的灰色夹大衣，在中国是没有这种春季大衣的。从他们的神气看去，他们好似刚刚回祖国，在他们的行李皮箱上，贴有 (Geneve (日内瓦) Paris (巴黎) Berlin (柏林) 的行李票。为了怕他们和我搭话，我的头尽朝上，眼睛望着车厢顶。到无锡了，人如潮涌一样地挤下车去，“你先下去吧，我们把这盒东西从窗口交给你。”其中一个说。我下车，在他们的车窗口，接着马拉糕，只说了一声有礼貌而无理性的“谢谢你!”就掉头走了，连一个再见也不曾说。其实，这三个

男子并不使我讨厌，或许他们与我间也可以有一点公民友谊，如果不是在中国，我也不会怕同他们搭话，我早会告诉他们我住在什么地方，或许会对他们赞美一番太湖风景的雄伟，三皇街肉骨头的美味：“下午来玩一天太湖吧！”或许会这样邀他们，但是在中国社会，男女间没有公民正常的交往，做女子的只能这样冷漠，就使有些男子很懂得男女公民友谊的。在中国社会，有女友对我说，根本不交际男朋友，她们能够往来的，除非是年纪很大，可以做得上她们的父亲，或者年纪很轻，可以做得上她们的孩子或者是一对一对的夫妇，这样，可以免掉许多麻烦与旁人的闲话。在中国，做一个女子，必定要十分谨慎不卑不亢——卑还可以，亢则绝对不能——小心翼翼，就是这样，也还仍旧免不了受人指骂，难做到极点。男子对于女子的要求是很复杂的，不像女子对于男子的单纯。《伊索寓言》里，对于理想的女子，有这样的话：“在街上像一个圣母，在家里像一个母亲，在某些场所又要她像一个妓女”。我想这的确可算是名言，在街上因为接触到人群，有社会性的，这时男子要求他所爱的女子，能为别人尊敬；在家里，男子要求他所爱的女子，能服侍他，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像母亲一样。有时我常常听到人们说：这个男子太脏，太糟糕，需要一个女子照应他，但从来不听到说这个女子怎样，需要一个男子照应。可是在别的场所，男子对于他所爱的女子又要求她亲密一点，热情一点，浪漫一点。要她能够

卑屈于家庭生活，会做蛋糕，也会补袜子，又会生孩子，但也不要生得太多；能文能武，能歌能舞，当然，还有女子的相貌，始终是现代，将来，任何地方，终究还成为男子选择伴侣的主要条件。“格兰亚伯脱[1]的鼻子如果再短一点，会把整个世界的面目改观了。”女子的相貌始终在人类生活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帮助现代科学战争最凶的武器，也就是利用着女人的相貌来做间谍工作。日本鬼子像德国人一样，特别欢喜利用美丽的女子来做间谍。不过爱美是人之常情，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勉勉强强地去娶一个丑陋的“无盐”呢！除了这些以外，男子所要求于女子的，就是在某些场所要她像一个妓女，也就是说要她浪漫一点，但是又不能太浪漫。如果太不浪漫，她也许会遭杀身之祸，如果太浪漫了，也要遭杀身之祸。英皇亨利八世的六位皇后夫人，有两位是被杀了头的。第一位，因为她太庄严，太纯洁，太严肃；第五位，因为她太浪漫，结识情人。一个女子的幸福，要基于这许多条件，就是一个女子的事业，有时也往往还是基于她如何应付男子而定。有时，她会被人投石头，有时她会被人赞扬，而这与她有的真正的才能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什么办法呢？聪明的女子，她一边沉默地承认男性的统治，一边，在壁角里讽笑他们，说这个恐怕还是最好的办法。

---

① 格兰亚伯脱（Cleopatre），古埃及女王，她的美丽与智慧在历史上有名。

女子是不幸的，即使在法律、经济、教育……种种方面都平等了，在两性方面，女子如果没有求婚权，女子还是不幸的，很不幸的。在爱情方面，女子总是成为被动者，她仅能接受男子的好意，她只好等待着，等待着男子先伸出手来。在维多利亚（Victoria，英国女王，一八一九年生，一九〇一年死，一八三七年登位）的私人日记里，人家发现她怎样用了眼泪，记述她逼得向她的表兄（德国贵族）求婚，为了皇族，教廷，与人民的意愿。固然他也是她自己所爱的，但她认为惯例不是这样，一个卖牛奶的，也等待男子来求爱，可是她呢，向一个男子求婚，求婚本身这件事她已认为是一个耻辱；而另一方面，她又怕这个男子拒绝了她。她这样记着："我对他说了各方面对我的愿望后……他说他也很欢喜一生永远陪着我在一起……我是那样地感激，流下了眼泪。"

人们常常欢喜谈论怎样可以幸福，也有人常常谈论怎样维持爱情。在极小极小的时候，听母亲讲许多故事，张敞画眉，举案齐眉……特别使我那时候感动的是讲一个什么人，他"赴京入试"，在京师一住十年，待得他"衣锦荣归"，他的夫人已双目失明了，他待她还是非常好，像从前穷苦时候一样，且常常扶着她走——当然他是有空工夫的。那样的事，在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多妻制之下的太太们会羡慕的，所以母亲是这样欢喜讲这些故事。在我听去，却也觉得不坏，这个男子倒是重信

义，而能同甘苦的。但我同时也听她讲许多男子负情的故事，唐，安什么公主（后来我在逸史上也看到）的情人，抛弃了她，在长期的秘密约会之后，他同另外一个女子结婚了。她病得很重，只想在死前能再见他一次，一位侠士知道了这个公主的秘密，有一夜，趁这个薄情郎酒醉人散的时候，把他劫到公主跟前，她一见这个负情的男子，竟"一恸而绝"！至于那个通俗的故事，赵五娘剪发卖发，是谁都知道的。到年纪大起来，现实生活里所给我见到的，似乎比那些悲剧更悲惨，丈夫对妻子怎样不好，妻子吞生鸦片死了，丈夫对妻子不好，妻子投了河。小时候，家里后门外河池的对面，住着一家农人夫妇，丈夫常常打骂妻子，她常常高声呼救命，我们在院子里可以清楚听得到。终究，有一天，她是上吊死了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而不幸的家庭却有它各个不同的不幸。"[①]（ToIsToi Anna korinine）我的确相信这句话。

有人说，幸福是有条件的，系于社会环境的，有经济，法律……等等，这是很对的。可是这些客观条件具备之后，是不是就能幸福了，还不是一定的。这话或许有人要笑我太唯心，可是事实是这样。当加德琳二世女皇（Cattlerine Ⅱ）与彼德三世结婚的时候，这个患神经病而荒淫过度的皇子，把妻子完全抛在一边。她的婆，是这件婚姻的主使

①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话。

者，而且是一位贤明的摄政女王，深夜，当清理了国家大事之后，去看她的媳妇，见她一个人坐着在哭泣。“怎么？这混蛋到现在还不回来？我去命令他到你这里来！”“不要！不要命令他！”她哭着回答。“怎么？你哭？你爱他？那我可没有办法帮助你，你只好自己想法吧！”的确，爱情与权威金钱可以毫无关系。当我寓居在法国中央高原的一个城市里时，几乎每个冬夜，听到一个酒鬼喝饱了酒，在一条街上来回地尽喊：“你不爱我，我还是爱你，诺！这就是爱情！”真的，这就是爱情，爱情是常常会这样的。

我觉得世上有些人与幸福很少有缘，这是人类的悲剧。温特沙公爵[①]与辛普森夫人的恋爱事件，曾占了一九三六年全世界报纸的相当篇幅。有些人很奇怪为什么温特沙公爵宁愿不做英王，为了要同一个平平常常的妇人结婚，而且她曾离婚两次，一个中年的妇人，既然有许多贵族小姐，他的表姐表妹，在等待着做王后。其实很简单，人类的心理，永远被暴君与奴性这两重矛盾支配着（鲁迅先生常描写这两重心理）。这位权贵的王子，从小起就受惯了异性的不得不然的尊敬与殷勤，这是可以想象的。在宴会的时候，只有女子给他燃烟，他从没有机会与可能给女子燃烟，没有一个女子以一个平常的男子样，一个人样对待他，可是辛普森夫人，她，敢于把他当一个人，一个男子样对待，

---

① 即英王温莎公爵爱德华八世。

而这个，正是他所需要的。（当时欧洲漫画上曾有一张讽笑画：温特沙公爵跪着给辛普森夫人穿鞋）其实，因为他是温特沙公爵（曾是英王），就不能给女子穿鞋？

无论男子或女子，权位与金钱、名誉，对于女子，还有相貌，都可以造成私人两性生活的不幸，特别是权威与金钱。有了权威的人，常常会给庸庸碌碌的人看做偶像，于是连行动也不自由了，他或她所理想的对象，会遭受到对方的不敢与不愿，（我曾经看到一件哑的永远没有说明的爱情，男女双方实在彼此很相敬相爱，但彼此又猜测又担心出身与学问的背后会有怎样可怖的东西。可说他们的身份与学问害了他们，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地位，这是悲剧。）而敢与愿的，或者却又不是顶理想的人物，或者甚至于是很糟糕的人物。我还记得前几年，在欧洲一个杂志上读到一篇纽约的一个百货廉价公司（如一元公司，二元公司）的创始人的孙女，对一个记者的自述，她曾被多少贪她财产的男子追求，结婚以后，钱到了手，或钱拿不到手，而抛弃了她。一个平平常常的男子或女子，穿的布衣，吃的青菜，倒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我也常常听人讲到三角恋爱，似乎中国特别多，可是仔细听，又并不是真正的像那些动人的悲剧，往往还是金钱与地位在作怪，是很庸俗的。可是我得承认中国女子有一个弱点，却是在现时代也还不能避免，那是历史的遗毒这样害了我们的。我们中国女子因为从来不容许自己选择

丈夫，而不知道怎么选择丈夫，她没有单独的判断力，往往她们会去选择一些已有妻子的男人，因为只有在一个异性旁边的男子，使她能较清楚地看出这个男子的长处来。我们常常听见妻的一个女友爱了妻的丈夫，小姨爱了姐夫这一类事实，好像转来转去，只在一个圆圈子里转，固然中国社会不容许男女交际或男女间没有正常交际机会，亦一原因。找寻自己的幸福，开辟自己的天地，爱没有人爱的人，这并不是讲恋爱道德，其实呢，恋爱也有道德。“爱情是不加害于人的”，爱伦凯这句话使我至今同意，更深一层说，如像爱伦凯所说爱情不当加害于对方，也不该损害第三者。可是在我们国家为爱情而损害对方与第三者的非常多，“不出恶声”这种伟大的精神，总很少见到。在言论上　　如果会写写东西的　　，在口头上，尽量地毁坏对方，“恶之欲其死”，正是这样；或者，不管“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反正“彼可取而代之”，男女双方都如此。我有时听一些青年说：“某某人他们夫妇真幸福，他的夫人如果做了我的妻，我同她也一定很幸福”。我说：“这个也并不然，某某人与他的夫人恰恰因为夫妇生活的各方面能够很和谐，所以是幸福的，如果嫁了你，可能一天吵到晚。”一个脾气急的人与一个脾气缓的人倒很合得来，一个极富感情的人与一个很理智的人也许很相投，但不一定是如此。有些人对于两性生活似乎看得非常公式。

有些青年男女常常在闲谈中说到他们厌恶离婚　一特

别是女子——以及怎样增进爱情，我说，能够维持爱情，已经很好了，大家以为这话太煞风景。其实，爱情是这样：取得胜利是容易的，巩固与扩大却不是容易的。在年轻的时候，会梦想一些天真无邪、雷电火燃一样热烈的爱情，可是实际生活却是如此平凡，乔治·桑（George Sand）的情人们责备她非常自私，并不像她自己作品里所写的热情，她不能把她整个献给她的情人，生活是这样规律：早上起来，早点后出去散步，回来，写作，直到午饭；午饭后，散步，回来，玩一下钢琴，又写作……梅特林克（Maeterlinck）① 的情人，发现梅也与平常人一样的爱玩脚踏车，……她就觉得讨厌了。爱情应该是经受得起平凡生活与平凡工作的折磨，但却又是日日新又日日新的。在年轻的时候，也许为青春，为健康，为勇敢，为相貌——多少有一点——而相爱着；到了中年，青春第一就不存在了，为学问，为信义，为责任，为他与她有这许多可取，而维持着爱情；到老年，为事业，为相互日常熟悉的生活，……他们还是相爱着。如果年岁与环境的变换，使彼此的需要及赠与——伟大的爱情是赠与的，如像泰戈尔所歌颂，至少"幸福是给予别人的"，这一句欧洲的通俗话是对的——能够和谐而不脱节，这样的夫妇，该可以齐眉偕老吧。

在边区，妇女的地位比中国任何地方提高了些，革命

---

① 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比利时剧作家。

的理论是要使男女平等的，也正是在实际生活上人们所努力想做到的。在客观方面，法律上，教育上，经济上……女子是受到平等待遇的。在一个朋友那里，我曾看到一份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草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想已通过），一共二十二条，可说是很民主的婚姻法，对于女子，可说是够人道的。只不过对于离婚，没有一点鼓励和限制，我是绝对赞成离婚的，不过从优生方面的立场，又觉得可以鼓励离婚的减少，例如每次离婚，要隔多少时间才能结婚。不过法律是给聪明人用的　当时我曾问到朋友关于离婚的实施态度，朋友说对于离婚，法院当然先问双方意见，然后第一调解，调解不成则准离。抗大与陕公及别的学校的女生与男生受同等的教育，她们出来以后，在前后方与男子同样的工作；至于经济地位，在边区是不成为问题的，政府机关的男女工作人员拿的每月津贴是一样的。边区的政策，对于妇女解放运动，他们是维护的，栽培的，在“纪念三八与开展妇运特辑”这一期《解放》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妇运的决定指示。在“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边区好几位负责人，曾再三致力地说：“如果这次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半数的妇女来参加，我们是不易取得胜利的。”又再三引用列宁、斯大林的名言：“如果不扶植妇女运动，那是罪恶的。”事实上，边区为了实现他们的政策，开展妇运，扶植妇运，正在办各种妇运工作的妇训班，当我这则稿子已经写好时，在四月九日，

听到了王明先生对于延安女子大学创设的一个报告，说女子大学创设的原因当然也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同时，鉴于全国原有的女子大学，如东吴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均因战争而并合他校了，全国的女大学生都感到失掉了学习的机会而苦痛。王明先生又宣布这个女大的课程，在革命理论以外，还着重于实施职业教育，培养职业人才，给女子有一个职业的可能，这是特别使我同意，赞成的。可惜这个女大，到现在才有创设的计划（听说五月中成立），如果在去年今日，当广州与武汉还未失陷的时候，交通方便，那我相信，两粤和江浙的先进知识妇女一定有很多会跑到延安来。与其在上海租界里花了很多的钱去进那些仅有的教会女子大学（为应中国抗战中妇女求知的需要，上海震旦男大，特地创设了一个震旦女子大学，听说是去秋办的）。边区的注意培养妇女干部，是有了行动。所以，在边区，一切都似不成问题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妇女自己争气不争气，是不是还仍旧要把婚姻当做毕生事业的活动中心，以及附带的小麻烦、小枝节，因为这不是一个政策与一个命令所能完成的。在两性与恋爱方面，需要与历史的、封建的恶习相搏斗。譬如说，边区的老百姓妇女，她们已脱出了买卖婚姻的命运——即使还有，也只能偷偷摸摸做——可是丈夫的虐待抛弃，虽然也有法律的限制，但有时一定有申诉不出的苦痛及法律所及不到的地方。

在边区，对于男女平等，的确是做到了，在任何方面

都平等了，抗大的女生与男生一样的能开荒，挑水，在从前，听说红军中，四方面军里还有一个妇女独立团，与男子一样作战。我们这些外来的，曾经穿过小姐、太太的"嫌疑的皮大衣"，所谓曾过着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女子，确实，直爽地说，有点不大习惯于这样绝对的平等。特别如我个人，体力不强，而女性的自尊心倒有一点，因之有些事情自己力量做不到，需要男性的帮助，可是又深深感到"求人不如求己"，与其求男性，还不如求自己，这种心理有时也是一个精神上的压迫。有一天，一个勤务同志赶了一只驴子，拖着两木桶水来，我因为没有力气帮他抬下，他只得去请求旁边窑洞前许多正在理东西搬家的男同志。"我这几天背酸抬不起！"一位男同志有深意地笑着回答。"为什么不叫她抬？抗大的女生都在那里挑水，她吃了饭做什么的？"勤务对他们表示恳求说，"哦哦"，好似要他们不要再这样说。他们嘻嘻地笑，其中有一位唱起："好男不当兵，好女……"大约我的面孔上表示出了一点不好意思或别的，自己见不到，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当我望着他们，他们就不唱了，哈哈地大笑起来，及至我走进窑洞，他们又唱起来了。无论在任何场所，男子对于女子这样的平等，表示得非常突出。就如过渡的浮船上吧，大家挤着，男先生们尽力挤女子、推女子，这是因为大概是在民主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尽量暴露自己的本性，哪怕是极纤微的一部分。并不需要像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里的男观客，穿着烫

得挺挺的西装，当散场的时候，在门口，站在一边，让太太们先走，为了自己的面子，不好把本性表现到漂亮的衣服外面来。事实上，如果过渡的地方，男子见了女子就立让一边，边区的女子也不会接受的。当敌机第二次（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轰炸延安时，一个熟人的夫人抱着几个月的小孩恰恰逃在城门下，城门下塞满了人，跑不出去，挤得好像是淤塞了的河道。小孩被挤在地下，如果不是做母亲的尽力去抢，小孩是要被践踏了，小孩哭，男先生们咒骂她。在这个时候，管什么老头儿，老太婆与小孩子，在逃命之前，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所以，男子终究是值得羡慕的。如果一切都平等，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担负生育的天职，像我们女子一样？大约是为了要求得这样的平等，一般的女子，大家要在军事与政治上争取地位，特别是政治，“开展政治思想”，这是一句女学生中的流行话。直至现在为止，还很少见有女子愿自动参加战时救护与保育工作的。至于生育的天职，不但男子瞧不起这件事情，就是女子自己，也谁都认为是最倒霉的，因为理由很充足：怕妨碍学习，妨碍工作。一方面，这些事实证明了现代中国女子的进步，她们并不想一定做一个女子，而想，特别想做一个人，一点也不推诿的与男子负起同样卫国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反而把妇女自己最有切身利益的事情——像战时保育——抛弃了不做。男子，瞧不起这个事情，又不尽心做这个事情，女子，又不愿做这个事情，那样叫谁来

做这个事情呢？当然，最好是大家没有小孩子，这样岂不顶干干净净？可是实际呢，又不然，有些虽然也想做国家大事的女子，有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大事的女子，她们一不谨慎，生下小孩，于是就多事了！外边的情形有时恰恰相反，外边自全面抗战一起，比较觉悟的知识妇女都自动的希望参加战时救护与保育工作，我想在边区，也一定有许多妇女，是关心救护与保育工作的。或许是这类的专门人才并不多，或许是客观上的工作条件还不能十分合于理想，但这个正是证明需要人力去求得实现的。听说当抗大女生队结束时，动员一部分女生去从事救护与保育工作，许多女生竟哭了起来，是不是认为这类工作是非常卑贱的？没有出路的？本来，战争对于我们妇女——更是中国妇女——是特别残酷的。一方面，国家需要我们去尽国民的责任，而我们自己也正不肯放弃的，拿起枪杆去杀敌人，或往前线做动员工作；一方面，又需要我们照管后代，养育后代，担负延续种族的伟大天职。男子是不应当也无权力鄙视女子的生育，如果男子不重视女子的母权，尽把女子看成感情与本能的发泄对象，或附属物，这将是十分卑劣的！结果，只不过增加男女双方的苦痛，这种苦痛如若一定要靠流血、切己的经验才能教训人，那会十分不合算的！

八路军里的军事老干部，大概团长以至团长以下的，常常是转战经年，孑然一身。他们作战的英勇，政治认识

的清楚与坚定，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固信仰，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区区小事，不算希奇了。他们是中华的模范军人，模范国民，他们个人的一切都为着民族解放而抛弃了！呀！他们是何等可爱！可敬！如果不是他们在前方日日夜夜忠勇作战，像我这样，就不能坐在桌子边写这几个字了！我们中国妇女，对于这样的男子，当然要表示崇敬与友爱！他们有些是八九岁起就参加了队伍，因为各种方面的努力，一直升到团长，有的也曾往苏联学过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这些伟大而质朴的人们的悲剧，使我联想到都德（A・daudet）的《我磨坊里的信》（Lettres de mon moulin）的一则短篇：《Arlesienne》里这样类似的事实。

也许，有一天，在窑洞的转角，他认识了她，像一声春雷把冬天的动物都惊觉了，像但丁（Dante）遇到的比德丽淑（Beatrice）[1]。"怎么？在陕北，有这样的女性！"这样的庄严，这样的美丽！一个稀有的神秘的（Occulte 的微笑，……而且，穿着一副军装。"同志！"继之一个敬礼；

① 比德丽淑，为但丁所钟情的女子。

他们认识了！多少革命的理论好似都与爱情脱离了关系，因为这在他生平，还是极生疏而极新鲜的事情。

“我们上城头看月亮去吧！”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是自由的，女的提议说，的确，延安是太单调了，没有咖啡馆，没有公园，也没有森林……只有一些黄沙，无尽的黄沙。“月亮有什么好看呢？还不如在家吃花生！”男的回答。“我们到延水边去走走吧！”女的说。“又来了，你们天天在延水旁跑，还看不厌么？”除了黄沙，只有一条时涨时落的延水，有几段清，有几段浊，没有水草，也没有一条鱼，延安，对于恋人们，这是一个严厉而单调的环境。最后，男的说：“还是去合作社喝四两白干。”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得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在月亮夜宿营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没有看过月亮一眼，不知道月亮与他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里所看到男子的抢婚，童养媳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没有半首失恋的诗，没有一页苦痛的日记，他忽然想起他是有枪的，一粒子弹，穿过女子的心胸，她倒下了……及至他回复到理智的人的知觉，特别是一位革命者的知觉，已经来不及了！

在一两年的后来，有些苦痛的恋爱事情，还引起人们

谈着上面这一幕悲剧。……已经离婚了，一共她同他结婚了七个月。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无赖地睡在她床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一天，一个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不，""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问她。"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后来，才知道她是那天结婚的。昨天我见她在街上，前面一个勤务员背着铺盖，后面，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你搬家了？"她没有回答……原来，她离婚了！肚子大大的，怀着五个多月的胎儿。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的洋包子！"他命令勤务员来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跟了勤务员滚蛋。在躲飞机的窑洞里，敌人飞机正投过炸弹，几位抗大的女生与男生在谈论着这件使他们，特别是使她们十分激越的新近发生的恋爱事件。而讨论着女子的大肚子是不是一个罪恶，怎样可以永远不成为大肚子。有的拖住牛尾当牛头，在忿然争论："妈的，他竟骂她'妈的'……"一位男同志说："谁叫你们女子崇拜权威，一定要嫁大队长？"……他们青春无邪的谈话使我发生兴趣，我忍不住加入他们的谈话："如果个个女子不肯嫁大队长，那么做大队长的，只好一生永远娶不到妻子，不是太倒霉了么？"大家笑了起来，于是他们从头至尾把这悲剧的始末对我叙述了一遍。"妇联会是做什么的？她们也不出来管管这些事情！"

她们说。

上面我已经说过，有些感情事件不是一纸命令与一些法律所能阻止的。任何事都要经过惨痛的经验，可惜中国女子从来不会使用枪来对付她负情的情人，如若有些为崇拜权威而遭受苦痛，那么是“姜太公钓鱼”，不能够怪别人了，而别人也管不到她。

有些青年男女，他们急急地要解决或太关心婚姻问题，其实，边区像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并非特产理想的妻子与理想的丈夫的地方——在“三八”节大会上李富春先生说希望现代中国女子个个成为新时代的贤母，良妻，孝女；男子个个都成为新时代的贤父，良夫，孝子——或许在将来，边区会成为男女青年找寻伴侣的最理想所在，成为青春的乐园。当有一些青年谈及恋爱的苦闷时，我有时想笑，或许他们要觉得我太残酷，可是我以为十八九岁的年龄，何必急急要谈婚姻呢？时间早得很，就算抗战十年，十年以后也还只二十七八岁，那才正是结婚的年龄。早婚的结果，常常促成不幸的离婚，多多交际朋友，建立些正当的友谊，可是不要轻易谈婚姻。“等待吧，等待到明天！”别的事情不能等待，而爱情却需要耐心等待。事实上，也只有上面几句话，是我能够赠给边区以及边区以外的青年男女朋友的。

一般地说，边区的环境，对于两性生活是比中国任何地方来得纯洁些，客观方面，没有妓院——这句话对于先

生们怕是不大恭敬的，只好请原恕。没有赌馆，没有舞场，也没有茶店，而夫妇双双跑到延安来，希期对于国家，能尽力于万一，这种例子，可说很多。在一切为着抗战与“相敬如宾”，“情爱如蜜”的情况下，他们的爱情经受大时代的折磨与激荡，是更会巩固与健康的，边区的典型的革命的夫妇，却也不少，可惜在延安，我没有什么交际，知道得不多。听说邓颖超女士与周恩来先生是一对革命的模范夫妇，他们是在北平学生时代结合的；蔡畅女士与李富春先生听说也是一对革命的模范夫妇，他们是在法国结婚的。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经过多少磨难，对于事业，对于爱情，都没有背弃，是如何地难得。萧劲光先生的夫人朱仲止女士，我比较熟识一点，她与萧先生是一对很难得的夫妇。她很直爽，也很质朴，而且一点也不外观主义，她也不像有些女子，把革命整日挂在嘴上叫得应天响；特别使我觉得可爱的，是她的简单的性格与宽大的胸襟。她能说流利的英语，金陵女大毕业后曾去过苏联。当萧主任指挥军队，一路长征时，朱女士还在监狱里，她不折不扣地坐了三年七个月的牢，足足有七年，他们没有通音信（事实上通信是不可能的）。在从前，他们曾相约谁先背叛了革命，谁就可以被抛弃而无怨。可是多少男子，在长征期间，因了事实的需要而重新结了婚，不管从前的夫人的存亡与别的一切，所以，特别难得的是萧主任，不单是一个忠实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个忠实的丈夫。统一战线成立时，她

已从牢中放出来了，前年八月到了延安，夫妇重得团聚，这在他们俩自己，我想一定是意想不到的。刚到延安，我曾在一个宴会上见到萧主任，他有着儒将的风度，朴实而多礼，只觉得这是一个堂堂的可爱的中国公民，在任何时光，总是站在最前最好的一边，他的和善态度，一点也不使你感到像一个可怕的军人——因为在我国，有些军人真是可怕的——使谁都觉得可以与他有友谊。在一个英文杂志上，我看见一篇对于八路军介绍的文字，说萧劲光将军是最早去苏联学习军事的一位军事专家，他现在担任着我们很重要的有关西北得失的河防司令，兼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的主任。"延安的天塌下来，有萧劲光同志撑。"听说毛泽东先生有一次曾这么说。萧夫人有着一种天生乐观的态度，我想也只有她，能够坐上三年七个月的牢，而到现在，这种残酷的经过，对于她，没有留着一点痕迹，她宽恕一切——哪怕是最不公正的，忍受所有的遭遇依然无条件的无怨尤地爱着这些缺点很多的人类！他们，这一对夫妇，彼此都经受过许多非常的事情，非常而不必要的苦难，读《离骚》，总感觉到这"湘水多情"与伟大，的确，湘南，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它在历史上，与近代的中国，产生了多少不平常的故事与人物。

延安也有好些无名女英雄，她们是真正的新时代的贤母良妻，可惜是常常被人遗忘了的，我爱这些沉浮在浮萍底下的妇女，她们才是值得效法与称颂的。王学文先生的

夫人刘女士，年纪快五十岁了吧，她虽然名义上没有担任什么独立工作，但能否说她不工作呢？绝对不能吧。而且事实上她或许比那些担任独立工作名义的女子还工作得多些。这样大的年纪，并且不是天足，在搬家的时候，

在延安，什么事都得自己做，不管你的年龄和体力，而延安的搬家是一种可怕而麻烦的事情——她必得帮丈夫搬书以及别的东西。我觉得每个男子，更是我们妇女，应当懂得尊敬这样的女子。还有一位外来的工程师，×先生的夫人×女士，我的认识她，倒也非偶然，谈起来，她曾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大学部学生，我的要好的女友×女士，是她的同学，在大同学生宿舍的院子里，她曾见我与女友好几次在院子里散步。那是一九二四与二五年的事情了，居然她还记得起我的名字与面貌，有一天，一个朋友带了她的一个条子给我，接着她来访我，我也去访她。不熟悉她生活的人，一定以为她是什么事情也不做的——她当然不会去立在大街当中大声叫喊说她做些什么事情——因为丈夫是一个技术人员，照理是比较受到优待，以为她就是依靠丈夫，受着优待，一天到晚在窑洞里，像个高楼上的太太。实际上，她做些什么事情呢？恐怕谁也猜想不出。她不能离那个窑洞一二小时，如果找不到妥当可托的人照看。在敌机每次轰炸时，她住的地方附近常有炸弹落下，她早该领了她的小孩下乡去，但是为了不可能，迟迟不行，放机器的零件与汽油的屋子在半山里，那些东西在延安不但值

钱而且稀有，如没妥当的人照管，有人会偷出去卖掉，她呢就担负着这个照管的责任。有些人是不会理解也不知道尊敬一个女子所做的这一类工作的，人们的眼睛往往只见一个名义，实际上，如果没有一部分人像她样做没人知道的撑脚工作，桌子的面就不会这样漂亮地摆起来的。我常常想，一个女子，她即使好像不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但如果她不妨碍丈夫，也不拉住丈夫做他的工作，那她就等于帮助丈夫做了他的工作，这种功绩是不能埋没的。妻贤，妻能安贫若素，在任何环境下，妻能总是那样，丈夫就得以安心做他的事情，而且一定能使负责的丈夫对公家事情更负责，廉洁的丈夫更为廉洁。

我不知道边区人们的婚姻是如何成功的，听有一位女同志说，通常在男女双方有意思以后，——我想中间当然有一个介绍之类的人物在里面——那么就像谈工作一样的解决问题。男女双方都把自己的长处与缺点坦白地来一个自我介绍，分析与批评，然后彼此问："你对我的印象怎样？"如若彼此回答说："好的。"婚姻就成功了！那位女同志又说："他们——指革命者们，是非常理智的。"那么，婚姻的成就，并不建筑在不断的情书，长久的年月，仔细的选择，与经常的交际……事实上，这里也没有男女交际的场所与机会，只不过在学校里，男女是同学，工作机关里，男女是同事的，但这里接触的机会是多么狭小！其它，也没有私人的宴客（谁有钱请客呢？）公众娱乐吧，那就是

晚会，可是我注意到晚会并不是一个谈情话的所在，一个男女交际的所在。实际上，为了抗战的需要，前后方工作人员是调动得非常厉害的，根本没有时间可以谈恋爱。学习的期间算是最长的安定时间，但也至多不过一年或六个月，要在一年与六个月内找寻一个终生理想的伴侣，苛求一点的人是办不到的。所以要谋解决，只有速成，但是悲剧就来了，虽然一切大前提都是相同的，但是在亲密的共同生活里，会发现许多小节目是完全合不来的。一个要吃甜的，一个要吃酸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日子一久就会刺痛神经，而有些脾气固执的人，一点也不肯让步，结果只好分离。我想大量的离婚是这样造成的。如果是理智的人，把婚姻看待做极物质的事件，那么多离几次婚也没有关系；如果感情受不起折磨的，那当然还是事前审慎一点好。老百姓妇女对于离婚的潮流好似受到十分刺激，有一次，去城外散步，遇到几个小脚妇女，大家在路旁坐下来歇息，她们就同我搭话，问我是什么地方人等等之后，她们其中一个问我："你的老汉（丈夫）呢？你同他离婚了么？"

虽然结婚与离婚是这样容易，边区将来也许会成为中国有名的结婚与离婚的城市，像美国的闻名的"结婚城"一样。在边区，而且结婚与居留时间没有关系。可是在我看一个女子要解决她的不幸的婚姻，也并不是那样容易的。就如最近，我听到的一件令我十分同情而感动的不幸

的婚姻事情。

×女同志与她的丈夫一同来边区已经七个多月，起初，她进抗大，当女生八大队结束时，她被派在×××工作，她的丈夫在一个学校里学习。当他俩在外边的时候，她依靠丈夫过活，自己的父母早已去世，家庭贫苦，弟妹幼弱，都要待人扶养。她自己是没有职业的，只好事事仰仗她的丈夫，为了这个，她受尽种种闲气与压迫。“你们这一家，把我累死了!”“都是你害了我!”……她常常受丈夫的咒骂。他不知道抚养幼弱，不单是革命者所该做的，也是任何人所该做的，因为这根本就是全人类的事情。在到边区来的时候，照她的意思，想把弟妹带了来，他们现在年纪已较大了，虽是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正因为这样，可以到边区来学习；但知道丈夫一定反对，连提议也不敢。在她学习与工作的期间里，她站立起来了，开始独立地做一个人；她还很年轻——二十多岁，也很聪明，同事都称道她做事负责，有计划，有条理。她开始发现她并不是如她丈夫一向责备讽笑她的，她也有一点工作的能力。其实，丈夫也发现出这个来了，但他却不肯承认。他继续鄙视她，说许多瞧她不起的话，以期她永远失却自信力。在一次他去访她的时候，她不肯与他同居，但到第二夜，他是那样地凶狠，她又只好忍气吞声与他同居。“以前我确实没有爱过你，现在我才真的爱你了!”这个比加雷尼纳（Karenine）更笨拙的男人，他以为这是最动人的情话。正如托

尔斯泰借启棣（Kidy）说的：“世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原恕的。”她记起他怎样欺侮她，咒骂她，他曾有情人，也常出去嫖娼，把各种毛病弄得来……待他一走，她只有嚎啕大哭，对同伴们申诉：“我受够了！”他呢，几次要求，并且已经得着学校当局的许可调她回来与他在一起学习，但她却不肯接受。“你以为你怎样的了不起，其实，你什么也不知道，连持久战也不知道，还谈得到什么文学，你一点长处也没有，文化水准吧，也太低，试问你凭什么工作？你这样不肯学习，工作是无法作好的。”他接着骂她：“你这样不长进，这样自满自足，别人几次三番要求学习都不被允许，你是完全因为我的情面才得着许可的。”实在，她并不是不要学习，恰恰相反，非常想学习，更不是自满自足，很简单的，只是她不愿进他正在学习的学校与他一同学习。总之，她不愿与他在一起。在他，也并不是真的那样关心她，要她学习，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把她弄进学校，就近可以监督，从此又可以一把拿住。一个越想近，一个越想远。

这一次，他的话，狠狠地中伤了她，“连持久战也不知道！”她跑到工作地点后面的荒山里哭了一场，同事们到处都找遍，为的怕她去自杀，找到荒山里才找着了，把她拖回来。

最近，他又并不征得她的同意，自去往分派工作的地方请求准许她调回来与他一起学习——可见一个女子还没有自主的权力，好像还须听命于丈夫——怕她又不受命，

自己跑去做一番政治工作。结果，逼得太紧，她只好表示了——虽然她还体谅他曾经有过一个爱国的行动而身体受到一点残废，对他有纯洁的同情心而一直不愿轻于表示——：“我们两人脾气不相投，而且也没有经过恋爱阶段。”丈夫气疯了，恼羞成怒，继续有三四天，天天早上找着她的女同事们骂她（那女同志，本来是我的一个女友，得着她直属机关的许可，在我窑洞里养病）：“××同志，”他对发烧到三十九度的×女士说，“她真不知好坏，这次竟又不肯来学习，我所以同她讲，你不要这样自大，你以为有什么长处，你一点长处也没有，××同志，你说是不是？×校长对我说：如你连对你自己老婆的政治工作还做不好，将来怎能对别人做政治工作呢？（但我想这位熟透人情的×校长恐怕不会说这句话，他一定会考察为什么这个人的老婆总是拒绝来学习，而有些人却在再三请求学习而不可得。）你的老婆已两次拒绝调来学习，这是不大好的。”接着，他说：“现在我还要看她半年，看她表现得怎样，你想上次有一个女同学，生得比她好，才干也比她好，件件比她好，表示爱我，为了她，我没有接受。”于是更加顾影自怜起来：“唉！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她要堕落，我也不要她了！”他忽然喊起我来：“陈学昭女士，你觉得是不是？实在我也不值得！”可是病着的女友与我，始终不说一句话。如果我还在二十岁的时候，也许我会管闲事，干脆地对他说：“你既然这样看她不起，她又这样不好，那么放手

吧，不要这个女人!”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笑了笑。每天每天，他总是噜噜苏苏翻来覆去同样的话，概括起来，是这样：他的老婆是中国女人中最无聊无能的一个女人，她堕落了，他是不要她了，不过又觉得她不无可取之处，而且因为了同志之爱，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他还想挽救她，如果她一定要堕落，她的政治总不开展，那他一定不要她了……

这种恋爱心理，实在使我发生兴趣，我想那些哲学家们，或者把这些非空谈的眼前摆着的中国人的心理研究一番，一定是有益处的。有些本位主义的人生，要显出自己好，并不是自己真的做得好，却只把别人抑下去，于是就显出自己的好了；对于一样好的东西，自己想占有它，占不到（自己占到时，又不知好好保存与使用），并不想大公无私地保存好，却只想毁坏它！有人说这是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民族的卑劣性（鲁迅先生常有这种心理描写），我可不知道！

这位先生去后，病人感到头昏，而我呢，也烦躁得好像拉紧的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又不能发，时刻对自己寻事似的，因为已有四天早上一个字也不能写，一个字也不能看，虽然他是在隔壁一个窑洞里说话，可是他的话，我不愿听却又十分想听。到后来，早上，我把我的窑洞上了锁（平常我把门开直放进阳光来，他不敲门就走进来），当他来时，我在门里回答他：“××睡觉了，没有

事吧?”始终不开门，他只好走了。

实在，这个男子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从前，他习惯于把她揉长弄扁，现在他看见她可以不再依赖他生活了，而且能很好的工作（我看到她给我女友的信，文字清楚，简洁，明了，叙一件事有条有理），同事们都尊敬她，因为她做事认真负责，他哪里不要她，正因为要她，发生恐慌而这样的。从前，他摆足威风，——特别是已经习惯了的——现在，还是这样，要她，却又摆足威风。我想，如果这一对夫妇闹到离婚，会不会正义与真理不站在她一边?离起婚来，会不会她要遭受人们说她堕落，政治不开展，文化水准太低，不适合丈夫的爱国的思想?连有的女同志也在旁边这么附和着说。

当然，一对夫妇，为了抗日，来到抗日动员工作最模范的，真正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边区，这种精神是值得敬重的，到了边区，要闹离婚，也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我同情她，却也同情他。但这好比在浪费挥霍之后，冷静下来，算一番清账，对于两人都是有利的。

有些青年——特别是男子，对于爱情的态度，我不能十分同意，有一次，一个青年，他说他同一个女同学要好了，可是再三申说是女的先表示爱他（中国男子对于这一点计较得很厉害，好似一个男子先向女子求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过几天，他说事情闹翻了，现在他为要报复她，同另外一个女同学要好了。这真使我又发怔又好笑：“你同

另外一个女同学要好，能够影响她？”“这样使她难受，她会回转来！”他说。“如果她看你同别人好，本来想回来的，现在也不回来了。怎么办？再则你同另一个好，是真的，还是假的？倘使是假的，那你玩弄你的感情，倘使是真的，如果她又回来了，那么你怎么办？再把另一个女同学抛掉？”可是现代的中国青年他们对于任何事都有极大的自信力，这是很好的，对于爱情，也一样，不过对于爱情，好似一点也不肯虚心，而且也不肯加一点忍耐。

有一件恋爱的悲剧，　其实这是充满了想象的才子气息，已经小说化了的平常的恋爱故事，并不是真的悲剧，　男主角用了希腊神话一样的叙述，讲他的三角悲剧，当他讲着的时候，黄黑色而油光的面孔上，露出一点红润，“他爱着”，我想，可是并没有什么动人的悲剧的意味，像《维特的烦恼》，《贝累阿士与梅丽藏特》　梅特林克剧（Peileas et melisande）　或者是古希腊的《十年归》等一样，我想也不用去叙述里面噜噜苏苏的事实了。总之，他是有妻子、儿女的，现在他又爱了一个女子，那个女子也爱他，彼此相见恨晚，然亦无可奈何；后来，他终究又给她一个希望，如果这次她出去工作回来（她上前方去，可悲的是在，这个女子会爱这样一个男子），他与妻子离婚。可是不管这些，有一两点使我不能理解，不可思议：既然他给她希望，与妻子离婚，为什么不在她出去之前与妻子离婚，其次，他与她相爱期间，妻子却正同时怀

孕。我佩服这类男子的精明算盘，他把两个女子操在自己掌中，一个回来，同一个离婚，一个不回来，也还有一个！不至于变成“驼子跌一跤，两头不着实”。我不能不同情他的妻，这个明知丈夫另有所爱的妇人，却还要担负着生育的责任，该怎样的苦痛！

恋爱不是人生最大的事业，即使不是在抗战期间，男女也应设法减少感情上的苦痛，免得将精神消磨在这种事件里，何况在这个时候，敌人对我们的践踏已经够残酷了，我们自己何忍再萁豆相煎，火上加油？我想该努力建立起男女间正常的公民的友谊，提高公民教育与公民道德，也就是提高同志之爱。这点在边区，男女正常的友爱已经比中国任何地方来得更接近“人”了，只要大家更加努力，既然有好的基础，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地步。

在外面（边区也曾听到过），我常听男先生们说：“近代伟大的中国大时代，竟还没有一个加德琳，一个克利斯汀（Christine）[1]，或者，一个蔡特金（Clara Zetkin）[2]。资产阶级的教育根底究竟不同，只要有一个男子在背后牵线，她就站得像样”。这些话自然不能完全否认，中国妇女本身有许多缺点，这也是不能讳言的，爱出风头，胸襟狭隘，容易自满等等。比较长进的女子，只要男子一捧，就昏头了，好像乡下人看走马灯，或者，把丈夫的话鸡毛当令箭，

---

① 克利斯汀，瑞典女王。

② 蔡特金，德国妇女运动领袖。

也有些女子欢喜学男性统治者，打官腔，摆官架，那是永无出路的。从前有一个朋友，欢喜谈妇女问题的，他常常说："女子是最投机的。"好像有一位欧洲近代作家，他说："无论怎样有学问的女子，她们的谈话，总是结束在她们的衣服上。"我也承认，无论是理论的学说与实际的行动，对于一个女子，总不及衣服的时式容易来得使她感兴趣。就如女子抽香烟吧，其实，这并不像吃饭一样是一件必要的事，可是我回国来，特别使我惊奇的，乡下的大姑娘与小脚老太婆，她们一样还是求神拜佛，骂人"杀千刀"，可是有一样不同，抽起香烟来了！就如人人认为文化较为落后的边区，我也曾见过老百姓妇女，一只小脚搁在另一只膝头上，嘴里衔着一枝香烟。但是，我想，在这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磨炼中，中国妇女已经表现出多么英勇、忠诚与贤明，这是我们还可以引为自慰的，有些小缺点是会被淘汰掉的。将来，我们会有不少游击战争的母亲，像赵老太太一样，也会有建国的女人才，特别是在这样热烈培植妇女干部的边区，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当能有不少或者竟很多的用不到一个男子来牵线的蔡特金。

九　报告，大会，晚会与小小的聚会

在延安，听报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可是这样，并不说这是官样文章，大家必得听一下。这种报告，其实可以比拟上课，有些文化水准较低的人，他们看不懂高深的理论书，但却听得懂人们讲的话，一部分人虽然不识多少字，但能力很强，或许是靠了听报告。对于我，觉得听报告特别有兴趣，因为那些报告不单是可以使我这样好像与军事及政治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知道一点抗战的形势；并且这些报告，根本就是极好而极专门的艺术作品。

可是我真不幸，住在山上，虽说不是世外桃源，消息的不灵通，却几乎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城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几天前方打得怎样，什么也不知道。偶然

有一两个朋友上山来看我，对我说起：“这两天贺龙将军有报告！”“呀！……什么时候？”“早已过去了，前天！”要探听这些报告，必得到城里去跑，向各方探听。事实上，一个女子，公事公办地老是那样跑来跑去探听报告消息，像一个包打听似的，也不大好，我又没有时间。在这时期里，我只想多坐在桌子旁，多写几个字。

彭副司令的报告，因为不知道日期及地点，没有听着，贺龙先生的报告也没有听着，一个朋友听到贺将军的报告，曾对我称道这位抗日英雄的口才，说他动人地说着许多琐碎的事情，而归结到一个军事上的战术战略里去，可是听的人却往往并不觉得他是在谈军事。认识他的人常常说着他的豪爽。我最觉得怅憾的，是没有听到项英先生的“南方游击战争”。虽说我并没有特殊的家乡观念，但那些地方都是我曾经游过，住过；那些为我所熟识的河流，田垅，吃惯的东西，以及熟悉的面孔与声音，自然是我所不能忘情的。那次谢谢成仿吾先生，他差人送了一个信通知我，说当天午后有项先生这样一个报告，信封上虽然写了“即送”，但我收到的时候，已快二时了，天下着雨，冒雨走到半山，跌了一跤，回上山，换了衣服想再走。“有四五里路呢！”旁边窑洞里一个熟人说。想想又只好不去了。当晚雨止时，有朋友来玩，说这个报告改了日期，次日早上有。次日大早，天晴，路也早干了，我就跑往陕公。在城外不远的地方遇见成校长：“昨天下午没有报告，今天也没有，

改期了!”他说。“在哪一天呢?”“还不知道。”他骑着马，急于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后来我还写了一封信给李富春先生，请求他的帮助，但是我终究没有听到这个报告。

一共我只听到了两次报告，一次，就是去参观陕公，偶然碰着那天朱总司令有报告，一次是周恩来先生的报告，也要谢谢成校长的通知，跑到陕公已二时过，报告早已开始了。屋子里挤满了人，门口站的，坐的，无法走过，谢谢一位男同志的友好行为，让了我一隙之地，使我走了进去，在泥台的一角坐了下来。

周先生足足讲了五六小时，从开始到末了，他的话是同样的沉重而清晰，也很庄严，好像是一块一块的石头，那样地沉重而有力地投到水中去所发出的声音。那天讲的是关于保卫大武汉问题，把敌我的形势分析得无以复加地清楚，他再三致力地说武汉四周的动员工作还觉不够，保卫武汉的工作并不在武汉本身，先得从武汉的四周做起。武汉不幸现在失陷在敌人手里，可是周先生的话，在保卫任何一角国土上，都应用得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赶快利用这些宝贵的惨痛的经验，改正自己的弱点。

这样五六小时的讲话，只休息了一次，我敬佩周先生的精神是这么好。在休息期间，成先生给我介绍，同周先生讲了两三句话，学生们来围着他，提出许多问题。我曾听人们带着敬畏讲到周先生的惊人的记忆力，他的能干，他的智慧，自然是非凡的。也有人讲起他处理一切事情是

如何有才能。有人说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当然，手续是十分麻烦的，一本厚厚的花名册交到周先生手里，他拿起来，从头至尾翻看了一遍，好像是很平常的，看完了，他把花名册搁了起来，“某某团从前有多少枪支，××枪多少，××枪多少，现在册子上写着这些，与数目不符，去向××查看一下，有没有弃下枪支；××连从前有多少枪支……”周先生一说，人们去查看一下，果然他的话是对的。听说他处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无论任何事情，他总是把原则推广到一切上去。在我国，特别需要像周先生这样的领导者们，中国的民族，以及历史背景所造成的种种，对于领导者的要求是非常复杂，几乎是要一些万能的人。我很惆怅未能对周先生作一个较长的访问。

那天报告完结，天已暗下来了。在我生平，可说从来没有过在这样没有灯笼，也没有同伴，独个人在没有一盏路灯的乌黑的荒凉的黄泥沙路上走，繁星光下，摸索着回到我的窑洞里。在山脚下，当我望见了我所住的那一排窑洞里透出灯光时，有无限的快乐。我理解那些行军的队伍，当走了许多许多的荒漠之后，看见了一个大城市，会如何的欢喜！那些航行在海上的船只，在一天又一天的海上生活之后，又如何渴望停靠到一个码头呢！于是在那一瞬间，我自负地觉得深深地了解哥仑布当时发现新大陆的快乐！

有些报告，虽然听不到，但还能在《解放》上读到，如像洛甫先生的《论待人接物》，是在抗大作的一个报告，

我深深地为他的宽宏与深刻所感动。我想我不怕冒昧与浅薄，现代的大政治家，他们总是文明与人道的真实拥护者。如果中国人，人人能做到像洛甫先生这个报告中所说的，虽然日本鬼子这个侵略给我们的苦痛已够多了，我们还是可以不在乎的。不幸，全国多少老实、忠心、坦白的人戴着不必要的大帽子，多少的眼泪白白地流，与打日本无关；多少的苦痛白白地磨难人的精神，好像放在磨子里磨来磨去，也与打日本无关。天呀！中国人的幸福日子不知道还有多遥远！

延安的会是非常多，我想或在我国也许要算是一个会最多的地方，可以与欧洲那些大都会相并比：群众大会，欢迎会……都在热烈紧张之中开始，也在热烈紧张与感动之中结束。好几年来我不爱参加那些群众大会。当我住在巴黎近郊 Laplace 的时候，附近的村子 Arcueil，每星期有工人的各种聚会，有时跟了邻居与房东去，有各党各业工会代表的演说，常常闹到开手枪，警察放自来水冲散群众……在祖国，我没有见过这样严肃活泼的公民聚会，一切会都在形式中开始、结束。延安的会，却有些不同，表面上，固然好似太整齐一点，但这个并不是缺点，因有热烈与紧张。

"九一八"纪念大会，欢迎王（王明先生），周（周恩来先生），秦（秦博古先生），徐（徐特立先生）四位的大会，欢迎荷兰驻香港领事与吴玉章先生的大会，鲁迅先生

逝世纪念大会……双十节听说有一个极大的群众大会，晚上还有提灯，可惜天不做美，下了一整天的雨，大会与提灯都无法举行。最使我感动而不忘记的，是拥蒋抗日大会，欢迎朱总司令，与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这三个大会。

武汉刚刚失陷，人们的心头，苦痛，忧虑……听说抗大里的女生，曾因武汉失守，哭泣终日，抗战是到了危急的关头了，谁都感觉到。

在拥护蒋抗日的大会上，第一次我看见毛泽东先生出现在大会上，并且第一个出来说话："我们只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原句已忘了，但总是这样的意思），毛先生又继续说："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伪组织，坚决反对汉奸政府，坚决反对汉奸中途妥协投降的主张，忠诚拥护国民政府，与最高领袖抗战到底，团结一致，打它十年，打它二十年，打出一个新中国来……"毛先生是那样的庄严，他的话又是那样有力，这就是我们抗战到底的最精良的武器，使用不完的武器，日本鬼子所没有的武器。是的，现在全边区的人民，全中国的人民，个个都有此心此志，这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坚固保证。打它十年，打它二十年，正如毛先生所说的，只要我们耐心地打下去，全中国人民，消极方面，不参加伪组织，不做顺民；积极方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动地参加兵役，努力增加生产，每个人执行所该做的抗战职责，我们不信日本鬼子打不出中国去！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

的。继着毛先生说话的是人们的掌声如雷地响着，那样的庄严与热烈，我不禁打了寒战。那天连女自卫军也出动了，空前未有的人众挤在那个大会场上。当毛泽东先生讲到领袖功绩的时候，人们几次肃然立正。有些青年，感动极了，掌声不绝地响着，这就是对日敌的侵略、挑拨、离间与汉奸的分化阴谋的回答。这样的喊声与掌声震动了山岳！我真的感动了！国民党的肤施县县长也出来说话，大意是以国共合作起来回答敌人的进攻，掌声自大会起直到末了，总是那样的热烈。我自己对自己说："虽然祖国内战十年，我在国外没有见到，也没有尝到内战的苦痛，但终究内战的祸根所酿成的敌寇今日的大举进攻，我切身尝受到了，使我也变成了一个流亡者，故乡被践踏着。永远不再自己打自己！永远！永远不再自相残杀！"那天当场散发致蒋委员长的通电，我拿着两份，一份寄给一位特别关心团结御侮的朋友，一份自己保存着。通电的末了有这样的话："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令全体共产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

我想中国人民一定个个拥护这个通电，因为中国人民现在最怕的是兄弟相斗，而不能外御其侮。那太恐怖，将

永远沉入地狱，万世不拔了！

人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使我的心颤抖，这支充满正义与反抗精神的歌曲，为全国任何一角的同胞所爱唱。忽然想起在汉口，一天大早在江边，看见队伍开拔，他们宏亮的声音唱着这支歌！

举行大会，平常我总是不知道的，——山上消息太不灵通——每次，在窑洞外，眺望不远的山下，渐渐地渐渐地挤起了许多人，我才猜想一定是有什么会了，等人已挤得很多很多，我便跑下去，果然有会。

欢迎朱总司令大会，我是在天近午的时候才知道的。“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了。”“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了。”……附近的一个机关里的小勤务，这个传那个，顷刻，传遍了山巅，带着疯狂了的快乐。有些人，没有吃午饭就跑下山去了，有些人急急忙忙，潦潦草草吃了几口稀饭，也就什么都不要了，去参加欢迎队伍。人们喊着：“欢迎鲁艺唱歌”，“欢迎抗大第×队唱歌”，“欢迎陕公唱歌”……接着好几个团体轮流着唱：“欢迎，欢迎，欢迎朱总司令！”起初，大家立着，后来，队伍坐在地上，时间过去了，朱总司令还不来。到三时过，我往山下跑了一次，看看没有动静，再回上山来。“远在三十里外！”大家传说。太阳已下山了，场上照不着阳光，天色晚下来，人们悄然地坐在泥地上，所有的歌也已唱遍了，人们已经开始疲倦：“今天不来了吧？”“车子坏了吧？”彼此轻轻地说，这样猜

测着。忽然间，马达的转动声自远而近，于是，卷起满天黄沙。一下子，这一声空谷佳音，使全场的人群都机械地立了起来，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来了!”“到了!”人们喊，队伍开始唱起：“欢迎，欢迎，欢迎朱总司令!”车子还未开到主席台，已被人们包围住了，听说这是篮球队，第一，要求与他们的老队员——朱总司令，合摄一影，他们甚至于老实不客气地跳上车去。朱总司令微笑着，带着满身黄沙，走上主席台……

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大会，是在下午四时以后开的，一直到夜，那晚还有提灯会，在未散会之前，我先跑到半山上，远远地看提灯，各色的纸灯都点起了蜡烛，反映出新鲜的颜色，沿着延水，弯弯曲曲地照耀着。一下子，使我快乐地想起许多幼时的回忆，当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的家乡，还是一个极讲究迎灯的地方，看了城里迎灯的人，尽可能地还要赶到硖石去看，元宵以前，灯节就开始了。在半山里站立了一歇，看提灯远去了，深秋的夜风，凉凉地吹来，终究使我回进窑洞里去，这时候，对着一灯如豆，代替快乐幸福的儿时回忆的，是一种心头说不出的狼狈情绪。把我们现在国家的情形比苏联，那真太相形见绌了。对于抗战必胜，我有坚强的信心，但对于建立一个未来的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不像许多青年有那样玫瑰色的梦想，我没有那样非分的妄想。只是希望在建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再流血了，我们的血不再流在自己的枪刀

上，必须大家理智而聪明的牢牢地团结，担负起抗战后的清理与建设工作。历史的遗产：恶习惯，非科学，非人道……还要给我们多多少少的磨难？生活将是单调，苦痛而沉重的。

除了群众大会之外，还有好些会议。在我到延安后不久，正逢着全国青年救国会开幕，会议时间足足有八九天，也许是两星期吧——几次搬家，把这个会议的约略记录失落了——我曾去旁听几天，那会议里，有全国各地青年的代表，有浙江的代表，有华北的代表，有从敌人后方，越过几道封锁线而来的代表，他们大都穿着军装。边区的代表中，有穿着短衣裤的，农民的老百姓服装，戴着毡帽，神气十分质朴，但也很活泼。我看他们对于非本地的语言不十分容易了解，所以当一位说着纯粹普通话的青年说话时，整整三小时，他们好像有点茫然于台上的说话。这个会议是个空前的会议，那次什么都讨论到了：青年参战问题，青年与文化教育问题等……

许多人已谈到过延安的晚会。晚会，这是延安的唯一娱乐。如果延安没有了晚会，那将会更加如何地单调！这是调剂紧张工作的正当娱乐。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里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虽然觉得生动，可是我常常是为了太挤，挤得——不如说被挤，手臂痛，腰背酸，而不十分有兴致去看晚会。有些较有空闲的人，吃过晚饭，五点钟

左右就去坐在那里等开幕。晚会定七时开幕，但常常是延迟的。这样老早去，可以占到好座位。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等待。在人们看起来，我既不进学校学习，也不去做工作，一个整天鬼混的客人，可是在我自己，有时连吃饭也好像是做一件事般快快了结它。每次赴晚会，我常回想到国外的学生生活：在盛夏，天要在九点以后才暗足，音乐会与戏通常是八点开始。吃完晚饭，同着几个朋友，在公园里逛一下，买了一份晚报，或者带着将看到的戏剧脚本，进剧院去。外边天色还是亮亮的，里面已开了电灯，在等待的期间，看报，看书，或谈一点天，并不觉时间是浪费了。

有几次晚会，为了太挤，在门口挤了一下，只好退出来。在我刚到延安的时候，晚会的入场券上，编有号头，进场有一两个招待，请观众按号入座。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入场券上没有号头，招待也没有了。或者是发出去的券超过座位的数目，人所以那样地挤。“为什么现在反而不编号头了?”我偶然同熟人谈起。“因为编了号头，人们也不肯按号入座。”又有人说：“票子也只好乱发，你想延安有这么多人，哪里能个个看得到呢?”我说：“要个个看得到，也不是不可能，延安的学生与工作人员，恐怕是容易统计的，统计以后，有多少人，把大礼堂的座位作个对比，一个晚会，同一节目演三天四天……人人都可以看到。”接着，我说笑话：“设一个娱乐部，由娱乐部长去管理。”

有几次晚会，特别的挤。军委会抗敌剧团第三队的晚会，简直是空前盛会。那次晚会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开幕前，听说唱了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我到时第一个节目已完了，人还在源源地挤进来，我被挤在半中，进又不能，退又不得，看见旁边坐着一排先生们，我就说："让我一角，可不可以？"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接着，他们喊起来："立着的人坐下！"但大家还是挤着，而且也没有坐的地方。幸而一个熟人救了我："陈学昭同志！"他同他的朋友让给我一点空隙，我才脱出了这个困难。那晚第三队演的节目，在歌唱方面不十分动人——歌曲的本身欠雄壮，可是演的话剧《军民合作进行曲》却不坏。可说他们是很大胆的，在这个戏里，有一点涉及恋爱，我却觉得正是这戏的好处。在抗战期间，人们还在谈恋爱，这些现象，也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怎样从复杂矛盾的恋爱小观念来服从抗战救民族的大观念，这戏很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那天的化装朗诵，在延安人的脑子里也留了一个深刻印象，虽然诗的本身欠雄壮一点。对于朗诵，我觉得可以配上音乐。如果单单朗诵一首诗，没有音乐或带戏剧性的表演来帮助，除非是极短的诗，或者是极富故事性的，不然，在观众之前，或者不会有好印象。延安自己所演的戏——第三队直属军委会政治部，这次由山西前线回来过延安，在延安作友谊的演出——都是同样的抗战与动员的戏，从来不涉及恋爱的，但事实上，中国的青年现在是不是不恋爱

呢？恐怕有些老年人，也还不能避免。延安的抗战戏剧好像太直觉一点，太简单一点。晚会的节目也嫌太单调些，特别是歌咏方面，只有合唱，独唱，大鼓，快板，既然有很多人提倡旧形式，我想很可以增加进粤曲。粤曲，这是中国极富于地方性的音乐，有人说，延安多北方人，大鼓快板之所以受欢迎，那是群众的要求。可是延安也有不少广东人，而且一定有会奏粤曲的欣赏者。在四个团体，鲁艺戏剧系，实验剧团，第二队，抗大文艺工作团举行联合演出的晚会上，我的背后就坐着一位广东女同志，等待开幕的时间里，她老是哼着粤曲。我觉得晚会里还可以加上一点短舞，在国外，我曾看见好几次，有些学校的聚会利用 Schubert① 与 Schumann 的短舞，非常可爱。在边区今日，这样一个伟大的生产运动，使所有的最进化的人用了最原始的工具去翻那些泥土，为什么还没有一支生产曲——听说已有了，我还没有看见演奏——与生产舞呢！在跳舞这方面，还没有一个可以领导的人，这也是实在情形。

那次晚会，并不单单演得好而使我感动，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会场的空气，第二队的代表讲话，人们拍着手，台上与台下，唱遍了壮烈的抗战歌曲，又继之以拍手，接着演戏，又继之以拍手……延安的青年，全国的青年，是这

① 法文：舒伯特，奥地利作曲家。

样的坦白真诚，他们是一无成见的，他们的确富有朝气。接着，他们唱起："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像一首质朴、真实、忠诚的情歌与誓词！

在四个团体联合演出的晚会上，观众是空前地拥挤，通常，前面的四排是留给边区的领袖们与特别来宾坐的，有两三个背枪的同志立在这四排凳子的旁边看守。那晚，人是那么挤，这四排凳子也坐满了普通的看客，及至边区的领袖们到来时，一个空隙也没有了，好几次动员都没有成功，结果只退了一排凳子：中间的与后边的人抗议："为什么要退后，前面的让出来，因为坐在前面的都是后来的人。"往常在人多的场所，我最怕人们打架与吵嘴，因为那才是审不清的官司。那一次空气似乎有点严重了，可是一下子，一切都溶解在歌声里了！的确，延安的人们还是非常讲理的。但是我想，每次晚会的入场券，最好还是编号头，只须把好的号头（前排）分给那些工作极忙而不能早来的边区负责人们，而严格地执行按号入座，事情不是很简单么？

四团联合演出的晚会，三个话剧都很好：鲁艺的《今天》，第三队的《死路》，抗大文艺工作团的话剧，我忘了名称。一个人的理解力总是受了自己的文化水准、教育与生活经验、阅历等等的限制，在我旁边坐着几位女同志，她们很不欢喜鲁艺的《今天》，实在住过上海的人，即使不愿与工人阶级来往的，也都认为上海的工人阶级的确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实。内地的人们，特别是农人，他们好似有一个成见，以为住在上海的人都是些坏蛋，正如我国人一谈到巴黎，就象征荒淫。其实如巴黎人常常说的："玩巴黎的人不是法国人，更不是巴黎人，都是那些美国人，英国人……"也正如逛上海四马路的人不是上海人，上海的工人们享受不到上海的繁华。那晚，鲁艺的《今天》，我以为很值得赞美一番。

"三八"妇女节的晚会，男同志要有券才得入场，女同志不用券可以随便进去。但当我去的时候，在旁边的窗口望一下，里面已是黑压压了，门口还挤着不少的人。靠着一位鲁艺里的同志的人情，把我从后门领进，但是一点空隙也没有，在一排凳子的边沿，我半坐半立着。有人提议坐着的男同志都把座位让给女同志，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但是只有少数的先生们立了起来，大部分都是坐得定定的，松也不肯松一松。"今天我们是来宾呀！理应招待我们坐。"有的男同志那样顽皮地说。有些人立得太累了，只好半当中回去，我也是其中一个。

露天的电影晚会，我只参加过一次，人们都自己携了凳子去，很有趣的，好像小时候看庙戏——我是极不爱看庙戏的，其实是跟家里人去看热闹，大家必得带凳子去。在露天空场上，人们有的坐在小凳上，有的坐在地上。呜呜呀呀的人声好似占住了半个天空。我联想起法国南方，这个热闹的城市都鲁士（Toulouse），夏天，本市组织了露

天晚会，在大圈子公园（Grand tour）里挤着将近千的人，也是这样呜呜呀呀的热闹。穿着丝衬衫的法兰西人，一边发出清脆的笑声，一边吃着用纸包着的冰淇淋。

延安有很多很多的会，群众大会外，还有各部分各工作团体的小会。欢迎何其芳、沙汀、卞之琳三作家与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的聚会，是在文协举行的，我很荣幸地收到了一张去参加的请柬。在那次会里，我认识了高士其先生。人还没有到齐，高先生在柯仲平先生的房间里躺着，他是一个半残废者，动作神经都坏了，不能好好说话，也不能好好地走路。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他是研究微菌学的，回国后曾养过许多微菌，因不慎让微菌进入耳朵，病是这样起来的。这是怎么的？我大大地惊吓！我想神经系专医者，能够研究出这是什么病。

我们谈着天，他说话很慢很慢。

他先问我来了多久，又问我什么地方人，我一一回答了他。

“那么与吴亮平同志是同乡？”他说。他的思考是很正常而敏捷的。

知道他曾经由新大陆到旧大陆，我问：

“你曾参观过巴黎巴斯德[1]学院？”

“去参观过。”他好不容易地说，好像有什么有力的东

---

[1] 法国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西把他的嘴压紧着。

“×××先生你认识么?”

“他是研究微菌的?”

“是的，他是微菌学专门者，这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学者。”

“呵!”他好似记起似的，“他是从巴黎巴斯德学院出来的?”

“他曾进巴斯德学院两次，前后有九至十年。”他的眼睛因头不能自主的移动，也失却了表情，但我看出他的好奇，当他正视着前面。

“你是一位女作家，怎么这样熟悉科学界?”

“我不是女作家，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旁边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我的朋友大都是些专门的科学者，……我越接近科学者，越觉得他们的可爱与他们的伟大，我自己，现在我后悔没有学科学。”我直率地说，忘记了当时旁边的人都是文学家，这些话或许是会得罪人的，但人们似乎很原恕我的直率，大家只是笑笑。

“×先生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关心地问，“他现在做什么呢?”

“他在重庆办微生研究所，养着许多细菌，制造血清与痘苗，抗战以来，他捐出了不少血清与痘苗给抗战忠勇的队伍。”他十分关心地听我说，“然而这种事情，是一种医疗工业，他是一位学者，可惜国家未能用他，他只能办一

个私人的研究所。”

“你很熟识他？他知道你来延安参观么？”

“他该知道的吧，在重庆的时候，大家曾一起吃饭，看电影……”

高先生的病，确实使我感动，尤其是以他这样病的人也跑到延安来，我想我是了解他的。一个微菌学者，脱离了他的显微镜与微菌，还有什么生命的意义呢？他是痛苦的。我联想到那位不幸的残废作家泼和斯脱（Warcel Proust）。

一朵又一朵，
白云躺在天空游，
像肥皂泡沫似的，
躺在蔚蓝色的大脸盆里漂，
有多少人天天在白云底下奔走；
……
……
哦，我是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高士其先生的诗《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刊在延安出版的第二期《文艺突击》上。

他的孤独，他的无可奈何的对祖国对人类的热情，他的疾病，谁能了解他像他自己所感受着的？正像泼和斯脱一样。

听别人说，高先生现在想翻译一些哲学的作品，但是找不到一个录写的合作者。延安有无数的青年作家，大家好似都要自开炉灶，竟没有一位愿做高先生的合作者。

开会时，柯仲平先生与林山先生扶着高先生走到会议室里坐下。

欢迎者们与被欢迎者都说了话（何其芳先生没有说）。卞之琳先生简短地说："一个作家，就是以写作为职业的，……实在不配受欢迎……"大意是这样。这几句没有文人口吻的质朴的话，很使我欢喜。

散会后，全体赴会者到工人饭店去会餐。我没有终席就走了，一个友人来邀我去赴晚会。

听说以前已经有过一个欢迎外来作家的会，在那个会上也提议成立一个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的。那一次会是不十分快乐而散了的，为的一位受欢迎的青年作家在欢迎会上骂政治家。

在那次聚会里，我还遇见徐懋庸先生，起初，听见一位个子不高，满口绍兴音的先生立起来说话，说过话，这位先生恰恰坐到我旁边来："这位就是陈学昭女士？……"

他客气地问我。于是我问他："尊姓?"他告了我，但我又立刻忘记了，不善于记人名的我，当友人们介绍朋友时，我总要问几遍。直到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里，听着徐先生说话，才终于知道了。"我听××纪念会上有同志说你到了延安。""呀!"于是随便谈了一些话。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大会里，徐先生说了些直率而慷慨的话。在延安，我也曾听到人说着他过去的笔墨官司。我离国八九年，从来不关心国内的文坛，根本就不知道其间经过了些什么，所以很平常地听着他的话。那天，徐先生说："一个青年，他走上革命的路，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说这条路谁可以走，谁不可以走。"（原句忘了，大意是这样。）这几句话我很同意。革命是不是一定要资格？哪一种人一定革命的，哪一种人一定不革命的，或者哪一种人配革命，另一种人不配革命，谁能够武断地加以类别？如果革命或抗日一定要资格，加以挑选与类别，那不知道干革命与抗日的只剩下多少人是有资格的。因为既是人类，总有缺点，不是神也不是圣。徐先生还很年轻，看去四十左右，实在听说仅三十岁，人是极聪明的，不过有极浓郁的绍兴味，好像一把快刃的刀，很是锋利；但如果没有这点锋芒，恐怕也就不成其为徐懋庸先生了。

十　絮絮谈延安

1　衣食住行与生活的氛围

怎样说说延安生活呢？我想只有用美丽的诗才能形容于万一。可是我的笔太笨拙了，只好把这个意愿留给延安的诗人们来实现吧。

我不会正襟危坐地来叙述，亲爱的远方的朋友们，让我只能乱七八糟的絮絮地谈，今天谈一点，明天谈一点，毫无系统的，而且非常主观，可说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生活。

延安本身的生活是十分单调，十分枯燥的。衣食住行这几项，譬如就说穿吧，除了老百姓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这里没有什么乔其

纱……一般说来，八路军里的老干部——当然不是个个如此，我也曾见过棉军装胸口的油迹泛出来，也许可以炒几只菜呢——穿的都整齐清洁，打着极“军人的”绑腿，那些学生，他们穿着军装，但姿势就及不上八路军里老干部的军人样，绑腿也打得不顶好，往往很随便，也很脏。有的学生自己说在外边穿惯了西装，穿起军装来再要讲究也弄不好，那么穿着军装也要经验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能怪我现在穿得不成样了。果然穿衣服好像纯粹为着御寒蔽体，没有什么时装之类的东西，但是也有些青年，特别是女孩子，在我平日的观察，也常常为要表现自己的特点，把帽子恰恰偏向左边或右边，或斜下一点或耸起一点。如果偶有一天如此，那是疏忽所造成的，但若天天如此，那或者同“美”这种观念有了关系。有一时期有好多孩子的头颈里束着一条颜色的丝围巾。女子是特别欢喜表现自己的特殊性，那些未来派画家以为将来女人的面孔上都要刻字表白她的特性与性别的。现在，艰苦的抗战期中，我们只好玩一点小花样，将来，新中国建立起来了，当国家有余暇来留意化妆工业，那时候香水，香粉，市面上有多多少少，尽少女们去选择吧。

我觉得一个男子，需要有一点外相的丑陋，一个天生相貌整齐的男子，如果再加上种种修饰，那么只能请他到蒙马脱（Montmatre）去给女人玩，他不是一个事业型的男子！天生成美的男子，必得有严肃的工作与严肃的性格

才能完成他天生的美，对于女子，也正是一样。

说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边大家都知道了。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牛肉呢，难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鸡蛋绝对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现在，初春的美丽季候，只有菠菜，白菜绝对没有了，其它菜类与冬季的一样，不过荤菜增加了鸡蛋而已。在故乡，这个时候有多少时鲜蔬菜，更不要去说那些河鲜海鲜了。晚上，在窑洞门口"欣赏自然"，（这里的有些朋友爱这么笑我）我就会想到这些南方的吃的东西。"春笋烧杭州的家乡肉汤，该多好吃！"对一个朋友说。

"女人都是馋的！"那个朋友露出一个有意义的微笑，这样回答。

"女人都知道辨别美味，男人却只知道吃！"我笑了说。

在延安，吃菜是无法变化的，吃来吃去只有那几种菜，而且烧法与一般的家常菜或南方馆子里的完全不同，往往放许多胡椒、茴香、葱……很辣或很酸，有的人对我说这样的菜就是军队里的特色。如果不到延安来，那我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军队里菜的特色。这里一般的大师傅都是四川人，这些长年长月吃得很酸又很辣的怪味的菜的人们，也是我觉得十分敬佩的。那些有胃肠病的人，他们有着一个稀奇的，可怜的与古怪而碰不起的胃口，一定会感

到说不出的单调。其实我想，对于吃这件事情，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关心，因为这是事实上的需要，直爽的人就说出来，如此而已。在延安，每当人们初次相见时，第一句问语是："你做什么工作？"第二句是："你在什么地方？"第三句就是："你吃什么饭？"粮食方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馍，但有附带条件，碱不能放得太多，能够发酵（这里所做的馍都没有发酵的）。如果切成片，在火上烤一下，有一点焦，那就很像面包。有一次，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斤蜜，蜜的颜色不像南方的，也没有南方蜜的那种香味，或许因为北方没有种花，只有一些野草花，原料不好的缘故，可是我疑心那不是纯粹的蜜，或者是商人在出售之前搀和了粉的。偶然把烤烘过的馍片放上一点蜜，很像果子酱。边区三边一带是出产牛油的，但延安市上不见有出售。其次好吃的是大米饭，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习惯下，馍虽是好吃，但似乎接连着吃就乏味了。第三是大米与小米合烧成的饭，第四是小米与红豆烧的稀饭，第五是小米稀饭，第六是小米饭。这是依我个人的爱好而分的。

使我感到不惯的，只有三样，第一就是吃里面的，白糖与糖果，别的两样是厕所与澡堂。

延安很少能买到白糖吃，那些饭馆与合作社，他们有是有，但不肯卖，因为他们要用以做八宝饭，米子固罗，雪花菠菜……这些甜点的。老百姓店里的白糖很少也很脏，红糖比较容易买一点，但真脏得太可怕了。我没有买东西

的技术，觉得我去买东西老百姓索价总是很贵，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衣上面孔上有什么特殊点？有一位某太太，她是在这里做客人的，每天要上街上去买东西，一天到晚找吃的，几乎把延安的每条街每家店铺都认得清清楚楚。她会买到一元一斤的白糖，但我却访了两星期，总是碰钉子：“一角大洋一两，卖给你四两。”走到一家摊有白糖的老百姓店铺，店主这样回答我。“半斤也不卖？”“不卖！”我脾气来了，“这样奇货可居，索性不要！”我想，就掉头走了。终究，我还是请教某太太，她告诉了我一家店铺，买到一元一斤的白糖。这是洋白糖，日本货，那家看去是小小的店铺，却有很多的洋白糖。有些什么东西，店门口什么也不写出，连招牌也没有，轰炸以前家家店铺有招牌的。在延安街上的商铺摊头，有好些日本货，我怎么敢说是日本货呢？在去年十二月里很少很少见到的东西，像洋磁碗这一类，因为汉口失陷，来源陡然断绝了，现在忽然多起来，并且一套一套的很多。这些印着“天津，直隶省”的火柴，我想也是日本货。据说这些东西是从太原及黄河边岸来的，那么是走私的。这样的抗战，真是艰苦，为了需用，不得不用仇货，但是多少钱又流给了他们。这一点也证明只是打，而不从事建设是不成的。我想延安可以用一个不用仇货的口号，提醒一班老百姓。在目前固然有些不得不用的东西还只好用，但该尽量省却那些可以省却得下的东西。重庆去年七月间的本产白糖市价为二角五分一

斤，现在不知涨了多少价，但我想无论如何总不会到一元一斤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改进川陕公路上的运输，同时希望边区也尽可能地发展一点简便的日用工业，这正是他们近来所做的。这里为了号召发展手工业，曾开过一个工业展览会。

实在，在延安住了快九个月，我已吃了近二十斤糖，当来的时候西安一位朋友曾告我需要带点糖来，我就带了十斤。其后，朋友又托人带了十斤白糖与五斤牛奶糖来送我过中秋，接着这里又有朋友送我十斤白糖。爱吃糖，这也是一个不良嗜好，人生活上的一个弱点，但不是我自己替自己袒护，我不抽香烟，不喝茶，也不吃花生，就是吃一点糖，不是可以原恕的？一个人的愿望会随环境而变迁，现在，不要去说什么牛奶糖，果子糖……只要有白糖吃，已经会欢天喜地了。

说到延安的厕所，或许有很多人会皱眉头。其实，越往西北走，厕所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这里的特色。厕所是我日常生活上感到最不惯的事情。

我的住处，有一处离红十字会很近，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女厕所，茅坑打得很深，有木盖，经常维持得也还干净。后来，我搬了家，带着十万分的惆怅离开了那个厕所，就此非常糟糕。延安的一般厕所，茅坑打得不很深，有时用泥墙围起，那已是算好的，没有门，男女不分开。陕北的老百姓，就无所谓厕所不厕所，他们干脆就来个满地黄

金，到处是天然肥料。一九三九年的新年，一个晚上，中共中央宴请延安文化界及客人们，饭后，我已经走了，熟人把我喊回来坐上一辆载重车，偶然看见毛泽东先生与王明先生，他们坐在车上去赴晚会。在车上，毛先生与王明先生说着笑话："延安有几多？延安有三多：雪多，山多，"王明先生接下说："茅厕多！"好些人忍不住发出了笑声。"多么方便，不像在外边，有时要跑好些路才找得到茅房，在延安，只要你需要，茅房就到处都是。"

接着毛泽东先生与王明先生谈着北方的好处，毛先生说："月亮清……""如若在汉口，这样的月明夜里，日本飞机又要来了，"王明先生说："那么这又是延安的一个好处！"

北方的气候干燥，月亮非常皓洁，天空没有片云，特别是在积雪的夜，一点风也没有，只不过空气很冷，明月照着积雪所反映出的光，使人产生一种贞洁与恬静的感觉。如果驾着一辆小派利（雪橇），在积雪的月光下飞驰，那真有说不出的风味。

是的，延安还没有过夜袭，就是在月明的夜里也没有过警报，或者天气太冷吧？飞机上的马达不容易生热，还是敌人认为不需要夜袭，还是因为山多，夜袭对于轰炸机本身的危险太大？

延安还没有一个女澡堂。

说到住，一般人大家知道是住土窑洞，那些泥房子潦潦草草的，为了省钱而如此造的，这方式我想恐怕是八路

军带来的。那些土窑洞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有时也可以打通。在延安，住的问题可说是最有趣味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迷信与盗贼的地方，可说是一个最痛快的地方。回想我平常一到家乡，人们是那样整个沉在迷信里生活着，一到家乡好像鬼跟到了脚跟边。从前，在别的地方，我独个人从来不住旅馆，为的不知道旁边房间里住的是一个什么人，杀人犯还是流氓……常常听到人们讲许多黑暗的事件，使我不能安心。好在住旅馆的机会非常少，旅行到一个地方，总有亲切的朋友家来招待我。我也最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住家，每次租房子就发生这些困难，不知道邻居们是怎样的？我欢喜光明而无一点黑暗的生活，可以绝对公开的生活。其实我也并不一定害怕社会的黑暗面，不过见到了有些稀稀奇奇的事情，就像碰到了脏东西那样会令人呕吐难堪。在延安，你窑洞的附近，你的邻居们，或者是农人出身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革命者，他说话有时带着“妈的，妈的”一点土包子的神气，但他是非常质朴、诚挚，使你感觉得他是一个人，一个堂堂中国人，没有什么可怕的，甚至于还觉得可爱。有时是一个什么机关或某一部门的负责人，一天只见着他忙忙碌碌的，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简单，谁对谁都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勤劳，使你心中不由得发生感动与惭愧的感情。

说到行吧，边区地广人稀，走一二十里路不见一家人家，那是意料中的事情，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连绵不

断。我曾经想象这个地方将来变成新中国的重工业区时，交通工具的发展情形，普遍地用升降机，还是用爬山电车？在目前，大家用两脚来走。西北地方与南边不同，在我们那里，走二里三里也好，五里、十里也好，就有田舍村庄或有一个凉亭，走路的人可以在凉亭里坐坐歇息。如在夏天，凉亭里还有茶喝，这是乡村人一定备着的。这种凉亭该就是驿站，旧诗词里最多写着这些凉亭："水驿灯昏"，"人语驿边桥"，水，桥，凉亭，在南方人的日常生活里确实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在西北，可就没有这些东西，走许多路，特别是在炎炎的夏季的中午，路边买不到一点开水，就是有店铺也不出售开水或茶的。这里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骑牲口，马，驴子，骡子，这里的老百姓不用说是长于此道的。八路军里的老干部不论男女也都善于骑马，这是使我最惊叹不止的。其中有些南边来的人，他们也学会了骑牲口，"南人乘船，北人乘马"，这是半原始时代的交通原则，在今日的西北似乎还可以应用一部分。这里的道路都是黄沙泥的，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树荫。今年，生产运动大号召的结果，边区种了十多万株树，去年本已种了相等的数目，几十年后，这些树将成为柏油路旁在靠背长椅上坐着乘荫歇息的地方。目前，大家暂时满足这些缺陷而为这个地方的光明与简单的生活氛围而愉快着。

延安的实际生活大致是这样吧，可是，这个要算全中国最最贫困的地方，却是令人十分留恋的。我想，当我离

开延安后，会回忆它。我太爱延安生活的氛围了，有些青年他们老说："延安生活真痛快，在延安，精神上真痛快！"但是他们说不出为什么痛快。吃小米饭，当然是不十分痛快的，拿一块钱或两块钱的津贴一个月，这是很好了，这还是八路军省下来的钱呢，但是用起来恐怕并不见得痛快的。那么痛快在什么地方呢？我倒曾经思索了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我想最大的原因，用我们家乡话来说，"政治清明"，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以及领导得好。其它的原因呢，我想是因为清明的政治反映到了社会生活上。社会生活，它是这样的光明，坦白与纯洁！说句对先生们不大恭敬的话，这里没有妓院，没有茶馆，也没有酒楼。来延安参观的人们住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他只能看到一部分的延安的面目：人们的紧张工作与学习，艰苦的饮食衣住，抗战的热情……但延安真正的好处，使人留恋的地方要稍久住一些的人才会深深感觉到。

在延安光明纯洁的社会生活里，我想到莫泊桑小说中所描写的现实的黑暗社会生活。我想莫泊桑当时一定用着失望与呕吐的心情来描写这些黑暗的。人们说在莫泊桑死后，发现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圣经》。如果是现在，不知道莫泊桑的枕头底下会放一本什么书？

2 日子

在我刚到延安的时候——八月初——还是盛夏，天气

早晚风凉，中午很热。北方的夏天本来少蚊子，多苍蝇；在陕北，特别因为垃圾满山堆，大头苍蝇非常多，恬静的午睡常常给吵得不能安枕。再没有比这种大头苍蝇更使人讨厌了，它并不来咬你一口，给你感到痛楚，不，它却是扰得你坐立不安，在你的疲倦之中，它得到胜利。我完全不懂这种苍蝇的心理与生理，为什么当它飞进一个窑洞，它总是飞来飞去地飞个不停，一边嗡嗡地响，就是这样，使你烦躁。十四五年前，一个夏天，当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开第二次年会，编辑股里的某君常常因苍蝇吵得不能午睡，索性打苍蝇。同股的一位先生时常同某君开玩笑，某君觉得非常讨厌：“你是我的苍蝇!”同伴们说他这是一句最好的情诗。

自从身体不好，我就一改过去的习惯，早起早睡，不在床上看书，也不在夜里写东西。在延安，我还是这样，上午我从不出去，除非同人有了约。近晚有时下山去看看熟人，但我最欢喜的，是当我白天写多了字看多了书或洗多了衣服的日子，在晚饭后，黄昏，有熟人来同我聊天，移出几张凳子，在窑洞门口的泥场上，三两个人捧着几块西瓜，一边吃一边谈。

“你在这个时候还留有西瓜!”某君说。

“西瓜要在晚上风凉的时候吃更有味!”我说。

“呀！是的，法国人是很会享乐的，恐怕你也有点那样?”某君惊叹着微笑说。

"那不，一点也不！"我不禁带着决然的口吻。

"人家说巴黎是多么繁华呀！"某君说。

"但不能说这是他们的享乐。我得说法国人是很知道享受生活的，从前俄国几位大作家，对于法国文学有修养的，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他们常常爱称道法国人知道享受生活。这是一个极善于把生活与工作配合起来的民族，这个民族是极富于和谐性的。如若他们一味只知道享乐，当普鲁士士兵攻向巴黎的时候，他们怎样能把敌人赶出去呢？就是现在……他们有爱国的热情，而且，知道工作。"我说。

但是某君的话终究还使我思索了一下，有时候一个人的话可以变成几个人的话，几个人的话可以变成一种舆论。我虽不是道学家，恰恰一点也不是，但也恰恰不是享乐者，像某君所想的。有时候，在茅房里遇到一些不相识的女同志时，她们要这样问我："你来中国几年了？到延安几时了？"我总是想笑。"我是浙江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这就使我往自己身上检讨，我穿的是军装，同延安别的女子一样……那么难道我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使人觉得特别的地方？在外边，我是顶欢喜布置自己所住的地方，在不浪费与不奢华的原则下，反正钱是用正当的努力去换来的，不是抢来，不是骗来，也不是刮来的，怎样使用我的钱，自己有绝对的权利。但在延安，我根本没有布置我住的窑洞，只不过把东西理得整齐些，尽可能地使灰尘少一点，

这是目前我私生活上的原则。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延安，就使暂时不离开，我也不想布置一个家。在离开南昌的时候我已决定不再摆一个家，将来，抗战胜利后，回到老家，我要像从前一样的布置一个家。抗战期间，就是身边带着一点衣服，我也想能穿它几年。在我窑洞里唯一的奢华品是一只木椅子，花了三块钱定做的，可是远远及不上在齐华先生那里见到的他们的木椅。可是现在我马虎极了，从前，桌子一定要多少高，椅子多少低，配合起来才觉舒服，现在有一只木椅坐我已觉太幸福了！我曾梦想一只能坐能躺的木椅，以前我在一个医生朋友的待诊室里看到的，坐着非常舒服，并不需用弹簧；马海德先生有这样一只类似的木椅，听说曾花了九块钱，想了几个月还没有决定去做。

某君，常常在黄昏时来谈天，果然也明白他不是特地来看我的，他是来看他的女友某女士，她不在，他就来看我，一边谈天，一边借以消磨厌烦的待人的时刻。但我每次总当他特地来看我而招呼他。

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不大好，他好似羞怯，这种羞怯会给陌生人误认为骄傲。他是有一点脾气的，执拗，强硬，但也还和气，聪明而比较真实，他对于女子有正确的观念，这或者是使我不讨厌的原因。

他要我谈法国的风俗人情，与法国的文学作品，我欢喜听他讲他的狱中生活。他曾坐过四年牢，在那里消磨了

最宝贵的青春。我从没有听到人像他那样不带一点奋激的感情，或者一点自负，他，却甚至于带着一点惆怅来叙述苦痛的狱中生活。坐过长期牢狱的人，因为生理与心理上所受的迫害太大，神经有时会失常，往往使他们变得冷酷而古怪，但某君，他没有。

“春天，从窗格里看见许多男男女女走往环龙公园去，那个时候的心里，……不想着是在狱中还好，当想起了是在牢狱中……”

我从没有尝过那种生活，会不会在那种生活里，我会发疯？我想人类最大的智慧，是不是叫他忍受冤屈？

有几次，他在我处谈了一个黄昏，回去了，好像没有见到她，因此次日大早，他又来了，她还没有起来，我正在漱口。她住在二层楼，我在三层楼 这是我用以分别山上窑洞的高低的 就是说她住在我底下的一排窑洞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某君在我的窑洞里谈天等待他的女朋友回来。有两次，两个青年男子问到我的窑洞里来：“某女同志住在哪一个窑洞里？”某君自己回答他们：“在底下，第二个窑洞！”我偷偷地端详他的面孔，觉得他很理智，没有表示出一点难受。当然，他是曾经受过比这种苦痛更难堪的苦痛。

一晚，某君又在我处谈天，他曾下去看过两次某女士，她总没回来，到十一时，他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实在，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就在她所住的窑洞底

下一座泥屋里，同着两个女伴招待一位宾客，她们的歌声笑声，在某君与我谈话的时候，清楚地听得到。某君走了，我爬到床上，笑声与歌声还在静夜的风里一阵一阵送进我耳朵——附近机关里的人那天大约都好像去看露天电影去了——我一时情绪有点复杂，自然更联想着某君。

次日大早，某君来了，某女士还没起来。我正在洗脸，被也还没有铺，人觉得十分疲倦，昨夜睡晚了。我已有了早起的习惯，不论在夜晚十二时或大早一二时睡觉，太阳一出，天一亮我就不能睡觉，必得起来——反正是睡也睡不着——这样夜里睡不好的日子，往往使我不想吃饭，也不想做事，很烦厌的。

等一歇，某女士上来了，蓬着头发。“昨夜回来晚了，回来后又睡在床上看画报，今天起不来了。”她没有着落的对某君说，一面望着我，我装做没有听到她的话，掉过头，远远注视半山里两个小勤务在开玩笑，打架。

“夜里不要贪看书呵！”某君露出一个父亲似的微笑。他同她下去了。

“她有什么画报？”我想。我唾弃那些欺骗的友谊与欺骗的爱情。但我忽然想起在克莱蒙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她老是前门送走一个男朋友，回转身来后门又接进一个男朋友，——前后门通两条街——她的父母却为这些生气。“或者这种行为，对于一个正在选择伴侣的少女，是可以允许的？”只有这样想，使我减轻一点替某君的难过。

某女士约有二十三四岁，欢喜运动，篮球掷得很好，从前也还会写诗，现在，她是一个技术人员，相貌不丑陋，却也并不美丽，看去好似还聪明，好些人曾在我面前说过她的坏话。星期六与星期日，来山上看她的人非常之多，在许多上山的人中间，十个中倒有五六个是来访某女士的。我甚至于对她有一个不好的念头。“那或者还不至于吧！”有时我又觉得她还不至于如此，但我也没有注意她。我觉得这类女子的生活，同她交际的人很不容易认识她的全部的。我同她维持着平泛的交际，见面打招呼，说“今天天气好”之类的话。

几个月后，我已搬过家，从某君口中也知道某女士已到近乡工作去了。一天午后，我去看一个同乡的病，我窑洞里另有一个生病的朋友睡着，急急忙忙地偷出时间去一下，拿了一罐人家送病人的牛奶去转送病人。刚下山，在山脚下遇到某女士，两人就一同走。她一路招呼三三两两走过的男子，该都是她的朋友。

“你到什么地方去？”她好奇地问。

“到那边！”

“那边看什么人？”

“看一个朋友！”这方面，大约我有一点所谓外国人脾气，我从不欢喜去关心人家的私事，也不欢喜人家来问东问西关于我自己的私事，哪怕是不关重要的，自然更谈不到秘密。

“我知道你去看什么人!”她笑着说。

“呀!你知道，那说出来看看呢!”我说，也笑着。

“你去××看×××，”她露出似有深意的微笑，“不要骗我，是不是?”

一下子，我几乎要发脾气了，这个讨厌的如此庸俗的女孩，她这个猜测是肉麻当有趣的开玩笑还是带有恶意的? ×××，这是一个小孩子，虽然我还够不上做他的母亲，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大姐姐，有时候他来我处吃饭，怎么?! 在她看起来，他可以做我的情人? 在她看起来，我是这样容易爱一个男子的?! 在她看起来，我也是到延安来找丈夫的? 或者，竟还可以同她这样二十几岁的少女做情敌…… “也算荣幸!”……总之，所有的思索都归结到一个不快乐，甚至于觉得受了侮辱。照中国一般女子的办法，表示一个女子或与一个男子无涉，就把这个男子毁骂一顿，“瞧不起”之类的话，可是我不会也不愿这样做，我想说她几句，但又尽力抑制，不过我的脸色一定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点什么，末了，我还是笑了起来：“呀! 你以为……那你还没有认识我。”

前面走来三个男子，齐声招呼她，她立定同他们讲话，我同她就分别了。

“你不要生气呀!”她远远地还向我喊。

我还没有脱却不快乐的情绪，但已开始悔恨自己没有涵养功夫了。

近过年的时候，一个凄凉的雪的黄昏，去看一位工程师夫人　　她快下乡去　　回来，路上遇见某君，他从几百里外回延安，骑着一只高大的马：“昨天我差一点跌死，这头马真胆小，过桥的时候，它不敢上桥，倒退下来，把我跌在河里，幸而水浅，冰也不厚，可是我也晕过去了好几分钟……”

次日正晚，他来看我，在我处吃饭。

“唉！”他忽然叹气，“我这次跑了一圈回来，快活多了！”他说。

“噢？”

“你大约知道我与××的……”他微笑着说，望着我，找不出适当的字眼似的。

“呀？”我避掉他的眼光，担心他讲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如果他统统对我说而问我呢？

“这次在××，一个夜里，很无聊，而战争空气又十分紧张，在期待战斗的时光中，大家围着炉火谈天，他们要我讲自己的事情，我说我一生曾经爱过三个女子，但这三个女子都不爱我……他们听了，大家捧腹大笑，其中有一位对我说：‘你怎么好意思讲出来的？’我肚子里也好笑。那晚他们个个说有多少女子爱过他们，追求他们，可是我想，不见得个个是真的吧……”

我不禁笑了起来，他曾对我谈过从前爱过两个女子，都没有表示就分开了。他说话非常含蓄，而我对于这类事

不爱问，始终没有道着一个头绪。

“在我爱第二个女子时，她的女友曾劝我对她表示，我不敢，后来想想又后悔没有表示。这一次，我表示了，又碰了一个钉子……想想很不好意思的。实在我不知道对女子该怎样，我一点也没有经验。”

“那是没有什么的，谁没有碰过钉子?”我说。

“实在，她这个人是很吃亏的，你大约也听到人家说过她的话……我曾劝她，理解她的人很少……对于我，也会引起误会与不利……现在是好了，完结了!”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

接着，他向我讨纸笔，写了一封信给她，因为附近的机关与那女上工作地方有联系的可以托带去。当我拿浆糊给他封时，他抬起头来，对我笑了一下。

“我本来想不写信，但又想该告诉她一声，不告诉她不大好。”他说。

事情是该当完结了，但是他还要写信给她，还没有完结！如果她是一个明白的女子，她该当更明白地表示态度，倘使以为接受这样的友谊多多益善似的，那是她的不好，因为他一直可以梦想以为还有希望。

过了几天，我又搬了家，他跑来，默默地坐着一歇，不说一句话。突然，他说：“一个人真矛盾，我已去看过××一次了!”

“呀?”

他显然十分苦恼，但我能说什么话呢？这类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如果这个人要爱一个不爱他的人或者不忠实他的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关旁人什么呢？

过了两三小时，他立起又坐下，好几次，还是在我处吃了饭，依旧是那样苦恼，走了。当然友谊是无法也不能给他安慰的。

某君，在我看，不但在感情事件上，他将是十分不幸的，就是在事业方面，恐怕也不容易快乐的。他的相貌不很端整，使人发生一点可怜或可怕的感觉。这类的相貌是很不容易得女子欢喜的。他的感情似乎太细腻，简直是那样地碰不起，可说是带一点女性的。他的性格使他忧郁，而这种忧郁，更随着他的性格扩大起来。其实他有一个质朴的性格，但他偏偏要学奢华，受过种种压迫，而又想尽力猜测人的心理或想法迎合，因之，变得如此复杂。人家对我说他有时的烦恼是很简单的，譬如对于×，这是上海人所谓“蜡烛”，他并不在道义上接受某君的好意，他越是捧他，他越是摆架子。其实，这是何苦呢？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人，真理正义总还是一样的，何况在民主的边区！并且某君还可以向上告状，终究他只是一个小团体的负责人，而在他之上还有别的人可以请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不幸的人！某君一定受过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颂赞，因之他自己所信以为这一部分有特长的，而旁人的观察恰恰不以为然。一个人是常常会被某时期某些不负责任的人的偶然颂

赞而走迷了路的，这就是认识了洋钿的正面而还不认识反面的人！某君，他有这个自信，再加上一点懒惰，那他能做些什么呢？

搬家又搬家，同某君隔得更远了，某女士已离开延安，不再听人谈着她，就是某君，也不再来我处谈天了。

在十一月初，阴历只有九月底的天气，早晨，霜很浓，铺在白菜地里与山峰上，淡淡的一层颜色，使人起一种"已凉天气"的感觉。沿着延水的公路上，很早，很早，就有人骑着马在飞跑，"马滑霜浓"，在这里是一个现实的景象。骏马应该赠与英雄，可是脂粉不当赠与美人，美丽的人何用脂粉呢，脂粉是用以掩饰丑陋的。有时，立在窑洞外，望着那乱草已枯了的山与那连绵不断的黄土，觉得异样的凄凉。"塞外草先衰"，北方就是这样。在故乡，秋天的野外，有芦花、柿子……说起柿子，陕北也有柿子，但远远没有杭州柿子的大，在这里我恐怕一共没有吃上十只柿子，根本不爱这种水果，也就不去关心它的价格与味道。

陕北有很大很大的雾，有时把太阳遮了起来，雾很低，整个天空与地面都变成迷迷糊糊的。怪不得从前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因着实际环境的需要而发明了指南针。

夏、秋是陕北水果最多的季候，是一年中可说仅有的吃的季候，有西瓜、小甜瓜、梨子、杏子、桃子（桃子与杏子很小），还有沙果，红红的，大得像苹果一样，一角钱可以买到八只十只。接着，有白蒲枣、胡桃。有人从西安

来，说在洛川一角钱可以买到一百多个胡桃，可是在延安城里，增加到几倍的价格。吃着胡桃，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老年人弄补品吃，把胡桃肉、桂圆肉、瓜子肉、糖、猪油……和在一起蒸几十遍，拿出来吃，这东西的味道真好。在他们是吃补品，对于我，却仅只为好吃解馋，常常偷开柜门拿来吃着玩。

我非常欢喜延安的夜，月夜也好，黑夜也好。黑夜，同几个朋友在小路上走，望着城外一角的一带窑洞，一层一层的，透出灯光，完全像船停靠在九龙，所望见的香港，也从 Haute ville[①] 瞭望 Lompgne 的村景。这是我最欢喜的夜景，它使我高兴，又使我很不高兴。有时候，我坐在窑洞门外一只小矮凳上，朦朦的夜光下，远处的延水反映出丝丝白色的影子，像一个我见过的海港口的夜景。常常在窑洞外，觉得好似在船甲板上，我的下意识里总要以为我脚底下是水而不是山沟。

延安的冬天，并不如何可怕的冷，特别是去年，听说不算顶冷。雪在十月中就下了，前年，"九一八"那天就下雪了。雪花很大，真有点像棉花似的一朵一朵。下过雪，太阳就出来，阳光照着连绵不断的积雪的山，天空发出皓洁的反光。我想若在平时，人们一定欢喜欣赏这个雪景，但是这个时候，一般人的脑子里自然地会这样转着："天这

---

① 法国南方的一个城市，高城。

么好，敌人飞机怕要来吧!”天一下雪，山路很难走，特别是上山下山，两只脚不够劲，只好用两只手来帮忙。我觉得去年的延安冬天，就像天津北平一样，远远及不上哈尔滨冬天的冷。夜里很少有西北风，不过空气是干燥的，冷的。人家对我说离延安向西北八九十里的地方，就比延安冷多了，有人甚至于说延安的北门外比延安南门外就要冷些。照情理讲是通的，不过我个人的感觉还没有这么灵敏。

初冬的黄昏，常常望见隔着一条延水，那面对山的窑洞前，烧着一大堆火，火光一星一星的在暗中飞跳着，我忽然起了一阵惊悸，在电影中，我看到原始时代——就是现在有些未开化的地方还是这样——杀人总是在晚上，当烧着一大堆火的时候，那就是杀人的标记了。晚上与火是一个可怕的信号!这些火光使我想得很远，它把我引到历史里去。杀人!这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可是，事业并不是杀人所能完成的。如果要痛快，乱杀一阵，混杀一阵，把一个一个的人统统杀光，那不是再痛快也没有了?!可是你的事业呢?事业是需要理智的，而不是感情的。忽然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我的思绪会这样脱空了实际，边区，这是一个民主的地方，也是讲人情道理的地方!它坚决反抗日本强盗的虐杀，而在全世界爱和平、反法西斯的队伍中，它是忠实的一员。

冬夜，在窑洞里，如有一两个朋友，围着一盆炭火谈谈天，那是最快乐的。这好像有一点诗意，有一点懒惰，

但在这种半原始交通的地方，没有现代化的娱乐，哪怕你是从纽约、莫斯科来的，你也没有办法烦躁，你也只好安于这个。我非常爱冬天的小小窑洞，洞里放着一盆炭火，会使你觉得好像住在欧洲中世纪的地窖里。有时，我把炭火故意放在地上，那就更加像了。

大早，天刚亮，邻近八路军的警卫部队，已在那里出操了，他们在一块出清了雪的小场地上跑步，瞄准，一，二，三……他们唱起歌来了，"……东洋鬼子真猖狂……"他们的影子，在清晨初出的日光与积雪的反映里显得更生动而有劲，好像傲寒的冬梅。虽然很冷，但每天早上，我总欢喜站立在山上观看一歇，这个景象使从暖被窝里出来的人，一下子记起前线残酷的战争。所有他们唱的歌我都听熟了，只是听不出词句来。

严冬，延水连底冻了，人与牲口都在冰上走来走去，一片美丽的冰场，可惜买不到溜冰鞋。延安的冬天生活，是干燥而单调的。其实，也不单是冬天如此，经常是十分单调的，你只要看一看城门口站岗的武装同志与抗大女生穿的服装有什么分别？有时候远远的连男女也分不出来，因为这般单调，恐怕绘画的人感到束手了。

开始解冻的时候，过河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延河上过渡的桥，只有总工会前的一条是好的，其余都很糟糕。有的是在水中小石块上再放小块石头，有的打了木桩，上面搁几条圆木头，用细得像两股线一样的铅丝缚住。可是人

走在上面，圆木头就滚动起来，老百姓的小脚妇人走到桥边，两手匍下，用她的手与膝爬过去。我希望边区政府建设厅能够把过渡的桥建设一下，其实，并不需要花多少钱，只须把那些圆木用大钉子钉住，圆木中间用一些干柴干草像结辫子似的结着，那么一则不会动了，二则就不会滑了。

有一次过河，我掉在河里。那条所谓桥，是用狭而薄薄的木板搁在小块石头上，石头又搁在石头上，……脚踏下去，木板一滑，脚就落在水里了。那里的水有一点深，我连忙伸起，已淹到了膝头。后来，我绕了许多远路，才再渡过河，走回家来。

阴历年的前几天，有几个朋友曾开玩笑说要到我处来吃夜饭。炭是五天之前就没有了，自己曾出去买过两三次，老百姓说："留着自己用的。"唯一的棉裤与棉鞋都湿了，情绪是十分恶劣的。

回到窑洞里，有两个朋友在那里，他们一望见我，就出声笑起来。"我掉在河里了！"我对一个朋友说。"当然，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另一位朋友说他的"呆话"。当我坐在小凳上，回过头来，看见放炭的地方有了些炭。

"我怕你今天还没有弄到炭，所以叫人拿了点来。"那位朋友说。

很不好意思，因为昨天我曾同他开玩笑："如果明天来吃饭，请带点炭来！"

他没有说什么话，可是我觉得他做了很好的政治工作。

仅仅为了这点炭，一下子眼前都变成快乐而光明了，人就是这样物质的，一点也没有疑问。我自己，我也最不会用嘴巴来安慰别人的，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上许多一句也不着根的劝解话，不会开这类空头支票，觉得如若没有解决的办法，说上千万句不关痛痒的话还是徒然的。

一九三九年的第一天，早上九时左右，日本鬼子来了七架轰炸机，投了几十个无结果的炸弹，走了。给我们拜年。在炸弹声中我们过了新年。阴历年夜的上午他们又来掷了几十个炸弹，敌人以为最懂得中国人民的心理，他们以为那天老百姓为预备过年，一定拥挤在街上，一定是没有什么戒备的，而且新年元旦来，旧历年三十来，以为这是最好也没有了。谁知警报放得早，大家都跑走了，他们依然没有达到目的。

过新年，元旦，延安不但各机关一例用国历，就是老百姓也用国历。在这里，街上没有出售日本鬼子替我们印的刊上五色旗的皇历。在使用日历的习惯上倒已完全统一与一致了。年初一，附近的机关送了些花生与糖来，糖留了一点给自己，花生全请了客。到旧历年初一，西安的一位女友，托印度救护队带了一包年糕，咸瓜子，榨菜来给我，真是“喜从天降！”但在延安，什么事也瞒不了人的，那倒并不是有什么包打听传达消息，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的缘故，哪怕是最最小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吃方面的事，一下子就可以让许多人知道。

“你这几天收到了好东西?”

一个朋友赶来，坐下，就问我。同时，他在窑洞里用他锐利的两眼观察起来。真的“家徒四壁”，他看不到什么。

“怎么?难道已经吃完了?”

我只是好笑，“你怎么知道呢?”我说。

“明天请我吃饭，我相信没有吃完!”他说。

“明天我要出去。”我笑着说。

“不管你出去也好，我们也要进来，把你窑洞里的所有吃的东西找来吃个光。”他开玩笑地说。

年夜，几个朋友在我处吃饭，瓜子在一小时内吃完了，年糕也吃完了，只剩下一点榨菜。到次日早上，近午饭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好像做了什么恶事似的，一些形容不出所以然的面孔，“昨天的鸡不是还没有吃完?”

“今天我是不想来的，×，昨晚回去的时候，在路上，他就说明天再来吃鸡，今天他来约我，我说不去了，真的，我自己斗争了好久才来的。”

当我来延安过西安的时候，一位熟悉延安情形的朋友曾对我谈及吃的事情，他说刚从延安出来的人，他们见了熟人就说：“你请我吃饭!”说这个的确是事实的需要。我想如果我回到成都，重庆，我是不是见了朋友也要他们请吃饭?

陕北的春天，非常可爱，青天无片云，天气暖暖的，

气候十分干燥，爽快，在祖国，我还没有度过像这个地方那样干燥的春天，只有国外，当我住在法国中央高原的时候可以比拟。一到春天，日子长起来了，衣服穿得少了，感到轻松。但是，讨厌的风，那是我所最讨厌的东西，刮起风来，窑洞的门窗格格地响，灰沙从门窗隙里一阵一阵飞进来，满天灰尘黄沙，比浓雾更厉害，走在路上，什么也望不出来了，飞沙走石那样的呼呼作声。

“你怕什么呢？它不会把窑洞吹去的。”一个朋友说。

但我并不是怕窑洞给风吹了去，我只是讨厌那声音，而想能够制造出一个可以克服风，比风更大的声音。自从我憎恶赌博，对于玩麻将之类的事情不发生兴趣了，但是一有时光，我还想玩玩麻将，不赌钱，纯粹玩，或者弹钢琴，弹高音的曲调。但在延安，这两件事情都办不到。

在未到延安来之前，我曾在一份外国报纸上看到一位外国的朋友的文字，说陕北多斑疹伤寒，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其实，并没有这个事，这位先生一定弄错了，用普通常识来说，冷的地方，急性传染病总比较少。陕北连普通伤寒也很少，像白喉等等都很少。就是流行性感冒最多，特别在春天，这个风季，大半是这个讨厌的风带来的。譬如早上很暖和，太阳也很热，一下子刮起风来，顷刻就凉了，风是那么大，人们呼吸的空气来不及经由鼻孔而暖和一点就吸进肺部，有些生长在南方的人，或没有大风地方来的人，一连感冒几个月都有的。

在欧洲我过了七八个春天，星期日的晚上，无数的人群从近郊回来，每辆电车，每辆公共汽车，每辆地道车里都溢出了铃兰花的香气。“巴黎人真傻!”年年春天看到这个景象，我有点厌烦。但是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每到春天，看着桃花，我总要想起那些情景与那铃兰花的芬芳。春夜，那快乐而热闹的Vogue（流行）的音乐与露天音乐，从温暖的空气里送来，使人不想睡觉，恨不得飞了起来。听惯了这种音乐，再来听祖国南方春夜的池塘蛙声，是怎样的单调！现在，再来听这陕北的蛐蛞!（住在延水边的人有时可以听到一二声蛙鸣，住在山沟里的人只好听听蛐蛞!）虽然是单调极，但也聊胜于无。“今夜偏知春风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它报道春天已至。不过，这里的窗上一律糊的白色油光纸。

延安的春天只有风声，夜晚很少蛙声，清早很少鸟声，“处处闻啼鸟”在西北处处不闻啼鸟，有时候，偶然听到一二声鸟声，像白头翁，有时一声鹧鸪，把我的耳朵刺激得直竖起来，可是要追寻却又没有了！麻雀与老鸦，这是延安最多的鸟，特别是老鸦，竟是那样的多，它们胆子很大，一群群的人在它们旁边走过，也不惊飞。倒使人想到养家了的鸽子似的。当我无聊地站在窑洞门口透空气的时候，这些乌老鸦也变成我研究分析的对象，它们的叫声实在太讨厌了，可是，我觉得它们是极有智慧的。有一次，旁边窑洞里的邻居，他们大约刚刚抛了一点什么果子壳之类的

东西，接着锁上门出去了。他们一走，一只乌老鸦，它飞到洞前，像一个偷儿似的，蹑手蹑脚地走了几步，又斜着头倾听一下。在法朗士的小说里曾写着一只“受过训练的老鸦”，后来我在一个城市里，真的看到一只受过训练的老鸦，这只老鸦，当人们走过广场同它玩的时候，它好似还会骂人的。本来是一家人家养着的，因为它常常把孩子的玩具衔到楼顶或别的地方，被赶走了，说是老鸦富于贼性的。西北的春天，它是没有一样能使你感觉到南方的气息。只有在雨后，一种青草的气味，潮湿的气味，使你嗅到一点熟悉的醉人的南方的春天，使你联想起那些池塘，河沼，亭榭楼阁，与秀丽的山峰。

近晚，延水边浮着一层烟霭，这情景使我想起南运河边。一九三四年春夏的夜晚，我常常同着朋友在南运河边散步。有时候，就在早上，我独个人出来走走，有些西班牙果菜车，早晨他们从街上推过，一边叫喊：“鲜美的桔子，鲜美的香蕉，鲜美的青豆……”每一种果菜上都加上“鲜美”两个字。有时我不出去，偶尔走到阳台上同他们开玩笑：“有没有‘鲜美’的豌豆？‘鲜美’的樱桃？”有时我就跑下楼去，向他们买点水果。晚上，他们推着空车静静地回去。有一晚，月亮下，我站在阳台上玩，一辆果菜车经过。“你可还有‘鲜美’的香蕉？”我俯身依栏轻轻地问。他笑了：“还有七只。”“好，卖给我吧！”我放下一条绳子去，他把香蕉结在绳上，好像吊井水一样把它提了上来。

但是给旁边的朋友知道了，结果我自己只吃到两只。但愿快快赶走鬼子！我还可以去过过故乡的有青蛙鸣叫的夜晚，也还可以去吃吃那些鲜美的香蕉！

3 陕北的古迹，陕北的美人，陕北的名菜，陕北的朋友

陕北该有极多的古迹，古极古极的古迹。但是现在往什么地方去找呢？而且毫无头绪，手边一本书也没有，想找一本《延安府志》都找不到。

延安，看看好像远远及不上我家乡的一个村镇的大，但是，它还是“府”呢，老百姓至今还叫“延安府”。延安又叫“肤施”，在外边时，一个熟人曾说这是有典故的：仁慈的黄帝为救一个人，把他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一只贪馋的神鸦吃，所以叫“肤施”，就是施肤的意思。小时候我曾看过一本古时传说的书，曾谈到这个，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可是，就使记得清楚，也并没实际用处。

有人说杨六郎就死在这一带地方，他的坟墓就在附近。延安的城外有一个很大的坟墓，墓身已看不出来了，只看见许多蟠龙的石柱、石碑，这些东西给了我很多的想象，但仅仅是想象。

在从前，因为这里接近京城——长安，每次统治者的变换，这里的人民总是最早受到影响的，同时，又是军事上极重要的地点。陕、甘、宁、青这些地方过去有多少血

染成的历史！古诗里有许多歌颂塞外的诗，从那些诗里我们也可以想见一点当时的情景。

离延安不远的地方，听说有一个“马超洞”，不知道与马超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延安附近有一个山，叫清凉山，上面有几株树，还有一个很大的破庙，跑到山上远望，延水若带，群山像一只一只的盆子。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开始陆陆续续往海边一带移？恐怕已不易查考。现在我是浙江人，但听从前家里老年人说，我们原来本是河南人。许多人都要集中在海口这个情形，实在是并不好的。抗战以后，我希望我们国家，要有眼光来建设内地，而特别要注意建设边疆。建设边疆，就是保卫边疆，同时人们也不会因贪海口都市的繁华而集中在那些地方。譬如一个人的发展，脑、心、肺、胃、肠、手足……都要平衡，才能健康。边疆，犹如人的四肢，如果边疆弱，哪怕心肺……都好，这个人也是不健全的。

在历史上，陕西是出产美人的，杨玉环就生在陕西。陕北的美人，现在如我所见的，就是同我小时候家里那些“绣像绘图”的小说上所有的简直一式一样：杨贵妃式的，圆圆而粗粗的身材，圆圆的鹅蛋脸，眼睛是单眼皮，厚厚的肿肿的，眉毛稍些上竖一点。有许多女孩子，她们生得健康而美丽，可惜她们很少洗脸，面孔上总是有鼻涕干，灰沙同汗所积成的东西。头发也总是蓬蓬的，最可怜而又

讨厌的，很小年纪，她们大部还裹了脚。

我刚到延安，住在城里，那家老百姓家有一个女孩，生得有我一样高，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孩，长圆面孔，壮圆的身材，完全是典型的陕北美人。我曾同她搭话，问她识字不，她回答说不识，问她为什么不进识字学校？她说她年纪大了，其实也还只十五六岁。她又说她的弟弟是进学校念书的，现正放暑假。原来，没有几天之后，她就出嫁了，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没猜想到，只在一个中午，看见院子里有许许多多的男子，哄哄的热闹得很，问了人，才知道这是房东人家做喜事。很简单的，前面有些穿短褂的男子引着，新娘穿着红衣服哭哭啼啼上了铺着红毡（陕北是出产毡毯的）的毛驴子，媒人骑在后面的毛驴子上跟着；在媒人后面，有人扛着一些圆的饼，小小大大地积叠起来，像我们那里的塔饼，但这里是用麦粉做成的，也没有馅子。下一天，她回门来了，满头戴了红红绿绿的纸花，打着哈哈的笑声，旁边机关里的小勤务们向她问长问短，她快乐地回答他们，但我可替她有点不好意思，竟不敢望她。

美的观念与美的标准是随着风俗习惯而改变的，欧洲人认为希腊式的鼻子——额角到鼻子是平垂的——是最美的；大眼睛，双眼皮，也算是美的。中国人爱单眼皮的眼睛，与细小的眼睛。一位南方熟人对我说，陕西人说话多鼻音，认为多鼻音话的地方的人，是很媚人的，这是根据

什么说的？不过我不欢喜陕西美人的单眼皮眼睛，好像永远睡不醒似的，那倒是我的实话。

延安除了合作社外，老百姓开的馆子也不少，但是如果问到陕北有什么特别的菜，我却回答不出。

“我会做三不粘。”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三不粘？”我不懂。“这是陕北的名菜！”人家对我说，怎样地好吃，而且是甜的，待我吃了一次，天知道，其实就是溜黄菜，不过是甜的。做法顶简单，把麦粉与猪油、蛋黄及糖和水放在一起烧，烧到一个沸的适当的程度，就成了。我呢，把它变通办法，因为不能多吃油，只放了一点点油，把麦粉与蛋黄及蛋白都在内和糖与水烧起来，就像Crème（乳蛋配制品）一样。有时我把它做了冷下来吃，那就像冰淇淋。朋友们赞许我这一点小小的发明，“三不粘冷吃”！可惜买不到茴香精，如果放一点香味，那就十足像冰淇淋。在延安，也许可以卖到四五角钱一杯呢！

我这样反复地谈着吃，恐怕人们一定要以为我是一个极贪嘴的女人，或者以为延安也像别的地方一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家在讲究吃，那倒不是这样。我说，在延安，并不如人家所猜想的连饭也吃不饱，有时候也可能，还可以弄一点吃的玩意儿。

“军人合作社口蘑汤，抗大合作社八宝饭……”熟悉馆子的人把名菜一一背出来，我很少上馆子吃东西，这方面的市面一点也不灵通。

“听说法国人非常爱热闹，没有客人过不来日子，你大约也有点这样！”一位朋友看见常有人在我处吃饭，对我说笑话。

“哪里！”我几乎要跳起来，“我一个人可以几天不出门，几天不同人讲话，你以为我最爱热闹，最怕寂寞的？”我说。实在，我是最讨厌一般人的消遣——聊天。我是并不欢迎朋友来吃饭，要热闹——也有些人需要热闹，非热闹不可的人，但恰恰不是我——他们并不是我请来的，有时我甚至于很烦躁，倒并不是舍不得一点菜，因为有人来总不好完全不理他们，浪费时间，不能做事。在他们通常是做完了事到我这里来找点东西吃吃，在我却被他们扰掉了做事的时间。但是我总不愿表示我的烦躁，只好把它克制下去。平常总是这样很巧的，当我烧了一点东西，就有朋友来，好像有人去通知他们似的。有一次，我好不容易靠了一位熟人在一家合作社买到一点糯米，放在一只纸匣里，拿到近住处才发现已漏去三分之二。把剩下的烧红枣糖粥吃，刚刚烧好，第一口放进口里，两个朋友来了：“你吃什么东西呢？”我真的只有笑。

在外边，我看见有些好客的人，脾气是各人不同的，有的人欢喜把菜的价目在吃的时候讲出来，表示这些菜的有价值，表示他对客人的尊敬。这使人觉得尴尬，觉得虽然请客，而并不如何舍得的。又有些人欢喜在吃的时候，说这些菜是经过了怎样复杂困难的手续而做成功的，好像

把请来的客当做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而什么也不懂得似的。对于请客，我欢喜欧洲人的习惯，他们通常是不大请人吃饭的，总是要好的朋友（外交的宴会不在此例），通常他们请茶点，会客的日子，每星期也有指定的一天。

托尔斯泰小说中描写旧俄的家庭是如此，但不知现在怎样——他们并不用很多的菜请客，像我国那样。他们却是用认为最好而知道客人欢喜的菜请客，如果客人吃得很多，主人就表示极大的快乐，认为他的菜是成功了。我也欢喜那些温泉疗养地与乡村里的馆子，他们的菜是很带家常色彩的，每上一只菜，饭馆主人——通常主人自己兼做大师傅——出来问你："这只菜好吃么？太咸么？"如果你表示太咸，他真的就拿进去给你换一只来。

有一次，在鲁艺前的坟堆边，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他的朋友"××"，接着，他马上开玩笑对他说："你要去她那里做食客么？"

我想，在边区，不知有没有食客这东西，该是没有的吧。

在延安，像我这样自己烧点菜吃吃的人是很少的，一般人因为工作关系，有钱都上馆子吃，就是女同志，自己会烧菜的，也这样，所以友人们到我这里来吃东西，变成特殊情形之一了。

边区社会，特别是八路军里的老干部，他们不像外边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有特殊的友谊——或者这种友谊，在

他们看来是不是奢华的灵魂所造成的？——这里是有一种普遍的友谊的作风，你看他们之间彼此相见，一般都是非常亲热，他们曾一同经过多少艰难困苦的日子，大家九死一生，这种友谊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及一切彼此都太熟悉，所以当几个老干部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外边来的人掺在里面，显见要感到陌生与隔膜。但我想人总有一种偏爱，譬如说吧，某人同某人结婚而不同某人结婚，这是一种偏爱。譬如有些人欢喜同某人在一起做事，这也是偏爱。所以我想还是有友谊，有特殊一点的友谊。

“某某常到这里来玩么？某某常来看你么？”有人会常常这样问我，我想我不是一个机关里的负责人，也不是延安的交际明星，哪里会有许多朋友呢。在延安，我还没有什么朋友，一个人到了中年，很少有机会能交际到那些所谓知己朋友，当你走入社会，你就会感到事业与学问上的朋友是那样难得。有的人爱名，有的人爱利，有的人爱……除非你一丝一毫的事情也不做，否则总要碰到嫉妒这类感情。好胜是人类优良的感情，但如果这个感情扩大到近于嫉妒，已经有点讨厌，因为嫉妒会蒙蔽真理与正义。如果由嫉妒而走到阴谋，那不但讨厌而且太丑陋可怕了。在延安，经常有一两个年纪轻的小朋友到我这里吃吃饭，倒是有的。

4　轰炸的前后

在第一次轰炸（十一月二十日）的前几天，日本飞机

来侦察过好几次，十七号的大早吧，大约六时半，一只银色的敌机飞得很高，从西往东南，飞了一圈走了，有人还望见它掷下一把传单来，但谁要看呢，他们真是白费了纸张。那天早上在窑洞门口，我清楚地望见高空有白色的一点，可是附近机关里的人，有的在喊："苏联飞机！"有的拍着手："我们自家飞机！"可是，自家飞机何必飞得那么高呢？事后，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只得承认今天又是敌机来侦察过了。

"延安山太多，不会来轰炸的。""延安只有上午十时到十二时飞机能来。"这是一般人的论调。侦察机在早上六时半就可以来，我想对于聪明人，这个事实是值得研究的。第一次轰炸到处多少有点损失，而延安第一次轰炸的情景，我不愿也不敢想象。

延安的空气里有了紧张的气息，但城里依旧拥挤着人群，到处是人声，笑声，话声。大家有时候谈到轰炸："会有"，"不会有"，总不外这两种。

一位长征过的女友，曾再三关心地叮嘱我，如果敌机来轰炸，叫我马上跑出窑洞，到附近山沟里去躲。长征中，她有经验，飞机的炸弹常常把甘肃一带的窑洞震塌，压死过不少人。我在住处的四周，曾仔细研究地势，什么地方是较为好的，但我也研究不出比我窑洞更好的地方，我倒曾想过如果窑洞塌下来，该怎样爬出去，可是只想了一下，就没有再想下去。

听说在好久之前，就有疏散的号召，但是老百姓的店铺一家也没有减少。“机关里还在造房子我们搬什么?”他们说，还好像以为叫老百姓疏散掉，机关里可以来做市面。老百姓是非常执拗的。

二十日，这是一个晴明的星期日，学生们照例到城里买零食吃，看朋友，上合作社吃饭……平常，上午，我从不出去，为想做一点事。下午三时以后，人疲倦了，需要透透空气，需要走动一下，有时我就下山进城绕一个圈，买点水果回来。这天早上，八时左右，×来了，她说××因为胖走不动，今天不来看我了。我正急于写，移一只小方凳放在门口：“你请坐吧，好！在这里晒太阳！”把一本杂志交给她：“让我写好这点，我们谈天！”我背向外，太阳从门口进来，晒暖我的背。

“拍！”“拍！”清脆的两下枪声——后来，有人说听到三下，但我只听到两下——我立起来，挺了挺胸口，伏在高度与椅子不相称的桌子上，胸口常常不舒服。站在门口，我说：“哪里来的枪声?”

“打靶子么！”×用她们家乡口音回答我，放下杂志。

轰炸机的沉重的声音，嗡嗡嗡，像一只了不得大的爬虫似的，已经到了头顶一样。“飞机！轰炸机！快往里面跑！”我这么喊，把门关上，转身往窑洞里面跑时，炸弹已下来了。

飞机的声音远去了。走出窑洞，远远地望见西山一带

冲起烟与沙土，那边大概是落了炸弹。不知窑洞塌了没有？特别是一些熟人住在那一带的，大家心里惶然着。

许多人从山下奔上来，有四位女同志，两位男同志，跑进我的窑洞，大家叙述各人的感触与所遇，×君的女友×女士也跑到我的窑洞里，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她的另一面。她在城里，没有听到警报，因为工作地点人声很闹，飞机已到了头上，她抱着显微镜拼命奔出来，投弹时，她刚到城外，等一阵炸弹投过，她再过河，跑上山，在山下的窑洞里躲了一歇，一位同志把她的显微镜代收了起来。跑到她自己窑洞，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她又跑到我这里来了，在危急的时候，她并没有抛弃那工作工具，显微镜，在这个时候，买起来也得几百块钱呢。

飞机又回来了，一个炸弹下来，把窑洞门震开了，泥土像浓烟一样飞扬起来，扑进口里。空气受到剧烈的震动，“毒气毒气！”有一两位女同志喊。“不是毒气，泥呀！”有人回答。这次的炸弹好像落得离我们不远，窑洞狠狠地抖了几下。我一时心事也担足。“会不会这些泥土掉落下来？怎样掉落下来？”我想。但窑洞只是震了几下。

飞机终于去了，一场大惊恐过去了！在任何场所我欢喜把自己提出来，在旁边看，这个时候我又把自己提出来。有的人，装出极大的镇静，心里未始不惴惴然；有的人就一任他感情自然地流露。其实，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死的威胁之前，谁都有一点惊恐，不过依照各人的性格，分量上

有一点差别。前年，在南昌，有一个朋友，当每次轰炸时，他在炸弹声里数炸弹："一，二，三，四，五……"

这时在我窑洞里有一位四川籍的女同志，面上有一点天花的疤，她惊惶得那样："怎么办？"连连问，一面两手蒙住耳朵，把头缩得碰着壁角，我忽然想起鸵鸟是这样来躲避人家去捉它的，觉得好笑，但又不敢笑。可怜的女孩，她是从大后方来的，从没有遇到过轰炸。

在这种时光，有些人欢喜挤在人多的地方，在南昌时，一位苏州朋友，他的家眷下乡去了，常常到我家里来过夜。"如果我不下来，请你们喊我！"他上楼去，再三叮嘱我们。敌机来夜袭，他一边跑下楼来，一边喊："这是空袭警报，还是紧急警报？"平常，我们坐在客室里的沙发上，女仆的脚一直伸躺在地板上，也不觉得不舒服，呼呼地睡着了。但当这位苏州朋友在的时候，他扰乱了人们的镇静，"怎么办？"女仆就连连地像小孩子似的问，一个胆怯的人是很容易把他的胆怯传播开来的。有时，在警报之后，我们把藤椅移到园里乘风凉，"月亮这么好"，大家诅咒月亮。"紧急警报来了之后，隔多少时间飞机到呢？"苏州朋友提出这一类问题问另一位朋友。"我怎么知道呢？"朋友回答。在暗夜里，他拉住了我的衣袖，我忍不住想笑。这位四川女同志使我想起那位苏州朋友。

嗡嗡的声音远去，消逝了，每个窑洞里出来了许多人，大家站着，互相问："炸了什么地方？"可是大家都答不出。

有的人莫明其妙地呆立着，好像正在找寻梦境，是耶非耶的心情。在我附近的山下，落了好几个炸弹，一，二，三，四，五，六……仔细远看，有几个洞，沿延水边，有一两个人倒着，再往另一面看，倒着一个人与一只牲口……第一个负伤者上来了，是一个住在边区医院的新从卫生学校出来的年轻医生，耳朵上流着血，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好似被什么凶恶的野兽咬了一口，惹起了忿恨，有点兴奋与特别。这一下，残酷的现实开始摆到人们的眼前来了，希望炸弹一个也没有爆炸的人们，心是颤抖了。

十时多一点炸完，到下午三时还不见有人出来做救护工作。“怎么山脚下的人还没有去救护？怎么的？”有一两个红十字会的女看护站在山坡上说。人是走来走去很多，大家探听轰炸的情形，好似群龙无首。终于，谢天谢地，保安队的担架出动了，边区医院的救护队也出动了。在延安，什么都是战斗员打头阵，让我赞美你们，延安的保安队！

我烧了点饭，给躲飞机的朋友们吃，吃过，他们都走了。我想出去看一看炸过的地方，但是邻居的朋友托了我一件事情，要我在天暗之前不能离开窑洞。

人声呀，哭声呀……接连不断，从山下一批一批地上来，轻的负伤者，由人们扶着走，重的，抬着，有的到医院已救不活了，又抬出来……我没有心绪做事，又不能走开，就把震破的窗纸撕下，重新糊过。我趴在窗口，望见

整个对面山上所经过的一切。

好几年来，我同医院好似结了很大的缘，医院不是在对面，就是在隔壁，医院常常做我的邻居，许多值得描写的凄惨情景从我眼睛底下过去，可是从来没有像这一天轰炸受伤的情景使我难过的。

到六时过，天快暗下来，我独个人摸下山去——电筒给人家借去了——先到文协会，看见区平先生与一个小勤务在理最后的一点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搬掉了。今天在轰炸时，有一位先生把门反锁了在房间里写东西，锁匙放在别人身边，想想看！真糟糕！后来他们乘飞机打圈的空隙跑出去了，回来门上锁匙都已打开了，每人被偷掉了被褥与书籍，这算是小小的损失。

整个的延安城，好似穿上了丧服，是的，今天死伤了一百多人，街上没有一盏灯，人们垂着头，默默地迅速地走着，店铺都搬空了，再也听不到老百姓的“偶”“偶”（陕北人说“我”字）的热闹声音。碰见一两个面熟而不知姓名的人，就彼此慰问：“你好么？”感到一种同危难的亲切。

一只负伤的毛骡子，在凄凉的街上独自跑着，它是痛楚还是在找寻它的主人？它该是被抛弃了的？显然它的主人觉得它已经没有用处了。我的心真的凄伤了！

机关合作社，西北旅社一带的房屋倒塌了，满街瓦片，死的已埋了，伤的已抬走了，没有什么，只有一片荒凉。

出城门时，遇到某君，“某君，你陪我走一节路，好不好?”天已暗足了，幸亏某君是抽香烟的，身边有火柴，我们走几步，燃一根火柴。谢谢某君，他不但陪我过河而且直送我到山上。

在城外一条路上，暗黑中，有人在装电线，机关一面搬，电线一面装，这种军事化的迅速是八路军最强最强的地方，看见有人好好在工作，哪怕是极小的工作，极不被人看重的工作，我就快乐起来，我们还有希望！中国人的命运还是乐观。

山上机关搬到近郊去，城里机关搬到近郊来。人声，哭声，马蹄声，人马杂沓的声音，一直闹到天亮。到早上二时半，我还守着窑洞，没有睡觉。

我的直觉，今天——二十一日——日本飞机还是要来轰炸的，什么理由，我说不出。不过我觉得日本鬼子是这样的，他们要扰乱我们，要炸一个“下马威”。对于延安的轰炸，我还没有经验，不知道要炸成个什么样子，而窑洞的抵抗能力究竟怎样的……我决定二十一日早上到较远的城外友人那里去。

起来，天没亮足，五时半，其实，根本一夜没有睡觉。附近机关还没有搬完，地上堆着许多白布……等等，人们正在不断地把这些东西装到牲口背上去。旁边窑洞里的一位朋友，前几天曾约好一个城里朋友今早去看他，本来早就该去的，因为前几天下雪，积雪，溶雪，山路不好走，

已改过一次期，今天是不能再改期或失信了。我很想劝他今天不要去城里，这句话已经在口头上了，但是没有说出来，“就是女子妨碍男子忠于他们的职务”这个思想使我耐住了那句话。

渡河时，红十字会的看护队里的两个女看护，正从城里扛了一只桌子向山上来，她们远远招呼我：“昨夜来不及搬完，今早再搬！”

晨是寒冷的，清寂的。

过清凉山渡河的地方，在文协会转弯的街角摆水果杂货摊的老太婆，她同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坐在岸头，旁边还有一只大木箱。她不再是那样狡猾，顽皮，平常同她买花红，她把烂的给你，却抬起慈和的眼睛，望着你。她现在的神气好像一只忽然断下翅膀的鸟。“昨天受惊了吧?”我说。“自然哩！你想我们房子四邻都中了弹，我……”

我望着她的木箱，“只有你同她?”

“我们等老汉，老汉回家去搬东西了。我年纪大又走不动！”

“可不是?”我望着她这一双可怜的小脚，“快不要把你娃娃再裹脚了！放了吧！”

天下着浓雾，像小雨一样，空气是冷的。雾在我的大衣领上结成了一片白色的薄霜，我觉得很冷。隔着延水，在雾里远远望见有些人影在移动，不知往哪里去的。

到朋友家约二十分钟，那进城的朋友也到了：“刚有警

报！”他没有见到他的朋友，城里是空空的。

飞机从我们窑洞上面飞过，接着炸弹下来，一连好多响……终于静寂了。

急于要回去看看，可是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有好些人停在那里，说还不能通过城，大家就聊天，这个地方有好几个炸弹洞，就是今天早上的成绩。

×同了她的队伍走过，她偷出一歇来与我讲了几句话："昨天，我同四个女同学在河北旅馆洗澡，没有听到警报，飞机声音没有听到，炸弹也没有听到，直到后面屋子烧起来了，老百姓喊叫，我们才从水里出来……走出河北旅馆，那屋子就倒下了，眼前都是尸身，一块一块的肉飞到脚跟前来，我伏在地下，自己想：听天由命！后来，飞机第一次投过弹，我们跑出城来，运气还好，我们还不认识延安城，居然一下就跑出了城，如果那条路是不通城外的，可不是糟了！”

经过城边，知道了昨天防空实地演习——只有血的经验是最宝贵而实用的——的结果，今天一共只死伤六个人。城门口站岗的两位武装同志，有一位英勇地牺牲了。飞机飞到头上，他们还不俯下，炸弹下来，一个已经倒下，一个还是直立着！现在我们经过城边只剩了他独个人，他的同伴已不在了。为了维持城内秩序，为了侦察汉奸，他牺牲了！呵！延安的站岗同志！他在我们民族解放的历史上，是一首短短的史诗。

今天我到城里转了一个大圈子，把炸过的地方都看过了，“回去还要深深地研究一番。”朋友们这样笑我。

城里一个人也没有——有是还有几个，不过比起未轰炸之前来，好像陡然觉得一个人也没有了似的，冷寂凄凉！听说昨天曾捉到了汉奸。汉奸，这类东西在边区也有！天知道，真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日本特务机关的魔手已伸进边区来！当然，这是一个敌人不肯放松的地方！但不知道这些走狗拿多少钱一个月呢？对于这些汉奸，我主张处罚严厉一点。从前，我觉得人类有死刑，是人类的羞耻，可是，对于这批汉奸，我倒觉得有时用死刑也好。在南昌，每次枪毙几个大一点的汉奸，我们老百姓就能得到几夜安眠。南昌的小汉奸，当敌机来时他放信号，他们拿两角六分钱一天，他们大半可说是为了生活的逼迫及他们的无知，但他们为什么这般笨呢？日本鬼子就在他们放信号的地点投掷炸弹，这批小汉奸自己的命不是也很糟的？在边区，老百姓生活得好好的，我就不懂为什么要做汉奸！

晚上，立在窑洞前，望城里，简直一盏灯光也没有，黝黑而古旧的城墙围着一座空洞而黝黑的城市。今天鼓楼上落了一弹，把“韩范旧治”的匾炸掉了，落下了几块瓦砖，别的一点也没有动。对于我国的旧建筑不禁惊奇而颂赞起来，它虽然比不上钢骨水泥，但是七八十磅的小炸弹，倒也不在乎。

二十二日，我决定不走了。七时左右，在窑洞门外看

早景，老百姓一个一个地走出城来，赶着他们心爱的毛驴子，背着包裹，扶老携幼地下乡躲飞机。号子一响或偶有一个人跑，别的人就跟着乱跑，他们还听不懂警报的信号，而他们是吓坏了，一切声音对于他们都有极可怕的意义，简直变成草木皆机了。

×君的女友×女士，这两天在我处吃饭，她的工作机关夜里搬家时，没有通知她，而新搬来的机关不便承认她，不肯开饭给她吃。总之，在突然的移动里，有些事情弄得青黄不接，幸亏我是自己烧饭吃的，还有点米，她就在我这里吃，等待她原来工作的机关放毛驴子来接她及她所保管的东西。

八时左右，我要到六七里外去托人带寄稿件，　不幸，那次恰恰失落了，而我倒奔走了好些路　×女士没有事做，说她陪我去，这样，虽然不是去躲飞机，而事实上却同那些躲飞机的人一道到近郊去了。

太阳已带着一点暖意，开始照在山头上了，路上行人已没有大早的多，躲飞机的人早已走去了。寥落的清晨的街道，嗅着一点干草的气息，我回忆起鲁森堡公园的 Rue vangirard 路，有一个冬季，我去补习法文，天天要经过这条路，清道夫正开过车去用自来水冲洗道路，道路上一点灰尘也没有，我出神地呼吸冷冷而新鲜的空气。有一次，我曾在那路角的咖啡馆前跌了一跤，跌得很厉害，一时爬不起，一辆公共汽车正开来，咖啡店里的侍者跑出来拖我

的脚，——一定是怕我被汽车辗着了——我立起来，觉得很不好意思，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忽然想起刚才没有对那位侍者先生道谢，不安的心情压倒了不好意思。

×女士同我两人静默着走，我呢，沉在遥远的回忆里了。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两个面颊红红的，穿着军装，强壮而结实的青年走来，见了我们，其中一个他唱起来："陕北土包子，住的土窑子……"另一个接下，"吃的小米子。"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走过去了，在我们背后，也发出清脆的笑声，这是新中国的笑声！开始的笑声！

在几个小坟堆旁，×女士遇到一个青年，"××是不是××？"她问。她是近视眼。那个青年把身子惆怅似地摇了一摇，掉转头，好像要哭似的。

他俩立定了说话，我慢慢地走着，等待她跟上我。"一定是她曾经开罪过他，拒绝他的情爱……"我想。

她来了，说她的朋友……刚才这个青年，他的弟弟前天炸死了，今晚他邀她去帮助埋葬他的弟弟。

送过信，我们慢慢地无目的地走着，朝城的方向。想回去，又想晚一点回去，总是想不定。不是说笑话，自己讽自己，因为确实，脑子里还在想到轰炸与飞机来不来这件事情。"现在你们回去不太早一点吗？"有的人从城方向来的，对我们喊。延安是沉在躲飞机的高潮里去了。

我们顺路走进一个山沟，那里面居然"别有天地"，在那一块一块生得很好而很巧妙的岩石下，人们坐着或躺在

高粱秆子堆上躲飞机，我们走到最里面的一块岩石下，有十几个别着××徽章的学生在那里，不知道他们怎么采取了单独行动而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想留着，因为这个地方很好，吹不到风，高粱秆子堆得高高的，很干燥，男青年们看见我们坐下，他们嘻嘻哈哈说笑话，唱歌，特别厉害，显然是因了我们的存在而兴奋了。×女士对每一个男子都好似要打招呼，微笑，这就招来了他们对我们更甚的开玩笑——上海人所谓吃豆腐[①]，我很想回击他们一下，无奈×女士太不争气。

结果，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在一块最不好的岩石下，那里有一个中年妇人同着四个小孩，大的男孩已经长得很高了。妇人把被褥铺在地下，呆呆地坐着，我们把那不多的高粱秆子铺搁起来，做成一个狗窝似的，一边可以挡住风，一边靠在岩石下，可以躺，也可以坐。小时候，我最欢喜偷进柴间里去玩，去“搭棚棚”，整天在里面，吃饭都可以忘记。但是现在，这个为我童年所常常梦想而不能做到的狗窝样的“棚棚”，却一点也不使我欢喜。

我们要那个妇人也坐到我们的窝里来，她那里风太大了。这是一个典型的陕北美人，胖胖的鹅蛋脸，粗粗的圆圆的身材，还同着一双三寸金莲。北方的女子，皮肤很粗，这是同南方女子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国外，我遇见一个波

---

① 上海方言，意为占便宜。

兰画家，他说中国女子的面部皮肤有时候细到发亮，这种亮光画家感到束手。我想他所说的大概是中国南方的女子。

小女孩，看去五六岁，生得很美，非常顽皮，一刻也不停，吃枣子，又吃饼。大的哥哥，摆出“长兄为父”的神气骂她，第二个哥哥，“苦恼三官”，像我们家乡所说的，一般父母都不喜欢第二个儿子，他生得呆头呆脑，十分欢喜他的妹妹，把她抱着，笑着。母亲带着宠爱的口吻劝止她的子女们的顽皮。我同×女士笑着对她说：“你不要太宠坏了她！”

她一边梳发髻，一边对我们长长地叙述起来：“前天……飞机的声音已听到了，我同了娃娃（她指着小女孩）跑，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她拉了我的娃娃跑，跑得很快，叫我快快跑！我的大孩子挑水去了，他们（指第二个与第三个男孩）跟了我跑……老汉在筛小米。我叫他快逃，他说：‘筛完这一升小米。’我们跑到城门口，炸弹下来了……我们在河边石窑洞里躲到天暗才回家去。

“走到城边，碰到从前同老汉一起做事的男人，他看见我，说：‘×嫂，大家以为你一家都完了！×哥恐怕……’我回到家里，大孩子跑在城外，刚刚回来，他身上溅了一身泥，说刚放下水，炸弹下来，他伏在地上，水和泥溅了一身。……老汉倒在磨子旁，他身上一点伤也没有，只有嘴巴里流出一点血……”

她哭了起来。

"我买了一只十三块钱的棺材，做了全身衣服，一共用掉五十三块钱，我同他夫妻一番，也算对得他起了。起初，我想我不要活了，我只是哭。老汉的同事们劝我：'大嫂，你还有未完的责任，大哥要你好好儿做的，就是好好的管着这些娃娃们。'我想，可不是的？我死了娃娃们谁来管呢？"

前几天，当敌机来侦察之后，她的丈夫，从前是一个《新中华报》里的送报工友（他们住地近《新中华报》），她的丈夫把《新中华报》里的一个防空洞，（因下雨而倒塌了的，工友们觉得不能用，索性把它弄平了。）又去扒开来，同她说：倘使飞机来，你同娃娃跑不动，躲在这个飞机洞里（陕北老百姓不叫防空洞），我同大的跑出去……

"他从没有骂过我，打过我，我欢喜他，我欢喜他！"忽然，她哭得非常厉害，疯狂了似地喊起来。

我的心激跳着，"我欢喜他！"我爱他的意思，陕北话竟同我的家乡话完全一样。我觉得十分难受，想呕吐了。但是X女士却笑着，笑得那么厉害，对于她，这种人间最悲惨的事故，好像是一个有趣的秘密，我有点不高兴她。一个未婚的女子，她不会懂得这类痛苦，但应该知道至少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她的大女儿已嫁了人，曾离婚过一次，前夫是一个江苏人，从前在延安做电报局长，现在的女婿是在汉中做县长的。她身上的布罩衫里穿着绸面的皮袄，里面还露

出白色的细绒衬衫，“这是我女儿寄来的。”她指她的衬衣。“我把帽子（一顶新的丝绒帽，这些东西在外边是太平常而且式样也过时了，而在延安足以代表一个人的资产呢）同衣服统统穿戴上了，我想倘使屋子炸坏了呢……”

她的大儿子十七岁，年底要结婚，她说老汉太没有福气了，见不着新媳妇。“我们哪里想到飞机呢，去年飞机也来侦察过不知多少次，但从来不见来轰炸；公家叫我们疏散，可是公家机关一个不搬，老百姓生意做得好好的，哪一个想搬呢？我们只想要过年了，替娃娃们做衣服，做了一件再做一件，延安这几年的年成太好啦！老百姓刚刚过得好好的，要来炸了！”

“前几天，狗对着我们的门叫了五天……”可怜的妇人，她只好求援于迷信，来解慰她丈夫的震死。

这是一个长于叙述的妇人，我恨我的笔太笨，不能照她说的写下来，否则就是一篇完满的文字。她同她丈夫相差十五岁——她小——可是她觉得很幸福。她说：“夫妻缘分好就欢喜，夫妻没缘分要吵架离婚。”她不相信什么爱情，第一是要缘分，像所有的陕北老百姓一样，她用了许多新名词新术语说着她的一切。

母亲尽哭着哭着，孩子们不是叫，就是闹，或吃，总之，手脚同嘴巴是一刻也不停的。只有大的孩子，懂得一些事情了，不笑也不言，沟里的男子们在我们高粱堆前走来走去，×女士同孩子们玩，对每一个过路的男子笑……

碰到交际科里的人陪着几个客人也在躲飞机，“×君，”介绍的人对我说，是一位留法同学，现在任新闻记者。他拿出一只照相机要替我照相，我最怕陌生人替我照相，而在×女士不断的笑里，我觉得十分不自然，大约我还装了鬼脸。

“让我把帽子戴戴好。”以为她也照在里面，妇人说，已停止了哭。

“好！好！”×君回答她。

相照过了，×君回到他们的岩石下去了，×女士时常跑到那个地方去逛一下。

×君来约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向老百姓家烧点东西吃，结果，他们去交涉，老百姓不肯，当然，看见有这许多人，如果天天来向老百姓买小米，借锅子烧，老百姓自己的粮食怕要不够过冬了。×君说东北的老百姓顶好，当然不是说大城市，大城市里的居民都是狡猾的，乡村里的老百姓人家，他们常常肯留不相识的过路人吃和住，一个月二个月都会的。的确，一般的东北同胞是很和善的，但我觉得这也与地方富裕及物产丰富有关系的。

我带着几张纸，就靠在高粱秆上写字，但我的思索常常给×女士的话打断。后来，我索性不写了。

她变得很知己地同我说着话，她说她不料到我是这样和气的，她想象中的我是很严厉的，不易接近的……所以×君曾对她说可以多多同我往来，她都不愿（当然我知

道她自然瞧不起我这样一个平庸女子，这是她的真正意思)，在人家"客观的"眼光与猜想中，我是这样一个人，这倒也奇怪的。但现在中国的少女们她们想些什么，怎样的女子使她们羡慕，成为她们所想达到的一种目标，使我有点好奇。

她对我谈到她的感情，她说她已经坚决地回绝了×君(这同×君对我说的相符合，她没有说诳)，并告诉他她爱的人是××，就是今早路上碰见的这个青年。可是从她的语气里，我立刻感觉到这只是她所爱的，　　她把他谈得像天神似的，使人感到没有一个平衡的尊敬与爱　　而今早那个青年爱不爱她是一个问题。

她说她同××认识了已经五年，当她在西安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了的。他曾到日本留学过两年，明治大学毕业，今年二十二岁……现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有的比起我们那一代来，真是活跃得多，他们只要花一两年的工夫就在国外的大学里毕业，而年龄还是极轻极轻的。

这个青年，我有时在路上遇见，他有一个较长的个子，圆长的面孔，大约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不算丑，因为他那种夸大到极点的男性的尊严，只有那些自以为聪明而美貌的男子才这样的。他穿着皮鞋　　在延安是很少的，穿皮靴的倒有　　拿了一根手杖，和着他的脚步，有节奏地挥着，原来他是留学生。"何必呢?"我想，"天知道！留学生是这样特别的么？留学哪一国是更加了不起的？摆什么架子呢！

真是半殖民地的可怜意识！”×女士问我对于这个青年的意见，我正在那样想。

“意见？你自己对他有什么意见呢？”我笑着回答。

她对我谈到一些女同志……“呵！”我心里想，这个我以为有一点神秘的女子，其实是一点也不神秘的，而且十分简单，她急于找一个男子做丈夫，　是不是因此对每一个男子微笑　这个男子不管是在外边或边区，只要有权力地位的，不过最好还要年轻而美貌。如此而已。

有些男子讽笑女子：“我们男子两手两脚一齐爬，也爬不过女子。”

在欧洲，我看见有些女子，她们以年轻与色相来嫁一个有地位财产的老年人，一方面，她结识情人，一方面她等待快快做寡妇，再可以嫁人。

像×女士那样心理不是很矛盾的？要有权力地位，同时年轻，这可不是也很困难的么？一个人的学问与事业不是一下子就成就的，就是那些相信金钱万能的人，也会知道并不是件件东西用钱买得到的。还要自己的努力，需要精神与时间。

我们离开那个山沟还很早，中年妇人与她的娃娃们还在那里。×女士在半路同我分别，她去看她的朋友去了。

晚上，天已暗了，×女士到我窑洞里来，她刚刚回来。“我不想吃东西。”她说，眼睛是哭红了。“××写了一封给他弟弟的信，要我代他念，他写得那样痛苦，我都哭

了……今天我帮他给他的弟弟穿衣服，唉！真可怕……”

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静默着。

她坐在一只矮凳上，显然心情是为一种人间极端的苦痛与哀伤所刺激着。

“××等一下要来看我，”她静默了一歇后说，“今天他悲伤得那样，对我说要我与他在一起……”

“呀？”我不十分欢喜听着她同我谈她与他的这件事。

“刚才我没有同他说什么，因为他太悲伤了，等一下他要来，你说我怎么回答他呢？”她望着地上，对我说。

“那要看你自己怎样想的！”我说，感到不十分自然。

“我想不大好。”

“那他这样年轻，已经想结婚了？”我随便问。

“不，他说同居，不结婚。”

“为什么呢？为怕花钱举行隆重的仪式么？在边区好像没有的吧？”

她走了，怕她的朋友已在底下等她。

已经有几夜没有睡好，而这一夜，我的心情更十分复杂，刚刚蒙眬睡去，又给狗声吵醒了，这些狗是搬走的那个机关的，他们没有带去，这几天大概也没有人喂它们。一到夜晚，整个山头好像变成了狗的世界，它们狺狺然叫着，叫着。

“他身上一点伤也没有，只有嘴巴里流出一点血……”

“狗对着我们的门，叫了五天……”

忽然我觉得很冷，翻来翻去总睡不好：讨厌的狗叫！

我身上穿着一件绒睡衣，从床上爬起来，也没有披什么衣服，捧了面盆里的一盆水走出窑洞去，向着那些狗泼去，刚刚把面盆举起，大约用力过大，“啪”的跌了一跤，空气很冷，月亮非常皓洁，狗的影子在月光下，拖得长长的。

旁边窑洞里的朋友，听着泼水与跌跤声，哈哈地笑了起来：“我劝你不要起来，明天感冒，还要找人治跌伤！”

的确，在延安是不好意思认真发脾气的，忍耐！忍耐！这一次可说是我在延安发的最大的唯一的一次脾气，但立刻就受到了惩罚。

听说×女士已离开延安，那个中年妇人也不再见到，躲飞机的高潮也早已过去了，我呢，整天在窑洞里很少出去，在我想象中，好像她们很远了。

5　长征的人们

刚到延安的时候，一听着人说哪位先生或女士是长征过来的，心里立刻肃然起敬了。虽然我也跑过十几万里路，但那是坐着火车轮船，谁都可以办得到的。他们，长征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所有人间可以想象的苦痛，都尝遍了。这就是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些人，他们还很健康，而且活泼，快乐，可不是一个奇迹？

延安刚刚开了门的时候，有许多男女青年跑进来，听

说有许多外来的女孩子，都以能嫁一位长征过来的八路军老干部为荣耀的。如若是真的，这也可以代表一般人对于长征的人们的仰慕心理。

我还没有得到机会听长长地谈长征，像谈一个不相干的故事，把他们当时的处境，当时的心情……没有带感情的叙述着。许多人到前方去了，留在后方的人都是忙忙的，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抗战，很少听到谈长征。平常我听得最多的，是几位战斗员口中讲过草地，四方面军曾过了两次草地，过来又过去，“一只脚拔出来，一只脚又陷下去。”但我所需要的却不止这个。

那些悲欢离合，出生入死，可歌可泣的事情，该比一部《元曲》还丰富，但是还没有！我想，在长征中，有些有文艺天才的人，他们也担负着不是军事就是政治的工作，他们没有收集或记录一些将来可写作文艺作品的材料；延安现在有许多外来的文艺工作者，这个伟大的工作不是也可以由这些非长征过的人来担负着做，但是一般的外来文艺工作者没有注意与重视这部分材料；同时，目前一般人要求于文艺工作者似乎不是在这方面。我个人希望他们能够有一部长征的史料与逸事，供给关心长征对于长征有兴味的人。

麻烦了几位先生，跑了两个下午，借到了那部为外边好些人们所期待见面的集体创作《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里面有日记，有叙述，大都是过后追忆而写的吧？共约三十

万字。只有一点是遗憾，没有一位女同志参加在内，听说本来邓颖超女士预备写一篇的，大概是忙着没有工夫写吧。

长征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开始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达陕北，大概是这样吧。

董必武先生在《出发前》说到何叔衡先生的死，李富春先生在《夜行军》里写得非常美丽，可是夜行军遇到大风大雨，却十分苦恼的。“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畅快。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行更觉幽雅。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着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你们真文明呀，救命菩萨！’”读者会起了有趣的想象，想如果是住在那些荒僻的高山上，茅屋中，看着这些不速之客的经过！

听说在长征中，他们大半夜行军，为避飞机的轰炸。在夜里，他们自做火把夜行军，云、贵、川都有竹头，四川又特产便宜的松香，这对他们做火把有了便利。

陆定一先生的《老山界》，何涤宙先生的《遵义日记》。这位先生在遵义十天，吃了几个辣子鸡丁，坐在土豪家的沙发里看上海的摩登画报，做布尔乔亚（Bourgeais）了，确实富有趣味。莫休先生与李一氓先生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都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吃饭，偶然遇到邓小平先生，这是一位八路军里闻名的政委，他们笑着叫他“牛皮公司”，我以为那是邓先生独家经营的。读了这部《长征记》，知道这是在长征期里产生的合股公司。在西安时，我曾听一位八路军的老干部说在长征中，几位老人，董必武先生，林伯渠先生，徐特立先生，也是这样走着，谈着，饥饿着，冷冻着，时时被炸弹枪弹威逼着到了陕北。同着许多朋友，而且是共生死的朋友，一边走一边谈，这一定是非常快乐的。

长征中，听说毛泽东先生一路作诗，当渡过雪山（岷山，他们所渡雪山中最后的一个），快到西北的时候，毛先生很高兴，曾有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诗我在外边曾看见杂志上刊过，听说当时传遍军中。

希望这本《长征记》能早点与世人见面。从这部集子里我们得以知道许多的事情，毛泽东先生的游击战术战略是从怎样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他们怎么经过人烟稀少，荒漠千里，高山层层的地方的？他们所通过的地方与接触着的人，回，夷，番各族同胞，对于他们都有好感，这些被人们遗忘了的同胞，他们的文化，他们生活习惯，以及他们所想的，我想都该是中国人发生兴趣的。

关于叙述长征，在外边我曾看到过一本《随军西征

记》，这是一位被俘到红军里的军医写的，只写到四川会理，后来他被川军俘去，离开了红军。在边区我又借到过一本小册子《雪山行军记》，是一个被红军俘去的无线电技术师写的。这两本册子里都曾提到长征中的女英雄，说她们都是体格强健，雄赳赳地佩着手枪。后一本的小册里说得比较详细一点，他提到邓颖超女士，蔡畅女士，与红军中的歌舞名星李伯钊女士。在延安，我也曾听到人们称道邓女士的能干，蔡女士的慈爱，为了她的慈爱，一般人都叫她做“大姐”。

从江西出发，听说一共有三十个女同志，她们没有掉队，也没有别的意外，都安然到达陕北，就是几位老人也一样。但是一路上参加长征的妇女还很多，有的在湖南参加进的，有的在四川参加进的。在延安，我们很少很少遇见从江西出发长征的女同志，比较多遇到的是四川与陕西的，特别是四川。妇女同志是怎样长征过来的？她们做的什么工作？她们的心境，都是我十分好奇的。

在延安，谈到长征，或者更扩大些说谈闲天，四川来的先生们叫做“摆龙门阵”。第一次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听到：“来，我们来摆个龙门阵！”我不懂，一位熟人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就是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四川的农民把土地革命也叫做‘摆龙门阵’。”

谈着长征，就联想到陕北流行的这个名字：“土包子”，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样产生的？长征的队伍中，有很多是

生长在极幽僻的农村里的，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大都市，也从来没有见过火车，汽车，以及女子身上五颜六色的绸料，香水，雪花膏，耳环，戒指。我看见几位长征过来的四川女同志，手指上戴着银戒指，这些戒指使我发生一些有趣的奇妙的想头。这些戒指戴在她手上，好像是必需的，如若在我的手指上呢？……在到延安之后，永鏊姐托二妹再托便人带了一个在成都镶的红豆戒指来，嘱人交到我手里，附了一张条子："宝戒一个"。哪里是宝戒呢，几毛钱可以买到一升的红豆呵！这不过是一种好玩的、友情的纪念品，并无物质价值的。我非常羡慕，欢喜延安人所叫做土包子的，他们对于人生还有这许多的欲望、期待与兴趣，对于他们，人生与一切事物，还是这样的有趣与新鲜，什么都能使他们引起爱好，好奇与动人的启发。

有些外来的人，他们能从面孔上与走路的神气上认出这是长征过的人，"长征的面孔"，"长征的步子"，有这样的口头禅。

当时红军主力长征了，留在江西的人怎样呢？这是一个残酷的别离。为了工作的关系，有的丈夫随军长征了，妻子留在江西，有的妻往别处工作，丈夫留守。听说有一位先生，长征过来，夫人留在江西，他带着两件夫人的内衣离开江西，一路没有抛弃，在那样长征的困苦环境之下，他都舍不得抛弃。现在呢，他的夫人大概已牺牲了！当时留在江西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听说比长征还厉害。其实，在

外边，那些单身匹马做底层工作的，我想象起来也一定比长征艰苦。一个人的双肩担负着一个集团的担子，而他却不像长征时是有武器可以自卫的，当打一仗的时候，至少死的命运敌对的双方各有一部分的。

在特别残酷的东方民族国家，仅仅做一个革命者的忠实伴侣，已是伟大的，况且本身也是一个革命者！倘使一对革命的夫妇，多少年生死与共，一旦忽然其中一个起了抛弃另一个的念头，那是怎样的残酷！但是这样的事不是不可能有的，倘使为了性格不相投。不过革命者是不是对这类的苦痛看得很平淡而能克制它？但是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比较担负着更大的苦痛，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理由可以互相鄙视，互相仇恨！一个女子，我想一定不愿被她尊敬的同志丈夫抛弃，她倒宁可被一个坏人，一个理想不相合的男人抛弃，对于男子，也一样吧。

在江西，在长征中，有些男子为了事实的需要，结了婚，虽然以前，在家里还有着妻子儿女的。那个时候，他们不能预料什么时候能再见他的家里的人，而且这个再见是不是可能的？他们恐怕也没有料到统一战线的成功，而且如此迅速。这样，从前隔着的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又可能找着原来的各种感情上的关系了。从前的妻，这个穿着长统袜，高跟鞋，旗袍的女子，看惯了穿军服的女子的，看来倒也觉得新鲜，有点特别，有点洋味，怎么说？实在，这也是很自然而平常的一种心理。

一个人在一定的地点住了较久，如若这个地方的一切比较单纯，交通比较不便，没有黑暗来给你诅咒，也没有红灯绿帷堕落的场所来刺激，这不是一个诗的环境，这是一个叫你“生活着”的环境。环境的应付十分简单——当然不是人人如此，这是很主观的话——于是不需要多用脑子，渐渐的变成土头土脑的土包子式了。我在延安，现在快十一个月了，自从把一只值得纪念的表——因为我已用了十四年——打坏之后，每天要知道时间，只有问邻近的朋友，但这个朋友是常常不在的，当然老去问，那个人也会觉得讨厌。这样，日子久了，我也就失掉了要知道时间的习惯，慢慢地也就无所谓遵守时间了。外边的朋友们听着我说这个，一定要跳起来了，“这怎么过日子？”但日子倒每天很快地过去的，不过，只是为了不要做“土包子”，我该快快离开延安了，我正在渐渐地习惯于一切，而对于这个地方的一切，正在渐渐地消失敏感性。这是很不好的。

平常，对于女子，接受新的东西比男子来得迅速，但在生理上，女子总是比较困难些，先生们有时讽笑女子：“我看每一个未结婚的女子都是有希望的，一结婚，就完结了！”其实话也有一点道理。比如一个工作不懈，奋斗不息的女子，一天，她担负了生育，那么她对于工作或学习，总得有几个月的停止或至少减轻，这是事实。为了这些，女子对于工作或学习总不能像男子一样的顺利，有规律，

而且往往有时生育损害了健康，那就更倒霉了。有时候，对有些人，取决于学习有优良的条件与否，譬如一个排字工人，他走进了学校去学理论，在他一定不会像一位伙夫同志般一向与书本子无缘，存在着进学校学理论的困苦；有些人到了某些年纪，简直学不进什么了，也是有的，除非有些特殊的人，文化水准本来很高，有了根底，且能自强不息，时时接受新的进步的知识。这样，人人都有变成土包子的可能，从前的洋包子，在今天也许是土包子了，今天的洋包子，将来不还是也可以变成土包子？

往陕北来时，我曾想象在西安的旅馆中可以见着我年轻时候的同学张琴秋女士，但是不，直到在延安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一天上午，我正在窑洞门口洗白菜，听到一声似乎陌生而又有点熟识的喊声，抬起头来，是隔别了十三四年的琴秋！昨天下了一天雨，今朝山路还是泥泞的。从前我们是顽皮的朋友，现在，在她的老家，宾主名分之下相见了。

"你做什么？烧白菜？现在你学会了这些事？"她有点惊奇。

"是的，我饭也会烧了，好几年前就学会了！"

当江浙内战的冬天，有一天，天下着雪，我从我的堂姐姐家里搬到她的寓里，我不能过旧家庭里的生活，那时又还没有成家。每天她出去做事了，留泽民同我在家里，有时泽民也出去了，就留我一个人在家。那时他们两间屋

子，一间是他们夫妇的房间，一间放东西同烧饭，我住着。吃午饭时，泽民烧白菜炒牛肉丝，这是泽民爱好而善烧的菜。天暗下来，可以开电灯了，快吃夜饭了，巴巴地等待琴秋回来，有时她还带回一点好吃的东西给大家。我在他们家里，像一个小妹妹。每次我从家里出来，一下北站，就先到他们那里放下东西睡觉，然后再不得不然地跑到亲戚家去做礼节性的访问："不，因为张小姐要我看家。"这是我对亲戚家留住的推托。琴秋是那样地善于应付人，在上海我的亲戚没有不欢喜她的，特别是×姐，直到前年，她还问起张小姐。五卅惨案的时候，琴秋还去向她募款，她，这位爱买香槟票与香烛胜于一切事情的旧式妇女，但琴秋还是成功了的。夏天，晚上，泽民爬到屋顶上去乘风凉，听隔壁人家吵架，一句二句搬给我们听，使人发笑，打断我们的谈天。在那时，泽民与琴秋有时是我的顾问，收到朋友们的信时，给泽民看，问他该如何回答？……这些年轻时代的回忆，想起来是可以好笑的。

那天，我们在快乐的情绪里重见了，我离开祖国好几年，其间国家经过了多少事情，但对于我好像读历史，中间脱落了一段，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变了……"访旧半为鬼"，在这个年头，见着一个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真是一件难得而快乐的事呵！可是见到琴秋就映起一个泽民的影子，因为对于我，在琴秋旁边没有泽民，好似很不习惯的，于是说话也得想一想过。虽然吃过许多苦头，她还健康，而

且比起我来，着实还健康，皮肤也还像从前一样的白润，可是我觉得她似乎比从前高大了，就是她从前带圆的面孔好像变成方了。她的身材一向比我高大些，强壮些，在爱国里，有人叫她做“小弟弟”的。从前琴秋就是很理智的，现在，觉得她更加理智了，这恐怕是从军队中锻炼出来的。

那天她在我处坐了一下就走了，随便吃了饭，因很忙，约好一个星期六我去她那里聊天。

星期六那天，天色阴沉，到下午三时左右，我还是动身去了，到得快近她住处时，天下起阵雨来了，只好躲进一个山边的石窑洞里，是一个机关的厨房。陈昌浩先生曾拿了雨衣来接我，没有遇到，等我到琴秋处好久，他才回来。

我们开始谈起从前在学校里的许多小事情、傻事情，与许多老同学……旁边几位先生笑我们：“谈不尽的话！”

晚上，天下着阵阵的雨，夹着一阵一阵带寒意的风，这是延安的秋雨！她与我同睡在一只土炕上，我们不是抵足谈天，而是并着头睡。雨声，从窑洞外飘进来，时常打断了我们的话声。在过去好多年里，我们两人的生活太不相同了，我们的话，就像江水从一个方向流，但总是相差一点点，汇合接连不起来。

“泽民究竟怎样死的?”我终于这样问，明知道这是不大好问的，但还是问了，心头感到了轻松，透了一口气，觉得人也自然了。泽民的死，对于泽民的老朋友们，至今

还是一个谜，可是，琴秋也不知道，她不在他身边。

“如果泽民还活着，××她会来的。”谈到泽民的家族和朋友们，我觉得琴秋的话是对极了。

接着，她谈着她自己：“那个时候四面八方都被包围着，前面正在接触，有什么办法呢，我在队伍中间被抬着走，后来，抬到队伍旁边，塞了一点布头，抛了。一个很胖的小孩呵！我们走了好久，还听得见他的哭声！”她在甘肃再婚以后，生过一个小孩，这样抛了的。

“会不会有人拾了去？”

“那样荒凉的地方！冻也马上冻死了！”

后来，在好几次步马交战之后，四方面军吃了一些亏，她失散了（那时她是四方面军里的妇女独立团团长，女子与男子一样作战，这是四方面军里的特点），在过渡的地方，几被急流冲去，骑兵又在追击；渡过了河，走呀，走呀，走了许多荒山，终于被俘了，经过边塞的苦工、都市的牢狱之后，才回到延安来。

琴秋已呼呼入睡了，时间已过了午夜吧，我想我也该睡着了，这倒并不是自己保养身体，因为生起病来，不但自己倒霉，还要害着旁人。这是经验告诉我的，不可以随便生病，要么就一病病死，倒也干脆，可是越这么想，越加睡不着。从前，当肠病厉害的时候，枕头边我总放着饼干，半夜一醒，马上机械地拿饼干来塞进口里，这个肠子是不好惹的，一饿要痛，一饱又要痛；可是这夜我并不感

到肚饿——其实白天每餐饭我都不敢十分吃饱——，只觉得热，又不能翻身。在工作与磨难的时间里，她的体格锻炼成这样的坚强，我特别觉得她的体格的强大！

为了叫自己睡觉，我想出一些旧诗词："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与 Lerlaine 的 "Le pleur dans mon coeur comme il plent sur la ville."① 这些为风雨所引起的大半忘记了的句子，结果又归结到："一个很胖的小孩呵！"与泽民的影子。

雨一直下到天明。起来后，我马上想回到自己住处，为待雨小，留到午后，雨还下着，已小了，冒小雨告辞了她。

"一个很胖的小孩呵！"在山沟里走，这话时时还在我耳中响着。

统一战线结束了十年苦痛的内战，一个快乐团圆不是值得称颂的？像萧劲光将军与他的夫人朱女士，像许光达与他的夫人邹女士……这好几位的团聚。听说邹女士与许教育长结婚半个月就分离了，一别十多年，她记得当他们近湖南的时候，他就没有信来了，当他们远离湖南的时候，她还能收到他的一点音讯。那年彭德怀将军攻下长沙，他们团聚了。以这些团聚来纪念长征，不是最好的？现在，为抗战的需要，全国忠勇的战士，前后方救亡工作的人

① 法文，诗人勒尔莱纳的诗句："泪水流在我的心里，如同悲痛弥漫在整个空间。"

们……不得不暂时分别他们同她们亲爱的人们，让我们祝颂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将来，以坚决抗战，抗战到底的最后胜利来纪念这艰苦的抗战。

6 青年！中国的青年！

“青年！中国的青年！”我每听着这歌声，心里自然而然地起了对于青年，现代中国青年的羡慕、尊敬与爱好的情绪。

中国现代的青年是幸福的，他们能够得到自由的革命的集体教育，过去的一代，为着求得一点教育，多少人曾可怜地过着“个人主义”的奋斗的大学与中学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技术人员，很少是因一个家庭能每年汇给他几千几万元供他安心读书而成功的。就是有这种人，他们却往往是一无成就的。这些个人主义的奋斗者大学与中学生活，恐怕却是现代中国青年觉得好笑的。

中国现代的青年是伟大的，国家正在进行一个残酷的国际战争，这种战争是我们都没有经验的。我们的青年，他们担负起卫国的责任，他们迎接战争，像迎接他们久别的亲爱的人。国家把整个希望交给了这一代青年，他们是我们民族解放的最大力量，青年啊，愿你强壮，结实，而且坚定！

边区是青年的摇篮。青年在这里，受到革命与战斗的教育，受到民主精神的培养，这些人现在是学校里简简单

单的一个学员，将来，他是一个游击队长，一个指挥员……将来，他是一个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一个行政人才，一个技术人才，一个斯达汉诺夫①……边区对于青年怀着极大的爱护与关心，青年在这里是幸福的。青年不是最抗战的么？这里正是培植坚定的抗战干部的。青年在这里，他们过着自由的集体的学习生活，紧张，规则，愉快，这是他们的精神。许多在家庭里尽吃也不胖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到这里来都胖了，她们变得强壮，单纯，质朴可爱。大家惊奇着这个现象，有的人说女青年在边区是太幸福了，在学校里，在学习中，她们跟不上的，有男同学帮忙，在生产运动中，她们做不了的，有男同学来代替做，在机关里做工作，男同事对于她们也是好好的，人道的。一般封建的残余力量不是说绝对没有，但那是枝节的力量，人们随时可以把它拨向一些正确的原则上去，原则是正确的呵！在外边，一般学校生活也还算是快乐的，但你回进家庭，走入社会，怎样呢？

今年五月四日纪念日，由边区青年提议，全国一致定为"青年节"。五月三日那天，洛甫先生曾有一次演讲：对于青年的希望。这是一篇很透澈、深刻而令人感动的报告，青年们快乐而热烈地拍着手。

"五四"的晚上，有一个盛大的露天火炬游行晚会。毛

---

① 苏联顿涅茨矿区采煤工人、劳动模范。

泽东先生作了一个报告（已载在第三期《中国青年》上），青年代表向毛泽东先生献旗。接着，游艺开始，鲁艺几十个人的秧歌舞，十分动人，热闹。“五四”以后，接连有运动会，各种比赛，赛球与赛马。在五月三十日，为纪念“五卅”惨案，举行了一个选举模范青年的大会与晚会。“我们相信青年”，这动人的标语到处贴着。

是的，我们相信青年！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有时容或有一点幼稚，但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生活着，学习着，在前后方抗战的工作中锻炼着，这些幼稚就会改正的，好的发扬出来了，坏的也淘汰掉了。边区青年，他们快乐地响应当局的号召，一批一批跑上战场。顽固分子引起人们的不满，他们是不要国家的，爱自己财产与生命胜于自由的国家；他们虽也恨日本鬼子，但没有办法，不愿牺牲。边区青年还有一种可爱的精神，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其实是所有的青年自然而然具备着的，不过延安的青年更能在这个优良的环境里把这个精神充分发扬。自我批评，在边区是发扬得很普遍的，这是边区革命领导者们的优良而伟大的作风。这种精神是人类高贵的精神，犹如敢于赤裸裸地看自己身上的疮毒而克服了痛楚。听说在边区开会时，负责人自己也常常提出自我批评，在外边，人们要想这样做时，觉得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可是不，在边区，恰恰相反，一个人愈加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他的威信只会愈加增高。

在大后方，去年，我还看见有些青年，穿得漂漂亮亮地在电影院里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嘻嘻哈哈地；女青年也还有画眉毛，涂胭脂的。过汉口，我在一家外国朋友家里吃饭，因为我们很熟识了，大家就随便谈谈。她们老实对我说："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懂，跳舞场与电影院门口都拥挤着穿得很漂亮的中国青年男女，可是你们正在战争呀，你们政府应该禁止他们这样！"当时我惭愧，又忿恼，我说："那些是坏蛋，我们好好的中国人不当他们人看的。"然而这些是事实，我的话是没用的。在延安，没有这类青年，固然环境也不容许有。边区青年他们最关心的是抗战到底的大事，剩下来的或者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婚姻问题每个青年都会自己解决。在我想，战争中何必结婚呢，但战争在事实上却是须促成迅速结婚的。在边区，婚姻是自由的。是的，婚姻当然自由，因为别人的规劝，是无效的。人们只能实施一点性知识教育，告诉青年如何避免疾病，如何避孕，增加每个人对于身体上的自卫知识，这是非常需要的。

同着青年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是老了，他们与她们有美丽健康的青春，有无限的前途，但有时，我还是愿意同他（她）们在一起，我也还有许多稚气，还有与他（她）们相同的地方。

我想不到在延安会遇着我看他们长大起来的青年，当我搬进文协会的那天，会里有人对我说一共有多少位先生

时，说到有一位在前方。这位先生回来时，方知道原来是我认识的××先生夫妇的儿子。一九二五年我在上海见到时，他该是八岁吧。现在，他长得壮壮的高高的，立在我面前像一垛墙。“我要叫你一声老伯母。”人们介绍时，他笑着说。真的叫起来了：“老伯母，你什么时候到的？”一本正经地问，我倒有点觉得窘。

长久的回忆引起来了，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家到××去读书，这是用了许多眼泪、恳求、好话、威吓换得来的，但是又舍不得家。刚到那学校里时，常常总是眼泪鼻涕的，比起现在这些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独个人抛了家，跑上几百几千里到延安来，我该大大的惭愧了。家里准许我每个星期日到××先生①家里去一次。那个时候××先生是那地方女工学校的校长。我去得很早，他们照例在吃油条，豆腐浆。“这星期过得怎么样？”他们问。我眼泪挂下来了。××先生微笑了，××夫人笑着说：“别哭了。”又转向××先生：“你老是这么问！”直到好几年后，在上海，他们见了我，还要开玩笑，“怎样？现在还要……？”我不等他们说完，就跑掉了。

上海亲戚熟人们中，有的欢喜看旧戏，那个时候时行毛韵珂的《诸葛亮招亲》，××先生的青衣也是好些人所爱看的。那天晚上，几个女伴把我拖到天蟾舞台去看××先

---

① 欧阳予倩先生。

生的《馒头庵》，他饰能儿。我们坐在正中第一排。这位身材不高而略胖的××先生，平时常衔着一枚雪茄烟，这时在台上，隔着一层薄纱，穿着女子的古装，在空中舞着——用铅丝系挂着——我忍不住地笑，笑得仰不起头来，觉得不好意思，离开了那排凳子。那晚同去看戏的有×三公子（人家给她的绰号，因她身材细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像男子），现在她父亲成了汉奸，但不知道她自己怎样呢？这个汉奸，我曾亲眼看见他，当北平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时，他做着司爵。原来的一个革命者，十几年后，竟变成了一个出卖民族国家的丑陋汉奸！他们的真面目一朝显露出来，使我们这种从不参加政治，与政治一向无缘的老百姓感到莫明其妙与极大惊奇！如若说出来，人家一定觉得我的话是不合理的：我觉得有一类人常常有做汉奸的可能性，或者是必然走到做汉奸的道路上去，那就是对于名与利迫切的要求而急不择路的人！眼前的事实不是很多吗？我倒也有一些例子与回忆。

一个人生活着，不但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人，也会见到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这有什么办法呢？能怪谁呢？年龄大起来，知道的事情慢慢多起来，要像十一二岁小孩那样的纯洁无邪是不可能了，但是一个人所宝贵的，恐怕并不是无邪，是在乎能够保持住一个人、一个公民的起码的操守，对国家、对同类。什么？说它是起码的政治操守或道德吧？就是现在，在抗战的巨流中，谁

知道有些人在几年或十几年后会不会变成坏蛋？全要看一个人的操守。

面对着××先生的爱子，引起了我一点不相干的回忆。

“爸爸呢？”我问。

“在香港。”

“妈妈呢？”

“在上海。”“呀！妹妹，她已长得很大了！”他忽然高兴起来，露出了一点稚气。

“也是长长的个子？”

“是的。”

“像妈妈。”

“是的，爸爸又胖了！”

“你还是那样老实！”我说。

“是的呀，家里说我小时候这样，大了也还是这样。”

“××先生他们的孩子呢？那时同你一起玩的。”

“大了，还是瘦得很！”

“小时候也瘦，大家笑他瘦得像小小猴子，老是吃零食。”

“是的呀，他们说我们两人一样，他小时候调皮，大了也还是调皮。”

我搬了几次家，他也调过工作。一次，在路上遇到了他。

“老伯母，你请我吃一毛钱花生好不好？”他同着一个

朋友向我招呼，说。

走到花生摊，他忽然改变了：“还是吃一毛钱柿饼吧！”

那次托熟人从西安买了咸鱼来，吃不到鲜鱼，咸鱼也是好吃的，聊胜于无就是了。还剩一条，写个信托人带去请他来吃。

星期六这晚，他来了，同了两个朋友。“我来烧吧。”他说，我就干脆把洗干净的鱼交给他。

他会烧很多的菜，什么回锅肉，红烧肉……是从家里的那个厨师学来的。

“如果延安办厨师训练班，你有资格当教授。”一个朋友对他说。

“哼！我还有资格当校长！”他笑得张开了嘴巴。

他一歇来问我要酒，一歇来要糖，一歇来要姜，“老伯母，有没有葱？鱼里不放葱是不好吃的。”

“反对放葱！”一个南方朋友说，“放了酒还要放葱？”

他生长在上海，说着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可是做的菜还带着湖南的风味，甜酸苦辣一股脑儿下去。

下一天，一个朋友说：“昨天我没有吃到鱼头！”这位先生是爱吃鱼头的。“昨天的鱼一下子就完了！”他带着惆怅。

“五个人吃，当然一下就完的。”我说，“我也没有吃到鱼尾。”

“谁知道！他们一边烧一边吃，也是可能的！”另一个

朋友恰恰在，他的话引得发笑了。

在延安，我也还看见了另一个看他长大起来的孩子。当我第一次参观××，×先生同我谈到从前的一些朋友。忽然他说：“×××的两个儿子在这里读书。”

“呀？我在外边也听到过。”

“在这里，还是在分校？”

“该在分校吧？”×先生似乎惊奇我的关心。

实在，这两个小孩，大的从前叫我“陈先生”，小的叫我“伯伯”，如果现在见他们一面，我还是快乐的。成人间的友谊可以不影响对小孩子的感情，可是旁观的人或者觉得不是这样，或者以为不必再与这些小孩子们有新友谊了。

该是新年间的一个晚会上，我确信见到了他，那个大孩子，叫××的。他就在戏台的旁边，同他小时候的面貌有了一点分别，现在变得完全像父亲了。

下一天，我注意到，他就住在我隔壁过去的一个窑洞里，他们一大群，该是为考学校而暂时住着的。他似乎在开始注意我，当我洗好了衣服挂出去的时候，他总是在窑洞面前，侧着头，偷偷地注视我。我接受了×先生不要明说的意见，没有招呼这个小孩，不去开始这不必要的友谊。

在北平有半年，我同他住在同一的人家，他是他父亲把他寄放在这家人家的，这对年轻的夫妇（其实也中年了）

是他父亲的朋友；我呢，一个同乡介绍去借住的，我不愿住到抽鸦片烟的亲戚家，也不敢独个人去住公寓，我的饭也是包在这家人家的。平常，当吃饭的时候，主妇太太把那些荤菜移了开去，对我说："这个菜恐怕你不欢喜！"把一只青菜或豆腐放在我与这个小孩面前。当小孩挟了一块肉吃时，主妇太太说："怎么你又吃肉了，明天又要肚子泻！"当小孩添饭的时候，主妇太太喊住他："怎么你吃了一大碗还不够，又添第二碗！"有时候，孩子给喝住了，只好放下了碗。我在那家人家做了可说是半年童养媳，对于这类事，从小我就没办法的，所有争权利的事情我都不会，但那时我已经济独立，唯一对付的办法我就买点糖果点心吃吃，填塞这未饱的肚子，有时到朋友家里吃点好东西；但是对于小孩不同了，他是不能像我一样的。有时，近晚，他的父亲来了，那家夫妇当然客气地留吃饭，孩子在旁边拖住父亲的手臂要父亲吃了饭去，我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拖住父亲吃饭。当父亲在一旁吃饭时，好菜都放在小孩与我面前，主妇太太连声地说："吃呀！吃呀！"父亲走时，九岁的××眼泪汪汪地拉住："几时再来？"

这些青年，他们出自各个不同的环境，但都是在这个多难的国家生长起来的，他们能够吃苦，对于抗战建国有坚忍不拔的信心，让我们珍爱、期望这一代青年吧！

"现在是儿子的时代了，不是父亲的时代！"我想到成仿吾先生的话。

7　刀鞘

附近的机关里，有一个赶驴子驮水的中年男子，我常常在下山上山的时候遇到他。小勤务们、行人……在近水边的山路上，大家同他搭话，开玩笑，他生得矮胖，胖得结结实实，皮肤黝黑。一张严肃而深沉的面孔，使人不觉得可怕，却也不觉得是如何同情；两腿粗粗的，比他的上半身短，这样，就愈加觉得他的矮了。他常常赤着上身，上山下山来回地赶驴子驮水，在冬天，穿着一件单上衣，就是下雨天，也不停止这个工作。驴子驮得累了吧，上山的时候，喘着气，走两步停一停，他带着一种温柔的像父母对于孩子的责备口吻："走！走！你走不动了！你这家伙！"从不见他鞭打它，他对它那么说了后，它还是不走，就在它面前，拉了它的缰绳上山。下雨天，山路非常滑，驴子下得太快时会跌跤，从山上跌到山下，会跌死的。他小小心心的，在驴子旁边后面拖着驴子的尾巴，一边叽哩咕噜说："哼！你这家伙，跌下去，没命……"他这样爱护它，它是他的工作工具，也是他的伴侣。

第一次我从旁边友人的小勤务口中，得知这位赶驴子驮水的人叫"矮子"，一般人大家叫他矮子，当然，我想这一定不是他的名字，这是一个绰号，但是有什么关系呢？"矮子"也好。

许多人，大人、小孩子，都把他当做一个开玩笑的对

象，人们同他开玩笑，他也打着哈哈。当他不赶驴子的空闲时候，对山红十字会里的人，常常要他抱病人。他力气很大，一个病人，他一人用两臂抱了就走，可是担架人员有时四个人扛，还说扛不起。

抱过一个病人，他问：“没有了么？”

“现在没有，等一下还有！”

“等多少时候？”他又问。

“等半个钟头。”

“我吃半筒烟行么？”

“行！行！”红十字会里的一位女士回答他，一边同他开玩笑：“一个钟点有几分钟？”

“八分钟。”

“不对，还要多一点。”

“那么十四分钟！”

他成天成天赶驴子，那个机关里的水从来不断缺。可是后来，这个机关搬走，矮子也去了，另外一个机关搬来，开水同洗脸水常常缺乏。无论是什么重的东西，只要他不在赶驴，你去请他帮忙拿，他总是肯的。他太使我觉得可爱，可尊敬了，这个把工作当做偶像的人！对于人，我只知尊敬他们的工作与才能，而不是尊敬他们的权威。有一天，我上山去，碰到他赶下山来，我问他：“你赶了几年驴子？”

“五年！”

我还想同他讲话，特别是对于他的工作，赞美一番，但是我听不懂他的话，不知他是什么地方人，说话非常含糊、好似舌头短了的。他呢，也听不懂我的话，我这笨拙的浙江话。

听说上海有一位刻了十年钢板的工友，得到了列宁奖章，那么这位矮子，再过几年，我想他也是有资格得到列宁奖章的。

文协会里最近来的厨师，有些人背后叫他“怪物”。“唉！这个老汉！”说到他，有些人摇着头。这个老汉是河南人。从前他做过军队里师长等等的私人厨师，大概他是逃难逃到了陕北，现在文协会雇用他，给他五块半钱一个月的工资。

在延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清洁的厨房。一个小小的土窑洞，里面三个炉灶，一块切菜用的搁起的方板，一只深进的小小的土炕，厨师自己睡的。炉子、炉盖、碗、盛菜的小洋铅盆，罐……甚至于一把破旧的扫帚，都是清清洁洁的。没有油腻，没有灰尘，每样东西都是有条理地放着，而且可说是基本上没有苍蝇的灶房，只有可数的三四个苍蝇。这个土窑洞的泥地，发出平滑的亮光，大约是他每天每天那样勤扫，扫得没有一点泥屑与灰尘，光滑得可以跳舞。

在这个窑洞旁边，他打了一个小窑洞，放着一点柴（柴统统放在露天，如果天一下雨，生火就很困难了）与白

菜，另一边打了两个小小的洞，一只木桶与一只缸放着，恰恰落不着雨。沿窑洞的转角，挖切成了一只圆转的泥土凳子，好像巴黎有些戏院里、博物馆四周围着有雕像柱的圆凳子。对着窑洞的山路边，放着一只倾脏水的木桶，一半埋在泥里，一大堆木柴紧紧地整齐地叠着，一根大配一根小，非常和谐，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地叠着。光亮的磨刀石，及搁着小凳的石块，该是从山底下搬上来的。这些，一点也无可引人注意的，但如果你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是经过一个人的力气、心思与计划安排过的。

他似乎为他这个工作与这些小土窑、炉子、碗、柴与圆泥凳子……而骄傲，走到他的厨房里，他快乐地招呼你，像对一个客人。我想起匈牙利作家 Ligmoud 所写的《残废者》中那个女人。他的馍做得很好，菜也还有味，无论多少人吃，有时多至二十以外，总是他一个人做，没有谁去帮他忙。

“我弄得不怎么好，”他再三谦虚，还没有满足他所做的，“我来的时候，柴东一根西一根横在路上，路上不好走人，我把它们理齐了，叠好了。”我赞美他的圆泥凳子，他笑得张开了嘴。“冬天的时候，早上我送饭上去，有的人还没有起来……”他的话有好些我听不懂，大意是说有些人到上午十点钟起来吃早粥，他决定不再上去了，挖了这样一只泥凳子，让大家下来吃的时候可以坐坐。对于开水，他也不送到每一个窑洞里去了。烧好了放在一只火油箱中，

这只火油箱有嘴，用盖盖着，还有用粗麻绳结成的提手，像一把极大的茶壶。一切他都尽可能在当地环境之下弄得整齐，清洁，合理化，我不禁赞赏他的组织与创造能力。

午后一二时，厨房外的地上，铺着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的皮，老汉蜷曲着在这块皮上午睡。厨房里，一炉子水正在沸起来，灶肚里一根木柴小心地、谨慎地——像他这个人一样的作风——燃着，但是惹它不得，惹了它，它有火的脾气。

“这老汉真是一个可爱的有趣的人！”去拿开水喝，走过他旁边，我说。从他的秃头，身上的衣服，直至赤脚，都是干干净净的，他那长而微胖的脸上发出一种“生”与“力”的光，那些油画像上常能画出来的。

“唉！这老汉真是一个怪物！天天同人吵架！”一位熟人说。

“吵些什么？”

“他不欢喜人去弄脏他的厨房，他的碗，他的刀……不欢喜人去拿给人喝的开水洗东西……”熟人接下说：“工作倒很好，就是脾气不好。”

“那不是顶好么？只要工作好！”我说，的确，各人主观的见解是不同的，在我，觉得只要工作好，天大的脾气也是不怕的；与其那些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做起事来皱起眉头，或者好像放在磨子里磨过，磨得只剩了一些渣沫（也有些磨成钢铁的），简直什么都没有劲了的人，就使有

脾气，总有用得多。

熟人尴尬地笑了，重复地说："唉！这个老汉，真是个怪物！"接着，他说："你看他这个厨房同这些（他做手势指着这些小土窑、水桶、菜、柴……），唉！他简直把这些当做一个理想！"

我吃地笑了出来，我笑的却是熟人的话。熟人笑得更厉害了："简直是怪物！傻头傻脑的。"

"一个理想！可不是每个工作可以成为自己的理想的？可不是每个工作都可以产生英雄的？还是人人该理想做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放弃目前的实际工作，去那样理想，过理想的日子？"我想。

"我欢喜这样的人！"我直爽地说。

"呀！你欢喜？"熟人有点惊奇，笑了。

"他对于钱怎么样？"

"你指什么？指他爱不爱钱？"

"他揩不揩油？"

"唉！那个，不！真太纯洁了！"熟人又笑了起来，"常常拼命要替公家省钱，买老百姓的柴都要他自己过秤，他自己的这点钱，五元半，不见他用，也不听他谈起。他就是同人吵架，不许人弄脏他的厨房……"

走出厨房时，熟人对老汉喊："老汉！她又在赞美你的厨房！"

老头子骨落地坐了起来，对我和善地笑了。

“目前他的苦闷，就是他还不满意这个现状，还要改善，可是被环境限制了他。”熟人带着同情地说。

像矮子与这个老汉样的人，是璞玉，是刀鞘。“刀鞘保护刀的锋利，而自守于笨拙。”好像是泰戈尔（Tegore）的一句诗。

8　邻居

在延安，我已大大小小搬过六次家。搬家这事情，用家乡话来说，一向使我“头大”。但是搬家没有及得上生病的麻烦。在延安，生了病，那真是有点麻烦的，也是需要耐心的，而久病的人知道这个。生了病，不声不响地睡着“做狗”，在外边，家里的人都这样笑我。我不迷信吃药，睡着，饿几顿，这是我生病的习惯。有些人生了病，乱找医生，医生一转背，希望病马上就好，同望病的人兴奋地谈话，谈他的病状，完全不知道休息。在边区，一切受物质的限制——生病的人自然而然会“做狗”——就是感情，也好像一样，什么都是为了公，没有私的友谊。生病的人不用担心来探望的人太多，就是拿一点开水，病人自己没法爬起来取。不过这是一个健康的青春的城市，生病的人怕并不多的。说得太远了，回头再说搬家吧。每一次搬家，我总觉得东西太多，其实我并不曾带什么东西来，可是比起那些抗大的惯于行军的学生，我的东西真太多了。每次搬家，我总抛一点东西。离开江西直到现在，已经抛的，

送的，捐的，剩了这一点，还觉得讨厌。将来，我可以变成一个痛痛快快的穷光蛋。

每逢搬家，照着我自己的习惯，把离开的窑洞打扫干净，至少收拾一下，不致太脏；及至搬了一个新地方，又要将那新居窑洞打扫收拾一番。

有一次搬到一个窑洞里，那个窑洞后面有一条小弄通到隔壁一个窑洞，我进去打扫，发现在我这边的小弄尽端有一个小便钵头，满满的，而整个小弄里，零零散散地堆积着许多脏纸头。

我听说这个窑洞本来是一个学校的图书室，后来曾暂时住过学生，我的直觉，觉得弄里的物件大概不是这些学生留下的，多半同隔壁洞里的人有关系，因为那纸头恰恰是从那窑洞的小弄端开始散起的；而我的窑洞里虽然有炭屑，灰尘，但没有这类脏纸头。

“旁边住的是什么人？”我问那个帮我搬家的一个朋友的小勤务，他似乎十分惊奇，他已经与我熟识，大约从不见我探听邻居及旁人的一切。

“一个××的教员吧，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是一个女子住的，但不，是一个男子，因为女子有时有些奇奇怪怪的特别习惯，或者不方便，但也不该丢着这些脏纸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小弄又不是垃圾桶。

窑洞再过去，住着一个也是××的教授，我曾在一朋友处见过他，从前是东北军里的一个团长或是旅长。

“你搬到这里来了?”在窑洞外，他望见我，招呼。这位先生是很有趣味的，直爽多话，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最会谈那些芝麻细碎柴米油盐一类东西。

看见我在生炭火，　　我很不欢喜人家看见我生炭火，人家一定要说我糟糕，没有革命志气，或者说我一天就是弄东西吃。实在，这有什么呢，可是这些念头在人类集体里总是会有的。平常我总躲了起来　　，我来不及走进窑洞，他说：“我来送把扇子给你，好得很，你看，只要扇几扇就成了。”他去拿了一把破的扇子扇起来。“你留着自己用吧，我也有扇子，不过已是破得不能用了。”我说。“不，这扇子也不是我的，是人家抛了的。”

“隔壁住的是什么人?”我问他。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里的哲学教授。”

“呀！我没有看见他。”

“你不认识他?就是那个面孔上……”

“面孔上有天花疤的?”

他笑了一下。

“唔!”

“怎么喽?”

“没什么。”

“这个人脾气有点古怪。”

“啊?”

“那个小弄里有许多脏纸头这一类东西……是不是?”

他走近我轻轻地说。

我笑了出来。

我把纸头都扫了出来，堆在窑洞门外烧掉，把那钵头放在窑洞外与邻居接连的泥台上，“请他自己去倾洗吧。”这个事情我是不愿做了。

在窑洞外拾了些人家搬走时候抛掉的破凳子、木板放在小弄的中间，意思也不过是告诉邻居，这是“楚河汉界”，他如要抛纸头，请他不要抛向我这边来。

一天，二天……钵头没有出空，太阳晒着，发出极浓郁的臭味，旁边一个朋友，他说：“怎么？这个朝天香炉还没有出空？”天天晒着，愈来愈浅，臭味也愈来愈浓了。

那天，×君在我窑洞里，那位邻居跑来了，他一直跑进我的窑洞，一边喊：“×同志在这里？”

“这位×××同志，哲学家、这位……”×君为我介绍。

哲学家没有理会，我笑了一下。他起劲与×君谈话，学校要搬家，他该跟了走——并不是人家强迫他，情理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愿离开延安，“我不愿离开一个政治中心。”他说，并问×君的校里需要哲学教员不？他很欢喜到×君他们的学校里教书……

我倒了两杯开水，就走开了。却断续的顺耳听×君对这位先生做政治工作：“学校需要你到那边去，我想你还是去的好，那边工作重要……”哲学教授打断了话，好像提

到什么服从不服从……×君说：“那倒不是这么说。”……彼此说了许多话，好像×君劝他去，而他则要留在延安这个政治的中心，要×君去问他们的学校，说他欢喜到他们那里教书。

这位哲学家，他进来的时候，如入无人之室，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窑洞的主人是谁——窑洞不是我的，但住着的是我——毫无礼貌地向×君告辞后转身就走了。

“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君坐下问我。

“我？我对他的印象?”我笑了。

次日上午×君又来了，那几天×君来我处很多，几乎每天来，后来，我才从×君的友人口中得知那几天×君为了感情上的什么很痛苦着，他做不下事，常常东看看西看看朋友，我心里开始觉得有点厌烦，但又下决心克制这个厌烦。

有些人已经开始惊奇我在延安的生活，其实在延安的作客生活——不过平常客人留起来至多几星期，我却已几个月了——谁也要感到惊奇的，也不止对于我，因为这些人物的生活多少总是缺乏纪律性的。“她躲在窑洞里做些什么呢?”“怎么？你还没有写完?”（其实人家背后的批评一定不止这个，不过自己无法知道，有时成了舆论，自己还不知所以然，除非敏感一点的人。）人们以为写东西是非常容易的，今天参观一个地方，明天一篇《参观记》出来了，今天同一个人谈话，明天把《谈话记》写出来了，就像一

只打字机。由于这种见解，对于拿笔头的人的私生活感到神秘，不理解，感到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大众化的。拿笔头的人的工作方式，我想也不外这样：收集材料的时候，动着，要写了，就必得静下来，需要有一个时间，关在窑洞里。

“你这样一天到晚不出去，尽写，如果一个朋友不来，真可以同外界隔绝了。”×君说。他虽然从前也是拿笔头的，似乎也有些一般人的见解。

“没法，我急于要写完这点东西。”这样，我只好完全把纸笔收了起来。写，我是一个外行人，而且我早已下决心抛掉它，现在还在写，真糟糕！

×君同我谈着他在上海时的文坛情形，似乎他的感情受到了激动。从前，我也有过那些激动，好像总受到冤屈，但现在早没有了，这些激动，忿慨，当对人类期待与估计得太高的时候就会有的。

当×君激动而兴奋时，好像一只刺猬，它的刺一直是竖起的，戒备着有什么东西要损害他，这样做人不是很吃力么？可是×君常常这样兴奋着。我猜想有些人对于他的攻击是一个原因，但为什么人家要攻击他呢，也不是没有原因吧！人家对他不高兴，所以×君老放出他的刺；×君老不放下刺，人家老对他不高兴，这样循环着。

我常常想，为什么×君欢喜到我这里来谈天，而一般人在奇怪我同他交际。延安有多少有名望的有学问的有地

位的人，可是我想我不配去交际，我是一个极平庸的缺点极多的人，交际那样的人，好像是去沾光了，好些人在我面前说他不好，可是我还同他维持着友谊。在国外，一位医治我胃肠病的熟识的医生，他分析我的性格，说我是一个“Grand timide”（很羞怯的人）一类里的人。这类的人，他们常常“被”人接近，当然这是一个极大的缺点，不过在被接近的时候，有的能够不被同化与不被牵引。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些缺点，　　缺点损害自己，人格不好，损害别人　　这些缺点常常损害每个人自己。对于×君也没有例外，他有好些缺点，这些缺点损害了他自己。人与人之间往往动感情，谁能够以人的立场，宽大而冷静地观察与接待他的同类，真是不容易啊！

莫泊桑在一篇小说（忘记了名字）里写了一个堕落而祈求自新的女子好几次离开原住的城市，到了一个新地方，起初，人家不知道她的过去，从她对工作及生活上，大家尊敬她，对她印象很好，可是，渐渐地从原来的那个城市有知道她过去的人来了，他们宣布了她过去的一切，那个新地方的人对她不好起来了，她又只好离开那个城市……这样，到后来，她自杀了！

到我这里来，×君放下了他的刺，他安静而休息似的谈些不相干的天，这大概就是他欢喜到我这里来的缘故。他的针刺，他的极富于地方色彩的精明，有点近于刻薄，庸俗，他的怪僻他的贪舒服享受……我都不管它们，我只

接受了他的聪明。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可惜他自己太明白他是聪明的。

有一次，我同×君偶然在一个地方遇到，渐渐地，在谈话中间，×君又开始放出他的针刺，我坐在窑洞边的矮凳上，笑了一阵。后来，×君同我一起下山，他所住的地方与我的是同一方向，两个人就一同走。到城门口，遇见O君，他远远就喊："今天我来看过你，你不在，我把你的书还你了，投在门里。"走近来，O君很不自然地招呼我，他的一只眼睛好像闭了起来，突然变小了，嘴巴偏在一边，想笑而又笑不出。我已经观察出当O君每次不快意的时候，就有这副神气。这个神气，是使我觉得可怕的，难堪的。好像英国小说里所描写的海盗，他们的一只眼睛会动，能大能小，就是这个联想使我起一种可怕的感觉。

我也曾听到人家说×君与O君之间是有意见的，可是我从不想去知道这里面的一切。但今天，O君看见我同×君在一起走，心里是不高兴了，引起种种猜测，特别是猜测×君一定说过他许多坏话，并且这些坏话我都相信。对于×君呢，为了O君与我招呼，还书，也一样地猜测。

进城门后，×君开始问我："你对于刚才这个人有什么意见？"

"没有！"我说，"一般人看起来我同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可是实在说，要问我这个那个是怎样的人，我却不知道。"

“你不要遮掩你的观察了！你……”×君似乎觉得我虚伪。

“你要我怎样说说呢？我不会说与我心里相反的话，可是有时当我觉得没有话，或有而不高兴说呢？你看我还是老实的。”

×君笑了，他开始从头至尾述说他与O君认识的经过。走过机关合作社，他邀我进去吃一点东西。推却，在这种时光要使×君不高兴，怀疑、不安的，我接受了。

我们叫了一个八宝饭，一只虾米白菜汤，人们惊奇这两只菜，因为大家都是来吃肥肉的，人们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可不是，在一个黄昏，一男一女走进馆子去，这该有点特别吧，就是在边区，也还有点特别吧？“让少见多怪的人开开眼界也好！”我想，就吃着八宝饭，×君一边讲着话一边吃。

有几个青年对×君招呼，并走近来同×君说一两句可以不说的话：“你来吃饭？”或“你吃什么东西？”以便看一看清楚这个同×君一起吃东西的女人是怎样的，而从这里猜想出许多事情来，建造一个“西班牙的别墅”……实在，这一切真是太费心了。

人们常常要替别人费心，这是常常有的。在外边，以前，有一次我突然理了轻装到上海去吊丧，四周的人以为我同家里闹乱子，要离婚了，因为那次送一个敬爱的朋友的丧，曾经哭了；又有一次我去望一个朋友夫人的病，车

夫以为我去赴情人的约会，回来时问我是否该不说这个访问，向我要钱……实在可笑的，别人是用不到去费心这些事的，每个人自己的事自己知道，也知道自己管理。延安，究竟是中国人站着的地方，十足中国的，男女间要末成为夫妇，要末就不理睬。友谊，这是太费解了。

从机关合作社出来，天已暗下来了，×君说他可以送我到山上，我谢受了。在路上，我们还遇到一些熟人，特别是×君的熟人。“××在家里等了你半天，各处都找到，原来……”人们转而望着我。

平常×君说话带点半真半假　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如此。这晚，他认真地对我叙述关于O君，努力克服他的兴奋，他好像很珍视我对他的友谊及印象。实在，他何必呢？对于O君，这样庸俗而迫切名利的人，何用申述与忿慨呢？这或者就是他们间合不来的原因，为的两个都有忿慨。

那天，×君谈到文坛，由文坛而谈到文化人，谈到团结与领导文化人。

“做一个领导人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技术。领导文化人更不容易。做一个领导人需要和暖得像春风一样，使人人愿意偎倚着他，亲近他，然而在内心里，他又要十分坚决的。”可是我虽这么说，实在是一篇鬼语，因为我得承认，对于文化人，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了解。年纪大起来，我只想简简单单做一个人，对于文化人，远没有螃蟹的美味那么使我关心了。我确实是太不长进的。

近午饭时，邻居推进我的窑洞门，一边喊：“×同志，我请你吃午饭去。”他随着坐下，与×君又谈他不愿离开延安的事。我倒了两杯开水走开了。

我的饭菜来了，邻居拖着×君走，×君有点为难。

“大家在这里吃吧！”我说。

邻居拖了×君出去，进出都没有招呼。

有人说延安人的嘴巴多少有点馋的，但我想也不是个个如此，所以我更没有怪邻居连客气话也不说一声，因为我决不会一呼就去的。

×君吃过饭，又回到我窑洞里来了。“我们吃了三不粘与红焖鸡……”接着他说：“这个人真傻，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他想不到我还是这么年轻，‘有这么大的名望，一定至少在四十以上了，你成名这么早……’真傻！”×君笑着：“我问他多少岁，他说二十九，但对人家说三十五。还没有结婚，不过对人家说已结婚且有了子女。他说一定要这样，年纪说大一点，又有了妻儿，这使人们对于他的学问和威望更加可以增高了。”

我怔了一下，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对于他有三个不同的印象，第一个当他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出版他的翻译×××，其实翻译得并不好，而他对于哲学是并不好的，一群盲目的青年大大地捧他，那时国内正在哲学高潮的时候，他的风头健极了。接着就有好些人批评他的译作，一下子被打下去了，他变得十分狼

狈，这是第二个印象。去年，在×××见到他，他神气十足，大学教授了。这是第三个印象……"

"听说他有钱，常常请客，有多少人常来看他？"×君突然问。

"倒没有注意，"我说，"有人带了钱到这里来请客的？"

说带钱，也不是什么数目，千把或几百，在延安用以上上馆子是很舒适了。他在××住了一年多，每月百余元薪水，他该带了千把块钱来。

他的窑洞门外堆积着馆子里的碗碟，几乎每天有，他该吃不惯公家的小米饭，常常叫面及菜来吃吧。

送来一阵尖锐的女人的笑声，×君停住了话，"什么？"

"他该有一个女友吧？"

"噢！这样的——我去……"像旋风一样，×君立起来走了。

"唉！你去做什么呢？"

×君大概只听到一个唉字，其实就是听全，也不会信从，结果我当然责备自己多说了这句"他该有一个女友吧？"

×君对于人事有这样的好奇，虽然有时好像带一点稚气，对于男女间的交际，他这样关心，对于这样的男子，一个女子须保持距离，他不是那种欧洲社会上的可以在一起无邪地跳舞、溜冰找正当娱乐的男子，这还是一个中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才子，虽然在有些部分，好像已经新到

了极点。

直到吃过晚饭，×君又来了，谈邻居的事情，有的人可以觉得这位女士找着了一位名人，有的人可以觉得她嫁这人而可惜。她对人说："过不惯集体生活。"很简单的，她想结婚了，一个女子结了婚就完成了她的事业。一个女子总想嫁一个地位比她高的，借此可以跨上一步，男子对于妻子也总要提一把，封建社会里的人总不免有点如此。也许她还爱他身边几个钱，谁知道？女子爱物质胜于名位，先生们不是这么笑的？特别在延安，这个穷地方。

×君观察到我对这些谈话没感大兴趣，特别，他一定觉得我早已不在等待他来谈天了，但仍是笑微微地叙述，问我的意见。

次日，×君又来了，邻居又来约他吃午饭。饭后，这次他俩一同到我窑洞里来。

"呀！你是……"邻居第一次招呼我。"你的名字可不像女文学家的名字。"他笑着，用了随熟而可爱的口吻。

"何所见呢？"×君半真半假的。

"像××，像××，大都是有草头或玉字的。"

"要不要取个紫娟，香菱，或者××，像你的女友，象征又香又甜又纯洁？"这个滑稽而带刻薄的念头穿过脑子，笑了出来，立刻我觉得太不好了，连忙忍住笑而责备自己。

可是这个笑已传染给×君了，他好像还猜中了我的念头。×君，有时使人觉得滑稽，不讨厌，这或是他的中国

旧学问在作怪了，非常幽默的。

我出去，就这样把他们赶了出来，邻居回到他自己窑洞去了，×君与我下山去。走了一些路，突然，×君对我说："他们的事成功是成功了，但并不圆满。"

我怔住了，"你说什么？"

"你的邻居哲学家！"

"呀！你又来说他们了！"

"我有证据，"他从衣袋里拿出一点破纸，拼合起来："我做了你爱情的俘虏。"

"这正是哲学家的笔迹。"

"天知道！"我笑得弯转了身：

"你什么地方去弄来的？"

"你们的窑洞门外拾得的。"

"唉！"我笑着叹了口气。

如果在别人面前，×君恐怕不会这样天真坦白的，别人或者要误会他或因此骂他，但是我原谅他的稚气，我觉得这还是稚气。

"多脏！地上拾起这些破纸头，还放在袋里。"可是一下子我想起从前在国外许多同学们的古怪脾气，又，常常把她的情书写了个头摊放在桌子上："×，我的心。""×，我亲爱的朋友！"一张一张地散着，一边看书，一边听无线电音乐。

"我做了你爱情的俘虏。一方面可见他不是爱情的主动

者，并不圆满；一方面，他已做了她爱情的俘虏，事情已成功了！”

我只是笑着。

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忽然记起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话来。

下午，×君没有来，但邻居却来讨开水：“陈同志，给我一杯开水。”

我正迟疑，开水，热水瓶里还有一点，但这是留以保护热水瓶的。瓶空了，等下冲开水，须把热的倒出一杯，凉了才可倾入，否则瓶胆会破的。

“人家连招呼也不招呼你，你还要给他开水。总之，这个人一点也不使我同情，他不像一个人。”窑洞里恰恰有个朋友，他对我说：“回答他没有？”

开水确实是没有了，但经他这么一说，我反而回答不出来了。

“人家当你傻瓜！好，那么以后他天天向你讨开水，你天天给他烧开水！又恨自己做不出事。”

“你急什么呢？做傻瓜也就是！”因为我笑得厉害，使这个朋友发急了，其实，在平常，这朋友对人是和气的。

“开水没有！”他这样回答了，几乎对我有点生气。

在春天——北方的三月初，还该算冬天吧　早上四五点钟是最好睡的时间，可是邻居，在这个时候，好像已

经起来了，但又不像起来，因为通常，在七八时才见他的勤务来打洗脸水，他一直哼着哼着，好久好久——两小时，直到天亮。

“……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支很雄壮的歌曲，给他哼成像小调，在睡梦中，嗡嗡地像无锡的清早，街上收买灰的叫声与出卖灰的喊声，一样的：“灰！灰！灰！”真讨厌！好几次我有点烦躁。

邻居的勤务是个哑巴，但他偏偏欢喜说话，欢喜探听所有的一切，报道所有的一切。有一天近晚，我出去了回来，上山遇见了他：“呜呜！”他见了我喊，拦住我，交我一张条子，我以为朋友送信误交在他手里了。拿起一看“……客饭……”“哦！”不及看完就交还了他。可是他觉得我没有看懂，对我做手势，指指他的嘴巴，意思是说邻居今天有客人在吃饭吧，在窑洞外，他时常对人做手势，说他是机关枪手。他的手代替了嘴，虽然说不出来，但都能比仿做得出来。附近一个朋友的马骑回来，他常常争去代他还给马房，可以骑一下子。有一次那个朋友骑出去了回来，大约等一会又要出去，就把马拴在窑洞门外的一个木头上。等到那个朋友出来，一看马不见了，他有点着急，及至到马房里去看时，马在那里，说是哑巴骑回去的。

那天早上，人声喧闹，照例已哼过无数次的“打东洋……”，夜间我曾闹肚痛，到早上七时还起不来。刚刚坐

起半身，穿好上衣。窑洞门外在闹架，附近的一个朋友走在门口，我问："什么呀？"

"哑巴送上一头驴子来，他叫送回去，要一匹马，一匹白色的脚上有……的马。"

"哦！怪道话那么多！这样的脾气，做他的夫人一定难对付的。"

"那谁知道？也许昨天早已说好他骑一匹白马，今早马房里送一头驴子来，也许这头驴子他知道脾气坏的，自然要换。"

邻居与他女友走进来向我辞行，那位女士还走到我床前握了一下手："陈同志，我们再见了。"

"再见！祝你们两位路上安好！"我说，"真抱歉，来不及送你们了！"

"××（我喊附近朋友），对不起，请你代我送一下！"我知道这是一个极不好的请求推托，但那个朋友并不拒绝、反对，等我起来时，他立在高坡上，还在送他们。早已走远了，他指给我看："在抗大合作社那边，那一群四五头马的地方就是。"

这位邻居终于离开了延安，但好似听说×君曾受到批评，人家说他拉教授，这自然是一个小小的冤屈，×君曾吃了这位教授好几次饭那才是真的。

邻居走后，在起初的几个早晨，听不到嗡嗡的歌声，反而觉得很寂寞。

9　几位老革命家与几位国际友人

好几位老革命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使我感动。董必武先生我曾见过一面，觉得他在严肃中充满了慈祥与和蔼。好几年来，我特别欢喜亲近老年人，觉得年老的人，对于他们的子辈孙辈，因着他们学识的渊博，生活经验的丰富，常常有宽大的胸怀，深刻的理解，晓通的人情。老年人，他们与我之间因了年龄的悬殊，学识的悬殊，生活经验的悬殊，而成为我仰慕的高山。年轻人是无法可以同他们争胜的，也无可以引起嫉妒。可是，在年轻人自己中间，常常为了事业上的种种好胜竞争的结果，引起嫉妒。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嫉妒这个感情，它使人类相互间遭受无谓的损害。其实，在中国，封建残余的毒根种在人们的身上，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子交际异性，恐怕还只有老年人或者小孩子，这是我回国以后几年内所感觉到的。为了什么事情，或者偶然，你交际了一个年龄相仿佛的异性朋友，这位先生如果有太太的，那还好，但如果没有太太，或者有太太而这位太太又并不贤明，那么不是自己遭受闲言，就是害人家夫妇吵嘴。人与人间的友谊我欢喜保持平衡的关系，我不能忍受上对下或下对上的关系，那种关系，我在封建家庭里早已受够了，这自然是我性格上的缺点，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老年人，他们会像一个仁慈的爸爸一样宽恕我的缺点，而我呢，献给他们以我的仰慕与

尊敬。

去年十月初吧，一天上午，去访吴玉章老先生，老人家从重庆到陕北，车中颠了好几天，在路上就开始病了。六十多岁的人走这样的路！那天恰恰有医生来替他诊病，这样，他们到旁边窑洞里去了，中间客室窑洞里只剩了我一个人，我走到廊上（那是些石窑洞，是用石头砌成的），朱总司令正从外面走进来。

“你看谁？呀！我知道，你望病，看吴老！”他笑着说，“他一来就病。”还是带着亲切的笑，“有医生在看病？”他用手指了一下。

回进中间的客室，吴老先生也出来了。他穿着一套米色条子西装，脚下一双皮拖鞋，带着莫斯科与巴黎的新鲜气息。勤务拿上一盆水果与一壶开水来，吴老先生倒了一杯开水给我。

“这水多脏！”他望着他自己杯里的开水说。

“可不是？”我回答。

“吃点葡萄吧！”他说，拿起一把葡萄放在开水里洗。因水而讲到怎样做沙滤水，在延安，环境艰苦，但也还可以做好，我应着。

在这里，我过着客人的优待生活，比起延安的八路军老干部与学校里的学生来，既然说不上纪律性，更谈不上吃苦耐劳了！有时，在这种比较之下，精神上受到自己极大的谴责，会感到深深的苦痛。但是说到沙滤水，却也引

起想到在外边，我们连洗碗也用烧开过的沙滤水。

朱总司令从左边的一间屋里走出来，坐下，吴老先生与我结束了关于水的谈话。

他从袋子里摸出了一把小刀，把一只沙果切成四块，削起皮来。这是一把德国制的精致锐利的小刀。这把小刀引起了我一些奇妙的想头，我想对他说，但又不敢说，只是呆住了望着朱总司令削沙果皮。

两位老人似乎有点奇怪我的呆木不说话，以为心里生了什么鬼。

“你答允我的照片呢?”我问朱总司令，但又惊奇自己这一句简单的问话，像对一个老同学说似的口吻，实在，我没有思索过这句问语的方式，如果我思索过，我就根本不会说出来，好得吴老先生在旁边，好像鼓励了我的勇气。第一次在陕公见到朱总司令，我曾向他索一张照片（当时成校长在旁，我想一个女子向人索照片是不大好的，而且我还是第一次，我说明是寄给一个杂志的），当时他答允了，并且我把我的地址抄到了他的簿子上。过后，成校长说：“朱总司令答允了的事，随便是怎样小的事，他都不会失信的。”

“还没有印出来。”朱总司令回答，他似乎惊奇我还没忘记。

“可不要失信呢!”我想说，但这回思索了一下，就没有说，只是笑了一笑。后来，我看见文协会里挂着一张朱

总司令送给文协全体同志的照片。

后来，吴老先生坐到一只番布椅上，又谈了些话，谈到《大公报》里吴老先生的老朋友们及我所认识的人。

这位完全像欧洲老年人的吴老先生，他使你感觉到这样可敬可亲，好像你不同他说什么话，他已经完全能了解你：在他面前，你可以坦白真识，就是你的缺点，也无须遮掩。

我见着徐特立老先生是非常偶然的，那天，徐老先生来参观附近的一个机关，路过我的窑洞。那几天，我接连有四五夜没有睡觉，上一天近晚非常疲倦地睡下后，下一天就起不来了，发烧。为要透空气，窑洞门是开着的，走过门口，徐老先生与几位先生立着，望了望窑洞。

“请进来坐一坐吧?”旁边一位朋友见着他们说。我生怕不会招呼陌生人，睡在床上，窑洞里又是堆得乱七八糟的，觉得很窘。

“请进来坐一下吧!”我终于说。

“不，我看看。”满盈着一面孔母亲样的慈祥，徐老先生笑着回答。

在延安的街上，有时可以遇到一位个子不顶高，不胖也不瘦，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老者，用迅速而坚决的步子走着路，那是林伯渠老先生，人家说林老先生是特别长于处理财政的。

几位老革命家的精神，像殉道者一样的坚决与牺牲的

革命精神，他们的毅力，他们的吃苦与耐心，真是超常的。或者，也只有东方民族，才有这样突出的富有毅力的老年人。

现在谈到几位国际友人。来延安的国际友人是很多的，不过大都是参观，很少有较长时间留着的。我来的时候，斯沫特莱女士已不在了，她在延安与前方都曾逗留较长时间，八路军里很多人知道她的名字。李德先生是大家知道他的名字的，外边有几个杂志上有文字曾提及到他。还有是马海德先生。

马先生的个子不高，胖胖的，有着阿拉伯或别的东方民族的血统。他在延安，是无人不知其大名的，有极丰富的社会经验，真是四面玲珑，八方圆通，没有一个人不欢喜他。晚会的时候，人们提议："欢迎马海德唱歌"，马先生就唱起："送哥哥，打日本，啊唷啊唷……"人们是百听不厌的。他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一塌糊涂"，"莫名其妙"，（有人教他说莫名其土地堂，还要好），他不但是一个中国通，特别是一个延安通。延安人人都知道他，他也什么都知道，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最近到了什么来参观的客人，他一定能确切地回答你。

马先生在中国，在延安留了这么久，比我，一个中国人还熟悉中国与一切，我想他一定有许多对于中国与中国人的宝贵意见，什么时候我能够看到听到他这些意见，或者在将来，我有运气读到？

当然，中国民族有极大的缺点，一个受着强邻侵害的民族，自然不是无因，本身有着许多缺点。百余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军事与经济的侵略，半殖民地意识普遍了中国人的头脑，有时甚至在思想前进的人身上，也找到这可怜的意识。马海德先生住过上海，现在又走到这样偏僻的内地，自然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国民族也有很大的优点，自从东北四省沦陷之后，一般外商，德法等国商人都说不能去了，也不能在那边做生意了。从前，同中国人做生意是最容易的，中国人最守信用，不必一定要写契约商约，平常口头说一句，都是“一言既出”准守着做的。可是日本鬼子不同，最没有信用，写定商约，还要变卦。中国人民还有极大的忍耐力，他能忍受一切的苦痛，并且常常会用宽大的胸怀对付他们的敌人，所谓“以德报怨”。他们对于生活的需要与祈求非常简单，世界上很少有民族能比到东方的大陆民族——中华民族这样富有耐心与韧力的。就是用着这个了不得的武器，耐心与韧力，我们与胸量狭小、出尔反尔、残暴不仁的日本强盗作持久战。说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吧，虽然复杂，也是美丽，完全，纯粹而且和谐的。

李德先生与马海德先生不但外表是不同的，看去他们的性格也好像有极大的区别。李先生是长长的个子，他的面孔，他的神态，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人家对于他的传说很多，好像是带一点谜样的，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

欧洲军人，外貌很严肃，极绅士的，这样的军人使我联想起巴黎的那些陆军军官与陆军大学学生。在国家有事之秋，就产生出许多卫国的大将军，而想到他们的“限制服装”（要一定讲究的服装）的高贵严肃的跳舞会。有人说李先生曾经非常骄傲，为什么呢？我想该不会吧，一个国际主义者，在他们，不是对于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看待的？我能够理解一位从欧洲初到中国的外国朋友，他们对于中国的估计，他们的心情，他们不但生活有时觉得不惯，也许会引起一点失望或卑视的情绪，这是可以原谅的。还记得我同着我的小孩回到上海再往乡间时，在沪杭车中，小孩子会有这样的思索：“越走越不好了！”过新加坡，小孩就有这一句话。乡间的小木桥与厕所，小孩总表示看也不肯看一眼。在生病的时候，他竟会说：“我们回到法国我的病就好了！”或者中国是有一点神秘的，他有广大的土地与众多的人民，而生产方法与工具，生活的方式是这样原始而落后。如果不去理解这民族的潜伏力，那一定是毫无趣味的。有些外国朋友，他们对我们的抗战表示惊叹，是的，我们已经支持了两年，但不止全国许多领袖们指示，就是全国人民也确信只要我们团结，打下去，坚持下去，最后一个放下武器，我们一定胜利。听说李德先生是一位军事专家，我想，如果在欧洲，正规军配合上机械化的武器，同着熟悉的地理与人情，他能发挥他的才干。在中国，情形恐不同。对于一个人才的使用，或者一个军事路线，政治路线，

关系是这样重大，关系到多少生命与多少的物力。

有一天，马海德先生请了些朋友到他的窑洞里吃晚饭。他的饭菜是勤务员做的，那晚是一只菜汤，西式做法，不过里面放的羊肉，切成一小粒一小粒中国式的，其它，加上几只叫来的菜。两个窑洞布置得非常精致，可够得上算我所见的延安最漂亮的窑洞。一个大的，可以容纳五六十人开会。晚饭后，留声机的音乐响起，有的人就跳舞。外边的人听着我说这个，恐怕要吓坏了。这好似我供给了有些人讽骂我个人与别的资料了。抗战前，偶然在朋友家里跳舞，上海的某报馆，当然很有钱，用了包打听，把这些我个人的消息采去登出来讥骂。那天，人们照常一样的穿着军服与草鞋，人们的脚步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跟着留声机的声音转动着。马海德先生实在什么都中国化了，他的跳舞的姿势也都变成上海那些舞场里穿袍子马褂的老爷们的那一副样子，真是滑稽。我谢辞了李德先生的邀跳华尔兹，以欧洲风俗，这是不礼貌的，但我又没有办法解说理由与苦衷。我不会说英语，虽然欢喜跳舞，但不过是个笨拙的欣赏者，华尔兹旋转得太厉害，要头晕，我也不会。可是对于一位军人，这个辞谢，他一定要以为我太没礼貌，或者故意给他一个不客气，这就使我很不安。我很想问他，似这样的长久住在中国内地，他感到苦痛不？想不想回到欧洲去看看？可是我没有问，我想如果问，他一定这样回答我：“集体需要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没有什

么苦痛的。"

那晚我还听到曾时行京、沪一带的歌曲："这位某先生，这位某女士……快……特别快！"《特别快车》的歌声，使我眼前立刻映"舅太太"与某小姐的舞影，肩头一耸一耸，绸衣上的花丝阔镶边，想起旧箱子里母亲的嫁衣，那时我回国不久，印象是非常新鲜而深刻。听到这类歌声，也想起回到上海第一次坐沪杭车归乡，在车中等候开车，北站的月台上无线电用苏白广播："从上海到杭州，第×班车，×时×分开，……"接着，广播这些"摩登"的歌曲：《特别快车》和《再会，巴黎！》。"再会，巴黎，我爱你……"那时我的心境真坏极了，我回来太迟，老母已在一个月又十二天之前进了棺材。这支歌曲引起我极大的难堪，我还不惯于祖国的生活，还眷恋着远方的友谊与一切习惯。有些人爱巴黎的实验室，有些人爱巴黎的图书馆，有些人爱巴黎人民的民主与革命精神，与它的国际城市的空气，而这支歌曲里却只赞赏巴黎的女人与醇酒。就在车厢里，我真的呕吐了，把早上吃的早点都吐了出来。想不到在延安，听着前几年的时行歌曲，还会引起这些不相干的回忆。

我厌倦交际社会的生活，实在，在祖国，根本也没有交际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交际总是很少社会性的。在那些宴会与茶舞会里，常常看见平时熟识的人，在这种场所夫妇还是挤在一起，好似变成小组的娱乐团体。可是在国外，人们聚餐，总是偏偏把夫妇拆开来，各人配上陌生的对象，

而在交际场所，一个丈夫跟着妻子，妻子跟着丈夫，好像有点不合乎交际道德的。

从前，我欢喜的跳舞会（抗战以后，我没有跳过舞），是几个要好的朋友夫妇，聚在一起，大家热闹一下，在家里，穿的衣服只要自己觉得舒服，不必顾虑到别人以为好看不好看，脚下呢，穿着平底的软鞋也不要紧，把神经放松了，随随便便的，也用不着顾到严格的礼貌。我也欢喜到那些被人们认为黑暗的舞场里去，有时找着家里亲近的人同到舞场里去，那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们跳舞，同时看这些舞客用着贪馋的眼光注视那些流露出勉强的媚笑的舞女，她们哓哓不休的毫无意义的话，与疲倦的笑声。这是一个现实世界！有些朋友笑我这古怪的脾气，说是欢喜"稀稀奇奇"。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找娱乐我欢喜亲切或洒脱一点。有些人特别欢喜到那些为我所不欢喜的场所去，打扮得讲讲究究，去给人家赏鉴；我不爱那样，如果我欢喜哪一件衣服，那也是为了我自己高兴。我最怕的是被人请得去，那里有许多陌生或半生半熟的人，这些人有的对你有好感，有的有反感，很少是漠然的，不论好感或反感，对于你，在精神上都是一种负担。

那晚，我在十时过就告辞了，如果要说我在延安曾找消遣，那么这是仅有的一次。

10　老百姓

说到陕北的老百姓，我真觉得是一门活的生动的广泛

而又渊博的学问。政治工作者找“一般的”去做他们工作的对象，可是文艺工作者们却也不妨找特殊的或典型的来描写一下。我住在延安，还没有机会到别的乡镇去住过，在延安过的是都市生活——陕北的都市生活，延安的老百姓也已经多少有点都市化了。如果想懂得他们，只有到纯粹的陕北乡村间去。

我同老百姓接近的机会很少，而接近的对象，总不过是些商人，当我同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印象使我十分深刻，去年，当芬刚来的时候，一天，我去找她，她住在抗大招待所，那是借一家老百姓人家的住屋。我找到一家人家，走进大门是一个院子，院子中间是一个花坛，里面淡黄色与紫色……的蟹爪菊正开得盛盛的，虽然说不上“六曲栏杆深院子”的那些中国旧贵族人家，但至少是一份殷实富户，跟着我问话的声音，走出一个老婆婆来，她上身穿着黑色的丝质夹衣，下面青灰色也是带一点罗质的夹裤，裤脚管用带子束住，一双小得无可再小的金莲。她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只是一见我，就赶我出去，“出去！出去！”因为我身上穿着军装，不但关系八路军名誉，也关系所有全国军队的名誉，所以不曾发脾气，如果我穿的是旗袍，也是老百姓样子，恐怕我要问她为什么用这副态度赶我出去。

在冬天，老百姓，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同四川同胞的用布扎头

是不同的），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张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脚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站在你面前，就像“七侠五义”中的两手叉起的彪形大汉，可惜这里没有什么卢芳，艾虎[1]……在你面前，他们假想你是有钱的，卖给你东西，价钱抬得高高的，反正没有人去干涉他们。在冬天，很少见到老百姓妇女，她们该一天到晚蛰伏在热炕上吧，躲到地下似的，好像蛰虫的生活。无论男和女，他们的两脚走起路来，作八字的趴开，听说这是因为从小骑马与骑驴子而养成了这一个难看的姿态。据说他们的土炕，成年生着火，就是炎炎的盛夏，也还是生火。睡在热热的炕上，可不是像做烤鸭一样？真的，我觉得就是在陕北住上十年二十年，他们这种习惯我是无论如何没法同化的。更说一句老实话，如果不是八路军在这里，我一天也住不牢，一位军事委员会的犒赏队长，我的老乡，他也表示这个意见。我并不是说陕北同胞的生活习惯一定怎样不好，不，我不是这么说，但我同他们无法同化，这是真的。有一次，我住的地方，旁边几个窑洞里住着好几个老百姓，他们是延长人，冬天没有什么耕种，到延安来做泥工。白天他们出去了，近晚四五点钟，他们回来了。那几夜，在半夜里，睡梦中常常被一种笨重的好像

---

① 《七侠五义》中的人物。

打泥土的声音吵醒，我想什么机关这样迫切要窑洞，工人连夜里都不休息？但这个声音只响了一阵就停止了，那又不像是开窑洞，接连每夜都是这样。好几夜后，我的耐心与好奇已达到了膨胀的地步了。那夜，大约二点多钟，这个声音又响起来，我起来，跑出窑洞，望了一望，发现这些声音是从那个老百姓们住着的窑洞里出来的。我走到他们的门口去探视，看见他们的炕上一端烧着木柴，发出熊熊的火光，一个人在炕上吸烟，一个人在地下劈木柴，这声音就是劈柴的声音。满个窑洞都是烟，他们在烟里面倒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从门外望里面，火光与烟就像火烧一样。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劈柴，劈柴在你们白天回来的时候劈吧，夜里是要睡觉的。”旁边的朋友哈哈大笑，笑我同他们讲道理。事实上，的确，尽管我同他们讲道理，他们也不懂得我的话。

我真觉奇怪，同样一个窑洞，我不生火——而且我是极怕冷的——也睡得好好的，他们的被褥好似用得很少，他们习惯了火，没有火过不来日子。

一天，我出去看朋友，走到半路，人家说有警报，而且放了紧急警报，就近，我跑进一个老百姓住的石窑洞。这个窑洞真可以叫做“晏子居”，那门矮极了，要俯下头才得走进去。原来这本是放棺材的石墓，把死人拿出，住进了活人。炕上睡着一长长大大的还年轻的男子，胖胖的，可是面色灰糟糟，好像有一种烟土气。一个老妇人，陕北

人叫“老妈妈”的，坐在炕上，玩弄一头用绳子系住颈项的肥大的猫。她的发髻与黑色发亮的面孔，乌黑的牙齿，特别是那一双手上的长指甲，使人联想起《聊斋志异》里的人与欧洲神怪小说里的木乃伊。一种比拟不出的臭味浓郁地充满了石洞，那扇矮小的门，她用木板拦了起来，这样，可以进来的仅有的新鲜空气，也给她关住了。老妈妈要我坐到炕上去，实在，也没有凳子，我就在炕沿上坐下。旁边还有一个是什么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我们随便谈着天，无非说这个窑洞非常好之类，问到我与那个工作人员是什么地方人后，接着，她自己说，她是从米脂搬来的，好像说几年前，那边荒年，没法生活。睡在炕上的青年说她有两个儿子，在米脂做小学教员。大家开始赞扬这位贤母的有家教，简直恭维她高兴得眉开眼笑。她不停地抚弄着那头猫，一边喃喃地口中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我担心她的长指甲如果刺痛了猫，那小畜牲怕会咬她，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的指甲抚到猫身上好像就变得柔软了。她与猫的安闲懒惰的神态使我想起波德莱尔（Baudelaire）① 诗里的安闲懒惰的非洲女人与她们的猫。这种安闲懒惰有点接近于原始感。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南方熟人曾说过陕北人的说话是有媚惑力的。陕北人的举动与话声都非常迟缓，而他们这种安闲与懒惰的确使人感觉到特别。但同时，我又

---

① 法国诗人。

觉得他们是可爱的，他们对于抗战的热情，与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他们有的只认得几个字，但他们的政治认识恐怕比受教育的人还高。男女自卫军所做的锄奸工作，如像查路条、放哨等等，他们都是用着极生动的自觉性来做的。听说曾经有二个日本俘虏想法逃跑，就是依靠了自卫军包围了山头，重新捉回来的。这里的老百姓，他们的警觉性非常之高，而且对于锄奸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一个汉奸或坏蛋，如果一经发现，他想逃出这里，那是休想，除非他生起翅膀。但愿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有这样严密的组织，都能这样做锄奸工作！他们的爱国热忱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如像秋末冬初，小米刚刚收起，那些头上装着两支毛巾角的小伙子与老汉，常常背上负了一袋小米（这些袋是用本地羊毛织成的，非常结实耐用，像英国最好的毛绒料一样，能够御雨），他们用八字趴开的脚步，慢慢地爬上山来。“同志，你们这里收救国公粮么？”“不！”有人漠然回答他，用着讨厌多事的口吻。“那么这里近段什么地方收呢？你知道么？”他还是热情地问，一定要把这袋小米交到收救国公粮的地方。城里十字街口连一张何处收救国公粮的布告也没有，结果，救国公粮收起来的数目超过预算，这是老百姓自动交纳的，这样交纳的。

这里的老百姓，他们非常欢喜小孩子，听说生育率并不低，但死亡率很高，所以我们很少看见小孩子。像江南那样，四川那样，一对夫妇拖着六七个小孩子，在这里真

不多见。许多人对我说起这里的老百姓大量的患社会病，这真可怕，也可担心！这种遗害子子孙孙的脏病，实在也是一个严重的敌人呢！多少年来这些病传染着，散布着，遗传着，他们完全无知，而尽是胡闹，以至变成人口这么稀少！这里实在可以来一个民众卫生运动，特别是抵抗社会病运动。有些八路军工作人员，因了种种不便的关系把小孩子送给了老百姓，他们都能很好的管养，他们特别欢喜男孩子，欢迎无条件的送给他们。如果寄养，比较不欢迎。凭着这点对小孩子的热爱，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但终究因为太脏，太不卫生，太没有育儿常识，往往容易把小孩糟蹋掉。

今年新年，老百姓开的店铺及他们居住的大门上，贴着新鲜的大红门对，没有一副不是有抗敌意义的："拥护抗日领袖，实行建国纲领"、"打日本为子为孙，除倭寇救国救民"，有的是当中四个字的横幅："抗战建国"……有一次，走过一家小旅馆门前，一位朋友指给我看："这里有一幅有趣的对子。"我看："过年敌机又来了，惊得同志东西跑"，已撕掉了一大半。这是好像有一点开玩笑的对子，或许那个店主发现觉得不大好，已经撕去了。这副对子不知是谁做的，虽然有点滑稽，却也有一点符合实际。在空袭时，城里的人只有往东西向跑，因为出东西门是最迅速的。老百姓对于八路军的亲切与随便，甚至于嘻皮哈脸开玩笑，这是我们常常能够见到，一点也不算稀奇的。从前，我见

到别的军队，总有“谁敢在泰山头上动土”的感觉，抗战后，全国军队都不同了。老百姓对于八路军这样亲切，自然因为八路军保护他们，而且，特别给他们种种实利。总之，在政治上，他们很快的进步了，但是在文化上，还非常落后，文化水准不比政治，这是一种公民教育，一种人情的修养，一种心理的改造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因为文化低落，虽然政治飞跃的进步，可是在他们的性格上或者生活习惯及别的方面，还有黑暗的一部分，比较自私偏狭排外，也有一点原始性的残暴。但是在他们老百姓自己淘伴里，有时候他们之间的亲切行为，弄到会使我感动得下泪的程度。可是在日常，在对一般人，他们很少有这种人对人间起码的同情行为。这些苦痛，让文化水准较高的人去负担吧！因之我觉得一个民族的解放与建设是怎样一个艰苦的事业呵！

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经济好似还很宽裕，这是我的印象，因为终究我也还没有去调查过他们平均每家有多少财产。去年年底有一次我代一个朋友到边区银行去取存款，遇到几位穿着布棉褂与翻羊皮的老百姓，他们也是取存款，有一个折子上有九千余元，有一个有一万二千多元，又有一个有七千多元。这次因为有好些人上前方，大家为了东西不好带多，把不能带的东西都卖掉了，买主自然都是老百姓。听说这次买卖的数目达一两万元。老百姓什么都要，小孩的斗篷，女人的短袖旗袍，与西式的上身短衣……她

们最欢喜大红大绿的颜色，各种绸料，她们拿起来看一看，笑眯眯地问："这是什么东西?"这些曲线十分清楚的衣服，她们粗壮的身体实在也穿不上，但是不管五块、八块，她们也买去了。精明的人卖得较高的价钱，不精明的人 芬的一件鸿章公司做的衬绒旗袍，两块钱卖掉了 - 卖得低一点，但总是卖掉的，老百姓有购买力。

无疑的，这里的老百姓需要文化，与提高文化，这个就要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去着手了。

11 大检查与生产运动

去年冬天，大约十月里吧，边区开始工作大检查，分做两大部分来着手：军与党政学……这个检查是有极大的意义，真可说是符合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精神 -事实上在边区是什么都动员起来了。检查的目的，是在把原有的优点加以发扬光大，把原有的缺点加以改正，并且建立一个更合理化的工作制度。检查工作的进行是极其民主的，无论在学校或机关里，任何人都可以写出意见提到检查委员会上去。有些机关，如像八路军总政治部，还发出请求贡献意见书，给外来参观的客人与一些不参加政治生活的技术人员，请大家发表意见。特别着重于希望人家指出缺点，他们这种求进心，这种谦虚心都值得全国仿效。

一个学校或一个机关在开检查会的时候，实行回避，就是说该学校或机关的负责人故意走开，使得任何人不会

因怕负责人的威严而把意见忍下不表白。这个大检查工作曾经过三四个月之久才结束。其间有的学校或机关检查一次不满意，再检查第二次的也有，非常认真。在检查工作中，大家不但相互批评，而且也着重自我批评。这样，在极科学而很民主的检查方法下，一切工作的阵容又更加整齐而活泼了。

这里最大的优点，是大家集中团结在一个集体的领导之下，这种优点，当然我们做客的人并不能深切地接触到，但我们还可以看到，感觉到一点：譬如在一个民众大会上，尽管发言的人很多，但决不会意见纷杂，或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使听者莫明其妙，这种怪现象，在这里是绝对没有的。

大检查工作之后，接着来了一个生产运动，这是伟大的空前的运动，是的，说伟大，一点也不过分。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重庆也立刻起了响应，而有生产会议的召集。在抗战特别艰苦的第二阶段，生产运动是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它回答日本鬼子："不但中国有自力更生的决心，长期抗战的决心，而且还有自力更生长期抗战的行动！"什么地方曾有过这样类似的运动？几万人拿起锄头快快乐乐去开荒？自然给我的印象太深刻，可是怎样写述它呢？我没有资格，只有留给那些劳动英雄，无数的劳动英雄去写吧。

像别的工作一样，用着合理化的办法来进行。机关与

学校都参加了，人人热烈地拥护毛泽东先生这一号召。他们把劳动的人分几类，劳动力弱的（身体不好的）人，做较轻的工作（病人不参加劳动），有的用分工合作制，女同志留着做内务，帮助烧饭，烧开水，替开荒的人洗衣服，有些学校女同志也去开荒。在这里，什么事情都是领导人领导着做，说领导着做，这是确确实实的。离我住处不远的山脚下一块荒地上，在北方已经暖热的三四月的太阳下，午后，好几次望见陈云先生、李富春先生，他们在那里翻泥土，在边区，这些是他们做领导人的快乐，而不是别的。现在那块地上长出了浓盛的马铃薯，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在生产突击的时候，足足有一个多月工夫，整天开荒，耕地，打土，施肥，下种，完全同一个老农夫一样。在拔草的时季，他们大早四点多钟就上山来了。听说毛泽东先生在开荒的时候，常常一边耕，一边说："克服困难！"这里的生产运动像别的任何事情一样，领导人都起着模范作用。

我真要替这些荒山僻地歌颂它们的幸福，这些多少年来未得人一顾的几十万亩荒地，（今年开荒六十万亩）一下子都得了翻身的机会，而且顷刻变成了一个灿烂的世界！"四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生产大合唱》中的一节），人们的脚步声，话语声同着歌声、笑声登上荒山去。几朝及时雨，使那些菜蔬、瓜果、小米玉蜀黍都展开了新鲜的绿叶子，含着微笑，将来，等待收成。去年，当我来的时候，我曾担心大家坐吃山空，同文协会里的几

位熟人谈着种白菜，大家以为文人的生产该是写稿子，卖稿子。今年，毛泽东先生的一个号召，不但所有的荒山都变了颜色，就是人也变了，许多文化人，艺术工作者都放下了笔头，拿起锄头，而成为生产英雄！到头来还该我自己要大大声明我的惭愧，我并没有参加开荒，只是到附近机关的厨房里帮助切了三次菜，好几位女同志还客气地把我的刀抢得去，一共并起来，不到两三小时吧。

12　送出征

结束这几篇拉杂的通讯时，想到有一天我总要离开延安，心里不觉茫然了。我是一个太容易习惯的人，住久了一个地方总舍不得离开，见惯了的人总是希望常常见面，忽然的一个送出征，又增加了心头许多惆怅。

去年冬天，我已经送过惠与环上前方，这两个质朴的女孩子，她们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放弃了家里有得吃的安安逸逸的饭，为什么呢？为打鬼子。她们在抗大学习了几个月，决然地上前方去了。

那天大早，十二月二十八日吧，在我住的山下，延水的那边，远远望见她们整队出发。地上积着深深的白雪，天空还在不断地飘着雪花。“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清脆的歌声穿过寒冷的空气送进耳朵，像火一样烧烫了我的心！我的心激跳了，我还留在延安，让我的心跟了她们一起去！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把它们颠倒过来：“昔我往矣，雨雪霏霏，……”回进窑洞里，感到异样的寂寞。有些朋友笑我用冷漠与静默来掩饰自己的热情。热情，不，我没有热情。我想或者还有友爱，我该提高对于践踏我故乡，杀害我同胞的敌人的仇恨，减少一点友爱的感情。

现在初夏清晨的和风里，又送走了一批朋友！立在窑洞前的山坡上，望见他们走过女大面前的桥，这座延安最漂亮的桥，延安的“阿历山大”。在夕阳里，走在延水边的沙滩上，一边“海”景，一边山景，远远望着这座木桥，“板桥流水”，又有异样的美丽。送行的人还依依立在桥的这一边，出征人的雄壮的歌声，《义勇军进行曲》渐渐远去了，旗子也渐渐消失了，走的人为要迎接一个新的动的战斗的环境，完成他们所担负的使命而惊喜着；留下的人呢，多少有一点寂寞与怅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想起一些古诗，我迫切地盼望延安的诗人们写出一首雄壮动人的现代的“送出征”诗。

他们走了，曾经偶然散过步的草地上，现在有了新来的人们的足迹与影子。呵！你们走了，当你们回来的时候，你们手植的树已经成荫！打了多少仗？杀了多少鬼子？我们回老家去吧！故乡的破碎的田园向我们招手，等待我们

去重新建设！我们所有的同胞，还要像现在一样，像在战场上一样，手携着手，团结成一个心去建设，哼！如果再分你呀，我呀，再来内讧，敌人是会再来的！愿我们团结着去抗日，团结着来建设！江南的金粉是柔软的，诱人的，要留意呢？它们会分散我们艰苦团结的心！回到故乡，哪怕是一个破碎不堪的故乡，我们将更加幸福，为赶走鬼子，为能够建设自由的新中国而幸福！

[illegible]

1 [illegible]

2 [illegible]

3 [illegible]

4 [illegible]

5 [illegible]

6 [illegible]

7 [illegible]

8 [illegible]

9 [illegible]

10 [illegible]

11 [illegible]

12 [illegible]